

三联
耳关

生活

2016.10.31
2016年第44期
www.lifeweek.com.cn

周刊

伊拉克三省行走记
不安的
中东



910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 ISSN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 82-20 定价: ¥15元



《经济学人》(英国) 2016.10.22

俄罗斯危机

目前,俄罗斯在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总人口减少,老龄化加剧,通货膨胀率一再创新高,与美国关系再陷僵局。普京在任期间,2005至2015年10年间,国家支出增加,经济增长速度从当政之初的7%下降至负增长。而普京强硬的对外政策恰恰凸显了俄罗斯长期衰弱的事实。



1



2



3



4



1 / 《时代》(美国) 2016.10.23 对抗性骚扰的斗士

格雷琴·拉尔森曾是美国福克斯新闻台知名新闻女主播,今年7月对福克斯高管提出性骚扰指控,并且被报复性开除。近日,特朗普在一次公开言论中有关女性的一句玩笑也再一次激起女性抗议。风波之后,拉尔森希望投入更多精力去对抗性骚扰,要让大众直面性歧视和性骚扰的社会问题。

3 / 《旁观者》(英国) 2016.10.22 波罗的海赌局

俄军表示,其新近在波罗的海附近的三个机械化步兵师部署和在加里宁格勒的导弹部署只是回应了北约在边境问题上的态度。而对北约,尤其是对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波罗的海三国来讲,俄军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他们焦虑的神经,即便能想到俄方可能只是出于防御的战术考虑。这种谁也不会轻举妄动的对峙就像一场赌局。

2 / 《外交世界》(法国) 2016.10 冰岛复生

2008年10月金融危机到达冰岛的最初几天,三家主要银行相继倒闭,金融体系完全崩溃。如今8年过去了,虽然冰岛的经济得到了全面复苏,本年度更是财政盈余,但随着月底即将开始的立法选举,人们还要面临社会关系的再次确立,宪法、移民、住房和税收等问题均将被再度重谈。

4 / 《纽约客》(美国) 2016.10.24 冤案平反的征途

去年,全美共有157名含冤入狱的人得以平反,而冤案的产生并非仅由于个别执法者的行为不当。在重查疑案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刑事司法体系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会影响、致使正直的法官、公诉人和陪审团做出误判。翻案的推进也不得不受限于漫长的程序和其中的变数。目击证人的证词可能不足以可靠到能作为定罪的决定性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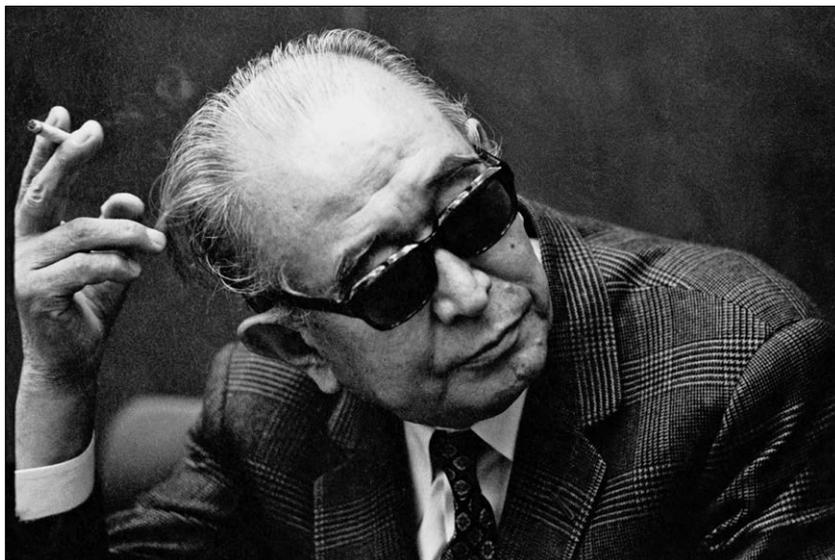
P30 封面故事

伊拉克三省行走记

不安的中东

36 沙中之墙：今日伊拉克目击记

54 失去的胜利：美国在中东



P112 日本推理, 通往世情与人性的幽径

社会			
时事：新兴市场之殇：蒙古经济探底	74	音乐：那个叫柯川的爵士萨克斯手	136
热点：景海鹏和陈冬：执行新任务的航天员 升空	84	生活方式：跟随盐野米松寻访日本手工艺	140
数据：自行车会回到城市吗？	88	设计：不含脂肪的有机设计	150
专访：“终身监禁”，落马官员是否真的会 “把牢底坐穿”	95	思想：元无知的危险	160
城市：胡同里的微型城市化	98	书评：锐利之眼，发情之眼	162
经济		专栏	
市场分析：美债遭遇大规模抛售	72	邢海洋：尾气无解？	16
专题报道		袁越：从皮肤细胞到健康婴儿	156
日本推理，通往世情与人性的幽径	112	张斌：你到底是小熊还是扬基？	158
岛田庄司式迷恋	118	宋晓军：南海局势与中国的“新长征”	159
有一种温暖，叫伊坂幸太郎	121	朱伟：王安忆：我们以谁的名义 (7)	164
文化		朱德庸：大家都有病	166
话题：布鲁塞尔的街头漫画墙	124		
逝者：诺贝尔文学奖史上最响的“屁”	128	(本期封面摄影：张雷)	
电影：于佩尔和《她》：一半是共谋，一 半是受害者	132	环球要刊速览	2
		读者来信	8
		天下	10
		理财与消费	18
		好消息·坏消息	20
		声音	21
		生活圆桌	22
		好东西	26
		个人问题	168

2016年第44期，总第910期，2016年10月31日出版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
 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权利。



www.lifeweek.com.cn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总编辑 Publisher

路英勇 Lu Yingyong

副总编辑 Deputy Publisher

常绍民 Chang Shaomin

名誉主编 Honorary Editor-in-chief

朱伟 Zhu Wei

主编 Editor-in-chief

李鸿谷 Li Honggu

副主编 Deputy Editor-in-chief

李菁 Li Jing 李伟 Li Wei

主编助理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吴琪 Wu Qi 曾焱 Zeng Yan

采编中心 Editorial Center

资深主笔 Senior Editor

邢海洋 Xing Haiyang 王小峰 Wang Xiaofeng 谢九 Xie Jiu

袁越 Yuan Yue 陈晓 Chen Xiao 王星 Wang Xing

主笔 Editor

李三 Li San 鲁伊 Lu Yi 钟和晏 Zhong Heyan

薛巍 Xue Wei 陈赛 Chen Sai 葛维樱 Ge Weiyang

贾冬婷 Jia Dongting 蒲实 Pu Shi 徐菁菁 Xu Jingjing

杨璐 Yang Lu

主任记者 Senior Reporter

李翊 Li Yi 关海彤 Guan Haitong 李晶晶 Li Jingjing

蔡小川 Cai Xiaochuan 曹玲 Cao Ling 何潇 He Xiao

黑麦 Hei Mai 程磊 Cheng Lei 石鸣 Shi Ming 丘濂 Qiu Lian

吴丽玮 Wu Liwei 俞力莎 Yu Lisha 王丹阳 Wang Danyang

记者 Reporter

邱杨 Qiu Yang 付晓英 Fu Xiaoying 孙若茜 Sun Ruoxi

杨聃 Yang Dan 张若凡 Zhang Ruofan 周翔 Zhou Xiang

刘敏 Liu Min 张月寒 Zhang Yuehan 张星云 Zhang Xingyun

艾江涛 Ai Jiangtao 宋诗婷 Song Shiting

特邀撰稿人 Overseas Feature Writer

赵潇 Zhao Xiao 苗千 Miao Qian

摄影记者 Photographer

于楚众 Yu Chuzhong 黄宇 Huang Yu 张雷 Zhang Lei

视觉设计中心 Vision Design Center

视觉总监 Visual Director

邹俊武 Zou Junwu

执行图片总监 Executive Photo Director

陈晓玲 Chen Xiaoling

设计总监 Design Director

王小非 Wang Xiaofei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黄罡 Huang Gang 刘畅 Liu Chang

插图 Illustration Editor

张曦 Zhang Xi

图片编辑 Photo Editor

覃柳 Qin Liu 陈喆 Chen Zhe 韩雅丽 Han Yali

编务总监 Coordination Director

程昆 Cheng Kun

发行中心 Circulation Center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雍江 Yong Jiang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周旭 Zhou Xu

区域经理 Regional Manager

杨雪梅 Yang Xuemei 潘海艳 Pan Haiyan

发行助理 Circulation Assistant

李卫红 Li Weihong 刘琳瑶 Liu Linyao

发行财务 Financial Executive

王霄 Wang Xiao

发行物流 Issue Logistics

王荻 Wang Di

发行库管 Release Library

姚贺梅 Yao Hemei

读者服务经理 Reader Service Manager

朱静 Zhu Jing

读者服务助理 Reader Service Assistant

金宇迪 Jin Yudi

市场发展中心 Marketing Development Center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钦征 Qin Zheng 傅东方 Fu Dongfang

新媒体事业部 New Media Development

总监 Director

钦征 Qin Zheng

内容编辑 Editor

薛凡 Xue Peng 刘彭媛 Liu Pengyuan 徐睿滢 Xu Ruihan 刘凌 Liu Ling

艺术设计 Artistic Design

张莉 Zhang Li

技术支持 Technology Department

刘国强 Liu Guoqiang

手机产品 MB Product

辛军 Xin Jun

平板产品 Tablet Product

连子君 Lian Zijun

活动事业部 Event Department

总监 Director

傅东方 Fu Dongfang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庄山 Zhuang Shan

运营 Operational Manager

罗启宏 Luo Qihong 邢宇 Xing Yu

产品经理 Product Manager

殷佳婷 Yin Jiating

文案 Official Documents and Letters

孙名梓 Sun Mingzi

活动专员 Event Executive

周宇飞 Zhou Yufei

视频事业部 Video Department

李倩 Li Qian 吴冰川 Wu Bingchuan 孙明楷 Sun Mingkai

节气刊事业部 Solar Term Department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王晶 Wang Jing

设计 Design

袁媛 Yuan Yuan

创新产品中心 Innovative Products Center

松果事业部 Songguo Department

总监 Director

魏一平 Wei Yiping

运营部 Operational Manager

阿润 A Run 赵雯璐 Zhao Wenju 李骁楠 Li Xiaonan 赵夫宏 Zhao Fuhong

孙正之 Sun Zhengzhi 刘小荻 Liu Xiaodi

市场部 Marketing Department

孟佳 Meng Jia 赵卓 Zhao Zhuo 夏青 Xia Qing 尤帆 You Fan 奚牧凉 Xi Muliang

行政 Administration

叶秋菊 Ye Qiuju

行政管理中心 Administration Center

行政主任 Office Manager

高媛 Gao Yuan

行政助理 Assistant

刘蓓 Liu Bei 吴泓林 Wu Honglin

财务总监 Financial Director

郝大超 Hao Dachao

财务主任 Financial Controller

陈晓华 Chen Xiaohua

出纳 Accountant

张宇 Zhang Yu 李明洋 Li Mingyang

法律顾问 Legal Counsel

金桥律师事务所 马眉 Ma Mei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采编中心热线电话：

(010)84681030 84681029 (传真)

E-mail: 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84050425/51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 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不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 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 0063 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15.00 \$8.00 港币 20.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

法国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

如何购买 《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82-20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上海：上海汇敦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021) 63769858

成都：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28) 86667805

重庆：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3) 86359776

南京：南京星与火文化有限公司 (025) 83327129

杭州：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 (0571) 88256120

广州：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 (020) 87376490

武汉：武汉春秋书店 (027) 85493562

西安：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9) 82100585

昆明：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71) 64122816

沈阳：大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4) 23934765

哈尔滨：志诚远大书刊公司 (0451) 88341879

青岛：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 (0532) 83840608

济南：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531) 82903395

长春：吉林九歌图书有限公司 (0431) 82752206

大连：大连渤海书店 (0411) 84609410

南昌：江西省邮政报刊零售公司 (0791) 88820509

太原：山西森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351) 7065397

贵阳：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51) 5661974

兰州：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0931) 8521090

郑州：河南大河书局有限公司 (0371) 67647337

天津：天津天智书店 (022) 23683854

河北：石家庄远大书店 (0311) 83993043

安徽：合肥皖新书店 (0551) 64252409

新疆：乌鲁木齐市纵横文书刊有限公司 (0991) 5582981

内蒙古：呼和浩特融联书店 (0471) 6263358

深圳：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 22203426

长沙：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 (0731) 82253036

本期广告目录

- 封二~扉1 · 奥迪
3 · 科勒
17 · 中华瑰宝
71 · WWF
87 · 周刊征订
110~111 · 紫薇地产软文
117 · 周刊20年
139 · 周刊松果广告
157 · 三联新知广告
167 · 书店广告
封三 · 野生救援
封底 · 力度形象



拍摄二维码直接
下载客户端



新浪微博 @ 三联生活
周刊或扫描二维码



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下载
松果 APP

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电信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9000。包月 8 元，周一至周六每日一期。

网络支持



新浪网官方微博：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 QQ:800033183

力度国际文化传媒集团

《三联生活周刊》
全媒体广告独家代理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9号

齐家园外交公寓7-5-13

邮编：1006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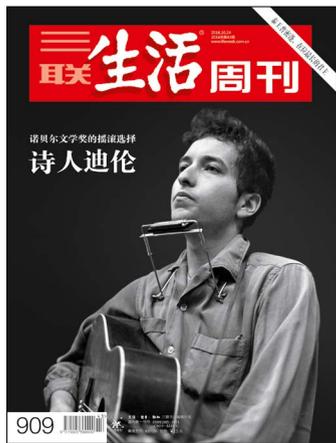
电话：+86 10 85325466

传真：+86 10 85324800

电邮：vtpower@vtpower.com.cn

网址：www.vtpower.com.cn

Vtpower
VITALPOWER MEDIA
力度国际文化传媒集团



诗人迪伦

说外国人不像中国人那样关注诺贝尔奖，那不准确。有一年在德国旅行时正赶上诺奖颁奖，几乎所有报纸的头条都在谈论这件事，只不过关注重点跟我们相反——我们模糊掉的东西，他们起劲报道。说诺奖反映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这是当然的；说它其实也没多大价值，这个不好说，价值观决定一切；说中国人不该那么热烈地关注诺奖、期待诺奖，言下之意缺了文化自信且太过追名逐利，这就有些尖刻了。——当国门打开，好不容易看到外部风光，世界最高的荣耀我们当然想看，想看出道道，还想跻身其间。中国人有诺奖情结，大概也说明我们还有梦想吧，不是坏事。有关诺奖的反思从来不缺，但我得说，因为诺奖，那些我熟悉或不熟悉、认同或不认同的人或事会聚眼前——袒露了多元世界的真相。感谢贵刊的呈现和解读。

上海 蒋明远

人为的“票荒”

“票荒”是国人的出行之痛。因此，我一直不敢在春节期间返家，更不敢利用节假日旅行。可是这个国庆节，我却不得不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8月下旬，赴京参加学习，结束时间刚好是9月30日。我深知国庆长假期间车票紧张，故而9月初就开始筹划国庆返家的订票事宜。9月1日晚上订票，网上一片灰暗，相宜时间的车次全部提示“无票”。近一个月的提前量，竟然无法买票！我只好求助在京的朋友。

朋友很是明白“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道理，他没帮我买票，却教给了我购票的方法。他告诉我：实在没票，就扩大购票区间，最不济的情况，扩大到终点站一般都会有票。不对啊，应该是小区间有票而大区间没票吧？带着疑惑重新订票，果不其然，有票了，而且数量还不少。按照相同的方法，试着查看了其他的车次，都是一样一样的，这不由颠覆了我对中学阶段关于“集合”“包含关系”等一些基本数学知识的认识。当然，买票区间扩大了，票价自然也就水涨船高了一——就我这次旅程而言，计划北京到怀化，只能买到北京至贵阳的车票，原本213元车费变成了268.5元，无谓超支26.1%。车票是9月2日订的，我也一直试图能抓住机会改签，虽然每天关注，但直到9月30日乘车，还是没能成功。

后来我发现，这种情况并非个例，甚至还比较普遍。去火车站途中得知，与我一起学习的一个同学，他计划回柳州，但购票

目的地却“被延长”到了湛江；及至上了火车，我就近询问了相邻、相对的其他五名乘客，除一名乘客计划行程与购票行程一致以外，其余四名乘客的目的地都被不同程度地延长，其中两人从湖北孝感“被延长”至贵阳，两人从湖南长沙“被延长”至贵阳，特别是湖北孝感的两名乘客，票价从141.5元被提高至268.5元，无谓超支车费近一倍。那趟列车，在长沙之前的沿途车站上下乘客数量总体维持平衡，始终处于比较拥挤的状态；在长沙站，上车乘客人数已明显少于下车乘客人数，特别是到了娄底站之后，车厢竟然空出了近三分之一的座位。面对这些为数不少的空位，我不禁惭愧起来：我们超需求购票，岂不是影响了其他乘客的出行，在不知不觉中成了票源紧张的帮凶？

据了解，为避免短途客流过多占用长途客列车票，满足长途购票旅客需要，并最大限度地保证列车上座率，购票系统实施了短途限售。我不否认铁路部门实施短途限售的良好初衷，但从这次乘车体验来看，执行情况却不尽如人意。乍一看，列车上座率很高，似乎是解决了乘客出行难的问题，实际上不仅没有缓解票源紧张，反而浪费了部分运力资源，还背上了“让乘客为冷门路段列车空载买单”的嫌疑。毕竟，超计划购票的那一段行程并非刚性需求，乘客提前下车空出了位置，但真正需要乘客的路段却买不到车票上不了车。看来，饱受诟病的“票荒”问题并不仅仅是因为运力不足所致，要解决这个问题，也不能简单一限了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湖南怀化 光明

一个农民的报刊亭

我想讲一个农民进城，求生于城市，回报于城市的故事。

我老家是县级市，城小，人口少。早先，我喜欢文学，市里哪里卖报纸杂志，差不多都知道。最初，街边出现一个卖报刊的小摊儿，木板上摆着样数不多的报刊，我看的报纸杂志全是在那儿买的。摊主是老路的姐姐，因他的姐夫在邮所工作，有接触报刊的便利条件，所以把老路乡下的姐姐领进城，摆了这么一个报刊摊儿。

市里规划管理，不许私搭乱摆，老路的姐姐把报刊摊儿撤到邮所旁，有些影响生意，但他的姐姐欣喜地说：“我们马上盖一间像样的报刊亭。”邮所对他们很关照，报刊亭说盖就盖起来了。不幸祸从天降，老路的姐夫清理建筑垃圾时，从高处摔下来，造成颅内出血，不治去世。老路的姐姐痛不欲生，回了农村，把报刊亭让给弟弟，就是老路。

老路十分珍惜，一心一意地打理报刊亭。各类报刊应有尽有，极其丰富。他从早到晚在拥挤的报刊亭里守着，像笼里的鸟。人却乐观，好说几句顺口溜，逗人开心。雨季时，一些房屋受损，老路的报刊亭未能幸免。于是，老路背起绿色的邮包，蹚水沿街卖报。老路说：“越是困难时刻，越要及时地把信息传递到千家万户。”卖报

过程中，看到积水影响出行，放下邮包，疏通下水井，受到行人的称赞。“是报刊亭让我立足，有了依靠。”老路动情地说，“我不忍心看到城市受伤害。”

去年，我回老家，去看望老路。老路的报刊亭又改变了模样。原来，为结合新型城市发展，统一规划，把一间间报刊亭打造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温馨书屋。老路早已把妻儿接到身边。儿子边帮他打理报刊亭，边读书，考上大学走了。女儿一心想开一家书店，做大做强。我高兴地说：“老路，你今非昔比，旧貌变新颜呀。”老路说：“小小报刊亭，改变我一个农民的命运。”

海口 李树林

失败的投资

半年前，接到母亲的电话，口气十分急切：她投资某敬老院的6万多元可能打了水漂。母亲的遭遇惊动了全家人。父亲离世后，母亲孤身孀居多年，一直守着她的老屋，说那儿有她固定的朋友和娱乐圈，离开了不习惯。除了节假日，她极少到儿女家过夜。尽管我们再三提醒，眼下社会上打老人歪主意的人太多，没想到母亲还是中了招。

说起来，母亲受骗的这个项目，看上去还是比较稳妥的，甚至口碑非常好。该项目是位于城郊的一家敬老院，母亲事先随他们的宣传

专车踩过点，对那儿印象不错。敬老院占地面积200多亩，环境优雅，交通方便，除了养老中心，还有家政公司、医院、健身房、老年活动室等，投资少说也有好几个亿，老总又是本地著名民营企业企业家，“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据称还受过中央高层接见。

正是这样一幅美好蓝图之下，母亲将积攒多年的6万元养老金，放心地交到他们手上。按合同规定，有了这6万元，母亲可以选择到敬老院安享晚年，也可每年获取12%的红利，如果这期间出现意外或病故，6万元可以转至儿女名下，还能获得一笔保险费。尤其是跟母亲联系的小鲜肉业务员，人长得帅，态度亲切，逢年过节嘘寒问暖，不时送来米、面、水果等小礼物，陪母亲拉家常，有时一聊一两个小时。有一回，母亲生病，不肯惊动我们，小鲜肉亲自送她上医院，帮着联系挂号、就诊，比我们做儿女的还要细心体贴。母亲感激之余，投桃报李，又将身边很多老年朋友介绍给小鲜肉业务员。岂料好景不长，敬老院经营不到一年，先是小鲜肉业务员突然失联，手机、微信均寻不见人，接下来是老总涉嫌诈骗被捕的消息。老人们急急租车赶至敬老院一看，这才得知里面所有资产

已被银行悉数抵押，敬老院也已易主，原来老总的一大堆荣誉称号，多是花钱买来的，他跟中央高层的照片，其实是PS的。有人对敬老院的固定资产做了评估，即使是按法定程序拍卖，也值不了多少钱，老人们的巨额集资款，别说利息，连本金都难以追回。

听完母亲哭诉，我陷入深深自责中。老人们之所以上当，除了无良老总的障眼法，社会监管的缺失，以及那些能说会道的业务员之外，还包括我们做儿女的关照缺位。母亲投资之前，曾试探性地征求我们的意见，并且有意将养老金交由我们保管。我们以种种理由，拒不接受老人的钱，虽然目的是想让她自己多花销，但如此阴差阳错，最终导致老人们的血汗钱被骗子吸走。

一场失败的投资，虽然缩水了母亲的财产，但也让我们有所反思，亡羊补牢。现在的我们，懂得了陪伴老人的重要性，不管工作再忙，也要抽时间陪母亲。她不肯到儿女家住，我们就按时回家。不管老人如何节俭，在尊重个人意愿的基础上，主动帮她理财。因为我们已经明白，只有留住健康，留住亲情，才能留住一个家的安宁，留住幸福的源泉。

湖南 蒋平



意大利 | 游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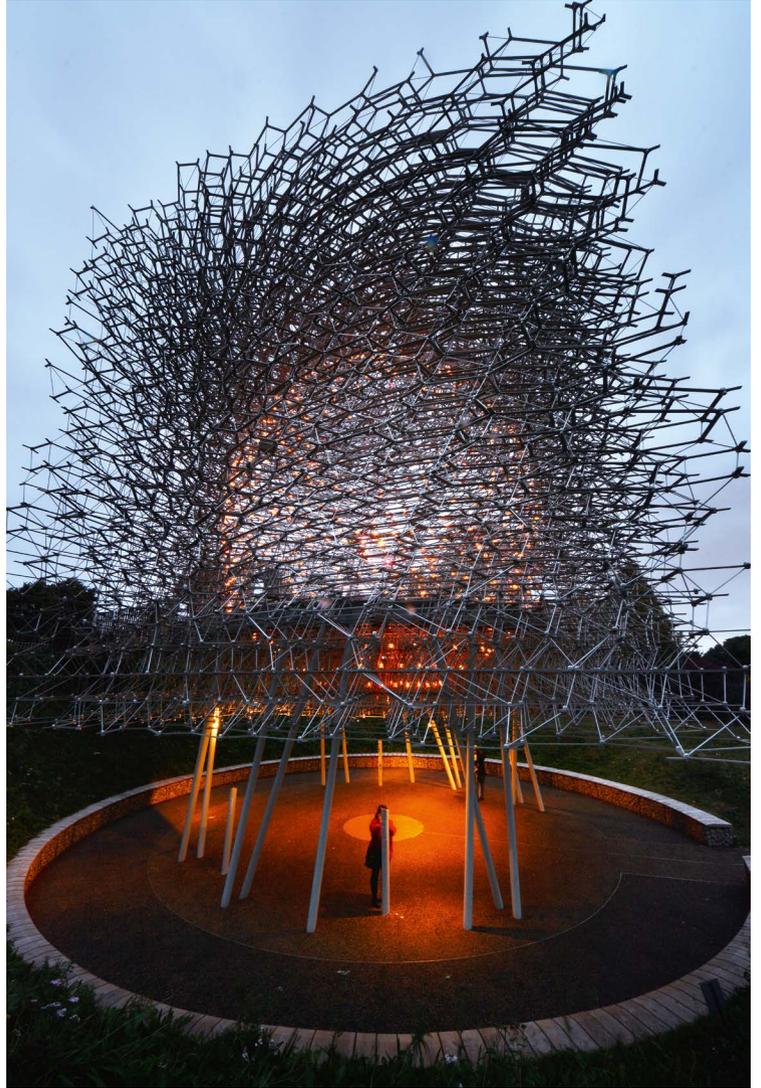
10月22日，意大利民众聚集在首都罗马市中心，参加反对伦齐的罢工大游行，旨在反对伦齐政府的改革政策。





英国 | “蜂巢”

(右图) 荣获多项大奖的建筑雕塑结构“蜂巢”(The Hive) 现坐落在伦敦皇家植物园。建筑反映了蜜蜂种群数量不断下降的趋势，以及授粉过程对于人类食物链的重要性，以呼应世博会“滋养地球，润育生命”的主题。建筑师可拆卸重组的设计理念，也让其得以成为第一个在 2015 年米兰世博会参展过后回到英国本土，并对公众开放的世博展馆。



印度 | 抗议

(左页上图) 10月21日，印度尼赫鲁大学的部分学生在新德里的内政部办公楼附近抗议内政部长拉杰纳特·辛赫对于前几日尼赫鲁大学一名大学生失踪事件无作为。这次抗议已持续6天，目前已有100名参加抗议的学生被警方拘留。

坦桑尼亚 | 鱼市

(左页下图) 10月20日，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岛的鱼市，工人们正努力把一条长喙鱼抬到车上。捕鱼是桑给巴尔岛的主要产业。





澳大利亚 | 雕塑展

(左图) 10月20日, 一年一度的海边雕塑 (Sculpture By The Sea) 展在澳大利亚悉尼塔玛拉玛海滩举行。图中展示的是一名慢跑者从一处雕塑旁经过。

中国 | 萌猫来袭

(下图) 10月22日, TICA 国际名猫展在武汉举行。一只参展的英国短毛猫引来关注。



尾气无解？

文 / 邢海洋

燃煤被认为是北方冬季雾霾的头号“杀手”，汽车尾气紧随其后。10月份，取暖季还没到，钢厂也早就限产，雾霾却卷土重来，除了那个虚幻的厄尔尼诺，尾气责无旁贷了。日渐拥挤的道路，浓烟滚滚的重载拖车，甚至外地牌照农用车在京郊大地畅行无阻，削弱了人们对交通治霾的信心。

农用车，顾名思义，只能用在农业用途上，不允许在省道、国道上行驶，更不允许从事运营活动。可在北京的郊县公路上，车流中时不时会见到收废品拉砖瓦货运的农用车，在进入北京的交通检查站时，这些喷云吐雾的车辆也能顺利通关。笔者曾向农用车司机讨教通关秘籍，他们似乎理直气壮，认为这是他们正常的谋生手段，不容置疑，可见交警对这些根本没有牌照的车辆是多客气。实际上也的确如此，自从道路交通监察越来越借助于无处不在的摄像头，那些从源头上就非法、连牌照都没有的车辆就成了“法外之地”。“互联网+”催生了外卖业的繁荣，外卖的交通工具中混杂着相当数量的摩托车，这也是一片“法外之地”。由于缺乏监察，农用车和摩托车也往往是尾气排放的大户。

大货车就更不要说了，环保部发布的《2016年中国机动车环境管理年报》显示，全国柴油车排放的氮氧化物接近汽车排放总量的70%，颗粒物超过90%。并且，占汽车保有量1.6%的国I前标准汽车，也就是黄标车，其排放的四种主要污染物占汽车排放总量的30.0%以上；而占保有量83.5%的国III及以上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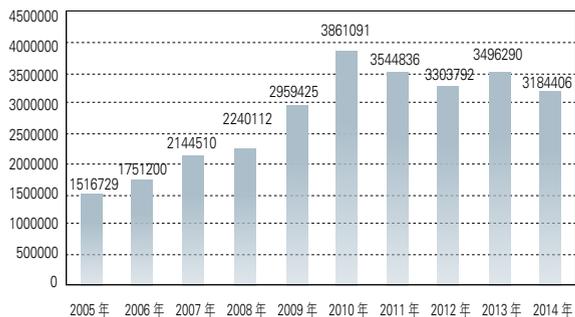
汽车，其排放量约为汽车排放总量的35.2%。按理说，这个冬季的雾霾多发季到来之前，减少黄标车数量，限制其使用应该是最见效的减霾措施。自去年7月，河北高速公路全面禁行黄标车，这一年北京市则全面淘汰了黄标车。可这些措施仍不能阻止该年雾霾红色预警频频发生，原因仍在于执法。

货车的问题不在于技术标准，不在于制作工艺，而是整个行业大面积造假。这些货车，合格证全是真的，车型也全是真的，环保部门也发了国IV绿标，可真正去检测尾气的时候，测出来的却是黄标车的尾气。进入10月以来，北京市已经发出四次雾霾黄色预警，中旬一次雾霾过程中，北京环保局一天内检查机动车3.3013万辆，处罚尾气超标车57辆、劝返外埠进京超标车4辆。环保局的执法可谓及时，不足0.5%的违规率，似乎也说明货车造假的情况得到解决。真的如此么？要知道，货车尾气治理可是金钱堆出来的，一辆柴油车想要满足新的排放标准除了需安装微粒过滤装置外，还需采用喷射尿素溶液的方法，将有毒的氮氧化物还原成无污染的氮气和水蒸气，载重40吨的卡车，百公里消耗的尿素价值9元，而新增尾气装置成本更是不菲。难道经过了2013年崔永元、2015年柴静以及全民的讨伐，重载货车行业“洗心革面”？

其实，仅从物流价格上，很难看到今年货车业在环保成本上的投入。9月份，一众物流公司的确集中提价，但那是针对交通部最新的《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规定》，新标准比旧标准允许装载量减少的缘故。而据测算，如果全部按照环保要求执行，运输成本将整体上涨15%。中国物流总费用占整体GDP的18%，其中运输费用占其中的50%以上，也就是占整体GDP的10%。按这个比例，货车的环保合规将推高通胀水平1.5个百分点。

当北京加速建设七环路，并将治霾的希望寄托在将过境货车引导为绕行时，你知道货车减排的艰巨了。中国物流成本如此之高，若将货车替换为发达国家的先进车型，也只有期盼着高速路免费、汽油价接轨等众多供给侧改革带来的物流实质降费，给环保投入以缓冲空间。■

历年全国货车销量





热烈庆祝《中华瑰宝》杂志荣获

中国最美期刊

2016年9月23—25日，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指导，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期刊协会、湖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武汉市文化新闻出版局承办的中国（武汉）期刊博览交易会如期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会议期间，发布了2016年“中国最美期刊”的遴选结果，《中华瑰宝》杂志荣获“中国最美期刊”称号。



期刊交易博览会开幕





栏目插图 | 范薇

扫货英国

10月9日，英镑兑美元汇率跌至自1985年以来最低水平，这一天也是中国的黄金周假期结束的日子。中国游客在伦敦核心购物区伦敦西区的零售消费同比增长了307%，平均交易金额也增加109%，达到1256英镑。今年的黄金周和去年截然不同，在中国股市暴跌后，去年“十一”黄金周中国游客的消费比2014年同期下降了8%。在英国最有价值的入境外国游客市场中，中国目前排在第10。

实体回暖的证据

8月铁路货运量增长1%，实现32个月来首增；物流景气指数（LPI）超预期反弹，9月LPI反弹到59%；进出口集装箱量也近两月恢复7%~8%的增长。这三个交运核心指标说明，实体经济反弹力度继续超预期，甚至将达到7%水平。另外，代表实体经济“流动性陷阱”的M1与M2“剪刀差”继8月出现历史性收窄后，9月继续收窄，显示企业投资和信贷需求上升。

人民币的“升”与“贬”

10月18日，在岸人民币对美元官方收盘价报6.7393，两周内，人民币持续下行，刷新6年新低。可按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截至10月14日，人民币汇率指数94.64，比9月30日的94.07上升了0.6%。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但对一篮子货币总体升值。在人民币指数的货币篮子中，美元的权重只有26.40%，其他12种货币占了73.60%，即使算上与美元挂钩紧密的港币，“美元帮”所占权重也只有32.95%。





博彩业磕磕绊绊

澳大利亚最大的博彩公司皇冠度假酒店集团3名澳籍高管因涉嫌赌博罪在中国被拘捕，在博彩业界引发震动，博彩股的反弹恐昙花一现。皇冠度假酒店集团在全球各地包括澳门经营赌场，集团收入因为中国政府禁奢肃贪导致许多豪客止步而大幅下滑。8月，澳门博彩收入188.36亿澳门元，同比升1.1%，扭转过去连续26个月同比下跌的趋势，博彩股在9月份连续受捧。

投行“大狂欢”

摩根士丹利三季度财报显示，三季度收入89.1亿美元，同比上涨15%；净利润16亿美元，同比飙升57%。至此美资五大投行，摩根大通、高盛、花旗、美银美林和摩根士丹利三季度财报尽出，全部超预期，表现亮眼。交易业务，尤其固收市场的惊人增速，帮助投行“卷土重来”。此前以瑞银、瑞信和德银为代表的“第二梯队投行”不断削减投行部门资产，精简投行业务，美资大投行们却更倾向于咬紧牙关，尽可能保留人员和基础设施。

营改增显效

9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12万亿元，同比增长4.9%。但其中的税收收入8243亿元，同比下降0.7%，是2015年2月以来的首降，“营改增”税改效果进一步显现。由于营业税按全额征税，不允许外购货物和服务已缴纳的增值税或营业税抵扣，导致重复征税，而增值税则只按增值额征税，故而起到减税效果。2012年实施“营改增”试点以来，税收增长也由高增长向中低增长转变，今年预计减税达5000亿元以上。

B股惊魂

10月17日午后1时半，上证B股指数突现“断崖式”大跌，全天跌去6.15%。B股虽是境内资产，但以美元计价，人民币贬值预期带来B股抛售。不过，人民币贬值、地产调控等因素并不能全部解释当日下午的暴跌幅度，投资者的集中抛售才是“祸首”。14日，国家税务总局曾就《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促使部分资金集中离场。





奶酪与美酒

下次品尝新葡萄酒的时候，千万别忘了配上个奶酪拼盘。发表在最新一期《食品科学杂志》上的研究指出，这样做可以显著改善葡萄酒的口感，尤其是那些因年份低、单宁浓度高而略带酸涩的葡萄酒。法国第戎味觉与摄食行为中心的研究人员是在调查了31名经常消费葡萄酒和奶酪的志愿者后得出的这一结论。分别品尝了4种葡萄酒和4种奶酪之后，几乎所有被调查者都表示，食用奶酪令红葡萄酒涩口的时间显著缩短，果香更加浓郁，而干白葡萄酒的主调香气则会变得更加突出。

好消息

一览银汉

借助北半球和南半球口径最大的两具射电望远镜的强大观测能力，德国和澳大利亚的天文学研究小组日前绘出了迄今为止最清晰、包含最多细节的银河系天图。这一研究结果有助于研究者更深入地理解银河系与邻近星系的结构，并为解释恒星形成过程提供了更切实的证据。



图胜于言

一张照片的说服力有时候胜过千言万语，在健康传播领域尤其如此。但什么样的图片才最令人难忘且能促成行为改变？以纽约大学医学院为首的研究小组调查了50名志愿者后发现，有行动力和号召力的图题、简明扼要的文字介绍和易于仿效的动作图片是成功的关键。

坏消息

不适与不安

身处高位固然风光，可由此伴生的患得患失也意味着付出健康的代价。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研究小组日前发现，在恒河猴群落中，与芸芸众猴相比，那些当下处于社会等级较高位置、但却充满不稳定因素的个体，体内炎症蛋白浓度更高，也更易患上心血管疾病和代谢疾病。

小岛难余生

因气候变化而引起的海平面上升对岛屿国家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领土面积的缩小，而是淡水资源的枯竭。发表于《地球物理研究通讯》上的最新论文指出，地下水的水位会随海平面一道上升，使得地表的湖泊面积增大，加速蒸发，这会令原有的淡水流失问题进一步恶化。



诗具有治愈的力量——并非仅仅以对病人。我知道在某些精神病院里诗被用来治病，如舞蹈和绘画一样。这意味着我们都需要医治，我们都需要治愈。我用现实医治着现实。

——以色列诗人耶胡达·阿米亥

穷人同上层阶级的人毫无共同之处。穷人并不艳羡富有者，因为双方的生活方式迥然不同，而且他们怀有一种典型的自得其乐的心理，总认为中产阶级的生活里充满了虚情假意，显得极不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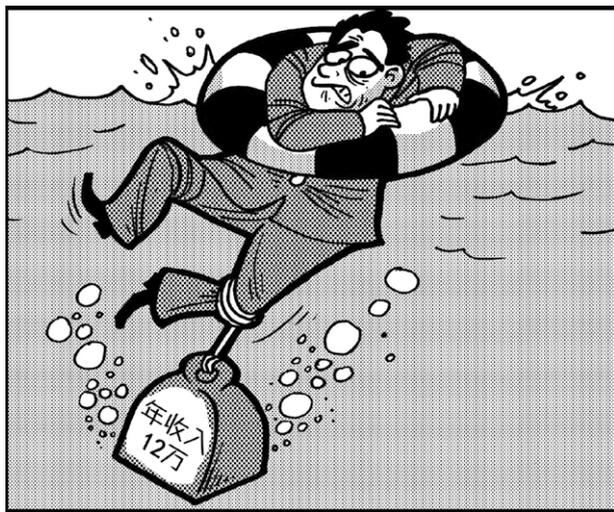
——毛姆，《人生的枷锁》

讽刺就像一种玻璃，观者通常能看到其他所有人的脸，却唯独看不见自己的。

——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

拉斯维加斯就像军队：鲨鱼准则大行其道——受伤的会被吃掉。在一个人人皆有罪的封闭社会里，唯一的罪行就是被抓到。在一个小偷的世界里，唯一的罪孽是愚蠢。

——美国记者亨特·S. 汤普森，《惧恨拉斯维加斯》



(插图 山羊胡)



一个作家总是很庄重地去争取自己的孤独，但接着又找到无穷的方法去挥霍它。

——美国作家唐·德里罗

+/-

数字

854

亿美元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以854亿美元收购时代华纳，市场估值约为2380亿美元的AT&T，近期已经采取一系列行动，逐步将自身改革成一个媒体巨头，包括在去年以485亿美元收购卫星电视信号提供商DirecTV。

12

%

国际葡萄和葡萄酒组织称，法国在春季遭遇了严重的霜冻和冰雹，随后又在夏季遭遇干旱，致使葡萄酒减产12%。这意味着意大利保住了世界最大葡萄酒生产国的地位。智利估计会减产21%。



1.17

亿

乔治敦大学法学院发布的一份报告说，美国联邦调查局人脸数据库收集了1.17亿美国人的面部图像信息，占成年人总人口的48%。目前美国有四分之一的州或警察局能够执行人脸识别搜索。

失窃的品位

文 / 南城织子

图 / 谢驭飞



窃以为Q小姐笃信星座说，这倒不是说她将24小时中的几分之一用来研究12大星座门派，而是她对星座说中的一条论调之信奉程度有一种山无棱、天地合也无法动摇的虔诚之气。“我们天秤座的人就是爱审美”是其高频语句，“天秤座人品位高雅、审美能力与众不同”之类的评语也就是Q小姐日常与非日常生活中的自信与欢乐的一大源泉。Q小姐数不清为陪好友和同学的面试、相亲等重大活动逛过几次街，备过多少行头，当然，Q小姐乐于对此“失算”，数不清意味着不计其数，意味着审美品位已获众人信赖，意味着在美学之朋友圈这一领域里担当着意见领袖的要务。

然而，Q小姐最近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麻烦，这麻烦正与品位有关：一干衣物被盗，价值350欧左右，若按原价计算则值800欧，也就是近3个月的房屋租金。这事儿对于留学生活开支几乎由打工筹得的Q小姐的打击力度可见一斑。海外中餐馆服务员，这行当向来僧多粥少，在市场杠杆的决定性作用下，Q小姐的时薪也就相当于法定最低工资标准的一半。不过好在暑期餐馆生意兴隆，老板管吃也管住，用出卖体力换来的银两可以全数入账。

于是，正在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又素来以品位为傲的Q小姐的钱包里多了张老佛爷会员卡，6折、半价、4折、3折，一件件春夏款宝贝在延续了整个打折季的烈日午间时光里成为Q小姐的压箱之物。Q小姐打工的餐馆位于郊区，餐馆、商场之间一个来回需一小时有余，时间如此仓促，淘来的宝

贝只能由一眼相中而获。但Q小姐就好这口儿，她笃信二眼望见的经过了迟疑，也就是权衡和比较，而一眼相中的那就是一见钟情，那叫只是因为衣海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

我毫不怀疑Q小姐对淘来的那些宝贝的浓烈情感，虽然此情并不能用“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来形容。在得知被盗的那一刻，Q小姐的呐喊响彻楼道：“我宁愿被偷的是钱，而不是衣服，它们代表着我的品位，我的时间和心血。钱被偷了可以再挣，钱只是钱，可这些衣服被偷了就再也买不到一样的了。”那天夜里，Q小姐反复念叨、描述着丢失的衣服的模样：“有一条黑色的及脚踝的半身裙，它是黑色的，包臀，双层刺绣，裙边有鱼尾设计。”那生无可恋的模样，若是脸上挂上些泪水，恐怕会让人误以为是十月怀胎诞下的孩子遭人贩给拐了。

据Q小姐的控诉，这一干衣服是搭配好了、一件一件叠放在最大号的老佛爷购物袋里的，没来得及收进行李箱，标签也未剪除。盗贼这一包一挑走，财力、精力统统损失不说，数个午后UVA、UVB的照射也都白受了。然而事发第二天正午，Q小姐便铆足了要收复旧山河的精气神儿，服务员的工作服一换下就立马奔赴了商场。什么叫“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Q小姐在看到打折区已由秋冬新款全数占据时，那体会着实彻底。当天，在得知各路人马灾后统计、损失最大者丢失了万余欧财物后，Q小姐又忽然为自己满面的忧伤感到了一丝羞怯。看样子，品位这东西，也是个矫情的玩意儿。☑

四爷的店

文 / 巫浩
图 / 谢驭飞



我习惯在工作日午饭高峰过去的时候，来到四爷的店，点上一锅黄焖鸡煲米饭。四爷的店门上，贴着两张硕大的广告“我们是来自广东清远的美味鸡煲”。给我上餐的小妹，长得很俊，年轻的面庞上写着俩字：青春。此时的四爷会坐在靠窗的座位，认真地洗着他那一套并不精致的茶具，身旁的电热水壶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橱窗里的陶瓷招财猫依旧在不停地向我招手。四爷不喝茶，只喝速溶咖啡，他拿着长条袋装的咖啡，捏着一头，使劲一甩，打开之后泡上了，抿一口，起身，背着手，巡视着店里的一切。那劲儿，那范儿，足得很。

四爷的名字叫“国超”，这是我在给他支付宝转账时知道的，同时我也知道了他还有个英文名字叫“Beyond”，我揣测四爷是个广东人，于是便问他。四爷扶了扶眼镜，点了点头回问我：“你呢？哦，江苏人。”四爷喝了口咖啡，说了句：“那咱俩算是半个老乡。”我一勺拌好鸡汤的米饭含在嘴里，思忖着，这也算是老乡？“四爷，那你喜欢恒大队吗？”“足球？我从1997年梦碎大连金州之后就不再看中国足球了，真是失望糟糕透了。”我知道我唐突了，就好像碰到一个来自曼彻斯特的人，我就自然地认为他一定是曼联的球迷。四爷接着又问我：“你是干啥的？”我摇了摇胸前的工牌。“哦，做留学的，你在塔几？哦，三塔。这让我想起了那遥远的三塔寺，它们在大理啊。”

四爷沉默了一会儿，他戴着圆镜框的眼镜，我觉得他有点像末代皇帝溥仪。他抬头看着店里

的电视节目说：“你看看，这些人为了钱，什么都能干，什么都敢干，真是糟糕透了……”我感觉四爷有点愤怒了，故意打了个岔：“四爷，您家这鸡是广东清远的吗？”四爷的眼睛暂时离开了电视画面，也暂停了对这个世界满满的憎恶，瞄了眼我面前的煲：“哦，你这个不是，清远的鸡晚上才供应，你这个是大兴的鸡。”对话再次陷入了僵局，沉默……俊俏的小妹走向了后厨……

四爷突然再次发问：“你们留学好做吗？把人忽悠到国外去？你觉得这留学把人家老外那些好的东西都学会了吗？”我隐约感觉四爷可能是个愤青，也隐约感到对话可能无法继续，我努力岔开话题：“四爷，您这店生意还行吗？”说到这里，四爷嘿嘿地笑了起来，说了句：“凑合吧，现在啊也就搞搞餐饮业就行了，除了累点儿。哎，小红，把这个月的考勤表拿来给我。”我打趣道：“嘿，该发工资了。”四爷咧着嘴笑着，翻开了员工的考勤表。我和四爷的对话在我吃完煲里的最后一块鸡肉时结束了。我走出店门的时候，回头看了眼坐在那儿、戴着眼镜、一脸严肃、拿着计算器对着考勤表一通狂摁的四爷，想起了布克哈特说的一段话：“我对自由和国家都没有什么感觉，国家并不是由我这样的人构成的。我会对人友善而有同情心，我会成为一个很好的个体，一个有感情的人，一个精力充沛的人，我对这一切的发展还有些天分，我们肩膀上有着更沉重的责任：抚养自己长大。”

王仙女

文 / 卡尔
图 / 谢驭飞



王仙女怎么看都不像仙女。她其貌不扬，个子不高，微胖，皮肤还有点黑，混在人群里谁也不会注意她。尽管如此，王仙女并没有怨天尤人，自暴自弃，又或者以整容的方式让自己变得漂亮些，她说她很满意自己的容貌。她不喜欢化妆，讨厌在脸上涂抹那些工业制品。家人劝她多注意形象，否则就有可能孤独终老。早已过了30岁的王仙女看上去一点都不在乎，还放出话来：“我王仙女可不像你们一样，一辈子就仅仅为生存奔波。我还有更伟大的事业去做！孤独就孤独吧，你们难道没听说过古来圣贤皆寂寞吗？我虽然成不了什么圣贤，可我要活得像仙女，逍遥自在。”大家都觉得王仙女在说胡话，摇摇头走开了。

王仙女所说的事业准确地说其实就是行为艺术。她十几岁就开始穿着用蔬菜、报纸和塑料做成的衣服，头上顶着一朵大红花，阔步走在蝴蝶镇的大街上。王仙女之所以穿成这样，源于她跟朋友打的一个赌，赌输了就要穿得奇奇怪怪在街上走一圈。后来王仙女觉得这个想法挺有个性，就坚持到了现在。只要天气允许，人们总能在街上看见王仙女穿着仙女装走来走去，每一天都不同。起初大家用异样的眼神看王仙女，说王仙女神经不正常，还威胁要把她送到精神病院。王仙女最终以100分的考试成绩证明她一点毛病都没有，只是有点特立独行。转眼间十几年过去，大家渐渐习以为常，要是突然看不见王仙女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不知是谁把王仙女的故事发到社交网络，她很快便成了新闻热点。记者蜂拥来到蝴蝶镇要采访王仙女，有公司还说要大力包装王仙女，把她打造成东方的加布里埃·香奈儿，但都被王仙女婉拒了。她说她之所以打扮得奇形怪状，只是因为爱好，没有那么多功利心。她没打算让所有人都知道，借此获得什么好处。大家都说她傻，这么难得的出名机会都不好好把握。王仙女只是笑笑说：“仙女的人生你们不懂，我也不想解释。”

王仙女35岁那年嫁给镇上一个开书店的。他们的定情信物竟然是一本《庄子》，众人大跌眼镜，说太寒酸。王仙女却自得其乐，还说她需要的不是身披金甲圣衣、驾着七彩祥云的盖世英雄，而是知书达理、温文尔雅、心地善良的伴侣。婚后的王仙女开了间服装店，闲暇之余仍然穿着千姿百态的衣服出现在蝴蝶镇大街，就像在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时装秀。丈夫很支持她，还深夜帮她设计造型。这让王仙女非常感动，走起路来信心十足，大家都说王仙女变得比以前美了。

王仙女觉得她这辈子最值得骄傲的事情就是穿了十几年的仙女装，并勇敢地展现在众人面前。她虽然没有令人艳羡的外表，但能听从内心的声音潇洒地活着，也不算辜负这一次且只有一次的人生。有人说王仙女就是仙女下凡，在不完美的世界有滋有味地做着自己，就像那句诗说的那样：“生如蚁而美如神。”

情人养成计划

文 / 余音
图 / 谢驭飞



在古今中外所有已知的恋爱模式中，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培养出情投意合的恋人大概是日本独有的调教文化。而最开始的情人养成计划似乎起源于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书中拥有至高无上美貌的王子光源氏虽在情场左右逢源，却始终未能寻觅到完全符合他心意的恋爱人选，只因他的暗恋对象不巧是父皇的妃子，和所有痴迷于他的外表的女性同胞不同，这位妃子意志坚决地拒绝了光源氏的求爱。难以得偿所愿的光源氏于是处心积虑地进行了情人养成计划，把他喜爱的紫姬抚养长大，紫姬的容貌酷似他的梦中情人，再加上他严格按照自身品位去培养，最终让她成长为令自己满意的情人。

无独有偶，有着日本“恶魔文学”大师之称的谷崎润一郎写过一本叫《痴人之爱》的小说，书中的男子也是基于自我的需求出发，把一位在咖啡店打工的15岁美貌少女领回家，为她提供衣食住行，甚至出钱送少女去接受教育，少女在他的栽培下出落得愈发标致，唯有内在的涵养不尽如人意，英语搞不清语法，男女关系则混乱得像她的英语语法。男子却拜倒在少女的石榴裙下，甘愿任其摆布，甚至不惜掏空口袋为少女提供极其奢侈的生活。

山田泳美受到启发，也写出一本《贤者之爱》。从女性角度出发的情人养成计划，详细描写了一位女性花费了20年光阴，培养出和她性情一致

的年幼情人。为了顺利达到目的，她从情人出生的那一刻起开始实行她庞大的培养计划，由此逐渐成为对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传授他开香槟的技巧，香槟开启时不可发出“砰”的声响，开瓶必须轻柔发声，她教授他对待女人的态度、调情的手法，可见“养育”一个情人务必从细节上也达到自己理想的状态。

以上的情人养成计划最终完美地“制造”出适合自己口味的对象，唯一的缺点在于时间往往花费太久，导致年龄差始终横跨两人之间。面对成年后年龄小上一轮甚至更多的伴侣，一场情感上的博弈战在情人养成后展开。于是，山田泳美把谷崎润一郎写出的“痴人”定义为虽然培养出完美情人却在战役中丧失恋爱主权的一方，而她笔下的“贤者”则是始终掌握情感主权的聪明人。

现实生活中，贤者与痴人常常是基于对象而随时调整的，比如写出《情人》的杜拉斯曾经是被成功调教的一方，相信她年少时遇见的中国情人奠定了她一生的情感基调。而等她年老后，却遇见一位热爱她“备受摧残”容貌的年轻男子扬·安德烈亚，两人以情人的身份相处，她为他重新取名，写出以他名字命名的书，他则陪伴她在苍老的岁月里消磨余下的时光。■

本栏目投稿邮箱：mensula@sina.com



可穿戴疼痛缓解仪

这款名为Livia的止痛装置是一款便携的医疗设备。装置通过物理作用来缓解疼痛，机身配有一个开关键和两个用于调节刺激程度的加减按钮，使用时只需将硅胶贴放在疼痛位置并将其启动，即可感受到痛感的缓解。

至臻天文台女士腕表

欧米茄星座系列小秒针腕表是首款获得至臻天文台认证的女士腕表，确保了腕表在暴露于15000高斯强磁场的环境中仍可正常运转。白色珍珠母贝表盘的9时位置是小秒针表盘，日历窗则调整至6时位置。



双重用途公文包

Berluti与Krug合作设计的双重用途公文包，既让香槟爱好者放置香槟及酒杯，亦可用作携带鞋履的旅行袋。其内层使用了“grigio topo”超细纤维衬里，可以分隔香槟的隔断采用了可拆式设计，配套的法兰绒袋子可以装酒杯或鞋履。

微边框高保真度电脑

具有微边框设计的新一代 XPS13 是戴尔专为提升移动性及高保真度而推出的产品。它搭载了最新的第七代智能英特尔酷睿处理器，更强大的 60Whr 电池打造了超强续航力，使用 FHD 全高清屏幕最长可达 22 小时，在 QHD+ 屏幕上也可达 13 小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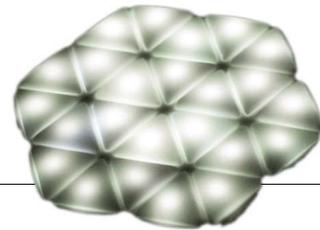


防辐射内裤

这款被戏称为“超级英雄内裤”的男性智能内裤“Wireless Armour”通过阻挡电子设备释放的辐射伤害来保护男性生殖能力。它将纯银材料“编织”在纤维之中充当“挡箭盾”，测试结果表明 99.9% 的电子设备所产生的 100MHz 至 2.6GHz 间电磁辐射都能被其屏蔽。同时内裤本身带有的金属耐磨纤维材质也将大大增加使用寿命。

智能袋鼠灯

袋鼠灯方便人们在漆黑的书包里翻找杂物，其表面材料是硬度 40 的硅橡胶，极大的柔软性方便折叠成任何形状。内置的 24 粒 LED 灯最强模式的光亮可以用作夜读灯。通过智能手机 APP 的连接，可以任意选择亮灯模式。



便携式电动滑板车

这款便携式可折叠电动滑板车的设计改变了传统滑板车的折叠方式，将电池隐藏放置在车杆中，节省了空间。车身主体采用碳纤维的材料，轻便的同时保证强度和安全性。以蝙蝠、蝉、鱼三种生物的形态为灵感的不同风格满足了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小鸟栖息

设计师尤马特·亚马克设计的 Perch 吊灯展示了小鸟栖息在枝头的诗意形象，抽象的纸质小鸟点缀黄铜细节，轻轻地晃动灯杆，鸟儿似乎随时会展翅高飞。

得洛斯手镯

爱马仕的得洛斯 (Delos) 系列是不同大小和形状的黄金、白银手镯，以爱琴海上的希腊小岛名字命名，手镯表面垂直的刻槽形似希腊建筑的立柱。



铝质家具

Emeco 品牌的 Run 系列包括矩形铝桌、凳子和搁架等，可持续的材料搭配简约、没有任何浪费的造型，适合室内外、工作、家庭等多种场所。



圣马克椅

Moroso 的圣马克椅将白蜡木和铝合金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材料组合在一起，阳极氧化涂层的铝合金椅管不仅减轻了椅子的重量，而且符合人体工学。



爱的手袋

纪梵希“爱”的系列黑色真皮手提袋，正面浮雕装饰炫目的红色“LOVE”字样，以此传递爱的力量，带手柄的手袋里面是一个可拆卸的拉链袋。

19 毫米腕表

Chanel 新款 J12 XS 腕表，别致的陶瓷和不锈钢表盘被缩小到直径 19 毫米，黑色漆面表盘四周镶嵌一圈圆形切割钻石，可以单独佩戴或选择与皮质护腕一起佩戴。



全铝音箱

英国音响品牌 KEF 与 Porsche Design 合作的 Gravity One 无线蓝牙音箱采用一体化全铝材质的机翼型设计，KEF 的同轴共点单元技术让听者在空间任意角落都能享受到优质的音效。

伊拉克三省行走记

不安的中东





10月21日，一名伊拉克少年骑车经过卡亚拉镇一处燃烧的油井。“伊斯兰国”武装在从该地区撤出前，破坏了当地的油田设施，并逼迫数百名平民随武装人员一同撤往摩苏尔，充当抵御政府军进攻的人盾。10月17日，伊拉克政府军开始对北部重镇摩苏尔发动最后的攻击



(张雷摄)



左图：巴格达解放广场附近一处破败的什叶派社区

右图：在拉希德大街的一间水烟馆，年轻人正在下棋

文 / 刘怡

世界不是平的

巴格达城给我的最初印象，并不是林立的清真寺圆顶、萨达姆·侯赛因时代遗留的浮夸雕塑，抑或两层奥斯曼式小楼外加装的木制雕刻窗（Mashrabiya）。从离开巴格达国际机场的第一分钟起，我的视野就被形形色色的“墙”切割成为无数不相连的碎片：连接机场和市区的12公里高速公路完全被高大的混凝土围墙和顶端焊接有带刺铁丝网的防护钢板所包围；透过围墙的缝隙，可以窥见两侧居民楼阳台上歪歪斜斜的防弹水泥护盾。公路尽头是被称为“绿区”（Green Zone）的政府街区和国际人士聚居地，同样为混凝土防爆墙和铁丝网所环绕，检查站林立；仅有的三个出口由美国和格鲁吉亚军人把守，无通行证者不得入内。在底格里斯河东岸的逊尼派聚居区阿宰米耶（Adhamiyah），一道5公里长、3.5米高的“巴格达墙”将老朽破败的居民楼围得密不透风。至于云集有数百万什叶派人口的河东区和萨德尔区，几乎每条小巷都只有一个出入口，另一端则被3.7米高的T形钢

筋水泥防护墙封住。这种表面为涂鸦和招贴画所覆盖的T形墙被称为“布雷默墙”——以2003年美军驻伊临时管理机构（CPA）首任行政长官保罗·布雷默命名。我有时不禁怀疑，伊拉克人是否把全国所有的水泥都用来建造“布雷默墙”、隔离护栏和反坦克路障了，这才导致1/3以上的巴格达市民依旧蜗居在历史超过50年的危楼中。

在《世界是平的》出版之后11年，我在巴格达见到了一个与书中的预测截然不同的空间。“布雷默墙”、武装检查站和街角巡逻的“悍马”越野车，将“世界”的定义由万里之外收缩到了肉眼可见的几十米范围内；支配人们思想和行动逻辑的不是托马斯·弗里德曼或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这样的全球化主义者，而是17世纪的英国人托马斯·霍布斯——当萨达姆·侯赛因的大利维坦崩溃之后，伊拉克的一切重新回到了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孤独、贫穷、肮脏、残忍和短命回来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也回来了。人们依靠宗教、部落、民族认同和民兵组织的庇佑来摆脱对暴死的恐惧，国家、国际组织和文化多元主义在这里统统沦为“他者”。乘车穿行在“布雷默墙”林立的巴格达街头，使人想起加拿大学者托



(张雷摄)

马斯·霍默-迪克森(Thomas Homer-Dixon)在《环境稀缺与全球安全》中的谏言：“车里坐着北美、欧洲、崛起中的环太平洋地区以及其他个别国家，它们身处风和日丽的后工业时代，举办贸易峰会、享受计算机和信息高速公路。车外则是其他地区的人们，两者走在完全不同的方向上。”

距今1/4个世纪以前，历时42天的“沙漠风暴”作战宣告了“冷战”走向尾声。伊拉克成为旧世界最后的注脚，也是“美国第一”(American Primacy)年代最初的祭品。1992年，弗朗西斯·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以不容辩驳的口吻为即将到来的世纪勾勒出了方向——“角斗场上的竞争者只剩一个人，那就是自由民主制——个人自由和人民主权的学说”；它的胜利使普遍均质社会的到来成为必然，人类将分享同质化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和基于自由市场的全球资源，时间和空间将失去意义。而作为“冷战”胜利者的美国，无疑是这样一个封闭时空中唯一和最后的霸权国。在那之后的十几年里，通过经济领域的全球化、政治层面的扩大结盟以及安全事务中的“人道主义干预”，美国正凭借其前无古人的权势冗余，一步步地将福山的规划付诸实践。而在第

一次海湾战争后勉强幸存下来的萨达姆政权，最终未能逃脱被清算的命运，在2003年的“伊拉克自由”作战中被连根拔起，死无葬身之地。

又过了13年，我们已经看到这出独角戏的终局：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新的“冷战”阴影正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滋生。朝鲜核危机、海洋权益争端以及形形色色的安全两难冲击着亚洲国家之间的互信，也使华盛顿被迫放弃引以为豪的战略机动性，“重返”亚太。希腊债务危机和中东难民的涌入导致了欧洲联盟的内部分裂，连带促成英国宣布“脱欧”。而在“阿拉伯之春”的焦点地带伊拉克和叙利亚，旷日持久的内战最终孕育出了恐怖主义恶魔“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并使整个世界处在其阴影之下。来自人口、地理、历史和宗教的反击，正在不断穿透那个被认为已经凝固的时空：历史仍在重复，历史远未终结。

100年前，奥斯曼帝国治下阿拉伯人的起义奠定了今日中东的基本版图；100年后，中东的“最初之人”正在日益远离华盛顿那些“最后之人”所向往和兜售的生活方式。从炮火连天的阿勒颇，到高墙林立的巴格达，再到刚刚被空袭光顾的萨那，新的全球政治觉醒并不对应“历史终结之后”的后现代困惑，而是回到了现代性开启之初的霍布斯式语境。如同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在《对话》中的发问：“一个深渊去了，另一个深渊来了……每一个都是一堵墙，每一个都让我闭起双眼。”

地理的报复

在伊拉克的第二个星期，我抽出时间造访了瓦西特省省会库特(Kut)。100年前，查尔斯·汤森少将指挥的英印军第6师在这里被土耳其军队全歼，造成“一战”协约国在中东战场最惨痛的一次失利。而我的下榻之处，就在此次战役最激烈的争夺点谢赫萨阿德(Sheikh Sa'ad)。入夜以后，人口稀少的乡村仅余星星点点的灯光，万顷平原向四面八方的延展仅凭肉眼就可以清晰捕捉到；毫无遮挡的土地从近在咫尺的底格里斯河河道一路覆盖向西，在月光映照下犹如宁静的海平面，仿佛可以凭速度轻松穿越。一瞬间，“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古希腊语意为“诸河之间”)这个佶屈聱牙的地理名词被赋予了具体的空间形象——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中下游之间，一块纺锤形的冲积平原提供了耕种用地、养殖场所、灌溉条件等易于形成定居城市群落的一切有利要素；同

时也缺乏天然地理屏障，无险可守。前者奠定了伊拉克在历史上少数和平时期的财富和人口基础，后者则使其沦为来自西部、北部和东部贫瘠地带的入侵者的战利品，并形成了威廉·麦克尼尔笔下毫无正面评价可言的高压法律——官僚系统。

“地理政治学之父”麦金德（Sir. Halford J. Mackinder）在20世纪初注意到，大航海时代欧洲人对世界之“西”与“东”的划分大致以苏伊士地峡作为中轴；而位于地峡和南亚次大陆之间的新月形地带，即习称的“中近东”，在早期文明史上一直是最脆弱的地理版块。它的灌溉河流和绿洲虽然催生过阿卡德这样的煊赫帝国，但也使海湾和通海河流无法对舰船锁闭，在不同时期曾先后遭受来自地中海、黑海和印度洋的覬覦。而在大陆内部，从中亚延伸到波斯湾的荒原对游牧民族的骆驼和马队是最理想的军事通道，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塞尔柱人和蒙古人、“背教者”尤里安和“壮丽者”苏莱曼，都在这里留下过印记。海洋与大陆入侵者周期性的渗入，乃至海陆力量间长达数百年的进攻和退却，造就了全世界宗教和民族状况分布最为复杂、最不易于被单一势力或目标合成整体的地理边缘——黎凡特（Levant）。

当奥斯曼帝国在1864年颁布行政区划法时，明智地维持了黎凡特事实上的分裂状态。在相当于今天伊拉克疆界的领土上，由北向南依次设置了摩苏尔、巴格达、巴士拉三个州，分别对应库尔德人聚居区、逊尼派聚居区和什叶派地区。阿勒颇州、贝鲁特州和耶路撒冷直辖区分享了东地中海海岸线，在巴格达与贝鲁特之间则横亘着祖尔直辖区和叙利亚州。某种意义上，这幅支离破碎的画面比今天泾渭分明的国界更符合黎凡特的自然历史情境：由阿拉维派穆斯林控制的那个“小”叙利亚州，与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在2015年最艰难的几个月中固守的最后堡垒几乎完全重合；毗邻波斯的巴士拉州，与其邻邦形成了基于共同教派的亲缘关系；而逊尼派云集的阿勒颇州、祖尔直辖区和巴格达州，则逐渐成为数十个民族交换有形商品和无形文化的区域市场。城市和要塞以外，被尊称为“谢赫”（Sheikh）的数百位世袭部落领袖在农村和沙漠地带行使着事实上的治理权，影响力远达阿拉伯半岛西部的汉志州、也门州以及内志埃米尔国（今沙特阿拉伯中部和东部）。远在君士坦丁堡的苏丹无法撇开谢赫们直接治理中东。

尽管萨达姆·侯赛因乐于将其权势与900年前的

萨拉丁联系起来，但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单一阿拉伯国家的愿景本质上是20世纪的产物。相比欧洲和亚洲的民族主义思潮，它更像是一种含混的文化观念——阿拉伯民族主义从来也没能回答包括多民族共处、教派团结和地方权力分配在内的一系列复杂问题；它是对土耳其和东欧民族主义的不成功模仿，在演变过程中又时时为权力野心和来自欧美的外部干预所左右。当麦加谢里夫侯赛因在1916年喊出“从阿勒颇到亚丁”的口号，并在英国支持下发动阿拉伯人起义时，他希望建立的是一个由哈希姆家族统治的准奥斯曼式哈里发国。而两位协约国外交官赛克斯和皮科在地图上轻描淡写的一划，注定了中东的分裂仍将延续，但并不是以合乎地理和历史传统的方式：分界线以北的法国委任托管地最终演变为叙利亚和黎巴嫩，南部的英国委任托管地则划分成伊拉克和外约旦。由于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黎巴嫩以南位于约旦河两侧的土地成为独立的巴勒斯坦，为日后以色列的复国埋下了伏笔。两大人为催生的中等强国叙利亚和伊拉克，意外“复活”的犹太国，加上征服半岛腹地之后坐拥石油财富的沙特阿拉伯，影响20世纪中东历史的大部分要素在30年代就已齐备。

之后长达80余年的历史，几乎成为一统天下的野心与顽固的地理、族群分裂之间的拉锯战：从纳赛尔到萨达姆，从第一次中东战争到“伊拉克自由”行动，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一度为严苛的现代官僚系统、复兴党意识形态和军事独裁者的个人权威勉强捆绑到一起的伊拉克，在进入21世纪之后恢复了涣散的部落化面貌。在它西方，叙利亚迄今为止仍在蒙受丧失传统势力范围黎巴嫩带来的振荡。而在半岛南部，沙特阿拉伯空军的F-15型战斗机仍在也门上空巡弋，以阻止胡塞武装深入无险可守的边境沙漠。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旧约·传道书》1:4）

均势与霸权

20世纪中东政治的演变轨迹和内在逻辑，很大程度上近似于16世纪以来的欧洲均势（Balance of Power）。无论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约旦还是沙特阿拉伯，都不足以凭借一己之力完成统一阿拉伯世界的任务。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上述中等强国中的每一个都曾经流露过扩张领土和对外输出影响力的倾

向。约旦开国君主阿卜杜拉试图建立一个包含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在内的“大叙利亚”；当阿拉伯联军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失败之后，阿卜杜拉毫无愧色地吞并了属于巴勒斯坦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并最终因此遇刺。叙利亚曾在1958年与埃及合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UAR），1976年又兴兵入侵黎巴嫩，驻军直至2005年。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和1990年对科威特的入侵则反映了萨达姆·侯赛因在波斯湾的野心。由于均势的自我生成机制，上述称霸企图只要稍微露出端倪，便会招来其他国家的警惕和联合抵制，甚至结成类似1991年“沙漠风暴”期间的军事同盟，直至霸权觊觎者被击败。

另一项相当微妙的共性在于，无论欧洲还是中东的区域均势，本质上都并非超然物外，而须以外部权势和资源的输入作为基础。欧洲均势之所以能延续超过500年，关键在于英俄两个侧翼大国（嗣后又加入美国）通过周期性的财政和军事干预，使欧洲大陆以外地区的资源可以被投入到欧洲内部的反霸权斗争中。中东同样不例外：从1916年英国为对抗中欧强国集团（德国、土耳其）而策动阿拉伯人起义，到1973年美苏两国舰队为庇护彼此的盟友在地中海陷入对峙，外部力量的干预往往能直接决定本地区国家变更领土和势力范围的尝试是否奏效。若无苏联在1967到1973年之间对埃及和叙利亚的“输血”，在“六月战争”中元气大伤的阿拉伯联盟军队绝不可能在1973年10月主动发起反攻。而以以色列在最初的猝不及防之后最终稳住阵脚，则直接受益于美国的军火和外交奥援。在位于“绿区”内的伊拉克国防部大楼前，至今仍摆放着1架苏制米格-21型战斗机、1辆T-72M型坦克和1辆BMP-1型步兵战车；在它们上空，美国制造的贝尔-206型直升机呼啸而过，恰好充当了这种外援之变幻莫测的一个缩影。

而两大地区均势体系的倾颓，最终也都源于外部权势输入量的“溢出”——在1945年，当美苏两国中的任意一方都拥有总量超过整个欧洲的人口、经济和军事资源时，间接干预已变得缺乏效率，直截了当的势力范围划分和“铁幕”的诞生遂成为必然。中东均势在21世纪初的崩溃，则直接源自后“冷战”年代美国无与伦比的军事优势和政治影响力：在2003年发起“伊拉克自由”作战时，华盛顿甚至已经无意如12年前一般，组织一个由联合国授权、包含部分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国际军事同盟，而是基本上由英美

两国的空中和地面武装直接承担进攻任务，并在短短一个半月里终结了伊拉克正规军的大部分抵抗。

讽刺的是，随后发生的一切，与历史上曾屡次出现的“帝国式过度扩张”（Imperial Overstretch）毫无二致。国际制度调控的缺位，使得看似简单的战后重建日益演变为界限无法控制的大陆义务；由新保守主义伦理观催生的“大中东民主倡议”，则触碰到了本地区诸多政权的心理底线，引发全球范围内反美情绪高涨。而对自身权势的绝对迷信，还使美国领导人对霍默·迪克森的警告充耳不闻——那辆全球化的豪华轿车自鸣得意地亮起大灯，疾驰在被贫富不均、敌视和焦虑之云笼罩的中东世界里，直至“阿拉伯之春”的悬崖突然在前方出现。此时再奢谈“战略收缩”，哪里还能阻止权势的自由落体式下滑！

这是一场只有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才会出现的悲剧：霸权国并未因假想敌的直接攻击而倾颓，却在对本身权势的轻率滥用中走下神坛。所牺牲的不仅有美国本身的优势地位和国际声望，连带也葬送了过去25年间与美国霸权捆绑在一起的所有幻想——超越地理空间的普遍全球繁荣，横跨大西洋的美欧联盟，预防一切民族冲突和仇杀的协调机制，以及以自由民主制终结人类政治史的终末论。如同亚历山大·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所言：“现代西方思想将逐渐消散于历史，被历史所吸收……如同我们的身体终将被分解成和构成青草、绵羊、肉饼的物质无异的分子一样。”

只是，乘坐航空母舰和运输机呼啸而来的美国人尚有抽身离去的自由，巴格达“布雷默墙”之后的居民却需要从头开始重建生活和社会秩序，并在准战争的“自然状态”下艰难地探索新的政治共识。经历了动荡的“阿拉伯之春”和暴烈的“阿拉伯之冬”，普通伊拉克人对政治家的任何承诺都已不再信任，而宁可藏身于宗教、水烟和有限的娱乐活动造就的个人避难所之中。在萧条凋敝的拉希德大街，有45年历史的“回声”书店老板指给我看一张发黄的旧照片：一名驼背的犹太老者正艰难地走过巴格达街头。“这曾经是犹太人在阿拉伯世界的生活状态；如今，佝偻的背和低垂的脑袋却成为伊拉克人的一生。”

（参考资料：Robert D. Kaplan, *The Coming Anarchy: Shattering the Dreams of the Post Cold War*; Thomas Homer-Dixon, *Environmental Scarcity and Global Security*）

沙中之墙：今日伊拉克目击记

文 / 刘怡





在杜胡克省一处尚未建成的难民营，三名自辛贾尔镇逃出的雅兹迪派平民在此暂时安身。“伊斯兰国”武装进逼摩苏尔以西的雅兹迪派聚居区之后，大批辛贾尔镇居民被迫逃入山中避难，最终被库尔德人武装“人民保卫军”救出



2015年4月13日，一名伊拉克安全部队士兵在巴格达巴勒斯坦饭店的露台上警戒。画面正中是昔日曾竖有萨达姆巨大铜像的花园广场，背景中可见灯光灿烂的“斋月14日”清真寺



这个在无政府状态中重新诞生的国家，依然深陷于族群分离和“滚木效应”带来的重重麻烦之中。但以个人威权和纯粹的武力压制社会潮流的时代毕竟已经远去，希望蕴藏在对差异的容忍和适应中。

知名旅行手册《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的撰稿人已经有整整7年不曾踏上巴格达的土地了。在2003年“伊拉克自由”作战的筹备阶段，美军曾经采购了一批90年代后期出版的《孤独星球》中东分册，以弄清伊拉克全国特别是巴格达全市的建筑和道路分布状况，并制订相应的进攻计划。但从2009年开始，即使在制裁年代也照常出入伊拉克中南部地区的《孤独星球》撰稿人中断了对这个国家的记录：部分原因是伊拉克政府迄今为止尚未恢复旅行签证的发放，部分原因是全国安全状况极为紧张。2016年版的《孤独星球》中东分册仅仅收录了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自治区的交通、住宿和景点信息；对占全国总面积超过80%的阿拉伯地区，手册的忠告是：“不可能也不应当成为任何游客的目的地。”

但对一个初次光顾巴格达的外国观察者来说，安全状况带来的紧张并没有那么直白显明。对“伊斯兰国”正面进攻的胜利降低了主要城市的恐怖袭击案件发生率，在我逗留于伊拉克的两星期内，巴格达仅仅发生了一起自杀式爆炸案。反而是拥堵至极的交通状况，足以令任何一个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旅行者感到胆战心惊：上一次系统的城市规划和交通设施扩建是由波兰克拉科夫的米亚斯托规划设计公司在1973年实施的；在那之后，绵延不绝的战火吞噬了政府的预算空间，道路改扩建和社区翻建几乎从未进行。43年时间里，商店、停车场和广告牌从各个角落自顾自地冒出来，外观、规格毫无一致性，使整个城市的面貌变得凌乱不堪。而在美军入侵之后成片竖起的“布雷默墙”和铁丝网，更使许多主干道变成了严格的交通管制区，塞车状况更为严重。数百辆“悍马”吉普和架设有有机枪的皮卡车在公路沿线四处设岗，随时叫停



1916年阿拉伯大起义的领导者、麦加大谢里夫侯赛因之子费萨尔（前排正中）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他后来成为现代伊拉克开国君主。
中排左二为后来的伊拉克首相努里·赛义德准将，右二为英国传奇游击队员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上尉

过往车辆并进行严格的检查：四车道就这样变成了两车道。而在拉希德区这样的老城巷陌，许多街道甚至不设交通信号灯，完全由汗流浹背的警察人工放行车辆。任何一次横穿底格里斯河的出行都要花费一个小时以上，包着头巾的小贩轻巧地在车流之中穿行，向焦躁的司机们兜售劣质红茶。

经历了超过30年的内外战争以后，伊拉克依旧不是一个缺乏活力的国家：开设有该国第一家苹果专卖店的巴格达商场大楼（Baghdad Mall）即将完工封顶，欧式理发店鲜艳的招牌就悬挂在伊玛目侯赛因的绿色旗帜之下。年轻人用各种型号的旧款 iPhone 和华为手机登录 Facebook，身穿巴塞罗那和皇家马德里足球队的队服。在卡迪西亚公园的摩天轮下，我甚至

目睹了一群包着头巾的年轻女孩用自拍杆摄下她们的合影，与全球各地的同龄人毫无二致。但总有一些迹象在不断提醒我，这毕竟是一片社会秩序尚未完全恢复常态的土地：每天停电3次到4次是正常现象，在毫无标识的政府机关大楼或官员私邸附近徘徊可能招来警卫的直接枪击，十几个民兵组织的纹章以及牺牲战士的照片就挂在路灯下方，买到一本美国印刷的英文书比买到一支美制步枪要困难得多。用《孤独星球》的话来说：“激动人心，但也令人生疑。”

两个星期的观察尚不足以遍及伊拉克的每一个角落，但已足够建立对这个国家的大致印象。随着对“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接近尾声，遍地士兵和枪支的伊拉克需要重新适应属于正常国家的生活方式。市民需

要住房，学生需要教师，城市需要稳定的电力供应、下水管道和高等级公路，放下 RPG 火箭筒和 AK-47 型步枪的年轻人需要从头开始学习阅读与书写。最重要的是，那些不近人情的防护墙和铁丝网，应当逐步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尽管上一次体会到安全和稳定的感觉，对他们来说已是太过遥远的记忆。

“阿里巴巴”

瓦西特省省会库特市的谢赫（Sheikh）阿卜杜拉与我面对面坐在华裔黄余庆家中的茶室里。人到中年的谢赫皮肤黝黑，气度不凡，说话慢条斯理。和大多数伊拉克人一样，他在饮用任何品种的茶水时都会加进大量砂糖。“您如何看待萨达姆·侯赛因其人？”“那是个大阿里巴巴。他在位时，政府的地位极其强势，说一不二。国家通过出口石油获得了大量外汇，但都消耗在无谓的战争中了。萨达姆被推翻之后，我们获得了一个弱势政府，一群小阿里巴巴代替了那个大的，政出多门，一事无成。油价走高时，阿里巴巴们可以勉强满足彼此的欲望；一旦下跌，就开始相互争吵。贫困率倒是没怎么变过，一向颇高。”

与中国人印象里那个足智多谋的阿拉伯樵夫不同，在伊拉克人的日常俚语中，“阿里巴巴”代表的是匪徒和强盗。甚至连美国大兵也学会了这种用法：他们把形迹可疑的武装分子一概称为“阿里巴巴”，与越南战争中的“越共查理”类似。而当这样的评价出自谢赫阿卜杜拉这样的大人物时，可信度就相当高了。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这位部落领袖就继承父亲的领导权，在瓦西特省的广大农村扮演着自治监护人的角色。海湾战争结束后，财政窘迫的萨达姆曾经接见过包括阿卜杜拉在内的大批谢赫，以承认他们的基层自治权和土地收益作为条件，换取各部落向国家的形式上效忠。与骑乘骆驼、居住在帐篷之内的古代部落酋长不同，大多数谢赫的势力范围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中小城市；他们依然拥有自己的庄园，但并无清晰的边界。在涉及农村土地分割、畜牧、纠纷调解、婚丧嫁娶等利益和社会事务中，谢赫具有极高的威望，有时也代替政府机构处理司法和税收事务，但通常不拥有规模太大的私人武装。部落的核心成员依旧作为一个整体生活在一起，在本省议会乃至中央政府中有大量亲属和代理人，谢赫阿卜杜拉的一位族侄便是现任伊拉克内政部警察副总监。“我本人的角色，类似政府与本省民众之间的调停人。”阿卜杜拉说

即使被送上绞刑架已有近 10 年之久，“大阿里巴巴”萨达姆在阿卜杜拉以及其他伊拉克人心目中的印象依然清晰。几乎没有人怀念这位暴君，但每个人都不止一次问过自己一个问题：与纯粹的无政府状态相比，单个独裁者的统治是否更容易忍受？毕竟，历史悠久的地理和教派区隔已经使伊拉克人习惯了“我们”与“他们”的区分：阿拉伯人是“我们”，库尔德人是“他们”；逊尼派是“我们”，什叶派和基督徒是“他们”；农民、小商贩和低级公务员是“我们”，知识分子是“他们”。萨达姆的暴政在某些时刻曾经侵犯到“我们”，但更多时候加诸“他们”头上，这形成了一种心理安慰。而绝对的混乱状况却可能随机性地伤害到一切人——在 2003 年美军入侵的最初几个月里，溃散的正规军、民兵组织以及武装黑帮在各大城市纵情劫掠，掳走从发电机、医疗设备、计算机到电缆、灯泡在内的一切有价值的公共和私人财产。在萨达姆时代受到刻意打压的什叶派社区及其代理人在这类活动中表现尤其踊跃，而他们最终在 2005 年的国民议会选举中成为主要执政集团。任教于加拿大约克大学的历史学家塔比特·阿卜杜拉告诉我：“你可以把这种劫掠看成是财富的原始积累。今天伊拉克的新贵阶层是在不光彩的抢夺基础上产生的，所以无法获得公众的足够敬意。”无怪乎同为什叶派穆斯林的谢赫会称他们为“小阿里巴巴”。

从 1979 年跻身最高领导人之位开始，萨达姆统治伊拉克长达 24 年之久，任内不仅发动了两次对外战争和数以百计的内部镇压行动，还把个人印记深深地刻在了从纸币、建筑到社区名称的一切事物上。今日戒备森严的巴格达“绿区”，并非美国占领军的创造，而是萨达姆留下的遗产。从他登上总统之位的第一天起，他本人以及复兴党领导层日常办公和居住的场所就被设置在这块由围墙和岗哨包围的封闭区域内。由英国设计师布莱恩·库珀主持修建的旧王宫被更名为“共和宫”，作为新总统的国宾馆，随后又建造了杂糅有新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建筑风格的复兴党党部。在 80 年代财力相对阔绰的阶段，萨达姆几乎把“绿区”变成了个人建筑趣味的展示地：250 米高的无名战士纪念碑、造型复古的国家庆典广场，以及浮夸的“胜利之手”雕塑，齐集于“绿区”内的阅兵大道周边。每逢 7 月 14 日共和革命纪念日或其他重要节庆，这位自恋的“大阿里巴巴”便会站到根据他本人的双手模型建造的“胜利之手”下方，检阅共和国卫队以及游行群众。至于平时，这些建筑周围往往空无一人，



普通民众根本无缘靠近。

尽管自诩为阿拉伯社会主义者，萨达姆在生活方式和行事手法上却更乐于模仿古代君主。从巴格达到提尔西特，“大阿里巴巴”造型浮夸的行宫遍布全国各地，他利用这些宫殿展示各种品味怪异的巨大雕塑和油画，宴请复兴党高官，举办舞会和狂欢派对。诸多行宫中最怪异的一座位于希拉的巴比伦古城遗址附近，背靠幼发拉底河，其中陈列着巨大的柏尔尼（黑夜女王）木雕和带有罗马柱装饰的浴缸，毫无美感可言。而这座号称“萨达姆山”的夏宫，就建筑在传说中的巴比伦空中花园遗址之上——一部分原因是萨达姆希望通过这番折腾，和他衷心崇拜的新巴比伦暴君尼布甲尼撒二世建立关联。这位公元前6世纪的君主曾经攻陷耶路撒冷、流放犹太人为囚，又吞并过巴勒斯坦，正是志在建立“霸业”的萨达姆的偶像。

当萨达姆对古代历史的附会达到极致时，他甚至

开始对巴比伦古城加以“装潢”——1983年，伊拉克政府宣布将在考古遗址的正上方重建巴比伦古城的外观，复原尼布甲尼撒时代的伊什塔尔门、城墙、宫殿以及高耸入云的巴别塔，全然不顾古城遗址的地基可能因此下沉甚至崩塌。今天，光临遗址纪念馆的游客依旧可以从一排排新建的城墙上发现明显的修补痕迹：真正的巴比伦遗物位于底部，上方整齐划一的新城砖则是萨达姆时代的做旧品，连带还有批量生产的呆板战马和狮子浮雕。每隔数米，城砖上便可见一段醒目的文字：“此墙系由尼布甲尼撒之子萨达姆重建，以增进伊拉克的荣光。”除去那座饱经风霜的玄武岩巴比伦雄狮雕像还是真迹外，古城遗址已经被萨达姆粉刷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可笑赝品。

已故西方文明史大家威廉·麦克尼尔曾经提出过一项关于两河流域政治历史的假说：由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城市群落分散、无险可守，统治者往往必须



(张晋摄)

左图：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期间，一名消防队员正尝试扑灭油井燃起的大火

右图：瓦西特省的一名伊拉克牧民在干旱的土地上

周期性地强化法律和官僚制度，才能确保自身的统治高枕无忧，故该地区在古代历史上一向暴君辈出。类似的评价同样适用于萨达姆：尽管只有少数人真正认为他值得爱戴，但在现代伊拉克历史上，萨达姆是唯一一位连续统治这个国家超过13年的最高领导人，他给伊拉克带来的影响之深超过其他任何一位君主。而费萨尔一世国王这位传奇的游击队领导人和1916年阿拉伯大起义的领导者，不过在海法街尽头的小广场上留下了一座规模不大的铜像而已。

评价现代伊拉克长达38年的前共和时代历史是不容易的。1958年革命胜利之后，复兴党大刀阔斧地抹去了关于哈希姆家族的三位国王及其统治经过的大部分痕迹，只有在古老的穆塔奈比文化街，仍有年过六旬的老人能稍微讲述他们从父辈口中听得的关于国王一家的往事。“费萨尔一世是一位伟人，”“回声”书店满面沧桑的老板贝拉尔告诉我，“他和他的子孙

都是彬彬有礼、极有教养的现代派君主，但他们不是土生土长的伊拉克人。”这位国王出身于麦加古老的哈希姆家族，是穆罕默德的直系后裔；他在大战中领导阿拉伯骑兵与奥斯曼帝国作战，因此被英国政府选中、成为由英国委任托管地变更而来的伊拉克王国的君主。但费萨尔象征的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萌芽时代，他的形象总是和英国官吏以及军人、对库尔德人的镇压以及殖民统治的遗产联系在一起。他设想过将伊拉克、叙利亚以及由他的兄弟阿卜杜拉统治的外约旦合并成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哈里发国；这在20世纪初还有实现的可能，但当伊拉克人独立的民族意识渐渐被教育和国界塑造出来之后，统一阿拉伯半岛已经变成了彻底的镜花水月。费萨尔的独生子加齐和孙子费萨尔二世如同两位尊贵而孤独的客人，继续居住在巴格达，直至在1958年的革命中被推翻。

贝拉尔拿出了一些翻印过的黑白历史照片：费萨

尔一世及其战友“阿拉伯的劳伦斯”出现在巴黎和会的会场外；加齐和他诡计多端的首相努里·赛义德与英国官员并坐阅兵；年轻的费萨尔二世和他的叔叔阿卜杜勒-伊拉赫摄政王谈笑风生……“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曾亲身经历那段历史，但我们讨厌萨达姆·侯赛因和他的一切，连带对那位年仅23岁就被杀死的小国王产生了一种稀奇的亲切感。”在日渐萧条的穆塔奈比大街和拉希德大街，历史超过100年的老店铺和老建筑上重新挂起了哈希姆王室的照片，以及消失整整58年的伊拉克王国国旗，仿佛这些并不真切的图腾可以作为过往的美好时代的象征加以缅怀。“有时会有一些年过七旬的老顾客找到我，我们一起喝着石榴汁，翻阅老照片，分享关于前萨达姆时代的各种记忆。许多人的口齿已经不再清楚，但提到遥远的往事，依旧会泪流满面。”

褪色的“黑金”

伊拉克国家石油公司(INOC)下属达乌拉(Daurah)炼油厂的高架火炬，在底格里斯河河曲的突出部上喷出熊熊火焰。傍晚时分，废气燃烧的火光在浓厚的雾气中摇曳不定，将河水映成一片橘红色，显得触目惊心。在与炼油厂隔河相望的小院里，伊拉克能源部长贾巴尔·阿鲁艾比(Jabbar al-Luaibi)的办公室主任马哈茂德略显激动地对我抱怨着库尔德自治政府在基尔库克油田问题上的自行其是。“他们的战士的确为保卫油田做出了贡献，也为北方石油管线的照常运行提供了帮助。但没有任何一项法令批准库尔德人自行出售原油并获得收入。如果每个省的政府都自行其是，伊拉克对其他产油国将如何交代！”

马哈茂德正在和我谈论的，是过去90年里伊拉克唯一一个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经济部门。没有石油这种“黑色黄金”，就不会有萨达姆这位“大阿里巴巴”长达近1/4个世纪的专横统治。有观察家认为，石油才是美国在2003年悍然发动“伊拉克自由”作战的最根本原因。坎布里奇能源研究协会主席丹尼尔·耶金在他的普利策奖获奖作品《战利品：角逐石油、金钱与权力的壮丽远征》中指出：“对美国人来说，包括沙特、伊朗和伊拉克在内的中东石油的重要性绝不亚于西欧的独立。中东油田必须受到保护，以确保整个西方世界的生存。”而石油和能源财富，同样构成了萨达姆在1990年入侵科威特的初始动机。

1927年对基尔库克油田的试验性开采取得成功之

(张雷摄)



1

(张雷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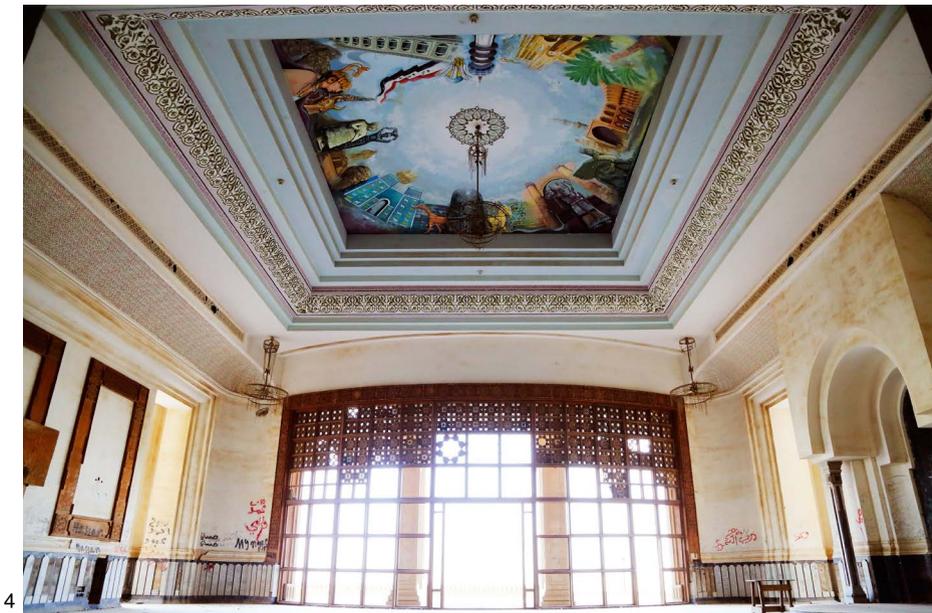


3



(张雷摄)

2



(张雷摄)

4

1. 瓦西特省省会库特市的谢赫阿卜杜拉
2. 巴格达拉希德大街一间历史悠久的水烟馆
3. 巴格达约旦街一处等待翻修的老旧民宅
4. 巴比伦遗迹旁“萨达姆山”行宫内的宴会厅



前，伊拉克的国家财政大致靠产出极不稳定的农业和畜牧业支撑。来自英国石油公司（BP）和壳牌公司的技术人员经过7年的勘探，确认该国石油储量至少可达1150亿桶，在全球排名第三，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其中仅北部基尔库克油田的探明储量就高达

90亿桶，且开采成本极为低廉。1934年，第一条连通基尔库克和海法港（今属以色列）的输油管道投入运营，在15年内使伊拉克的年均原油出口收入达到了201万第纳尔，占财政总收入的7.5%。而该国位于地中海和波斯湾之间的优越地理位置，意味着可以就



〔张雷摄〕



〔张雷摄〕

近修建多条输油管道，增加出口结构的多样性。1952年，连接基尔库克和叙利亚西部港口的地中海管线投入运营；第二年，巴士拉附近发现了新的油田，开辟了第一条经波斯湾出海的水路直通航道。到1958年7月14日革命时为止，石油出口占伊拉克财政收入的

百分比已经上升到了61.7%，年均获利接近8000万第纳尔，较10年前净增38倍之多！

“黑金”的价值不仅在于增加了政府手中的可支配收入，农业、教育业乃至城市化的发展速度皆与之密切相关。1956年，伊拉克政府利用出口石油获得的资金完成了萨迈拉大坝以及塞尔萨尔湖水库的修建工程，此举使全国可用耕地面积增加了200%，粮食作物甚至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到1960年，农业占全国GNP的比例上升到历史性的17%。随着1958年“七月革命”的爆发和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兴起，政府在1959年与英国资本控制的伊拉克石油公司缔结协议，将后者99.5%的特许开采权收归国有，仅允许其保留基尔库克油田的专营权。1972年，复兴党当局最终完成了对伊拉克石油公司的国有化，从壳牌、英国石油、埃克森、美孚和道达尔等欧美资本手中收回了能源产业的全部支配权，实现了国家垄断。

这是一个一本万利的决定。一年以后，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中的阿拉伯国家为了报复美国在“赎罪日战争”中偏袒以色列，宣布对美国、日本和西欧实施全面禁运。1973年12月签署的新定价协议将每桶原油的单价由2.9美元一次性提升到11.65美元；作为OPEC第二大产油国，伊拉克的原油出口收入由1972年时的6亿美元直接飙增到了1976年时的85亿美元，到1980年更是上升至史无前例的265亿美元。在激增的财政收入刺激下，萨达姆政府启动了声势浩大的经济开发进程。到1983年为止，伊拉克的总人

左图：巴格达海法街，一群从简易足球场内冲出的少年

右图：瓦西特省远郊灌木丛中的狩猎者



10月19日，伊拉克政府军士兵庆祝收复摩苏尔附近卡亚拉镇的一个村庄。10月16日凌晨，进攻摩苏尔的最后战役正式开始

口较25年前增加了一倍，达到1400万，其中75%的居民生活在城市住宅中，超过3/4的农村领土也已经被电网覆盖。人均收入由1968年时的96.9第纳尔增加到了1979年时的825.9第纳尔，成年人识字率超过80%，联合国甚至为此向伊拉克政府颁发了一项特殊贡献奖。激增的国民收入，除去提升了政府的支持

率外，也使好大喜功的萨达姆乐于建立一套惠及全民的粗放社会保障制度。从80年代初开始，每位伊拉克居民每个月可以凭身份证和户籍卡领到20公斤大米、5公斤面粉、1公斤食用油和一定份额的茶叶、砂糖，全体居民中有40%的人收入依靠国有企业或政府薪酬，政府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



“迪拜算什么！”贾希姆露出了不屑的表情。他的叔叔拉提夫·努赛义夫·贾希姆曾任复兴党军事局副局长，是萨达姆的亲信之一，在2003年美军发布的“扑克通缉令”中位列“黑桃10”。“当巴格达已经成为阿拉伯世界最繁华的城市时，迪拜还是一片沙漠呢！”这份傲气并非毫无根据：到80年代初为止，

伊拉克大部分城市已经拥有完善的国内短途航线，高速公路网遍布包括沙漠地带在内的全国主要地区。首都巴格达拥有整个中东最大的动物园、第二大的大学和最好的几家五星级酒店，文化中心穆塔奈比街被誉为“阿拉伯世界的查令十字街”（查令十字街是伦敦著名的书店街）。205米高的巴格达电视塔于80年代初动工修建，1994年最终落成，到2003年为止一直是全市最高的单体建筑。1980年建成的曼苏尔饭店，带有巨大的游泳池、网球场和篮球场，至今仍是许多国家驻伊拉克大使馆的临时办公地。

这种经济上的优越感，甚至不曾因海湾战争以及国际制裁的打击而削弱。政府依旧维持了对成年人的粮食配给；根据联合国制订的“石油换食品”计划，伊拉克每天可以向国际市场输出不超过200万桶的原油，以换取主粮、副食品和其他非军事物资。尽管人均GNP缩水了14倍之多，有超过50万婴幼儿因为缺乏药品和营养品而死亡，但政权没有崩溃，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居民外逃现象。到2003年为止，全国2550万合法居民中仅有30万人在海外流亡，部落势力的影响力回升则起到了安定家庭的作用。萨达姆一度甚至认为自己的领导相当高明，还有闲情逸致继续建造新的宫殿和巨大的城堡、雕像。

“2003年的战争给我们的石油工业带来的负面影响比预期的要小。”马哈茂德表示，“尽管部分钻井设施在空袭和反美武装的袭击中被炸毁，但因为出口额度不再受限，几个星期内我们的生产能力就恢复到了日均300万桶以上的水平，接近70年代末的水平。目前，我们有能力维持日均500万桶左右的产能，其中约1/5来自基尔库克。”包括法国道达尔公司、俄罗斯卢克公司以及中石油在内的国际企业参与了伊拉克能源产业的战后重建，在马哈茂德看来，国外企业的技术优势，有助于弥补伊拉克企业因为设备老化和开采工艺落后造成的损失。“现有的6组输油管线需要进一步扩容和更新，西部和南部新的油田区块也需要数百亿美元的资金投入才能创造新的产出。我们并不抗拒来自欧洲和亚洲的合作者。”

“包括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在内的主要产油国都提出了促进经济结构多样化的口号，以降低财政收入和就业结构对能源产业的依赖。伊拉克政府是否也有此种打算呢？”我向马哈茂德提出了疑问。他回答说：“有，但仅仅是计划而已。我甚至认为沙特阿拉伯的所谓‘多样化’方案也只是空洞的口号。国际市场的需要不会永远低迷下去，油价在低位徘徊的时间窗，



(张雷摄)

拉希德大街“回声”书店老板贝拉尔在他的店铺中

也比许多观察家预测的要小。你看，限产协议达成前后，北海布伦特原油的报价不是比几个月前有了明显上扬吗？重要的是，我们依然有规模足够大的未开发原油储量，而且开发成本在整个波斯湾周边也处于比较低的价位。你或许只关注了基尔库克、巴士拉这些已经在稳定出油的超大型油田板块，实际上，在占伊拉克国土面积 1/4 的西部沙漠之下还有非常可观的油气资源值得期待。受长期的国际制裁和战争影响，我们还没有对这些板块进行过系统的大规模勘探。一旦查明它们的确切储量，伊拉克的能源开发潜力甚至会直接超过伊朗。为什么要杞人忧天呢？”

马哈茂德的这番豪言壮语，也可以反过来加以理解：除去开采经验丰富并且产量稳定性大致可有保障的能源产业以外，伊拉克的其他经济部门大半处于凋敝零落的状态，根本无法获得国际资本的长期青睐。这种猜测，在国家投资委员会公共关系司司长萨莱赫那里获得了某种旁证。在被问及中国企业在伊拉克境

内的投资状况时，萨莱赫略显委屈地表示：“我们感谢中国和韩国企业在能源、电信产业以及服务业方面为伊拉克所做的一切，但大部分项目的运作周期时间还不够长。参与伊拉克经济重建的外国企业和服务公司超过 250 家，但只有不到 5 家从事的是长期项目。要知道，伊拉克是一个人口超过 3000 万的地区大国，我们在住房、电力、公路、建材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也有足够的支付能力。我们更希望在这些领域获得中国资本和企业的关注，也会推出相应的优惠政策。”

有什么企业会愿意在爆炸威胁尚未完全根除、交通设施和电力设备超过 30 年未见升级、教派和社群矛盾纷繁复杂的伊拉克从事投资多、利润率低、见效慢的住房和公路建设呢？在巴格达东部的什叶派聚居区，300 万到 500 万居民拥挤在空间窄小、缺少下水道、供电不稳的老式楼房里，为他们兴建住房并集中搬迁需要耗费的资金和动员能力完全无法按照常理推

断，而那些藏身于“绿区”中的高级公寓的政府官员显然承担不了这样的责任。“阿巴迪总理甚至无法阻止他母亲居住的那条街道被汽车炸弹炸毁，他又能拿什么来保证刚刚建好的新楼房不会马上被炸塌呢？”一位商店店主悲观地表示。只有负责向外国媒体和商人接受投资项目的萨莱赫依旧热情高涨：“随着北部的军事行动接近尾声，过去5年里暂时无法推进的10个大型基建项目即将在最近恢复对外国企业招商，各省也在上马自己的项目，不妨关注一下！”

武夫当国

伊拉克人对中国功夫电影和足球的痴迷，足以令外国观察者留下深刻印象。不止一名哨兵在查看过我的中国护照之后，摆出李小龙的出拳姿势，口中“嘿哈”有声。成龙和李连杰的知名度也相当不俗。而在阿卜杜拉的家中做客时，他的两个儿子整晚都在用结结巴巴的英语要求我回答三个问题：巴塞罗那和皇家马德里哪一支是更好的球队？梅西是世界最佳球员吗？为什么中国国家队会输给叙利亚？

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尽管你可以在巴格达萨德尔城的集市上用麻袋购买火箭弹和步枪，但伊拉克的电视节目中播放的几乎都是粗制滥造的本地室内剧，很少有战争电影出现。“这类电影的拍摄成本相对更高，政府也并不鼓励播出类似题材的节目。”贾希姆告诉我，“或许是因为关于萨达姆时代的战争，人们还没有形成比较一致的评价吧。关于和美国人的冲突也是如此。”唯一有上升迹象的是关于打击“伊斯兰国”的电视画面的出现频率，这是因为各大党派在此问题上的看法基本不存在分歧。

军人形象的低出镜率，并不是一种正常现象。即使不论如今街头随处可见的武装巡逻车、枪支以及四处悬挂的战死者照片，往上回溯到80年代，军人在伊拉克国家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也已经足够突出了。1958年“七月革命”爆发时，伊拉克武装力量还是一支小型的精英型部队，总数不过5万人。复兴党全面掌权之后，出于平息内部叛乱和参与对以色列战争的需要，将这一数字增加到了20万人，同时国家机构雇员中的20%需要直接或间接参与安全部门（主要是秘密警察）的活动。两伊战争进入高潮以后，武装部队的规模开始急剧扩充，正规军在1988年一度膨胀到95万之巨，再加上25万预备役和辅助部队，军队总数占到全国成年男子数量的50%。形形色色的军

事仪式和庆典，规模也变得越来越大。萨达姆那对浮夸的“胜利之手”雕塑，铸造手模的钢铁来自战争前线缴获的5000顶伊朗钢盔，两把重达24吨的弯刀则是用从阵亡的伊拉克士兵手中回收的步枪制成。即使是在经过了90年代的大规模裁军和国际制裁之后，2003年时的伊拉克依然拥有37.5万人的正规军、65万预备役部队以及超过8万人的精锐共和国卫队。

对美作战的结束并没有减少武装人员的数量。相反，由于派系矛盾的激化以及获取轻武器难度的降低，更多离开学校的年轻人拿起了步枪和火箭筒，开始参与名目不一的军事行动。根据伊拉克国防部公布的数据，截止到2016年春天为止，在伊拉克境内参与对“伊斯兰国”武装和其他激进反政府势力的军事行动的正规政府军共有30万人，警察30万人，私人安保部队约7000人，安巴尔省部落民兵3万人，隶属于政府赞助的民兵总团体“人民动员武装”（PMF）的40个小团体共约6万人到9万人，伊朗支持的“巴德尔旅”约1万人，库尔德人武装“决死军”（Peshmerga）20万人。以上数字之和已经接近两伊战争末期伊拉克正规军的总人数。而在他们对面，“伊斯兰国”武装和效忠于复兴党的部队同样超过了20万人。

在巴格达河东区的一间办公室，我见到了“人民动员武装”所属的民兵团体之一“伊玛目阿里营”（Kata'ib al-Imam Ali）的新闻主任迈赫迪，以及该团体的明星指挥官阿布·阿兹雷尔。这支组建于2012年的民兵武装成员不过数千人，但在2014~2015年从“伊斯兰国”手中收复萨拉哈丁省的战役中表现相当抢眼。看得出来，他们从自己的对手那里习得了不少宣传技巧：在迈赫迪的办公室里，七八名年轻工作人员正紧张地将战场图片、新闻以及其他资讯上传到Facebook以及其他社交网站，来增加本团体的知名度。迈赫迪告诉我，他们的成员大部分由新兴伊斯兰政党“伊斯兰伊拉克运动”从南部什叶派聚居区招募，部分成员曾是萨德尔派反美武装以及其他抵抗团体的资深指挥官。由什叶派达瓦党控制的伊拉克新政府成立之后，与该组织达成合作协议：允许“伊玛目阿里营”自筹资金、自行招募武装人员参与对“伊斯兰国”的联合打击行动。政府军给予其一定数量的弹药补给，并允许该部队使用政府军的训练设施、营地和补给站，但不负责阵亡人员的抚恤以及武器装备的配发。“伊玛目阿里营”通过其政党后盾和社会募捐获取资金，士兵一旦阵亡，其家属可一次性获得4800美元的赔偿和子女的长期教育赞助。

在我和迈赫迪交谈的整个过程中，隐身于套间内侧的阿布·阿兹雷尔始终一言不发，警惕地打量着陌生的来访者。这位蓄着络腮胡、身着迷彩服的健壮军人曾是大学体育教师，擅长跆拳道，口头禅是“把你们碾成齏粉”。2015年春天，视频网站YouTube上一度流传一段他用匕首刺死一名“伊斯兰国”外籍武装分子的画面，阿兹雷尔因此引起了英、法等国外媒体的注意，并获得了一个译名“死亡天使”。“我不是屠夫，也不是战争狂人。”他含蓄地表示，“我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保护伊拉克合法公民的生命安全。”迈赫迪也宣称：“一旦战争结束，我们的武装可能就此解散，将目标转为合法地参与议会选举和国家治理。”

很难揣度这究竟是一种托辞还是真诚的想法。可以肯定的是，参加这场战争的许多年轻人不仅不具备参与选举的能力，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书写。在巴格达街头，我至少有两次遇到巡逻士兵不懂阅读伊拉克签证的情况，必须电话召来一名资深指挥官或懂得英语的路人代为解释，才得以脱身。海湾战争之后的制裁使得许多知识分子和大、中学教师设法离开了伊拉克，意兴阑珊的年轻人也无心向学，旷课率居高不下。到90年代中期，伊拉克成年人的识字率已经由1987年时的80%快速滑落至58%。经历了2003年之后长达16年不间断的武装冲突和战争，这一数字已经进一步滑落至40%以下。高等教育的情形更加糟糕。谢赫阿卜杜拉反问我：“假如你的父母不是在石油行业工作，他们从哪里搞来钱为你支付每年1000美元到2000美元的大学学费呢？这个国家需要专业人才和知识分子，但在内战无法停止的情况下，国家大部分财政收入都花在了军费和维持居民的基本粮食配给上。你该是有多么大的热忱，才愿意自己贴上几千美元去读完大学和硕士课程啊！战争已经使整整一代年轻人接受教育的时机永远错过了。”

更重要的是，效忠对象错综复杂的各派武装，正在使伊拉克全国错综复杂的权力中心变得进一步固化，难以被重新统一。北部自治的库尔德地区，即习称的“南库尔德斯坦”，拥有独立的武装、立法机构以及部分征税权，实际上已经成为国中之国。这块面积7.8万平方公里、拥有550万人口的领土从上世纪20年代起就追求彻底的独立，以便与土耳其、叙利亚以及伊朗境内的库尔德人控制区合组成独立的库尔德人国家。萨达姆统治时期，曾经动用包括毒气弹和化学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库尔德人进行屠杀，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干预，也使南库尔德斯坦的高

度自治地位获得了来自外部的支持。尽管伊拉克新政府通过由库尔德人担任总统的方式缓解了彼此之间的分歧，但库尔德人对巴格达政权的效忠始终是有所保留的。一项富有深意的征兆是，从巴格达飞往南库尔德斯坦首府埃尔比勒的国内航班，竟然有经停阿联酋迪拜和阿布扎比的路线。而中西部的逊尼派控制区，则存在与叙利亚北部的阿勒颇地区同气连枝的传统，这也是“伊斯兰国”得以出现的历史和地理原因。而南部紧靠波斯湾的传统什叶派控制区，则把一只眼睛朝向国界以东的伊朗，仿佛那里才是他们的精神故土。

某种意义上，1916年赛克斯和皮科在叙利亚—伊拉克交界处画出的那道轻描淡写的分界线，造成的冲击至今仍在影响着伊拉克的命运。只是在超过30年的战争状态之后，这里的人已经疲惫到不敢再去想明天。“我们对美国人有过期待，对新政府也有过期待，可又有什么意义呢？”谢赫阿卜杜拉叹息道。

消失的读书人

“我的‘回声’书店开在拉希德大街已经有45年了。”贝拉尔抽着香烟对我讲述道，“起初贩卖收音机，后来是诗集、小说集和各种外文二手书。萨达姆时代的文化管制政策禁止一切政治类书籍的出版和流通，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但文学受的影响不大。人们尊重知识，也爱读书。那时候，政府高官和大学教授在下班后都会来到这里，喝上一杯茶或石榴汁，买上几本书，闲聊一番。我这里甚至能找到专门为一些老顾客留下的日文书和中国香港的杂志。但那已经是很久之前的的事了，有20多年了。”

今天的穆塔奈比街和拉希德大街已经失去了“中东查令十字街”的风采。2007年3月的一次自杀式爆炸炸塌了一栋历史超过100年的老楼房，造成26人身亡。在那之后，许多老店主沽清了店面，把旧书店改成了杂货铺或者货仓。“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消失了，读书人也消失了。”贝拉尔说，“最近20多年里，我的二手书货源主要来自移民国外的大学教授和政府高官。他们在前往伦敦、柏林和巴黎以前，把无法带走的诗集、小说和其他书籍低价转售给我，我就靠出卖这些过活。但经过几波迁徙，稍有经济能力的知识分子已经悉数离开了，并且永远不会再回返。我还能上哪里再去找货源呢？”

类似的话语，也出现在伊拉克国家博物馆馆长迈赫迪·阿里·拉希姆博士与我的交谈中，他说：



〔张晋摄〕

两名伊拉克女童在巴格达海法街的家门前

“我已经有将近 20 年没有聘用过本地的考古专家和文物修复人员了，因为大部分大学已经不再开设类似的专业。有知识、有头脑的伊拉克人，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大学老师，最好的飞行员，统统移民去了更安全、收入也更高的欧洲。我的好几位老朋友现在生活在伦敦。来到伊拉克参与考古项目和文物保护的，大部分是来自欧洲和美国的专家。为了弥补 2003 年那场战场造成的破坏，我们聘用有国外资金支持在欧洲团队领导文物的修复和鉴定工作：意大利人有挖掘罗马古迹的经验，负责现场；德国人有技术，负责鉴定；美国人有博物馆设计和布展的经验，负责场馆。至于本地的年轻人，我只敢让他们负责粗笨的搬运工作。”

作为全国最高博物馆的领导者，拉希姆博士每月领取 70 万第纳尔（约合人民币 4068 元）的微薄工资，也和所有普通市民一样，每月获得 5 公斤大米、少量面粉和食用油的配给。“欧美博物馆赞助的项目经费

中，有时会拨出一部分作为我个人的津贴。许多时候，我甚至会利用业余时间零零星星的欧美游客充当古迹导游，这才能有余钱支付两个孩子读大学的开销。这就是身为一个伊拉克人的人生啊。”

在博士的建议下，我造访了古朴庄严的卡济米耶清真寺，这里埋葬着什叶派十二伊玛目中两位的灵柩。清真寺的管理者友好地邀请我这个非穆斯林进入内室，在肃静幽深的穹顶下，我看到老老小小的市民安静地祷告、交谈；在院墙内陈列有各种语言版本《古兰经》的书架附近，还有佩戴十字架的基督徒出没。此刻他们所求的不仅是伊斯兰教的智慧，更是在动荡反复的时局中，为自己寻得一片心灵的庇护所。

我离开巴格达的前一天，一枚汽车炸弹在东部的什叶派聚居区萨德尔城爆炸，死 32 人、伤 60 人。☑

（感谢黄余庆、王矛、陈序、贾希姆·贝德里·萨莱赫、奥玛拉为本文提供的帮助。应采访对象的要求，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失去的胜利：美国在中东

文 / 刘怡

过去的25年（1991～2016），对四位美国总统来说，中东政策的意义，在于它恰好充当了大国关系、全球化进程乃至单边主义之运作效率的绝佳验证物。而美国在阿拉伯世界形象的崩塌，正是单极霸权本身命运的象征。

萨达姆·侯赛因高6米的全身铜像，于2002年4月28日，即这位政治强人65岁生日当天，在底格里斯河东岸的巴格达乐园广场（Sahat al-Firdaus）揭幕。与河西充斥着浮夸的现代主义建筑和巨型广场的政府街区“绿区”相比，位于卡哈尔街和穆萨纳·谢巴尼街交叉口附近的乐园广场面积远为局促，不免使慕名而来的外国游客大失所望。但对统治伊拉克进入第23个年头的萨达姆本人来说，这依旧是一个象征意义足够突出的地点：在广场东北角，是以伊斯兰教斋戒期结束之日命名的“斋月14日”清真寺，代表这个国家的宗教传统。西侧并排的两栋大楼是80年代修建的地标性建筑——18层的巴勒斯坦饭店和118米高的喜来登伊什塔尔饭店，代表海湾战争之前的黄金岁月。沿着穆萨纳·谢巴尼街继续向东北方前进，则可抵达占地200英亩、年访客数量超过150万人次的巴格达动物园；在国际制裁的压力下，这是伊拉克人少有的休闲去处。而萨达姆的铜像就矗立在这些建筑之间，傲慢地俯瞰着这里的一切。

2003年4月9日，美军攻下底格里斯河畔的总统行宫之后第三天，前国家摔跤队队员卡齐姆·谢里夫手提一把10公斤重的大锤，抡出了砸向铜像基座的第一锤。路过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调来一辆M88A2“大力神”型装甲回收车，将钢索套到铜像的脖子和脚踝上，随后发动柴油机，高举右手的“萨达姆”从6米高的底座上重重跌落下来。聚集在巴勒斯坦饭店露台上的各国记者拍下了巴格达人向铜像吐口水和丢鞋的镜头，并通过电视信号和互联网传递到全世界，成为这场战争中最富煽动性的一个画面。两个多月后，残留的基座上重新竖起了一座由年轻艺术家艾尔·达维里





2014年9月7日，库尔德人“决死军”女战士尼加尔的父母在她的坟墓前痛哭。19岁的尼加尔在三天前牺牲于对“伊斯兰国”的作战中



设计的绿色现代主义雕塑：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人共同托起冉冉上升的新月和太阳，代表了伊拉克各民族和各教派的团结一致。

整整 13 年过去了。踏进巴格达城的美军作战部队，大部分已在 2011 年底之前撤出；剩余的安全人员和军事顾问回缩到西岸的“绿区”，托庇于萨达姆时代残留的高大政府建筑。巴勒斯坦饭店和伊什塔尔饭店在装修之后重新开始接待外国旅客，但多次遭到迫击炮、汽车炸弹和火箭弹的袭击，不得不用数十米长的“布雷默墙”将底层整个包围起来。达维里那座赶制出来的“团结”雕塑，因为锈蚀严重，已经在 2013 年被拆除。就连挥出第一锤的谢里夫，也开始对当初的激情之举感到后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那座光秃秃的底座上方，至今还残留着萨达姆铜像的一只脚掌，仿佛他才是这出悲喜剧最后的胜利者。

乐园广场上发生的一切，浓缩了过去 25 年美国

中东政策的命运：他们在每一场军事斗争中都能轻松获得胜利，却无法将任何长期战略贯彻下去。从“沙漠风暴”“沙漠之狐”到“伊拉克自由”，接连四位美国总统从未停止过在伊拉克境内的军事行动，却始终不曾成功地将其纳入寻求大国协调、管控地区冲突以及完成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总体框架之中；反而因为中东政策的拖累，损害到了全球范围内的战略机动性和领导声望。如同修昔底德笔下无法抵挡帝国之诱惑的雅典，美国在利益、荣誉和恐惧的三重驱动下，发起了属于他们的“西西里远征”，最终铩羽而归。当奥巴马在 2016 年即将结束其第二个任期时，美国既未保持住 1991 年时的绝对战略优势，又未能扭转国际权势分布趋向多极化的趋势，甚至连单极结构最具说服力的“优越性”——稳定，也已经一去不复返。巴尔干争端引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颠覆了德、奥、土、俄四大帝国，而美国的单极世界幻想，也在中东



左图：2003年4月9日，6米高的萨达姆铜像在花园广场被拉倒后，伊拉克民众用鞋痛击铜像的头颅

右图：2007年，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左）和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右）在美国安纳波利斯参加由小布什总统召集的中东安全会议

这个21世纪的“全球巴尔干”看到了终局。

“新秩序”的幻象

我们今天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一种世界新秩序正在显现。在这一新秩序下，全世界各国，无论身处东方还是西方、南方还是北方，都可以实现普遍繁荣，和谐共处。

——乔治·H. W. 布什，1990年9月11日在国会的演讲

人们对历史时刻之重要性的发现，并不总与事件绽出的时间点吻合。1945年8月15日，即使是最迟钝的人也能意识到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经降临；但在1991年12月25日夜间，当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落下时，华盛顿和纽约街头并没有出现欢呼庆祝的人群。东西方长达40余年的对抗结束之际，美国政治家的担忧和警惕感盖过了如释重负：俄罗斯庞大而缺乏戒备的核武库是否会向恐怖分子敞开？南斯拉夫内战将发展成何种情形？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围绕纳—卡飞地的冲突是否会升级？关于朝鲜的核计划还有多少不

为人知的秘密？1994年，以《追击“红十月号”》等一系列政治惊悚小说闻名于世的汤姆·克兰西甚至出版了一本内容耸人听闻的新书《荣誉之债》，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日本对马里亚纳群岛和关岛的军事入侵。在小说结尾处，一架日本客机撞上国会山，使美国总统死于非命，仿佛一句不祥的谶语。

直到90年代中期，美国政界精英才敢于公开承认：单极霸权的时代已经确实地降临。作为当时最著名也是最审慎的战略理论家之一，前卡特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1997年出版新书《大棋局》时，一反常态地将“美国的首要地位”（American Primacy）写进了副标题。此前4年，他在《大失控与大混乱》里还只是期期艾艾地把美国称为“举世无双的全球性大国”；而在《大棋局》中，布氏对华盛顿之领袖地位的笃信已经变得根深蒂固。他直截了当地申明，“冷战”的结束赋予了美国承担世界领袖角色的最佳机遇；或者用一个从伯里克利到当代西方左派都会热衷的词来说，“美利坚帝国”已经诞生了。

这是一种相当令人惊讶的表态，因为布热津斯基并不以鼓吹霸权理论著称，相反，他一直是均势理论

的鼓吹者。按照这一理论，霸权觊觎者的出现必将招来其他国家的联合制衡；一家独大的局面不可能长期维持，国际权势的分布最终将恢复到总体平均状态。是故在90年代初，国际关系学界曾经出现过无数种对“后冷战”时代制衡模式的预测：有认为欧洲一体化的递进终将动摇美国及其货币的基础地位的，有认为俄罗斯和欧盟的结合将造就一个庞大的“中欧联盟”的，甚至有认定日本会成为美国在经济、政治和安全层面的头号竞争者的。但这些预测无一例外未能对美国发挥作用。事实证明，以金融、商业和海上力量为支柱的美国霸权，在90年代的世界遭致的不满和反感远没有那么突出；相反，在各国皆须仰赖美国的硬实力承担国际秩序运行成本的当时，没有一个国家能脱离华盛顿单独遂行全球治理。

在布热津斯基看来，自20世纪初突破“门罗主义”、开始向欧亚大陆进军以来，美国经过90年的努力，终于“第一次自我加冕为全球领袖”。这一“加冕”至少包括两层含义：首先，在苏联崩塌于萧墙之内、“冷战”宣告结束的历史时刻，美国被公认为仅存的超级大国和唯一有能力在全球层面塑造经济、安全以及社会议程的领导者，而其他国家最多也只是地区强国。其次，由于美国无可匹敌的军事机器，尤其是从海上和空中随时向全球任何地区投送武力的能力，一切国家在区域安全以及政治问题上的动态，都必须获得美国的首肯。而与这种煊赫的权势相对应，美国也必须承担三项义务：（一）在苏联退出“第一世界”、国际权势分布出现变动的背景下，重新塑造和引导独联体、欧盟、中国、联合国、“北约”等重要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形成一种与“美国第一”相适应的国际制度。（二）在地区层面，预防和遏制局部冲突、恐怖主义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的扩散，组织并领导集体维和行动，以使世界变得更加安全。（三）重视和应对一度被“冷战”压力所遮蔽的地区发展失衡、贸易自由化程度有待提升、环境和生态问题日益凸显等经济和社会弊端，使之与美国领

萨达姆发动对科威特的入侵，本意是利用美国忙于东欧和苏联事务，通过吞并邻国来解决两伊战争造成的财政赤字。但对老布什来说，这却是重塑大中东内部权势结构的良机。

导的开放政治—经济秩序相适应。

乔治·H. W. 布什总统（以下简称“老布什”）被赋予了这项推陈出新的使命。他和他的幕僚班子（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国务卿贝克、国防部长迪克·切尼）在应对传统危机方面具有丰富经验，也本能地察觉到了转换目标的必要性。严格说来，“世界新秩序”（New World Order）这个名词实际上是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首先创造的，但老布什毫不客气地将其借用过来，作为自己外交政策的标签。在1989到1991年那些动荡的日子里——需要指出的是，东欧剧变、两德统一、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签订、南斯拉夫内战爆发、苏联解体等重大事件是在短短27个月里不间断地发生的——老布什高呼这一具体内涵尚不清晰的术语，乘坐专机往返于华盛顿和北京、柏林、莫斯科、基辅之间，与各国领导人举行会谈，展开危机公关，力图使政治动荡带来的地区安全和社会冲击被降低到最低程度。

应当承认，虽然美国乐见东欧剧变的发生和苏联崩溃，但老布什的个人努力至少缓解了法德两国就统一问题发生的矛盾，使苏联解体的负面影响大致被控制在其旧国界之内，并有效阻止了俄罗斯管理不善的核武器流入国际黑市。尽管美国时常被指责未能为俄罗斯的经济转轨提供担保，但老布什在1992年初依然批准向莫斯科提供30亿美元的食品和医疗援助、80亿美元的财政援助以及总额接近500亿美元的信用担保，以协助叶利钦政府站稳脚跟。中美关系在风波之后的“破冰”，同样有赖于老布什的努力。

而中东问题，最终成为塑造新秩序的最初试验场和美国全球领导力的试金石。当萨达姆·侯赛因在1990年8月发动对科威特的入侵时，本意是利用美国忙于东欧和苏联事务的契机，通过吞并邻国来解决两伊战争造成的财政赤字。但对老布什来说，这却是重塑大中东内部权势结构乃至扭转阿拉伯—以色列关系的良机——伊拉克政府咄咄逼人的姿态不仅招来了联合国的制裁决议，还使大部分阿拉伯国家宁可与宿敌以色列站在一边，共同谴责巴格达当局的侵略行为。包括埃及、叙利亚、沙特阿拉伯在内的中东主要国家公开加入了美国组建的军事同盟，安理会以13票对0票通过了要求伊拉克撤军的决议。

1991年那场历时42天的“沙漠风暴”作战，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老布什的重大胜利。包括苏联在内的安理会各理事国对伊拉克的谴责使美国的军事行动获得了充分的道义支持。在进攻发起前的准备阶段，



1991年2月12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国防部长切尼和中央司令部司令施瓦茨科夫（由左至右）在利雅得商讨“沙漠风暴”作战的实施方案

50万美军获准进驻沙特阿拉伯，随后维持了地面力量的常驻状态。在参与直接进攻和辅助行动的95.7万多国部队中，包含有33个其他国家的25.6万人，特别是10万沙特军队和2万埃及军队也参加了战斗，在中东历史上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而“沙漠风暴”本身，则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新纪元——依靠无与伦比的海空军优势和立体化战术，多国部队在短短100个小时里就将伊拉克军队赶出了科威特，并彻底摧毁了萨达姆继续作战的经济和军事基础。到1991年2月28日停战为止，伊拉克军队的死伤超过了11万人，3700辆坦克、2400辆装甲车、2600门火炮、110架飞机和25艘舰艇被毁。而联军方面遭受的损失，不过是292人战死、776人受伤、31辆坦克和35辆装甲车被毁，得失交换比超过100:1！

但老布什的谨慎和短视，也恰在此时暴露出来：尽管巴士拉已经爆发了反对萨达姆政权的什叶派起义，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也乘机取得了半独立状态，

但美国总统似乎并无决心将军事和政治上的攻势维持下去。作为一名怀旧派政客和危机管理专家，老布什决心把他的大部分精力留给更具“中心影响力”的苏联以及东欧。当他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那里得知萨达姆还有8个师的共和国卫队以及至少20个师的其他地面部队尚未投入战斗时，当即决定接受停火、避免将战线深入伊拉克国界之内。而军事史上从此留下了一个术语“鲍威尔主义”（Powell Doctrine）：只有在美国的利益受到公开挑战且获得广泛的国际支持的情况下，才考虑采取军事行动；作战行动注重得失比，且随时准备好退出。

老布什和鲍威尔的决断，显然不是出于单纯的财政或军事考量：在小翼翼地中止了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之后，美军继续留驻重兵于沙特，同时在干预巴拿马、哥伦比亚、尼加拉瓜等拉美传统势力范围时也依旧坚决果敢。“沙漠风暴”的戛然而止，反映的是此际美国最高领导层对国际事务的一种传统看法——

需要投入注意力和资源的是若干固定的权势中心以及长期结构性问题，例如苏联、台湾海峡、朝鲜半岛以及东欧。至于前景不明的南斯拉夫、内部冲突正在升级的阿富汗以及突然“爆发”的萨达姆，白宫并不打算在它们身上浪费精力，以免承担过多的义务。在中东事务上，老布什和斯考克罗夫特的对策依然是谨慎和保守的，即希望在确保以色列的安全的同时，促成以色列当局和巴勒斯坦达成政治协议。

这一决策有其充分的合理性：到1973年“赎罪日战争”时为止，“反以”差不多是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最重要的国际政治目标和塑造国内政治正当性的来源；在苏联的推波助澜下，阿拉伯世界常常作为一个整体参与中东政治博弈。但随着伊朗革命的爆发以及埃及、约旦相继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阿以问题”已经逐步坍塌为纯粹的“巴以问题”，解决难度较“冷战”高潮期有了明显下降。海湾战争期间，老布什以额外提供6.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作为条件，说服了以色列当局既不对伊拉克的导弹攻击采取报复行动，也不直接参与多国部队的作战，在华盛顿和多数阿拉伯国家之间形成了谅解。在萨达姆被击溃之后，也只有美国既有能力又有足够的声望和动机说服巴以双方展开和谈，重塑双边关系。

1991年3月6日，在伊拉克前线停火之后一星期，老布什公开发表声明，宣称将推动巴以双方实现“全面和平”，在确保以色列安全的前提下保护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利。当年10月30日，在美苏两国领导人的共同邀请下，以色列、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和“巴解”组织共五方代表前往马德里举行和平会议，开始就以色列从约旦河西岸撤军以及组建巴控区自治机构等问题展开磋商。但美方提供的基本只是一种接触的形式——既无清晰可行的操作方案，亦没有表现出毕其功于一役的胆识，仅仅是在目标和手段都不明确的情况下使漫长的讨价还价不至于破裂。为了抵制国内犹太院外集团的游说，老布什促成国会通过了暂停审核对以色列军事援助款项的提案，却没有向特拉维夫方面提出可供还价的B方案，导致“利库德”集团在1992年大选中落败，马德里会议的进程再度被延宕，不得不在挪威奥斯陆另起炉灶。

甚至连美国国民也无法再容忍老布什对他迷信的“冷战”经验和“中心地区”的偏见了。1992年总统大选中，这位志在连任的老人家仅拿下18个州的候选人票，大败而归。计票结束后，有民主党选民在白宫前打出讥讽的标语：“萨达姆还在执政，可您呢？”

这位“新秩序”的提出者，在给他创造的概念注入足够的内涵之前就抽身离去，留下一套僵硬的对外战略架构、游移不定的中东政策以及对战略机遇期的无谓浪费。这一点对共和党的一批中生代战略家形成了严重的刺激，使他们反过来相信不计成本的直接介入才是制胜之道。10年过后，正是这些人做出了再度向伊拉克开战的决策。

“全球胡话”

全球化并非某种我们可以拖延或逆转的事物。就像风和水一样，它是经济界的自然力量。

——比尔·克林顿，2000年11月17日演讲

1993年1月20日，46岁的比尔·克林顿以革新派的形象入主白宫，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在此前与老布什的选战中，年轻的挑战者以一句风靡全国的口号昭示了新政府的生存之道：“关键是经济，笨蛋！”(It's the economy, stupid!)除去财政方面的考量外，这也是大部分美国人的心声：苏联崩溃之后，没有多少人再对权势政治、军事冲突、民族问题这类散发着陈腐气息的术语感兴趣了。人们厌倦政治意味浓厚的“新秩序”，期待克林顿及其年轻班底能带来更具吸引力的改变。于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一概念脱颖而出，成为将美国的内外政策串联成一体工具，并主导了随后8年里的美国外交。

理解这一逻辑并不困难：既然历史终结论者可以乐观地取消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疆界、习俗区隔，那么将全球范围内的科技进步、贸易自由以及利益协调视为美国经济模式尤其是跨国公司模式的对外输出，在逻辑上也完全成立。跨国公司和利益集团通过其院外游说团体，以推动国会立法的形式实现自己的私利，而行政机关充当了立法的政治和安全担保人。要命的是，在1994年中期选举之后，国会的控制权就转移到了共和党手中，他们在增税、对外干涉等问题上与总统意见相左，增加了政策缔造的难度。

某种意义上，甚至连克林顿政府本身的决策流程也变得很像一家大公司。鲍威尔在回忆录《我的美国旅程》中提到，当他参加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例会时，发现这简直是“咖啡馆里的闲聊”：所有人都在随意插话和发表评论，总统本人并不明确做出裁决，而是在讨论结束后杂糅各方的看法，形成一个勉强的共识——“假使有火星突然来到地球，出现在这样的会场上，他绝对猜不出哪一位才是美国总统。”在“全

全球化”的口号使得对外政策目标本质上被内部化之后，每一个部门都希望介入决策流程，而国务院却变成了单纯的执行者。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克林顿政府的第一任期内，在对外事务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既不是国务院也不是白宫，而是由经济和金融专家组成的国家经济委员会（NEC）——在相对专业的经济领域，其他部门无法对委员会的决定指手画脚。在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正是经济委员会决定了美国政府的应对策略。也是得益于该委员会的努力，美国的财政收支在克林顿政府任内恢复到了平衡状态，并被公认为最成功、最有活力的市场经济体。

但经济委员会的魔力显然无法化用于安全和国际政治事务，这一点首先在防止核扩散问题上暴露出来。承袭老布什的遗产，克林顿政府自1993年起与俄罗斯共同着手执行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 II），承诺不在彼此的弹道导弹上搭载多弹头分导式再入大气层载具（MIRV），并在10年内将双方的核弹头总数各自削减到3000至3500个之间。但俄罗斯国家杜马直到1997年才正式批准关于核弹头总数的条款，并要求将截止日期延长到2007年；只有已经决意“废核”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在美俄两国的监督下移除了境内的核武器。但在除原苏联国家以外的其他地区，防扩散的努力基本以失败告终——美俄两国在核军控问题上的步调一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冷战”年代形成的常态沟通机制；而在亚洲和中东，克林顿政府并未组织起足够规模的核军控同盟，亦未设立惩罚机制，仅仅是以单对单的方式随机展开接触，效果完全取决于运气。1994年与朝鲜签署的“轻水堆换重水堆”框架协议后来被证明从未发挥作用，199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相继跨过核门槛同样未曾受到有效惩戒。2003年利比亚宣布放弃其核计划之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在调查中惊讶地发现：在巴基斯坦、伊朗、朝鲜、利比亚和叙利亚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核材料与核技术交易黑市，而美国政府对此几乎浑然不觉。

由于在精神气质上本能地排斥“旧制度”，克林顿政府在对外战略的重心上有一种古怪的飘忽性，似乎既无意继承老布什对“中心地带”的关心，也不屑于提出一项明白可行的地理战略：考虑到“后冷战”时代频繁爆发的地区冲突和动荡，这种不屑几乎是致命性的。在1996年俄罗斯的政治动荡以及两年后的经济危机期间，美国完全无动于衷，直接导致了俄美

关系滑向低谷。1996年夏天的台湾海峡危机中，美国派遣航母战斗群对中国实施威慑，使中美关系也逐渐由晴转阴。1997年“北约”东扩的成行大概要算这一时期美国最重要的外交成就，但它的影响被美国和欧盟在国际事务方面的诸多分歧抵消掉了。

更要命的是，在把“全球化”和“历史终结论”作为带有道义性质的国际目标提出之后，美国在人道主义干预和集体安全行动中却表现出了极强的随意性。1993年，在摩加迪沙的“黑鹰坠落”事件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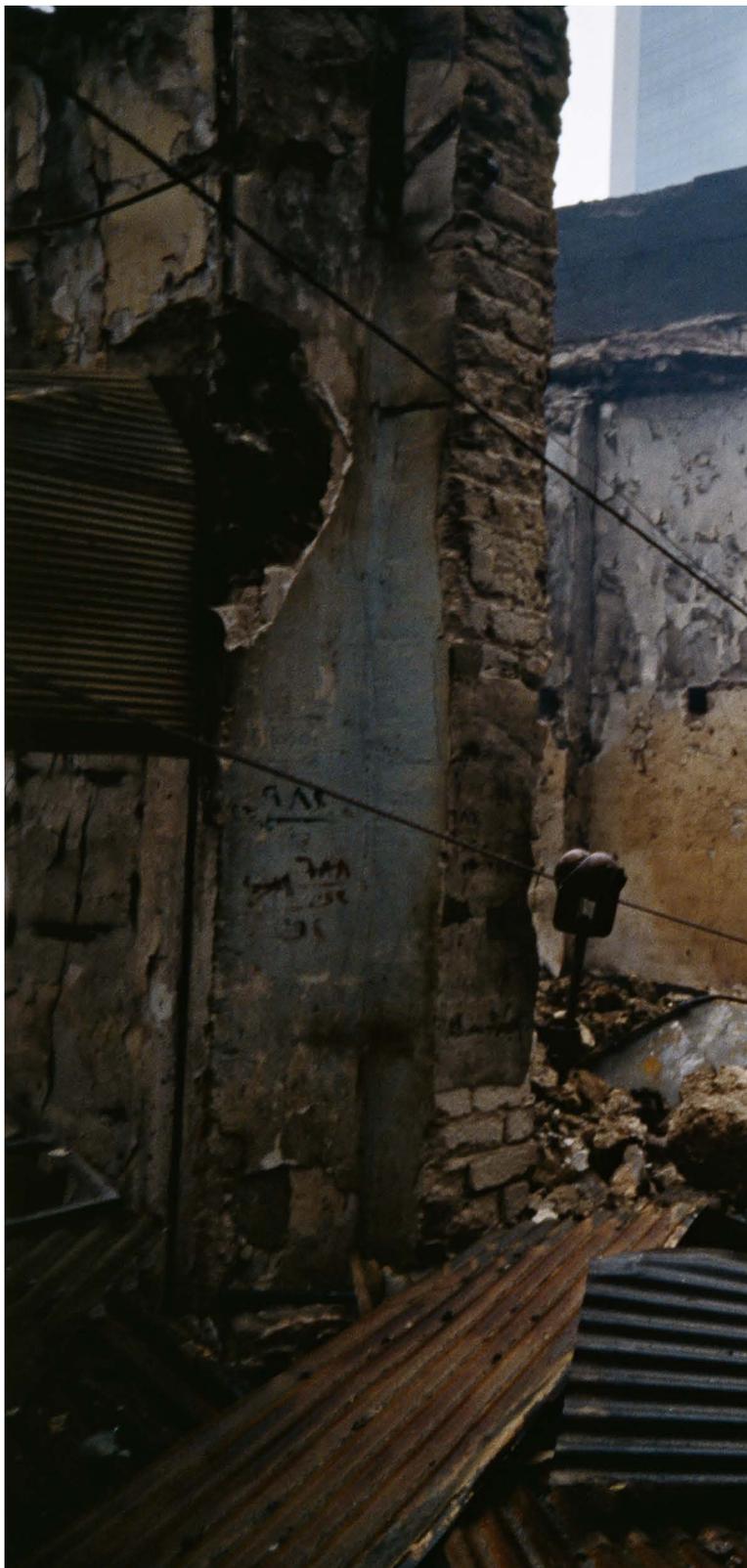


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发表演讲

克林顿政府宣布从索马里撤出美军维和部队；一年后，中非国家卢旺达爆发丧生人数超过50万人的种族主义屠杀，美国完全无动于衷，却对俄罗斯在车臣采取的军事行动大加鞭挞，毫无全球领袖的风范。克林顿对南斯拉夫内战的干预，同样延续了这种“战略任性”——尽管早在1993年就提出了将巴尔干地区“类中欧化”的目标，但美国直到1995年“斯雷布雷尼察事件”发生后才开始对波黑塞族武装实施空中打击，以促成《代顿协议》的签署。而在第二任期内，尽管“北约”对科索沃的军事干预在主动性和效率上有所提升，却使美国与中俄两国间的关系急剧恶化。这是无法单靠发展双边经贸关系就可以修复的。

在国内政策议程中，克林顿可以轻松地说服国会接受他飘忽不定的行事风格，但这和美国自封的道德卫士形象构成了鲜明的反差。实际上，十几年后在干涉伊拉克和叙利亚时出现的一切，在南斯拉夫已经有了预演：基于民族、教派矛盾形成的武装冲突和内战，在激烈程度、复杂性以及持续时长上都超过了“冷战”时代的典型国家间冲突，化解成本更是膨胀到了10倍以上。而在美国单方面决定中止军事行动之后，上百万难民的安置以及艰难的重建成本却要由欧洲国家来分摊。但在科索沃的空中行动的成效，反过来强化了美国政治家和军人对“鲍威尔主义”的迷信。1998年6月，18位美国政界和学界精英上书克林顿，要求以坚决的空中打击和快速武力干涉排除萨达姆政权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能力，这些人的名字并不陌生：埃利奥特·阿布拉姆斯（人权与人道主义事务部前副部长）、理查德·阿米蒂奇（2001年任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2005年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弗朗西斯·福山、理查德·珀尔（2001年任国防政策顾问委员会主席）、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2001年任国防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2001年任国防部副部长）、詹姆斯·伍尔西（中情局前局长）、罗伯特·佐利克（2005年任副国务卿）……

至于中东问题本身，克林顿继承了老布什对巴以和谈的形式重视程度超过实质性内容的偏好。1993年初在奥斯陆重启的双边会谈经过历时半年多的博弈，最终在9月13日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拉宾、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和克林顿并肩站在白宫南草坪，宣布签署史称“奥斯陆一号协议”的《原则宣言》。根据该协议，以色列政府应在3个月内从加沙地带以及约旦河西岸城市杰里科撤军，“巴解”组织获准在上述地区建立一个充当行政管理部门的民



1991年2月27日，一名重返家园的科威特人站在被伊拉克军队摧毁的房屋前



族权力机构（PNA），以行使自治权。在以色列军队撤出巴勒斯坦人聚居的主要城市之后，“巴解”组织可以通过普选产生一个立法委员会，作为事实上的议会。尽管耶路撒冷的地位问题和巴勒斯坦的正式建国问题依旧被搁置，但这已经是巴以双方在当时能够取得的最大限度的共识。以奥斯陆协议为契机，1994年约旦也和以色列实现了正式停战，突尼斯、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相继与特拉维夫恢复了外交关系。1995年9月，巴以双方又签署了关于控制区边界的《奥斯陆二号协议》，以方同意完全撤出约旦河西岸的8座大城市，并在其他地区缩小治安权力。

但和平的曙光仅仅维持了一年多。11月4日，以色列总理拉宾被一名犹太激进主义者刺杀。1996年6月，强硬的“利库德”集团再次上台，随即以“哈马斯”多次制造自杀性炸弹袭击为理由放慢了撤军速度，并违背协议重新开始扩建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这导致原定在1998年结束的移交过渡期变得极为漫长。直到1999年7月倾向缓和的巴拉克总理上台，克林顿才得以在戴维营重启三方首脑会晤。但这次会谈重复了1991年马德里和平会议的沮丧局面：以色列坚决反对1948年以后流散到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巴勒斯坦难民重回故土，阿拉法特对减少冲突的承诺则由于“哈马斯”的反对成为一张废纸。2001年强硬的“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沙龙上台后，巴以和平进程再度中断，自杀性爆炸和枪战再度成为常态。

更危险的信号，来自西起摩洛哥、东到巴基斯坦—阿富汗交界处的这轮“动荡新月”。1992年12月29日，由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组成的“基地”组织（Al-Qaeda）用炸弹袭击了也门亚丁港的两家酒店，意图杀死经也门前往索马里执行维和任务的美军士兵。随后几年间，该组织的活动愈发频繁，袭击成功率越来越高：1998年8月7日，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大使馆遭到汽车炸弹袭击，死亡总人数高达224人；2000年元旦，“基地”组织在约旦制造了4起爆炸案，并将印度航空公司的IC814航班劫持到阿富汗；2000年10月12日，美国海军最现代化的导弹驱逐舰之一“科尔号”在亚丁湾被爆炸快艇撞中，舷侧被炸开一个12米×18米的大洞，死伤56人。克林顿的回应是在1998年夏天派出一支小舰队用巡航导弹攻击了“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境内的训练营，但行动并未持续下去。

年轻的美国总统显然没有意识到，自1991年底“冷战”结束以来，处于准无政府状态的阿富汗已经

逐步成为阿拉伯世界一切被边缘化的极端政治势力的大本营。从巴勒斯坦的“伊斯兰圣战者”到有沙特阿拉伯背景的“基地”，从埃及的库特布主义者到反对复兴党世俗主义政权的叙利亚、伊拉克武装人员，所有这些边缘势力在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庇护下，正利用对苏战争末期搭建起来的训练设施、通讯网络以及军火购买渠道，策划针对整个西方世界的大规模袭击。他们从根本上拒斥“全球化”所代表的西方现代性理念，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难以被华盛顿的超民族话语所驯化。阿拉伯世界因“人口爆炸”产生的大量失业青年，则为抵抗事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员，并在阿富汗的“反应炉”中熔炼成战士。

到2001年初克林顿的第二个任期结束时，美国面临的是这样一个世界：“全球化”口号及其带来的诸多变化并未成为美国政府增殖和维持国际权势的源泉——美国正在推动全球化，但对其方向毫无把握。华盛顿的政治影响力和道德优越感在1995年前后达到巅峰之后，现在正以缓慢但引人注目的趋势向下滑落。美国在控制全球气候变化、《渥太华条约》等问题上令人失望的表现使得更多人对其是否能扮演好领导者的角色、是否愿意为此牺牲一部分特权产生了怀疑。在波黑和科索沃的军事行动未能赢得国内外舆论的普遍支持，却引发了关于“新帝国主义”的担忧。中东地区暗流涌动，“基地”组织在苏丹、肯尼亚等边缘国家的活动已经使美国的全球利益受到直接威胁。克林顿鼓吹的“全球化”和他那些空泛无力的巴以和谈原则一样，逐渐沦为“全球胡话”（Globaloney），而美国却继续在世界范围内炫耀其道德、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的优越感。这种放纵的结果，最终将以血的代价来偿还。

小布什

这次针对恐怖主义的圣战将会持续一段时间……如果你们不与我们为伍，就是与我们为敌。

——乔治·H. 布什，2001年9月16日全国电视讲话

与保持持重的老布什和乐观轻浮的克林顿不同，2001年上台的乔治·H. 布什总统（下文简称“小布什”）果断果决、一意孤行，怀有固执的政治信念。他的一位顾问曾经告诉《纽约时报》记者：“我们就是历史的行动者，我们将创造现实。”在适宜的环境下，这种气质可能造就一个非凡的全球领袖。但当这种“气



1994年5月11日，一名在卢旺达大屠杀中死里逃生的图西族幸存者被安置在首都基加利的一家医院。这次屠杀造成至少50万图西人丧生，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之一

质”是在一个完全错误的时机、以一种欠妥当的方式表现出来时，它所带来的结果将是毁灭性的。

两位前总统留给美国的是一个矛盾重重、地理危机一触即发的世界。这种矛盾最终以2001年9月11日对美国本土的直接攻击为形式爆发了出来。但从客观角度看，经过克林顿政府两个任期内在经济和外交层面的公关，“9·11事件”实际上给美国领导人提供了重新赢得全世界支持的绝佳机会——除去本·拉登以及他的少数铁杆拥趸外，全球舆论像1991年海湾战争前夕一样不约而同地站在了美国一边。包括中国、俄罗斯和欧盟在内，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和地区领导人纷纷向美国表达愿意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的意向，美国赢得了缔造以自身为中心的全球同盟的又一次良机。甚至连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内部，在是否要收留“基地”组织领导人的问题上也存在矛盾。但小布什的反应之激烈出乎所有人的意料，9月16日，他在电视讲话中做出了一个简单粗暴的表态：“如果你

们不与我们为伍，就是与我们为敌。”

在全球反恐问题上追求大国之间的协调一致和单方面要求其他国家无条件支持美国的一切行动，个个意味自然大不相同。后者是一种基于主观的意识形态产物，它是激进的新保守主义世界观、对“文明冲突论”的预言自证式强调以及新帝国主义安全观杂糅而成的结果。第一项渊源始于对“冷战”胜利经验的主观解读，美国及其盟友的资源 and 制度优势被一厢情愿地解读为“信念”的胜利：只要坚持信念，一切困难皆可排除；只有坚持并捍卫“美国式生活方式”“美国例外论”，才能在全球化时代缺乏意识形态信条的世界里维持美国的优势地位。第二项渊源始于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文的偏颇解读，即认定既然诸种文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终究不可避免，当务之急便是在国际社会之间划定“敌”与“友”的阵营，必要时甚至可以潜在对手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第三项渊源则源自对美国全球领袖地位的滥用，认为华盛顿当局在领



2003年4月3日，一名参加“伊拉克自由”作战的英军士兵向巴士拉附近的一处伊拉克守军阵地射击

导各国对抗恐怖主义的同时，有正当的理由兼顾本国的独占性利益。

而小布什赖以推动其新保守主义全球战略的，正是美国政治精英中“敌”“我”区分意识最突出的一个群体。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康多莉扎·赖斯曾是“冷战”年代的苏联问题专家，与总统气味相投。副总统切尼、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以及副总统幕僚长刘易斯·利比曾任职于老布什内阁，早在1991年底就起草过一份言辞激烈的防务问题报告，宣称应当继续打击伊拉克、直至萨达姆政权崩溃。包括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内的大批政府要员曾在1998年给克林顿的公开信上签名，并且是以色列“利库德”集团的支持者。与之相比，主张有限度、短时间军事干预的

国务卿鲍威尔反而成为决策层中的异类了。

2001年10月对阿富汗的“反恐战争”打响之后不久，小布什便公开将朝鲜、伊朗和伊拉克贴上“邪恶轴心”的标签，显示了美国下一步的行动方向。与此同时，以颠覆萨达姆政权为目标的入侵伊拉克计划已经开始制订。在小布什及其智囊团看来，伊拉克构成了由阿富汗自东向西传导的动荡反应链的关键一环，不仅威胁到美国在沙特阿拉伯乃至整个中东的能源利益，而且对以色列构成了重大威胁，必须以坚定不移的先发制人方式加以铲除。在彻底颠覆伊拉克现政权并建立起与美国同质的民主政体之后，类似的模式将被进一步移植到叙利亚和伊朗，最终实现以阿拉伯半岛为中心、重构中东秩序的蓝图。

一项往往被人忽视的事实是：恰恰是在美国紧锣密鼓地筹备入侵伊拉克的2002年，以色列沙龙政府对巴勒斯坦的态度也开始进一步转硬。以色列当局开始在约旦河西岸修建包围巴勒斯坦人居住区的隔离墙，阿拉法特也被软禁在位于拉马拉的官邸内，直至他于2004年病逝。此举与2002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对伊拉克用兵授权案一样，都属于单边主义行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华盛顿模仿了特拉维夫的政策：在物质力量尤其是武力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全然不顾假想敌的意愿，单方面采取进攻措施并强迫对方接受。日后，以色列在西岸的隔离墙策略也被美国占领当局化用在了爆炸频发的巴格达。

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自由”作战正式启动。与“沙漠风暴”时朋伴众多的情形相比，这一回只有美、英、澳、波四个国家的军队参与了第一阶段的军事打击，其中美军占84%；而英国贡献的4.5万名部队，多半还要归功于布莱尔首相与美国总统的亲密个人关系。正面攻势推进顺利：不到一个半月时间，萨达姆的正规军就宣告土崩瓦解；他本人于当年底在提克里特附近被捕，三年后被送上绞刑架。但美方用以支持其开战理由的“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勾结‘基地’组织”的证据，自始至终没有被找到；这意味着小布什关于此次战争系服务于全球反对恐怖主义的共同事业的辩解，完全丧失了可信度。华盛顿这个“全球领导者”现在丧失了大部分合法性，只剩下赤裸裸的力量。而2004年阿布格莱布和关塔纳摩监狱虐囚丑闻的爆发，在进一步伤害了美国的道德形象的同时，也意味着“北约”已经不可能像介入阿富汗一样，公开帮助美国收拾伊拉克的烂摊子。讽刺的是，美国引以为豪的军事机器，恰恰被证明在伊拉克的治

安战环境下水土不服：在驻军总数超过 15 万人的前提下，英美联军直到 2008 年春天才大致恢复了伊拉克主要城市的社会秩序，为此付出了 4800 余人伤亡的代价。而“基地”组织、“纳克什班迪教团军”等战前尚不显山露水的极端势力，却在美军到来后的无政府主义空窗期找到了繁衍土壤。据国际知名医学杂志《柳叶刀》统计，在美军入侵已满 3 年的 2006 年初，伊拉克平均每月仍有 3000 人死于治安问题；而到 2006 年 7 月为止，丧生于暴力活动的伊拉克人累计已经超过 60 万人。

在对伊战争已经陷入泥潭的背景下，小布什在 2004 年 6 月举行的八国集团首脑佐治亚峰会上依然提出了“大中东倡议”（The Great Middle East Initiative），并将之作为自己第二任期内的对外战略重心，无疑值得玩味。该倡议宣称，“变化不应也不能从外部施加”，必须将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变革系于其内部需求和动力。诸如巴以冲突、伊朗核危机这样的“技术问题”已经不再是关键，通过政治改造消弭“动荡新月”内部的不稳定因素才是终极目标。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两个战败国家将成为民主试验的第一批对象，随后是巴勒斯坦、黎巴嫩、沙特阿拉伯以及毗邻阿富汗的巴基斯坦，紧接着还将进一步扩展至“新月”边缘的叙利亚、埃及、苏丹以及伊朗。倡议提出的改革目标包括男女平等、开放党禁、信仰自由及经济平等，目标是建立起与美国同质的自由民主政体，消解激进势力赖以滋生的土壤。为此，美国宁可冒改革初期出现进一步动荡的风险。毫无疑问，这是一场与军事“圣战”相配合的政治攻势。

需要指出的是，政治攻势的开启，并不意味着就此降低军事施压的规模。因为伊拉克的“模范政体”首先就不是自然生成的结果，而是在美国实施军事干涉之后人为塑造的。将伊拉克模式推广到整个中东，意味着美国彻底抛弃了“冷战”时期目标有节制、灵活善变的中东政策，将自身霸权的前途和中东的民主化进程彻底捆绑到了一起。而向来与“民主”“自由”无涉，却长期扮演着美国中东政策稳定器的沙特阿拉伯和埃及，也变成了潜在的“改造对象”。无怪乎这一消息一传出，立即有 82% 的黎巴嫩人和土耳其人表达了不满情绪；甚至有 81% 的巴勒斯坦人宣称，他们希望有更多美国士兵在伊拉克的爆炸中死去。

小布什希望“改造”和“矫正”的，恰恰是过去 20 多年里全球不安定因素最为密集、干预成本最高昂的地区。按照亨廷顿的说法，自 1989 年苏联从阿富

汗撤军以来，在“动荡新月”地带就出现了“一个不稳定的伊斯兰组织的联盟，其目的在于促进伊斯兰反对一切非伊斯兰力量。战争为他们留下了训练有素和经验丰富的战士，军营、训练场所和后勤设施，一个复杂的个人和组织之间的泛伊斯兰关系网，以及包括 300 ~ 500 枚未付账的‘毒刺’式导弹在内的大量武器装备”。更重要的是，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动荡新月”地带的主要国家恰恰进入了人口增长的井喷期，一些国家 15 岁到 30 岁青年男性的数量开始以年均 20% 的速度递增。亨廷顿认为：“伊斯兰世界人口的膨胀，尤其是在巴尔干、北非和中亚，已经大大超过其邻近国家和全球的一般水平……这种增长将对全球政治构成可观的影响。”“有文化的、人数迅速增长的年轻人渴望工作和富裕，但政治权力却控制在愚昧的老年人手中，知识和权力的分离将使政治系统陷入紧张状态……单是这一因素就足以解释阿拉伯世界暴力活动频发的原因。”

而第二任期内的的小布什政府，偏偏在财政、军事资源和时间的余裕度上都不足以胜任花费如此惊人的大工程。单是伊拉克经济重建和恢复治安的成本就已经大大超出了华盛顿的预计，国际油价走高以及 2007 ~ 2008 年的美国金融危机，更是使小布什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支持率一路下滑。奥巴马上台后，公开指责其前任“没有为美国中产阶级这一支撑国家繁荣的基石提供太多必要帮助，却花费了 1 万亿美元用于战争，并经常靠海外借款维持财政。这样做不仅欺骗了自己的人民，还让美国的财政赤字居高不下”。这一表态无异于重复克林顿当年那句“关键是经济”。区别仅仅在于，老布什进行了一场半途而废的战争，而小布什将这场战争推进到了最终阶段，但美国并未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布热津斯基评论自以为是的小布什时称：“他那简单的教条主义世界观引发了自我毁灭的单边主义，在短短 5 年里就给美国的地理政治处境造成了可怕的破坏。”与 2001 年时相比，小布什离任之际的美国变

将伊拉克模式推广到整个中东，意味着美国彻底抛弃了“冷战”时期目标有节制、灵活善变的中东政策，将自身霸权的前途和中东的民主化进程彻底捆绑到了一起。



得空前孤立，并且继续被暗流涌动的中东所纠缠。长夏已尽，凛冬将至。

大撤退与大混乱

“伊拉克自由”作战已经结束，伊拉克人现在必须承担起保卫自己国家安全的重担，这是我在竞选美国总统时向美国人民做出的承诺。

——贝拉克·奥巴马，2010年8月31日伊拉克撤军演讲

以“改变”作为竞选口号的奥巴马，从入主白宫的第一分钟起就决心卸脱其前任留下的战略包袱。在他看来，继续维持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尤其是后者）的军事行动，只会进一步恶化美国既有的国际形象，并造成国内各阶层间矛盾的不断深化。现在，“该是翻过这一页的时候了”。从2009年2月起，奥巴马政

府就加快了美军作战部队撤出伊拉克的速度；到2011年12月为止，除去大约2万名军事顾问（包括保卫美国大使馆的海军陆战队员）以及4000多名私人安保武装继续留驻于伊拉克全境外，美国从伊拉克的撤出大体宣告完成。但这项行动的意义，早在最终结束前12个月就遭到了直白的挑战和攻讦，因为始于突尼斯的“阿拉伯之春”政潮正在迅速席卷整个“动荡新月”，而美国对此的反应笨拙迟缓，极尽狼狈。

勒特韦克在分析罗马帝国的大战略时曾经指出，主导人们关于权力的认知的关键要素不是物质，而是心理。大部分国际行为主体不必要也不可能总是依据一国实际行使权力的结果来度量其权力多寡，他们只关心自己能够“感知”到的力量，并基于本身的利益关切和可采取的手段做出回应。乔治·凯南在撰写《苏联行为的根源》时同样宣称，对苏遏制本质上是一种心理战，唯有能使对手感受到更大心理压力的一方才



左图：2009年4月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访问伊拉克巴格达的一处美军驻地时，与一名士兵碰拳致意

右图：2014年7月3日，一户刚刚从摩苏尔逃出的伊拉克家庭由于无法挤进人满为患的临时收容所，被迫在旷野中露宿

会是最后的胜利者。而奥巴马及其第一任期内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因为急欲与小布什的遗产做切割，不仅使从伊拉克的撤军变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单方面行动，还过早地以“亚太再平衡”这一口号暴露了白宫心目中不同地区战略重要性的变化，从而使“阿拉伯之春”中崛起的反美力量变得愈发有恃无恐。尽管政潮本身并非因撤军引起，但在事实上造成了一种丢盔弃甲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而1945年以来美国霸权在欧亚大陆的存在形式，始终是前沿性的军事部署和政治承诺，这一点与奉行“离岸制衡”战略的英帝国截然不同。地理政治学先驱麦金德和斯皮克曼早在20世纪初就已意识到，在工业化时代，陆上强国的物质优势已经弱化了海上力量作为大战略工具的有效性，并使外围海洋强国不再享有干预时间方面的余裕。倘若海洋国家不想在冲突爆发之初就被孤立，就不能把隔岸观望当作常态，而必须在平时把政治和军事存在前出到欧亚大陆，哪怕必须为此背上负担。而奥巴马政府在仓促做出撤军的决定时，并未对其在中东的结盟体系和本地区内部的

权势分布做出相应的调整：与伊朗之间的“破冰”直到2015年才宣告完成，与沙特阿拉伯以及其他传统盟友之间的义务分配始终未能重新厘清，大撤退变成了大溃逃。从利比亚到也门，一切因政潮而陷入混乱的国家都相信美国军事—政治力量在中东的前沿部署已成明日黄花，星条旗不再令人感到恐惧，这是奥巴马竭力掩饰但又木已成舟的现实。

今日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动荡，实际上属于布热津斯基所言“全球政治觉醒”的延伸。布氏指出：“到了21世纪，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国民处在了政治活跃期。这部分人口意识到自己正遭受史无前例的社会不公正，对其权益遭到剥夺以及缺乏个人尊严的现状深表痛恨。由于能普遍接触到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他们形成了一个共同仇视和嫉妒的共同体，正跨越主权界限，对现存国家以及当前美国仍高高在上的全球等级体系构成挑战。”数十年如一日的传统型社会由于内外因的结合，意外获得了政治“再现代化”的机会，先是造成一国范围内的不稳定，随后又沿传导链逐步蔓延到邻国。

以埃及为例，在革命爆发前的20多年中，穆巴拉克政权安居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框架内，维持了表面的经济繁荣与社会稳定，穆巴拉克也得以长居总统之位达30年之久。但由于美国主导的巴以和平进程始终徒劳无功，埃及执政当局始终无法完成合法性由“反以”向“调和阿拉伯世界”的转移；加上穆巴拉克政权并非基于普选，官民矛盾重重，在市民社会内部具有极大影响力的“伊斯兰兄弟会”乘机公开和政府唱反调，使得旧有领导层的实际地位变得相当脆弱。全球市场的繁荣为开罗带来了纸面GDP的高速增长和大量财政盈余，但也进一步加剧了其国内的分配不均乃至各种社会矛盾。产业结构单一的埃及对全球经济的依赖度急剧上升，而美国出于对能源安全的顾虑和对全球化总体目标的维护，始终漠视此种风险。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埃及社会的固有矛盾受到连带影响，最终被点燃，引发了“阿拉伯之春”。

埃及的范例，在整个大中东地区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可以视为此次大中东政潮的样本。至于革命的具体形式和发展过程，则存在显著差异：突尼斯、埃及等国的统治集团出现分裂，部分政府官员和军队转向反对派一方、罢黜旧领导人，控制了混乱的规模。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出现了反对派政治—军事集团与旧政权之间的武装冲突，内战至今不曾停歇。而伊拉克国内政治势力的分化，及其与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极端势力的结合，最终导致了在两国边界地带出现的恐怖主义哈里发“伊斯兰国”（ISIL）。而奥巴马政府对伊拉克和整个大中东近于甩包袱的处理方式，实际上使得中东地区的内部力量传递再度进入了东西向自由流动和渐进蔓延的循环。既有的权势均衡在8年半的伊拉克战争期间已经被破坏殆尽，已经被动员起来的各方政治力量又缺乏来自外部的控制和指导，只能依自主传导链条混乱而暴烈地传递下去。可以说，最近6年中东世界的政治动荡和冲突频发，与奥巴马的撤退战略导致的领导力缺失不无关联。

美国原本有一种可能来制止此种颓势，那就是与欧盟和俄罗斯进行战略目标以及战略义务的协调，通过恢复海陆双向的干预模式来制止中东乱象的蔓延。但由于俄罗斯选择了在2014年发动东欧攻势、吞并克里米亚并出兵乌克兰东部，美俄关系在短期内无法缓和，在日益复杂的叙利亚局势上亦不可能进行有效的双边合作。以俄罗斯和伊朗支持的巴沙尔·阿萨德政权为一方，美国支持的各派反政府武装为一方，“伊斯兰国”残余势力为一方，在叙利亚已经形成三足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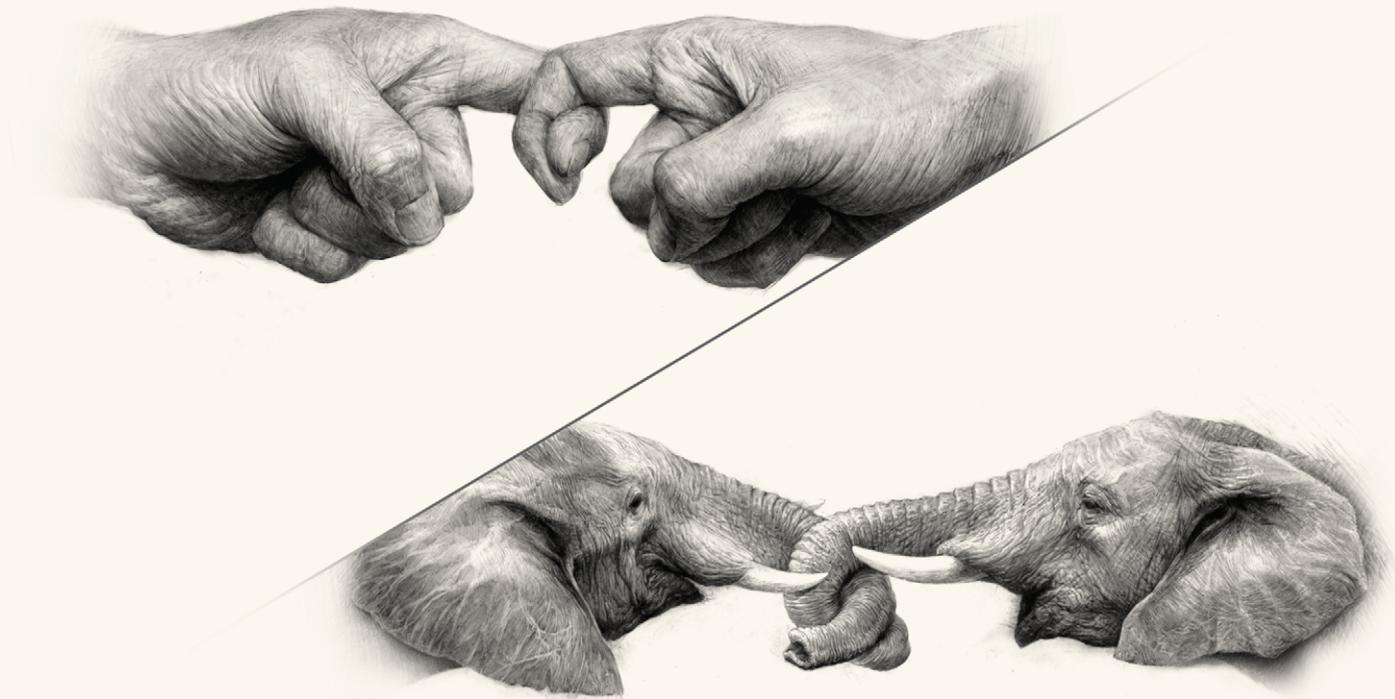
立之势，国家的进一步碎片化、部落化几乎成为必然。而欧盟作为另一股可能分担美国战略义务的力量，在“阿拉伯之春”初期还曾经以调停者的身份登场；但随着美国的大撤退演变为卸脱责任的大溃逃，近在咫尺的欧洲国家不得不以一己之力担负起收容难民的责任。截止到2016年初，仅从叙利亚涌入周边国家和欧洲的难民就已达400万人之多，超过越南战争与南斯拉夫内战产生的难民数量之和，使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HCR）的安置预算出现了50亿美元以上的赤字。除去叙利亚以外，包括伊拉克、也门、利比亚和突尼斯在内的其他中东国家在过去5年中也有700万难民流出，使中东板块在全球难民总数中所占的比重超过了1/5。难民涌入造成的财政、治安和社会问题，已经使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主要国家陷入了国内政治分裂；而美国在难民安置问题上的束手束脚，使欧盟完全陷入了孤军奋战，“跨大西洋同盟”在短期内已经失效。

随着土耳其发生政治清洗和也门内战进一步升温，在21世纪前16年，起自非洲西北部，沿黑海和地中海东岸深入阿拉伯半岛，随后掠过波斯湾、朝东北方直达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界处的“动荡新月”，已经成为政治上最不稳定、对世界安全影响也最为深远的“冲突反应炉”。尽管该地区的大部分国家既无有效的中央权力，又无成熟的市民社会，因之难以在和平的全球化格局中占据优势地位；但因为“动荡新月”地处适于向内外两个方向发展的海陆交界地带（地理），靠近并控制中东石油产地（经济），拥有极富煽动性的意识形态工具（激进宗教思想）和大批失业青壮年（人口），反而有助于强化对既存国际秩序的否定性破坏力。尽管“伊斯兰国”势力在伊拉克境内的部分已经面临最后的围剿，但在叙利亚的战火尚未停歇，也门局势又前途不定的情况下，冲突因子仍有沿地理链条继续传导下去的可能。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随着奥巴马的第二任期临近结束，以中东作为前沿战略支持点、维持“美国第一”战略优势的单极霸权结构已经走向尾声。在萨达姆铜像残留的脚掌之下，新秩序的雏形正在萌芽。■

（参考资料：Zbigniew Brzezinski, *Second Chance: Three Presidents and the Crisis of American Superpower*;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Goldschmidt Jr. and Lawrence Davidson,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等）

勾起手指，连结拯救的决心

Link your fingers to support elephants



拒绝购买象牙制品，支持象牙禁贸。勾勾手指，把拯救大象的承诺传递下去。

Reject ivory and support the ban. Link your fingers to pledge your support for elephants!



拯救大象不能没有你！扫描二维码
或登录 <http://www.wwfchina.org/ivory>
传递爱的承诺。



共同发起全球拒绝
非法野生生物贸易行动

TRAFFIC
the wildlife trade monitoring network
国际野生生物贸易研究组织

美债遭遇大规模抛售

主笔 / 谢九

随着美联储 12 月加息的预期升温，美国国债开始遭到前所未有的抛售。不仅是中国、日本和沙特这几家美国的最大债主，几乎全球主要央行都加入了抛售美元的队伍之中。

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 8 月份减持美国国债 337 亿美元，为 2013 年来最大减持幅度，截至 8 月底，中国持有美国国债总额达到 1.1851 万亿美元，为 2012 年 11 月来的新低。美国第二大债权国日本在 8 月份减持 106 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持有规模降至 1.144 万亿美元。沙特连续第七个月减持，持有美债规模降至 930 亿美元。在截至今年 8 月末的过去一年中，海外央行抛售美债的规模高达 3464 亿美元，创下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的最大规模抛售潮。

按照美国财政部的分析，不同国家抛售美元的目的各自不同，比如中国大幅抛售美元的目的是为了支撑人民币的稳定，防止本币快速贬值。美国财政部近期向美国国会提交的报告也表示，中国并非汇率操纵国，中国没有通过操纵汇率贬值获得贸易优势，虽然人民币在过去一年持续贬值，但原因是市场压力。美国财政部报告认为，如果北京方面没有采取措施，人民币贬值幅度会更高。沙特抛售美债的原因是为了抵消石油美元贬值带来的财政赤字压力。据外媒报道，沙特计划近期开启首次国际发债，拟募集资金 175 亿美元，是迄今为止中东地区最大规模的国际发债。日本抛售美元的原因则是因为在实施负利率之后，日本国内对美元的需求上升，因此抛售美债兑换现金。

虽然不同国家抛售美债各有其特殊需求，但是全球央行集体大规模抛售，更核心的因素还在于美元加息的预期所致。理论上而言，加息和债券价格通常呈现跷跷板效应，由于美联储 12 月加息的预期升温，美债价格难免会出现下跌，全球央行选择在正式加息到来前提前出逃，可以算是对美联储加息预期的集体回应。如果全球央行抛售美债的行动继续升级，反过来又会制约美联储加息的步伐，使得 12 月底美联储的加息行动变得更加复杂。

过去一年时间里，美联储屡次推迟加息的步伐，

在去年底首次加息之后，迟迟没有按下第二次加息的按钮，除了美国自身的就业和通胀数据不够理想之外，美联储还屡次提到对于新兴市场的担忧。一旦美联储开启第二次加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都可能出现资本大规模外流，引发金融市场乃至经济动荡，在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的背景下，美联储的政策具有越来越明显的外溢性，新兴市场的动荡最终也会反过来冲击美国经济。

在美联储对于加息屡次爽约之后，12 月底加息在市场看来已经势在必行，虽然加息还没有正式实施，但是对于市场的冲击已经开始显露，全球央行集体抛售美债，既是因为加息预期所引发，反过来又可能对美联储加息形成掣肘。

全球央行集体抛售美债，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这就意味着美国举债成本的提升，对于高度依赖债务扩张的美国经济而言，举债成本的大幅上升，将给美国现有的经济模式带来巨大挑战，这将是美联储历史上所没有面对的新难题。在 2008 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美国国债总额为 9 万亿美元，占 GDP 比重 65%，次贷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国债规模屡次突破天花板，目前美国国债总额已经接近 20 万亿美元，比次贷危机前已经翻番，占 GDP 的比重已经超过 100%。

虽然美国政府一直在试图减赤，但在刚性支出面前，未来的债务规模依然难有实质性缩减，美国的财政支出主要是社保、医保和公共医疗补助、国防军事开支以及利息支出这几项，占美国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七成，而且基本上难有缩减空间。在老龄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美国财政赤字也在出现上升势头，美国财政部近期发布的一篇报告表示，截至 9 月 30 日的 12 个月中，美国预算赤字超过了 5874 亿美元，较 2015 年的数字 4391 亿美元增长 34%，美国 2016 年财政预算赤字占 GDP 比重从前一年的 2.5% 上升至 3.2%，自 2009 年以来首次扩大。未来美国经济仍将高度倚重于债务扩张，按照美国很多专业机构的测算，美国未来 10 年的公共债务负担预计将增加 10 万亿美元。

美国国债的主要持有人除了美国社保基金和美联储之外，主要由海外央行持有，中国、日本、欧佩克

组织、英国、金砖国家等都是重要持有人，长期以来，外国央行对于美国国债的需求一直保持上升势头，很好地满足了美国的印钞需求，即使在2012年美国信用评级被标普等机构下调，美国国债也没有被海外央行抛弃，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美国国债的持续扩张，进而为维持美国经济正常运转提供了重要动力。

一旦海外央行开始大规模抛售美国国债，美国依靠债务维持运转的模式将遭遇严重考验，最直接的影响将是美债利率上升。从今年6月份以来，美债收益率已经从1.4%上升到1.8%，涨幅约40个基点，海外央行抛售美债的影响已经有所显现。这一轮海外央行抛售美元，主要是由美联储回购以及散户接盘，但从长期来看，依靠美联储回购和散户维持美债的增长并不具有持续性，如果未来全球央行抛售美元的规模升级，美国国债利率可能面临快速上升的风险，这将对美国财政支出带来巨大压力。过去几年，随着美国国债规模滚雪球般扩大，利息支出已经成为美国财政支出的重要一部分，大概在2012年左右，美国利息支出占联邦财政支出的比重约为6%，截至去年底，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12%，一旦美债利率上行，美国利息支出还将大幅增长，原本脆弱的美国财政支出将遭受更大的压力。

目前全球市场认为美联储在12月加息几乎已经

是板上钉钉，但事实上并非完全没有变数，如果全球央行抛售美债的规模继续升级，届时美联储将不得不考虑到这一因素对于美国经济的潜在冲击。对于美联储而言，这也是前所未有的新课题，在去年底加息之前，美联储最近的几次加息周期分别是1994至1995年，1999至2000年，以及2004到2006年，最后一次加息戳破了房贷泡沫，导致次贷危机爆发。这三次加息周期下，美国的国债尚没有形成今天的规模，因此美联储彼时加息不用过多考虑到这一因素，但是随着如今美债已经逼近20万亿美元，超过了全年GDP总量，美债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已是今非昔比。到今年12月美联储年内最后一次议息会议上，美债因素可能会成为美联储新的顾虑，年底加息也并非完全是板上钉钉。

由于美联储对于加息的态度始终摇摆不定，导致现在的局势让美联储自身也骑虎难下，因为美联储加息的靴子迟迟没有落地，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就一直存在，在金融市场上，导致市场波动的往往不是某一件重大事情本身，而是市场对于这件事情的预期，美联储加息对于市场的影响正是如此。美联储第二次加息还没有正式到来，全球金融市场的反应已经超出了加息本应带来的影响，包括美元过于强势、美国国债被集体抛售、新兴市场货币大幅贬值等等，这些市场反应已经让美联储越来越难以扣下加息的扳机。■

大家都来听一点古典音乐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 84050451
84681046 84681042 (传真)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爱乐》杂志网址：
<http://www.lifeweek.com.cn/philharmonic>

《爱乐》2016年第十期要目

古典音乐欣赏入门系列 94

- 飞入英伦的奥尔菲斯：珀塞尔和他的音乐世界
- 孙健、刘青、臧尘、孙冰洁对珀塞尔的歌剧《狄朵与埃涅阿斯》、键盘乐、合唱和《仙后》的精彩解读

纪念册 柯达伊《无伴奏大提琴奏鸣曲》的首演

逝者 瑞典的夜莺：珍妮·林德(上)

话题 “本真主义”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是什么？

指挥艺术历史中的一些继承关系梳理(一)

爱乐笔记 我们真的认识古尔德了吗？

此声还依旧——听贝多芬的大提琴奏鸣曲

现代音乐 竖琴之魅

作曲家档案 记俄罗斯作曲家卡林尼科夫

指挥家档案 富特文格勒：勃拉姆斯与我们的时代危机

演奏家档案 捷克钢琴家鲁道夫·费尔库斯尼访谈

作品 格里格三首小提琴奏鸣曲初探

专题 库尔特·桑德林回忆肖斯塔科维奇

我的爱乐往事 少年爱乐在北大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先生二三事

《爱乐》2016年订阅须知

2016年《爱乐》月刊，每期240页，全年12期，零售单价：20元，全年定价：240元。

2016年《爱乐》邮局发行，邮发代号：

82-24，读者可到各地邮局直接订阅，也可汇款至杂志社订阅。全年订阅8折优惠，订阅年价：192元。欢迎咨询、订阅与作为礼品馈赠他人。或在卓越网订购：www.amazon.cn

邮局汇款：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收款人：爱乐

银行汇款：开户行：工行王府井金街支行

户名：三联生活周刊

账号：0200000719004641092

网上支付：www.lifeweek.com.cn

新兴市场之殇

蒙古经济探底

文 / 刘怡

产业结构单一、对外国投资人友善度极低的蒙古国，一度在 21 世纪初全球大宗商品暴涨的浪潮中斩获颇丰，并自鸣得意于其“第三邻国”的外交政策。如今，这个“蓝天之国”正面临一场经济崩盘。

如果新一届国家大呼拉尔（State Great Khural，即国会）的选举日期不是安排在 2016 年 6 月 29 日，而是往前推一年，其米德·赛汗比勒格或许不会成为最近 10 年来蒙古国任期最短的一位总理。

在 2015 年夏天，赛汗比勒格有着足够充分的理由说服国民投票继续支持蒙古民主党（DP）：自 2012 年 6 月该党在大呼拉尔选举中获胜以来，蒙古 GDP 增长率已经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 2.7% 回升到了 2014 年时的 7.8%，并使国际投资者乐观估计至少还存在 100 亿美元的投资空间。2015 年 5 月，蒙古成功发行了 5 亿美元的新债券，并促成日本国会通过一项双边贸易协议，在 10 年内逐步免除蒙古对日出口商品中 96% 的关税。与中俄两个近邻的经济、政治合作也有新进展：在中国领导人于 2013 年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之后，蒙古也于 2014 年出台了“草原之路”计划，希望从国内外获得 500 亿美元的融资，修建联通中俄两国的新高速公路、电气化铁路以及天然气和石油管道，以充当中俄之间的主要经济走廊。尽管由澳大利亚力拓集团和加拿大艾芬豪矿业投资的奥尤陶勒盖（Oyu Tolgoi）铜矿开发进度落后于预期，使得预算缺口相当醒目，净外债总额也依旧高达全年 GDP 的 1.3 倍（这一数字仅次于冰岛，高于债务危机中的希腊、塞浦路斯和西班牙），但至少表面上仍显得风平浪静、机会大过风险。

一年过后，一切都起了变化。由于蒙古最大的大宗商品出口国中国在过去 12 个月里缩减了 30% 的煤炭进口，并且国际期货市场持续低迷，蒙古在 2015 年底时的 GDP 增长率已滑落至 2.3%。外商直接投资额





今日乌兰巴托市郊的贫民聚居区，数十万人仍居住在简陋的蒙古包和木制棚屋中。乌兰巴托一词意为“红色英雄”，系为纪念蒙古革命之父、红色游击队长达木定·苏赫巴托尔而更名



1939年诺门罕战役结束后，蒙古领导人乔巴山元帅（右一）与苏联军人一起检视日军遗弃的大口径炮弹发射药筒

在最近10年里第一次变为负数，财政进项的缩水和支出高企使预算赤字逐步上升至22亿美元，占全年GDP的18%，远高于4%的法定上限。类似“战略走廊”这样的画饼已无法再搪塞民众——6月29日，就在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结束塔什干“上合”组织峰会之行、宣布与中俄两国元首签署建立三国经济走廊的协议之后5天，由他长期领导的民主党在大呼拉尔选举中遭遇惨败，仅拿下76个议席中的9席，从而为老对手蒙古人民党（MPP）重返政府官铺平了道路。但新政府对愈演愈烈的赤字和债务危机同样束手无策，整个8月，蒙古货币图格里克（Tugrik）贬值超过10%，在154种基本通货中表现最差，迫使央行将基准利率调整至历史新高的15%。新任财长乔伊吉勒苏伦在对民众的电视讲话中承认，由于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上升至78%，乌兰巴托当局已无法支付公务员和军人

的全额薪水，“国家正处于深度经济危机状态”。预计在一到两个月里，人民党内阁就会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亚洲开发银行（ADB）以及世界银行发出援助请求，以偿付明年3月到期的一笔5.8亿美元的债券，避免财政彻底破产。

从1946年独立获得承认到2016年经济濒临崩盘，70年的蒙古现代史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992年之前，以“一边倒”的姿态依附于苏联，并从经互会国家获得细水长流的经济援助和财政支持；1992年之后，在外交上奉行“不结盟、等距离、全方位”的多支点战略，经济上则利用东北亚各国尤其是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增长的机遇期，出口煤炭和矿产资源。汹汹涌入的国际资本一度使蒙古的GDP增长率在2011年攀升至17.5%，位居世界之冠，但未能使这个大漠和草原之国摆脱在拉丁美洲和非洲曾反复出现的“资源诅咒”。不稳定的市场和法制环境，被政治风向所左右的大型工程项目，以及由来已久的借债传统，最终提前耗尽了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带来的红利。俄罗斯投资银行复兴资本（Renaissance Capital）在2009年底发布的一份著名报告《蒙古：“蓝天之国”的机遇》曾将该国的经济走势形容为势不可挡的“蒙古狼”，短短7年之后，这匹曾经凶猛的灰狼正以同样惊人的速度奔向财政破产的悬崖。

漫长的“输血”

尽管外蒙古的主权独立要到1946年才被国际社会普遍承认，但从20世纪初“蒙古独立运动”兴起开始，俄国的影响就在这片草原与大漠之地扎下根来。1911年底，外蒙古宗教领袖第八世哲布尊丹巴活佛在沙俄支持下宣布“独立”，自称皇帝，至1920年初在中国北洋政府的军事压力下宣告撤销自治。不过进入1921年，随着进行中的苏俄内战蔓延到外蒙古，中国的控制力再度遭到颠覆——白俄军人冯·温甘伦男爵拥戴哲布尊丹巴重新称帝，一度控制了库伦（今乌兰巴托）的中央政权；由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领导的蒙古人民革命党（MPRP）则退出苏俄的卫星国远东共和国境内，在莫斯科的支持下组建了“蒙古人民临时政府”。1921年6月初，温甘伦的主力部队在恰克图周边被蒙古人民军和苏俄红军联手歼灭；一个月后，苏赫巴托尔在库伦宣布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革命政府”，以哲布尊丹巴为立宪君主，由人民革命党控制实权。1924年哲布尊丹巴圆寂后，人民政府将国家政

体变更为共和制，国名改为“蒙古人民共和国”（MPR）。从那时起到1946年，只有苏联一个国家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地位，并与其缔结了互助协议。

从1928到1952年，政府实权掌握在身兼国家小呼拉尔主席团主席（相当于国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部长会议主席（政府总理）和人民军总司令三职的乔巴山（Khorloogiin Choibalsan）元帅手中。由他奠基的蒙古社会主义模式，与苏联的斯大林模式不无相似之处：寺院和贵族的财产被强制没收，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遭到取缔，牲畜和牧民则被集中到苏联式的大型集体牧场中，在国家指导下进行统一放牧。唯一的区别在于，蒙古从来也没能开启苏联式的大规模工业化进程——在斯大林看来，蒙古最重要的经济价值应当是弥补苏联在工农、轻重产业方面已经出现的发展失衡。因此，在乔巴山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蒙古仅有的工业部门一直是皮革和羊毛加工、鞋靴生产以及织布，产品出口到苏联换取工业制成品和机械。另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蒙古在安全上还要充当苏联与日本控制下的中国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之间的缓冲带，在此处建设过于庞大的工矿产业，在战争爆发时有遭到集中摧毁的危险。

1945年“二战”的结束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部分改变了这一切：蒙古不再成为军事前沿，于1948年启动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围绕畜牧业合作化开展经济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基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互助，亦自1956年起向蒙古提供了3笔总额达4.6亿卢布的经济援助，并派出1.8万名技术专家和工人帮助蒙古进行基础设施建设。1961年，全长2215公里的纵贯蒙古铁路线建成，它是蒙古第一条铁路客运线路，将中国内蒙古城市集宁与靠近贝加尔湖的俄罗斯城市乌兰乌德连接起来，使蒙古被纳入著名的横贯西伯利亚铁路网，至今仍在承担全国80%的货运和30%的客运任务。首都最著名的一些地标性建筑，例如苏赫巴托尔墓（样式模仿莫斯科列宁墓）、乌兰巴托饭店、国家古典艺术剧院以及被称为“灰宫”的政府宫，也都是在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建设高潮期，由苏联、东德和捷克建筑师设计并援建的。

不过到60年代初中苏分裂时为止，蒙古的经济建设尤其是第二产业发展依然停留在水平极低的阶段，90%的机械设备、100%的石油和石化制品以及70%的有色金属制品需要自国外进口。乔巴山的继任者泽登巴尔（Yumjaagiin Tsedenbal）自1952年起领导蒙古长达32年之久，他选择了再度向苏联“一

边倒”：1963年，苏蒙两国签署《关于强化南部边界防御的协议》，8万名苏联陆军和空军、1800辆坦克、2500辆装甲车辆、1400门火炮和315架军用飞机随即进驻蒙古境内。到1988年底撤军时为止，全蒙古共有4139平方公里的国土被苏军基地、营房和机场占据，相当于疆域总面积的0.26%；21个省中有15个驻扎有苏联军队，对草原造成严重的生态破坏。以至于日后蒙古政府竟提出了25亿美元的索赔要求。

但“一边倒”也带来了相当丰厚的经济回报：1962年，蒙古获准加入莫斯科领导的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在苏东集团的内部分工中扮演铝矿石和铜矿石（均为重要的机械和航空工业原料）提供者的角色。起初，东德、波兰等国曾试图以来料加工的方式帮助蒙古发展制造业，但因为产品的质量过于低劣，最后不得不改为直接援助或赠予；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则持续地向乌兰巴托提供无息贷款。到1987年为止，蒙古从经互会国家获得的直接经济援助累计达10亿美元之巨，并占用了苏东国家对外投资总额的5.8%。考虑到当时蒙古的总人口不足200万人，而6400万人口的越南累计获得的经济援助也不过20亿美元，这无疑是相当可观的数字。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兴建达尔汗、额尔登特、乔巴山三座工业城的资本几乎完全是由苏东国家所赞助，苏联还向蒙古人民军提供了425辆坦克和126架战斗机。

到1985年为止，蒙古的年均财政收入已经由1940年时的1.24亿图格里克稳步增长到了57.43亿，其中32.4%的进账来自工业部门，18.3%来自农业。政府同时乐观估计，到第八个五年计划结束时的1990年，年均财政收入还将继续增长至少26%，并进一步追加对工矿产业的投资。但即使是在这一阶段，产业结构失衡、严重依赖外部“输血”的缺陷也已经暴露得相当充分——尽管蒙古在历史上素以畜牧业著称，但过于偏执的集体化和合作化政策使得整个第一产业效率极为低下，占全国总人口1/4以上的农牧民宁可依靠政府补贴过活，也不愿改进粗放的畜牧模式。进入70年代中期，蒙古的种畜数量甚至下降到了“二战”爆发前的水平。至于工矿产业，虽然由于苏联这个最大进口商和投资者的存在，发展势头相当可观，但苏式国企那种注重短期利益、贪渎横行和缺少规划的特征也被蒙古人继承了下来：到80年代后期，全国80%的工业产能、90%的采煤业和100%的采矿业都集中在以乌兰巴托为中心的中部城市带，上百万人口拥挤在这片缺少足够住房、卫生设施和供暖条件的区域里，



在达尔汗乌勒省的沙林高勒，一名蒙古工人在矿场中操作移动式破碎机。煤炭、铜矿和金矿开采业的畸形繁荣带来了21世纪前10年蒙古经济的井喷式发展，但产业结构单一、贫富差距极大、负债率偏高等问题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步暴露，最终导致了2016年夏天的经济崩盘

半数人仍须以蒙古包为家。

最重要的是，由于经互会体制的存在，蒙古的国民经济既不遵循市场规律，又无法依靠自身优势独立发展。到1990年开始实行多党制转轨为止，蒙古外贸总额的80%系与苏联进行，另有15%发生在和其他经互会国家之间。由于图格里克的汇率与苏联卢布挂钩，且矿石、煤炭和羊毛制品的出口往往以记账贸易的方式进行，乌兰巴托当局根本感受不到大宗商品供需预期波动带来的压力。来自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资本投入，还掩盖了国民收入低下带来的经济活力不足：在苏联解体之前，蒙古国民消费占GDP的比重长期维持在60%以上，若无源源不断的外部“输血”，政府根本无力升级生产设备和交通运输条件。而畸高的税率、庞大低效的国企和刻板呆滞的计划部门，几乎构成了前转型时代蒙古经济的最突出特征——政府岁入

的63%来自营业税，29.9%来自国企上缴的利润，却有18.7%的开支花在了行政机关的运作和国防上。而即使是在每年持续获得经济援助和外国贷款（而且是条件相当优惠的免息贷款，大部分在苏联解体之后未曾归还）的前提下，蒙古的财政收支也不过勉强维持平衡，这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等距离”外交

1990年7月，蒙古举行了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多党制选举，名称中已经去除了“革命”一词的人民党在大呼拉尔的430个席位中拿下357席，组成了转型后第一届政府。1992年2月，根据新宪法的规定，“蒙古人民共和国”正式更名为蒙古国，立国宗旨由社会主义变为建立和发展人道的、公民民主的社会。在那



2006年7月11日，参加那达慕大会开幕式的蒙古牧民策马经过政府宫前的苏赫巴托尔广场。2013年，该广场被重新命名为成吉思汗广场

之后，70年红色历史留下的印记开始像潮水退去一般渐渐消逝：在2005年的政府宫改造工程中，这座外表面被黄色花岗岩覆盖、带有浓厚苏联气息的新古典主义大厦被重新改建为拥有蓝色玻璃幕墙、穹顶和天井的民族风格建筑，政府宫正前方的苏赫巴托尔墓则被整体拆除，原址竖起了一座巨大的成吉思汗坐像。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两位前领导人的遗体被火化后按藏传佛教仪式重新埋葬，首都的苏赫巴托尔广场改名为成吉思汗广场，国家图书馆门前的斯大林像也换成了语言学家宾巴·仁亲的全身铜像。2012年10月，在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到访之后不久，蒙古拆毁了国内最后一座列宁像。

然而，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迅速改弦更张相比，蒙古的经济、外交转型进行得远没有那么从容。从地理位置推断，苏联解体之后，转向南邻中国寻求帮助无疑是可取之举，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也可以为蒙古提供必要的借鉴。但“亲中”对人民党领导层来说恰恰是不可触碰的禁忌——在洗刷完苏联留下的印记之后，人民党将其历史正当性回溯到了1921年革命之初，抬出鲍陀、丹尚、丹巴多尔济等在20年代的政治斗争

中被清洗的创党元老作为新的政治图腾。而这些元老除去反对斯大林主义这一突出特征外，同样担心蒙古再度沦为中国的被保护国或政治附庸。丹巴多尔济在1925年提出过一项著名的外交方针，希望蒙古能成为“苏联和中国都能认可，其他大多数国家也予以承认的中立国”，中蒙两国执政党保持平等的关系，这项方针在90年代重新获得了重视。“独立之父”苏赫巴托尔的形象，也依旧为民众所推崇——在政府宫前的成吉思汗广场上，这位红色英雄身骑骏马的铜像就矗立在成吉思汗坐像之前。人们当然不会忘记，他在1921年不仅击败了白俄将领温甘伦的军队，还与进入外蒙古的中国军队作战。而“一边倒”时代形成的对俄罗斯的文化 and 心理依赖，同样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消除的：1941年，乌兰巴托当局宣布将蒙古文的书写形式由传统的索永布字母改为俄国式的西里尔字母，同时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强制学习俄语。纵贯蒙古大铁路在外蒙境内的部分，采用的也是与苏联相同的宽距铁轨，而与中国境内的标准轨道规格不同，以预防来自南方的“入侵”。蒙古对中国的防范心理，因此成为必然。

90年代后期，人民党当局最终宣布了被称为“多



蒙古西部巴彦乌列盖省的两名哈萨克族猎人在白雪覆盖的阿尔泰山中捕猎狐狸。他们是当今世界上最后的鹰猎人族群，身着皮袄，骑乘矮小的蒙古马，训练鹰隼捕猎狐狸和其他小动物

支点”外交路线的“不结盟、等距离、全方位”政策。不结盟是针对美俄两国的表态，意即蒙古无意与任何一个大国缔结军事盟约，也无意成为东西方向任何一方的安全支点。等距离是就中俄两国而言，希望在南北两个邻国之间游刃有余，避免为任何一国完全控制。全方位则是就日、韩、印等其他亚洲国家和美国、欧

盟等区域外势力而言，希望多方交好、多方受惠。由此又衍生出另一个概念“第三邻国”，意即蒙古乐于将任何愿意为其提供经济和政治支持的非本地区国家视为与中、俄地位相当的外交“邻国”。利用中国的劳动力和市场，获取日本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在安全上依靠俄罗斯，在全球层面则依靠和追随美国，这是



八面玲珑的“多支点”路线的本质。

只不过在市场化转型刚刚启动的90年代，蒙古对欧美和日、韩资本无论如何都算不上理想的投资场域。币制改革和国际铜价的回升虽然在1995年把GDP增长率推到了喜人的6%，但效率低下的老国企依然占据着大部分新增加的流动性，并使整个银行业成为其

效益的担保者。1998年亚洲和俄罗斯经济危机的爆发，几乎使过去8年的努力毁于一旦：依然倚重对俄资源出口，且双边贸易部分采用卢布结算的蒙古一下子损失了80%的对俄贸易收入，铜和黄金价格的下滑则使GDP增长率由1998年的3.2%迅速缩水到1999年时的1.3%。又过了20个月，一场突如其来的雪灾使蒙古损失了3300万头牲畜中的240万头，连带也终结了民主党与社会民主党脆弱的政治联盟。人民党在大选中重新获得压倒性胜利，并确定以私有化、引进外国直接投资（FDI）和专注发展采矿业作为复兴经济的举措，“蒙古狼”终于开始咆哮。

从90年代末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外国资本驱动下的煤炭、铜矿和金矿开采几乎成为蒙古经济增长的唯一活力。来自61个国家的1500家外国企业相继涌入这个基础设施建设极为滞后的国家，在短期内就投入了3.38亿美元的资金，并使采矿业在吸引外资方面的份额由1990年时的0%（当时的矿产出口以记账贸易的方式流向经互会国家）迅速上升至1999年时的25%。中国市场的带动作用尤其引人注目——由于纵贯蒙古铁路仅具备单向通行能力，运力存在巨大缺口，中国企业自2004年起即在蒙古中部和两国边境投资修建多条高等级公路，以降低运输成本。据《纽约时报》报道，早在2004年，中国资本就占据了蒙古纺织业、皮毛工业和羊绒加工业一半以上的份额，在蒙古工作和生活的中国公民一度相当于该国总人口的10%之多。2014年4月，中国神华集团还与三家蒙古国有企业成立合资公司，共同修筑一条18公里长的跨境铁路，将全世界最大的未开采煤矿南戈壁省塔班陶勒盖煤矿（探明储量约64亿吨）和中国内蒙古境内的甘泉铁路线联结起来。一旦该煤矿启动开采，焦煤可以经铁路直接运输至渤海装船。

截至2012年底，中国在蒙古的出口贸易份额中占据了88.9%的压倒性比例，是第二位的加拿大（4.1%）的21倍以上；中国商品在蒙古的进口贸易份额中占37.6%，超过俄罗斯和美国之和。中蒙之间的双边贸易额由1994年时的1.2亿美元一路上升至2013年时的60亿美元，数以千万吨计的煤炭、铜矿石、原油、牲畜和羊毛制品通过14个口岸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换回中国制造的家电制品、纺织品和农产品。在中国能源消费量增长的巅峰期，蒙古每年对华出口煤炭3000万吨，占中国进口煤炭总量的近1/10；100多家中国企业在蒙古从事矿业勘探和采矿作业，占中国对蒙投资总额的50%以上。为吸引中国企业继续在蒙投

资，乌兰巴托当局甚至在2013年修改了投资法，给予外国资本以国民级待遇。

不过，即使是在两国经贸关系的黄金期，“多支点”外交造成的隔阂依然存在。神华集团曾两次参与塔班陶勒盖煤矿的开发招标，皆被蒙古政府以种种理由加以否决；2012年中铝集团竞购南戈壁资源公司控股权的意向同样未能获得大呼拉尔的批准。2009年10月，经过为期6年的谈判，奥尤陶勒盖铜矿（预测年产量超过45万吨）66%的股份和开发权最终被出售给了加拿大艾芬豪矿业及其大股东、澳大利亚力拓集团，同样有“对冲”中国影响的考虑在内。2010年10月，连接南戈壁省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新货运铁路正式通车，更是将“等距离外交”的布局发挥到了极致：若从经济因素考虑，焦煤由塔班陶勒盖煤矿陆运至俄罗斯远东港口的时间是取道中国内蒙古的3倍以上，利润须打90%的折扣，但乌兰巴托当局对此似乎并不在意。时任外交部部长桑加苏伦宣称：“我们不想仅仅成为只面向（中国）一个国家的原材料供应商。”正在修建中的东西向横贯铁路干线（全长约1100公里），同样采用了与俄罗斯标准一致的1520毫米宽轨距，最终目标仍是要实现蒙古铁路网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体化，而无视其经济效益。

同样耐人寻味的还有蒙古在国际事务上与美国的遥相唱和。2001年“9·11”事件后，蒙古主动提出向美国开放其领空和军事设施。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后，蒙古派遣173人的非作战部队参加了美军的辅助行动，随后又陆续派兵前往科索沃和科威特。2012年，北约组织宣布将蒙古升格为与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同一等级的全球伙伴国。最近10年间，美国总统小布什和两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里曾先后访问乌兰巴托，表达对“继续推进蒙古的良好治理”的期待。而蒙古与俄罗斯甚至朝鲜的双边关系，并未因此遭到削弱。如此八面玲珑的外交手腕，显然是乔巴山和泽登巴尔所始料未及的。

逐利心理和对“民主政府较独裁者信誉更佳”的笃信促使国际投资者日益放低举债和融资的成本，甚至鼓励蒙古政府采取激进的赤字政策。

“资源诅咒”应验

在2012年前后造访乌兰巴托的外国游客会有一种相当魔幻的体验：在这座还没有一家麦当劳的城市，路易威登、杰尼亚、巴宝莉等外国奢侈品服饰的专卖店正在陆续开张，对面就是政府宫前策马扬鞭的苏赫巴托尔和那座价值500万美元的成吉思汗铜像。奢华的夜总会和富于草原风情的摇滚乐每年能从全世界吸引到上百万人次的游客，来自亚洲各国的商人和超过137万的常住人口使乌兰巴托的公寓月租金一度被哄抬到800美元的水平。在硬币的另一面，大多数蒙古人的月平均工资仅为250美元——2011年高达17.3%、位居世界第一的GDP增长率对绝大部分国民的生活水平加成有限。少数精英阶层之外，全国依然有1/3的人口生活在月平均收入不足83美元的贫困线以下，住蒙古包、冬季烧木炭取暖。

120亿美元的GDP（2015年数字）造就的不是一个新的卡塔尔，而是亚洲的尼日利亚：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曾一再应验的那种“资源诅咒”，也在蒙古逐渐萌发。煤炭和铜矿出口给予了政府领导人一种极为简便的获取外汇的途径，使他们能够在不必对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做大规模调整的前提下获得可观的财政收入增长。对大宗商品市场的乐观预期，还会使政府乐于举借高昂的债务，透支未来以换取当下的虚假繁荣。而国际投资者对亚洲经济前景和乌兰巴托政权稳定性的信心，同样助长了在蒙古的非理性投资——逐利心理和对“民主政府较独裁者信誉更佳”的笃信促使他们日益放低举债和融资的成本，甚至鼓励蒙古政府采取激进的赤字政策。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开端，作为新兴市场代表国家的蒙古被认为存在100亿美元以上的进一步投资空间，几乎与其GDP规模相当；南戈壁省荒漠中那些还处于待勘探状态的煤矿、铜矿和钼矿被估价2.75万亿美元，包装成投资项目兜售给外国客户。没有人关心矿业对国际市场的过高依赖程度会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所有人的眼中都只有振奋人心的远景。经济稳定增长本来应该意味着对债务规模的控制和削减，但受到鼓励的政府反而变本加厉地借债，造成“经济越增长，债务越上升”的怪相。当政府终于察觉到偿债成本过于高昂时，事情已经发展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

事实上，蒙古的“荷兰病”状况，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就暴露出来了。由于欧美资本大量撤出和多个大型项目停工，GDP增长率在12个月时

间里由8%暴跌至2.7%，商品出口额缩水24%。乌兰巴托当局不得不以苛刻的条件从IMF争取到一笔2.32亿美元的贷款，以维持财政的正常运转。但在2010年国际原煤和铜价复苏之后，教训很快被掷于脑后：托庇于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消费的继续扩张，蒙古的对华煤炭出口再创历史新高，政府也重新有了底气继续向国际资本借贷。民主党在2012年大呼拉尔选举中获胜后，先后在国际市场发行了价值15亿美元的“成吉思汗”国债和2.5亿美元的“武士”日元国债；加上此前为蒙古发展银行提供担保发行的5.8亿美元国债，最近4年蒙古经济一直在以高负债的状态勉强运行。外债占财政预算的比例已经逐步突破了50%，这一数字几乎与经互会时代的规模相当，而债主们显然不会像当初的苏联一般，放任乌兰巴托延长偿债时间。

出于对蒙古经济运行状况的担忧，自2012年起，欧美资本逐步加快了撤出“蓝天之国”的速度；而民主党政府对这一风险似乎浑然不觉。2013年2月，大呼拉尔通过了成本超过280亿美元的乌兰巴托市新规划方案，计划重建和改造全市的10个区、新建3座卫星城、一条170公里长的客运铁路线、一座新机场以及全套公共交通系统，项目预算相当于全年GDP的两倍。受这一规划案刺激，市中心的现代化公寓的报价一度突破每平方米3000美元。而中央政府2015财年的总收入是26.7亿美元（支出为48.7亿美元，赤字率82%）——显然，没有一位严肃的经济学家参与过那个疯狂的规划方案的讨论。

从2017到2018年，蒙古政府共有超过17亿美元的国际债务（其中包括与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互换协议规定的部分还款）需要清偿，包括明年3月到期的那笔5.8亿美元的开发银行债券。而除去占GDP份额超过30%的矿产出口收入，政府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抵押品。即使是这座看上去永无枯竭可能的金山，也密布着重重裂缝：一直以来，大呼拉尔都试图修改2009年与艾芬豪和力拓签署的奥尤陶勒盖铜矿开发协议，以增加蒙古方面获得的分红。该项目预计投资超过100亿美元，力拓方面已经投入了6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计划在2021年启动全面生产。在最初的协议中，蒙方须承担项目第一期1/3的工程，但由于政府方面缺少启动资金，最终力拓以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LIBOR）再加6.5%的高利率为其提供了融资。换言之，在铜矿启动生产后的前15年，蒙方理论上可以获得的利润都须用来支付已经拆借的债务，不会

有任何剩余。而违约修改协议只会导致外资进一步出逃，并进一步抬高蒙古从国际市场借债的成本。

实际上，借债成本已经被拉高到了骇人的程度：在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已经上升至78%、总额超过84亿美元的情况下，蒙古国债的发行利率现在至少须定在12%。而对国内企业的压榨同样已经到了极限：由于银行业完全不对外国资本开放，蒙古国内银行目前的贷款年利率高达22%至28%；中小企业在承担巨额融资成本的同时，还须分担图格里克汇率暴跌造成的损失，已经完全丧失活力。最大国际贸易对象中国预期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以及能源需求量的下滑，则在进一步打击其对经济前景的信心。雪上加霜的是，最近几年蒙古社会非但没有表现出任何欣欣向荣的迹象，反而与新纳粹和极端民族主义的猖獗联系在了一起。显著标志便是对昔日蒙古帝国历史和成吉思汗形象的过分推崇。

“成吉思汗热”和民族主义浪潮在蒙古的兴起，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一种正常现象。那位8个世纪之前的蒙古枭雄与今天的蒙古民族国家关系微乎其微，甚至连一种文化上的纽带都不具备——当代蒙古的文化形态和语言、艺术特征基本上是20世纪俄罗斯历史的副产品，民族性特征相当单薄。与其说是蒙古人重新发现了成吉思汗的精神价值，倒不如是说一种因失望导致的精神补偿：希望这位传说中的伟人能帮助蒙古解决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希望对13世纪历史的追忆能部分弥补被外国投资者予取予求的精神创伤，甚至在对昔日辉煌的回想中塑造一种再度“复兴”的幻觉。这位蒙古大汗的形象被印在1万图格里克币面上，被用来命名商场和夜总会，甚至连短命的哲布尊丹巴“皇帝”也成了被崇拜和褒扬的对象。似乎只有这种对中国“外来者”的精神胜利法，能够稍微平复债务危机下的焦虑和迷茫。

只是在自我安慰之余，丧失后劲的蒙古依然需要靠兜售“前途远大”的巨型基建项目来吸引国际社会的关注。7月初，中、俄、蒙三国签署经济走廊规划纲要之后不久，乌兰巴托方面放出消息称：希望以不高于2.5%的利率从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获得多笔融资，以建设总长550公里的新铁路项目。看上去，无论“等距离外交”还是成吉思汗都无法化解蒙古政府目前的窘境，南方的邻国成为最后的救命稻草。但愿他们在抛出如此雄心勃勃的计划之前，已经向经济学家和财政专家做出了咨询。☑

景海鹏和陈冬：执行新任务的航天员升空

记者 吴丽玮



(朱九通摄)

“神舟十一号”航天员景海鹏（左）和陈冬

三次升空的老航天员和年轻的新航天员一起完成 30 天的中期驻留任务，“天宫二号”正在向空间站的方向迈进。

在第六批航天员即将升空之际，朱九通只记得有过两次流泪。第一次是从北京出发前，景海鹏和陈冬的妻子“眼睛有点湿润”，第二次是出发前几小时景海鹏的眼泪。

10月17日凌晨1点多，景海鹏和陈冬起床去餐厅吃饭，陪他们一起吃饭的是航天员中心副主任费俊龙、航天员大队大队长聂海胜，以及另两位候补航天员。几个人拿着红酒杯各自倒了一点儿可乐，景海鹏似乎说了一些沉重的话，陈冬绷着嘴表情严肃，最后景海鹏哭了。

从“神舟五号”载着杨利伟上天时起，朱九通一直都担任着航天员的专职摄影师，见证了每一次的载人飞行任务。“最紧张的是杨利伟那一次，发射之后我看前方指挥大厅里很多人都激动地落泪了。之后每一次大家都很轻松，像景海鹏已经上去过两次，这次心里更有把握。”所以他觉得景海鹏只是一时情绪激动。

第六次载人发射，早已没有杨利伟当时那种悲壮感。朱九通向本刊回忆当时的场景：“他们按时起床，两个人都面带笑容出来，表情很轻松。”朱九通在外面看他们的表情，很快几个人就带出了笑意，干掉杯中的可乐仍觉得意犹未尽，几个人又举起碗里的汤碰了一下。

两个航天员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的一套两室一厅的房间里。收拾好行李后，像以往每个航天员一样，他们要在房间的门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景海鹏住在自己2012年乘坐“神舟九号”第二次升空时的房间，聂海胜2013年第二次升空也住在这里。陈冬住的是杨利伟当年住过的房间，门背后最上面写着“首飞航天员杨利伟”，下面依次是张晓光和刘伯明的签名。

朱九通要在升空准备过程中拍一些照片作为资料，因而能始终观察到两名航天员的情绪状态。“他们俩的确很轻松，有时我让他们看一下镜头，他们就会很配合地摆一个手势，或是两个人手拉着手。”两名航天员中，景海鹏50岁，陈冬38岁，他们分别来自我国在1998年和2009年选拔的两批航天员。景海鹏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对搭档陈冬相当满意。“我们俩性格特别相像。一是凡事心里有数，平时都是看得多、听得多、干得多、说得少。二是心细。以前执行两次任务，战友们说，以前听说你细，没想到你这么细。但跟陈冬在一起，我发现某些地方他比我还细。三是一个问题不解决，誓不罢休。四是都有追求完美的‘毛病’。一次考试，一共两个空，他全填上了还不算，又在后面添了一个括弧，把其他要点全写上了。此外，这位小兄弟对我特别尊重，训练一年多从来没有在我之前提前上车，每次电梯打开以后，他都会目送我上电梯，让我特别感动。”

陈冬是这次公布的航天员新面孔。他和刘洋、王

亚平都是2009年选拔的第二批航天员，他和刘洋既是同一届的河南老乡，又是空军长春飞行学院的同学。陈冬是洛阳人，他的中学班主任姚志强告诉本刊，陈冬所在的班级，一直都非常重视体育锻炼，陈冬既是班长，又是足球队队长，还是学校运动会上各种项目的主力，身体素质非常好。高二的时候，高三有一名很调皮的学生退级到了姚志强老师的班里，和大家一起学习了几个月后，如期参加了高考，结果这名学习不太好但运动能力特别强的学生考上了飞行员。“这对陈冬的触动非常大。我也借这个契机跟学生们说，有机会都去参加飞行员招募，这是多光荣的一件事。”姚志强说，结果第二年高考，陈冬和班上另一名女生都被长春飞行学院录取为飞行员。

考飞行员，陈冬差一点因为视力原因落榜。但他高考考了620多分，比当年的一本线高出不少，长春飞行学院招生办的老师从没见过这么高分的考生来报飞行员，很珍惜，就又把他的体检结果调出来重新审查。飞行员招募的视力线是1.0，而陈冬的体检结论是0.9，招生办老师发现，查视力的两位医师结论不一致，一位给的结果是1.0，另一位是0.9，为了保险起见，最后填了0.9。因为他的文化课成绩太好，最终这个有争议的视力结果被忽略不计。

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副总设计师黄伟芬曾评价陈冬说，作为年轻一代的航天员，他各方面都很全面、优秀，也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短板，是很优秀的航天员。“平时你看陈冬说话温文尔雅，也很质朴，但是他很有主见，也很聪明。”从初选到定选，陈冬在同批航天员中成绩都是第一。

在航天员中排名第一来之不易。军校毕业后，陈冬在嘉兴机场空军部队服役，飞行过强-5超音速轻型强击机，2010年入选第二批航天员之后，训练更加系统和艰苦。航天员要掌握八大类58门课程，陈冬曾回忆说，平时需要学习几个月才能完成的一门课程，他们要在一两个星期之内学完。“我记得那时候白天上完课，晚上就待在宿舍里面翻书，不会的大家聚在一起，相互讨论。”除了理论学习，航天员的训练也相当残酷，比如离心机练习，要求航天员身处八米旋转臂一端的关闭吊舱内，训练中他们常常被无穷的离心力甩得脸部变形；为了习惯长时间的太空失重状态，航天员还要承受五天五夜的头低位卧床练习，在倒竖的状态下，他们要正常地吃饭、喝水，进行摄像等操作。

这次在“天宫二号”工作30天的中期驻留飞行任务中，陈冬主要负责做实验、维修设备，甚至还要

养蚕、种菜，他的角色更偏向一名工程师。针对此次任务及未来空间站任务，黄伟芬解释，第二批航天员在一些方面能力更强，而首批航天员则胜在经验丰富。景海鹏是我国唯一一个三次升空的航天员，他在这次飞行任务中担任指令长，肩负载人飞船驾驶、交会对接、飞行计划管理、飞行安全保障等职责。从后来公布的几段录音对话中来看，“神舟十一号”发射升空后景海鹏更加沉着轻松，“老司机”景海鹏让陈冬多看看窗外，并且一直追问到陈冬回答“爽”才罢休。景海鹏察觉失重状态的来临也比陈冬敏感得多，进入“天宫二号”时，陈冬一不小心飞过了头，景海鹏一把把他拉了回来。

与高分录取成为飞行员及备训六年就获得升空机会的陈冬相比，景海鹏的起步并不算顺利。

景海鹏出生在山西运城的农村家庭，是家中老大。1984年，他第一次参加飞行员招募考试，不幸落选。他的妹妹景艳芳回忆说，这对大哥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连门都不愿意出，说自己“没脸见人”。更令他难以接受的是，父亲想让他退学，兄妹三人的学费让务农的父亲难以为继。后来在别人的劝说下，继续考学的机会终于保住了，第二年，景海鹏不负众望，终于被空军录取为飞行员。他在一篇文章里回忆当时，经过几次体检，他成为仅有的两名候选人之一，空军体检的最后一项是放大瞳孔，这是最难的一关，他也通过了。散瞳后怕见光，医院发了一副墨镜给他。“我戴上墨镜骑着自行车回家，到田间地头找父亲。我爸戴着草帽正在田里除草，我对他说：‘我考上空军了。’我爸二话没说，扛起锄头就往家走。我戴着墨镜，推着自行车跟我爸一块回到家里，那一刻我掉眼泪了——我觉得梦想可能快要实现了。”景海鹏回忆说。

景海鹏在航天员里是公认的刻苦努力，朱九通记得航天员刚刚见到“神舟五号”内部环境时，他曾进去拍照存资料，回来之后景海鹏就来问他要一张仪表盘的照片。“那个仪表盘非常大，上面的按键非常多，他让我按照一比一的比例帮他印一张照片，回去放在

训练中他们常常被无穷的离心力甩得脸部变形；为了习惯长时间的太空失重状态，航天员还要承受五天五夜的头低位卧床练习，在倒竖的状态下，他们要正常地吃饭、喝水，进行摄像等操作。

宿舍里，没事的时候就看着练习。也只有他一个人来找我要。”虽然1998年就入选了首批航天员，但2003年杨利伟升空时的三人首飞梯队里没有他，“神舟六号”派出的是费俊龙、聂海胜，他当时是候补航天员，也没有获得机会。他曾回忆说，当人们开始为费俊龙、聂海胜庆祝凯旋的时候，他就开始备战“神舟七号”了，结果终于如愿。四年之后的“神舟九号”升天，他再次担任了指令长，和他一起升空的刘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神舟九号”返回后不久，大家还都在进行身体恢复，结果她看到景海鹏的房间里满屋子的学习资料，刘洋诧异地问他：“‘神十’任务按规定我们不能参加选拔啊？”景海鹏回答：“那还有下次呢，‘神十一’‘神十二’呢！”

两名航天员在“天宫二号”里将实行每周六天工作制，每天工作8小时，保持与地面同步的作息时间表。他们每天保持一定的运动量强化体格，要收看“新闻联播”以免与世隔绝，“天宫二号”里的医疗系统可以随时监控航天员的健康状态。他们的食物也更加丰富了，食谱周期为五天，各种食物的种类达到近百种，一个长期稳定的空间生存环境正在逐步形成。

除了科学任务，航天员还要在太空中承担摄影和

摄像的职责，其中摄影的部分由朱九通来当老师。在“天宫二号”里拍照片，只需要分为舱内、舱外。舱外主要是透过舷窗来拍摄地球，朱九通指导两人根据光圈和快门速度来拍摄炫光表面。为了能更便捷地拍出工作照片，他和景海鹏、陈冬一起到地面的天宫模拟仓里实地拍摄，“天宫二号”的光源固定，景海鹏升空过两次，知道“天宫二号”的光线更明亮一些，根据这些条件，朱九通建议航天员手动调好快门和光圈拍摄舱内。“他们的确比一般人掌握得更快。”朱九通说，景海鹏去院子里拍太阳，又用鱼眼相机拍摄出一些角度夸张的舱内生活，几下子就掌握了朱九通传授的要领。

临走时，两名航天员各自带上了一卷照片画轴。“每人30张，让他们每天都能看看解闷。”朱九通说。陈冬的照片里最多是他和妻子的合影，以及和一对双胞胎儿子玩耍的照片。景海鹏的照片就相对刻板一些，包括他之前执行任务凯旋时的现场照，和某次回运城老家的几张端端正正的合影。在他的卷轴开端是小侄女跳舞踢腿的照片，前两年，景海鹏的弟弟去世了，他非常珍惜弟弟的女儿，这次也把她的可爱照片带到了太空，以解思念。☑

《新知》2016年第5期上市

(总第17期)



读者服务联系电话

(010) 84050425 84050451

读者服务部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新浪微博 @新知

微信公众号: 新知 WISSEN

关心一些恒久的事情——理性进步,智识生活的乐趣,美

Wir müssen wissen. Wir werden wissen.

[新知2016年第5期要目]

Entrée

天空中的微生物

宠物之魅

八卦人生

小人国和暗物质

Main

奇美拉的“美丽新世界”

人形动物的人文主义

动物的生活: 后人类主义、鱼和庄子

梦狼: 中世纪北欧狼人与史塔克家族

鸦科的傲慢与人类的偏见

从“人猿泰山”看人与动物的理想国

本世纪第一个灭绝的类人猿?

冰岛 DNA 档案

Fusion

哥白尼颠覆了人类中心主义吗?

当诗歌遇见达尔文和进化论

一切的开始: 伦敦动物园今夕

北京动物园的回忆

内容: 为动物提供情趣

克服杂草焦虑症

Dessert

我们如此不同,又如此相同: 一个人类学家的观察

真实世界中的虚假感觉: 再谈“瓮中之鳖”

难道还能给太阳也申请个专利吗?

帕普特和他的 LOGO 教育微世界

影像报道: 奥特伊赛马, 可怕的疾驰

月光下

1BOOK140 短书评

《新知》2016年订阅须知

《新知》双月刊, 每期160页, 全年6期, 零售单价20元, 全年定价120元。

2015年珍藏礼盒, 合订本已上市。

2016年刊开始征订!

读者可到三联生活网订阅: www.lifeweek.com.cn, 全年订阅8折优惠, 订阅年价96元。

或在卓越网、京东商城等订阅: www.amazon.cn / www.JD.com





绘画·阿梗

喧嚣时代 给灵魂一个栖息之地

阅读之美

生活周刊

每周一出版 全年52期 多样便捷的订阅方式
邮发代号:82-20 拨打11185上门收订
零售单价:15元 零售年价:780元 订阅单价:10元 订阅年价:520元,全年净省260元
读者服务电话:010-84050425/84050451 读者服务邮箱:dzfw@lifeweek.com.cn



自行车会回到城市吗？

文 / 杨璐

流行完健身和马拉松，标榜健康和环保的中产阶级下一步该骑自行车上班了吧？

自行车，下一个美好生活标签

跟大多数在创业苦海里熬夜的人不同，张向东是在纳斯达克敲过钟的，然后辞职创办了自行车创业项目 700Bike。他是互联网行业里出名的自行车爱好者，有若干辆好车，比如具有欧洲绅士气质的意大利公路

车 Bianchi、配置顶级的美国公路车 TREK、属于街头的自行车 fixed Gear。从热气腾腾的互联网世界里告别，加入看似已经风光不再的自行车行业，所以，这是一个“他在纳斯达克敲过钟，却辞去总裁职务，隐居在胡同里造起自行车”这样 10 万+标题的情怀故事吗？

张向东看起来不像是个心里没数的人，他告诉我：“做事情要看趋势，人们将来要转移到这上面来，你要先做这些。创业公司一定是在人们需求发生之前做，你要看到这个变化。”张向东的心得来自于上一次创业的成功经验，2004 年行业里的人都把精力放在



左图：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街头骑行者

右图：700Bike在上海组织的复古装骑行（摄于2016年10月）

PC端的时候，张向东的公司就以3G门户开了移动网络的先河，上线半年用户数就突破百万，此后两年内先后拿到了两笔千万美元规模的投资。在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普及之前，张向东就提前入场等着大家了，纳斯达克上市就是对大势判断正确的结果。

转型做自行车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他告诉我，在多年的骑行中发现，越是发达的地方，骑车的人越多。“发达国家对自行车的认识更深层是一个生活态度，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总结为自行车哲学，简单快乐自由。”张向东说。

从这个角度去看张向东的这次创业，他做的不是捷安特这样的代步工具，也不是为骑行发烧友们做公路自行车，而是中国城市生活的一种新品类。“就像从前穿着篮球背心、T恤去健身，但是健身成为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时，人们都穿Under Armour了。”张向东说。如果能理解当健身、跑马拉松成为时髦生活方式后，所衍生出来的那些美丽装备，就能理解张向东的逻辑。“所有骑行爱好都是从山地车开始的，我们自嘲是‘山马党’，骑着山地自行车走在马路上，

而且我上班骑车，穿着西服套装骑个山地车太奇怪了。后来我有了几辆手工自行车，很漂亮，等红灯的时候就有人上来问，这车哪里买的。我觉得这个就是需求，城市自行车是空白，当人们想在城市里骑一辆自行车的时候，700Bike就有了。”张向东说。

现在普通人中还看不到对于拥有一辆城市自行车所带来幸福感的向往，人们不是在摇不上车牌的无奈里就是堵在路上又烦躁又焦灼。张向东对这个现状很从容：“我们会努力让这件事快点发生，催化这个市场。”张向东说。潮流永远是从小众扩散到大众的，他最先争取的是那些比较敏感的、引领潮流的人。北京线下展示空间里，搭配的伙伴是瑞士环保品牌Freitag，这是用废旧卡车篷布清洗制作的包包，看起来又脏又旧却几千块一个，标榜的是一种鲜明的态度。他跟出境游品牌马蜂窝和穷游网都有合作，跟马蜂窝是联手推出定制的700Bike海外骑行路线，跟穷游网刚刚发布了一款“对世界上瘾”的定制自行车。而出境自由行数据是研究者观察消费升级的指标之一，代表着一个时髦活泼、有消费力的群体。他还跟



(王公之摄)

左图：700Bike
创始人张向东

右图：摩拜单
车 CEO 王晓峰

酷公司合作，在这些公司里设置自行车架，公司员工团购自行车给优惠价格。

700Bike 自己也经常策划一些自行车文化的活动，组织复古装的骑行，所有参加者从发型到服装都是民国装扮、组织环保主题的分享会，聚集骑行和 Freitag 的“粉丝”见面，参加由李宗盛做主席很多民谣歌手登台的简单生活节，组织一起骑车去看环保电影，他们还正跟公益组织合作翻译《夺回路权》，把国外自行车发展经验介绍到中国来。这些都是润物细无声的文化推广和营销，如果想要在大众里产生影响，接受自行车出行的生活方式，看来要走很长的路。

现实：丢车和维护的难题

张向东的自行车，造型十分优雅，穿上西装，在车筐里放一个托特包，立刻像从《Monocle》的图片

里走出来一样，而今年这本杂志的全球最佳生活城市特刊里，哥本哈根和阿姆斯特丹的入选理由也特别提到了它们都是自行车友好型城市。

这对于拥堵和雾霾常伴左右的“90 前”中国人来讲，是个五味杂陈的结论。自行车曾是中国人主要的交通工具，而到了 90 年代以来的城市化，我们的理解是大力发展汽车城市。在这种思路导向下，中国城市街头的自行车洪流只留存于历史胶片上，截至 2011 年的数据，北京、上海自行车的出行比例降低到 16.7% 和 30.6%。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说：“欧洲国家也同样经历了汽车社会的发展，从‘二战’结束到 60 年代，小汽车拥有量飙升，城市向外扩张，自行车出行比率下降。”有资料显示从 1950 到 1975 年，荷兰、丹麦和德国的自行车出行比率降低了近三分之二，同现在在北京和上海的数据差不多。

从汽车社会最先转身的是德国、丹麦和荷兰，它们的交通和土地政策向步行、自行车和公共交通倾斜，自行车的出行比例逐年上升。诸大建说：“现在看来与人为善的城市交通应该首先鼓励步行，马路小一点，大马路设计其实是相反的，一个红绿灯过不完马路是不对的。其次是方便慢行，就是自行车友好，然后是公共交通体系，最后才是小汽车系统。”这里涉及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的发展，在世界上都是U型曲线。诸大建说：“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到了第三阶段，中国下一步也面临着从汽车城市向自行车友好城市的转型。但我们的硬件和软件都不成熟。”

人们想“从我做起环保出行”确实不容易，丢车和维护这两个考验人性的事情是世界性难题。上世纪60年代，阿姆斯特丹一个组织将涂成白色没有上锁的自行车放在公共区域，希望人们长期免费使用，可几天之内所有自行车丢失或者破坏殆尽，计划彻底失败。90年代末，欧洲的方法是建立了一个系统，通过出租站取车和还车的读卡，知道谁在使用自行车和计费。在中国的版本，就是带停车桩的公共自行车系统。停车桩解决了计费 and 丢车问题，运营公司解决自行车的维护。

实际上效果并不理想，北京在2006年同7家企业联合摸索公共自行车模式，那一次定价高、使用人少、车辆缺乏维护，奥运会以后几家企业陆续退出。2012年在吸取经验之后，又一次推出公共自行车系统，逐年增加自行车投入量，还是满足不了市民的需求。杭州是国内公共自行车发展最好的案例，能够达到平均100米就有一个公共自行车租赁点的密度，它在车身和车棚上设置广告，经营多年之后达到收支基本持平。看起来这是一个需要政府主导，投入大、发展缓慢而利润低的事业，并且如果密度不够，使用并不方便。在这种背景下，ofo和摩拜单车两个创业团队不约而同进入到公共自行车领域时，质疑声音很多。ofo联合创始人张巳丁和摩拜单车的创始人王晓峰都有好多碰壁的故事讲。能够获得投资，是移动支付和GPS普及的今天，让解决难题充满了想象力。

创新工场创始合伙人汪华投资了摩拜单车。他详细讲述了投资思路，在中国依靠滴滴的模式不能彻底解决交通问题，很多出行是在5公里范围之内，长距离出行的接驳也是在两三公里范围内。其现在人们已经用自行车、电动车、滑板来解决这些问题了。可行性和需求都不用去证明，只剩下能不能挣钱的问题。政府的公共自行车很大问题出在停车桩上，它要占地、

连电力、维护，它的成本比自行车贵很多倍，并且桩严重影响自行车的使用率，借还定点可能不比走到地铁站近。如果有一种技术可以降低成本、提高用户满意度进而提高使用频次，这个生意就成立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可以完成用户认证和支付，替代了排队办卡，而GPS可以定位行驶的起始点和计算距离，两种技术轻巧代替了昂贵的自行车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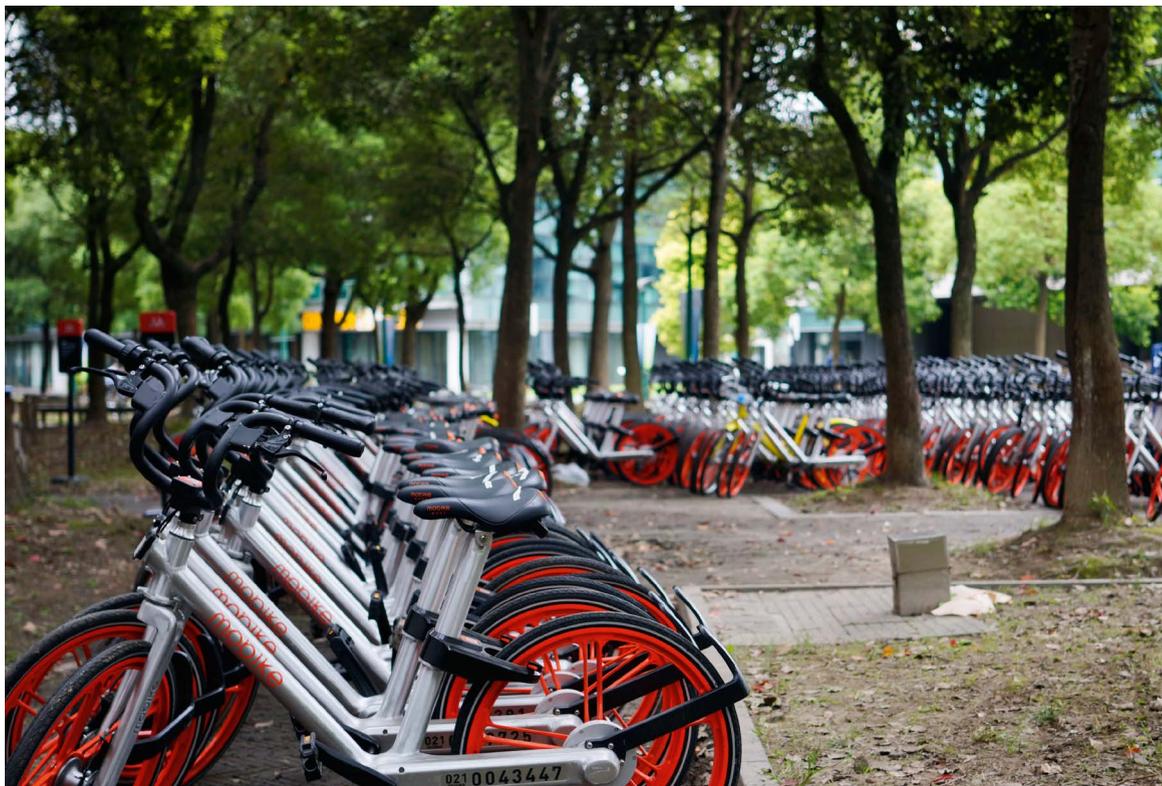
ofo 的解决方案

我们拥堵和雾霾的现实与张向东观察到的欧洲宜居生活方式之间，差了自行车回归城市的阶段。这其中的公共自行车在欧洲发展了30年，移动互联网技术和大资本的加入能否加速我们的进程，还要看虚拟桩理论下的具体运营。

ofo的创始团队来自于北京大学车协，是刚刚毕业的骑行爱好者。联合创始人张巳丁告诉我：“五道口几所学校丢车很严重，买车还是不买让同学们很苦恼，能不能做一个自行车共享项目，让‘大四’离校



ofo 联合创始人张巳丁



(王之涣摄)

摩拜单车发源上海，成为城市热门话题

的同学把车留下，进行一些改装再投放到校园里，给师弟师妹继续使用。”

跟公共自行车一样，防盗和计费也是这个校园团队要解决的问题。他们把回收的自行车统一刷成黄色，张巳丁告诉我，丢车是因为偷车贼把车销赃到二手市场去，这样统一颜色和外观，谁也不敢买。他们还研制了密码锁和APP，同学找到车之后，输入车牌号就能得到开锁密码，而随骑行携带的手机记录了使用时间便于收费。自行车还是市场上的普通自行车，密码锁和手机替代了有形车桩的计费功能。

学校里的运营和维护也不复杂。张巳丁告诉我，虽然自行车在学校里是自由流动的，但总体说集中在图书馆、教学楼、宿舍三个地方，使用和停放有规律可循。学校保安帮他们防止自行车骑出校外。因为环境简单，每500辆车配一个师傅，负责把日常损坏的地方修好，把停到冷僻位置的自行车找回来归队。北大校园里很快对ofo的小黄车产生依赖，张巳丁告诉我，有一次抽走一批自行车检修，立刻有同学给客服投诉，说上课迟到要ofo负责，说明不用不习惯了，

这就有爆发的趋势。在北大站住脚后，ofo复制到北京的五所学校。

即便不走向城市，ofo已经具有了投资价值。罗斌也毕业于北大，他今年年初回学校，看见了校园里成批的小黄车。“我做投资对这些事情很敏感，一看就大概明白了。在校园这样的封闭场景里，自行车是唯一出行工具，学生每天骑自行车在不同教学楼里上课下课去自习，骑车次数比吃饭多，我们投了‘饿了么’和‘滴滴’，这个频率比它们都高。它能够把学生的流量锁住。而且它不但有流量，获取成本并不高，一辆车才200块钱，投1000辆车才20万，它却可以覆盖几万学生。‘饿了么’要获取流量得有人送餐，自行车放在那里就有人骑，不需要人力成本。”罗斌说。

在PC端时代，校园流量入口有人人网，人人网没落之后就是空白。学生的流量有很多商业机会，ofo无论靠自行车收费能不能赚钱，它已经是一个在学校获取用户的渠道。经验丰富的罗斌对于商业模式信手拈来：“比如说做学生分期付款的、学生旅游的，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市场是考驾照，现在学生都是没

毕业前驾照就考好，每个学生可以贡献五六千块钱的收益。”罗斌估计 ofo 在校园领域至少可以做到 5 亿到 10 亿美元的价值。他关注了 ofo 公众号，给客服电话找创始团队投资。

罗斌的盘算是进可攻退可守，先稳住学校市场。“我们进一个 2 万人的学校，很快就能做到一天 2000 单，现在一天可以做到 50 万单，很快就能做到一天 200 万笔交易。中国也就几个大公司能做到这个数字。滴滴一天的交易是 1000 多万单，ofo 虽然每笔钱数小，可是支付频次很大。容易融资。”罗斌说。学校也是 ofo 的优势，CEO 戴威是北大学生会主席、全国学联副主席，几个联合创始人都是刚刚毕业的好学生、社团活跃分子，既懂得跟校方打交道也擅长跟学生们沟通。“我们最了解学生，那时候校园里没有任何人做这件事，我们站住了就是站住了。”张巳丁说。现在，ofo 已经覆盖了“北上广深”等 21 个城市的 200 所学校。

我采访张巳丁的当天，ofo 公布了进入城市的计划，在北京中关村西区、上地试运营。张巳丁告诉我，这些区域住宅密集，有强烈需求。他自己就在西二旗住过，发现很多人上班距离并不远，这个距离很尴尬，高峰期地铁挤、公交车堵在路上，打车又贵，特别适合自行车出行。城市是个更复杂的系统，运营和调配有很多新挑战。

摩拜单车的制造业+

摩拜单车要进入城市，同样得解决丢车和运维的问题。创始人王晓峰觉得，把自行车撒在街上的同时，需要庞大的运营维修队伍去扫街，可是城市面积广大而有冷僻死角，这种做法难以执行。他相信技术可以替代人工。跟 ofo 依靠骑行时携带的手机收集数据不同，摩拜单车的思路是把自行车联入互联网，不但解决计算距离和支付，而且实时监测到每一辆车的停放位置、运行路线和历任使用者信息，进行高效管理。在这个方案里普通自行车不能胜任，完成这些任务的芯片、感应器、智能锁必须充电。

为了减少维修，普通自行车也不能胜任，摩拜单车把普通自行车的脆弱环节设计了改装。比如，把容易松、弯、断的自行车辐条借鉴汽车轮胎设计，改成足够粗、结实的设计。把容易松、断、夹住衣服的自行车链条做成轴传动。车身使用了航空铝、轮子是镁的，这些材质保证自行车不会因为风吹日晒雨淋而生

锈，变成马路边的金属垃圾。“当你把价格定到公共汽车和地铁价格的一半时，它就具有了公共属性，你得照顾政府的想法，不能增添垃圾。”王晓峰说。

无桩公共自行车运维所衍生出来的这些需求，不存在一辆现成的自行车可以投放马路上，王晓峰的团队就先建了一个工厂，配置跟捷安特一模一样，自己生产自行车。“互联网行业的人最容易想到的办法是 P2P，我做平台，收车进来，再提供给人使用，模式轻。但是，在公共自行车行业不太容易实现，因为体验不稳定。如果要提供标准化体验，自己设计生产才能达到目标。”王晓峰说。王晓峰的第一份工作是宝洁，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企业之一，对盖一个实体工厂没有心理障碍。摩拜单车的设计全部从特殊需求出发，他反倒觉得与其说服代工工厂打破先入为主的经验、改变思维定势，不如自己生产效率高。

这种逢山开路遇河搭桥的做法让创新工场的投资人十分欣赏。投资经理孙培麟一直关注代步出行、智能硬件领域，他告诉我，因为自己也骑车，留意过杭州、台北很成熟的公共自行车项目，觉得这件事做不成，因为公共租赁效率极低，而且一旦大规模投放，丢弃和损坏没办法解决。“我去上海出差体验了一下摩拜，觉得它可能真正解决之前的那些问题，方案就是简单粗暴地重新造一辆车，批量化去运营。”孙培麟说。他还专门守在摩拜单车旁边，观察骑车人的态度、身份和反应，不光是代步，还有人把它当作周末锻炼身体的工具。“我觉得市场有增量，原来不骑车的人因为有了摩拜而骑车，那么他们的出行就会减轻城市负担，于公、于这个项目、于我们投资人，都是值得去采用的。”孙培麟说。

王晓峰对这个项目特别保密，从 Uber 离职时接受采访只说创业项目与出行有关，兼具硬件和软件。在汪华看来，这种低调给摩拜单车留了一个窗口期，因为模式很容易被抄袭，但是硬件研究和生产建立了壁垒。这种无中生有的技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技术问题需要解决。“比如车如果一直没人骑，没有发电怎

跟 ofo 依靠骑行时携带的手机收集数据不同，摩拜单车的思路是把自行车联入互联网，不但解决计算距离和支付，而且实时监测到每一辆车的停放位置、运行路线和使用者信息。

么保证电子锁还能被激活，比如移动信号弱的地方如何提高开锁成功率，比如极端环境里的车况，比如车到底能不能被GPS定位、精确程度如何。硬件做出来没那么容易，他留了半年防御窗口，别人研发需要时间，这期间摩拜就建立了一定的规模效应和壁垒。”汪华说。

因为摩拜单车接入互联网，运行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可以很迅速地反映出来。摩拜单车没法销赃、航空铝卖废铁不值钱，偷车的意义不大，但还是有人打主意方便自己使用，把二维码撬下来带走，使用的时候扫二维码，不用的时候别人开不了锁，把车停到自己家楼道、车棚，王晓峰的手机里存了不少私停单车的照片，都是运营人员从平台发现异常，按照定位寻找拍摄的。还有车被停在了少有人经过的工地上、城市死角里，不容易被人发现，也被工作人员通过定位找了出来。

车联网还让投放的效率提高。进北京的时机和决定就是由数据驱动的。王晓峰说：“在进入北京前，北京注册用户是除了上海之外最多的。很多用户在北京没事儿就会打开看一次，每打开一次，他的位置就上报到系统里。我们就知道北京哪个区域有这样的需求。为什么我们进到海淀之后接下来去了东三环，因为那里的需求是红色的。”

运营和维护可以用互联网走通，但一辆摩拜单车现在的成本是2000元，要想方便人们出行，投放必须达到一定的密度，这对产量、资金投入都是巨大的挑战。诸大建计算，单就上海如果算是有点规模，得投入20万辆车，每辆使用5次，每天供100万人次出行。在北京，五环内的面积是700平方公里，投放1000辆车什么也看不见。王晓峰本来的策略是从海淀区慢慢外扩到五环，可是网上舆论太汹涌，现在设定服务范围是五环加上通州，需要加班加点增加密度。

资本游戏

推着摩拜单车必须迅速扩大规模的除了用户猛烈的需求，还有竞争对手ofo的压力。我分别跟张巴丁和王晓峰约采访时，双方不约而同地把时间定在了半个月之后。就在这半个月时间里，大资本纷纷站队，公布对这两家创业公司的投资，本来我们想观察自行车回归城市的可能性，讨论它是否能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却目睹了被冷落十几年的自行车成了2016

年最后两个月的风口。投资ofo的金沙江创投合伙人朱啸虎发朋友圈表示，共享单车之役将会像拼车、代驾一样，在90天内结束。而投资摩拜单车的熊猫资本合伙人毛圣博针锋相对宣布，如果年内ofo超过摩拜，熊猫合伙人将在国贸裸骑。

打法一目了然，谁能让用户最方便找到自行车，谁就占领了用户的手机，占领了这个市场。罗斌说：“这个东西是恶战，但是我们有打仗经验。”金沙江投资的“饿了么”经历过送餐外卖大战、滴滴经历了打车软件大战、映客经历了直播平台大战。摩拜精心设计车联网定位，让用户可以通过手机导航找到车，可是ofo如果加大投入密度，用户不用找车，小黄车随处可见。“我们现在一天可以供应1万辆到2万辆自行车，你想要铺100万辆需要多长时间，快得很。当ofo有1000万用户运营经验的时候，他就领先于其他单车了。”罗斌说。

获取用户的撒手锏还有滴滴的入伙。公共自行车和滴滴属于一个出行市场的两个平台，两个平台的流量都很大，大部分骑自行车的人也会打车，所以大流量的自行车平台也可以作为打车软件的入口。滴滴并不是没有威胁了，总有人来挑战，缺的就是流量，滴滴不能让这样的大流量入口被竞争对手抢走。不用说神州租车、首汽约车，摩拜单车的创始人王晓峰就是从Uber上海总经理位置上离职创业的。滴滴投资ofo是战略性的考虑，而除了资金，当ofo投放密度足够的时候，它完全可以从APP上接一个ofo入口，ofo共享了滴滴庞大的用户。

加快自行车投放的速度和密度的打法，摩拜单车也看在眼里。孙培麟觉得，不联网是改装自行车的致命弱点，车容易丢失，损坏的车和乱停在城市死角的车也很难被运营人员发现，不但每辆车的使用率降低导致成本提高，而且会造成大量的僵尸车挤占街头，增加城市负担。

ofo有丰富的校园运营经验和漂亮的数据，摩拜单车已经进入到“北上广深”上路运营，虽然资本方吵得热闹，两种解决方案都没有先例可循，城市里的运营都才刚刚开始，对团队是个考验。但是喜闻乐见的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骑车出行中来，自行车回归的软件和硬件设施才能加速推进，从国际经验上看这是解决环境、拥堵问题的好办法，也会变成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

（实习生甘兰蕙子、肖楚舟对本文亦有帮助）

“终身监禁”，落马官员是否真的会“把牢底坐穿”

记者 付晓英

作为《刑法修正案（九）》引人注目的新规，“终身监禁”是现有法律对贪污受贿犯罪最严厉的惩罚。



刑法学专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

10月21日，黑龙江龙煤矿业集团物资供应分公司原副总经理于铁义因受贿3亿多元，被黑龙江省林区中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在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对其实行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于铁义的受贿金额超过了白恩培和魏鹏远两亿多元的受贿额，创下近年来官方公布的落马官员受贿额之最，他也继白恩培和魏鹏远之后，成为国内第三例被判处终身监禁的落马官员。

短短一个月内，先后有三名落马官员被判处终身监禁，而此时“终身监禁”实施还不到一年。“终身监禁”是2015年8月份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中的一

项新规，“因严重贪污、受贿犯罪被判处死缓的，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予以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这一规定对特重大贪污受贿犯罪确立了死缓犯终身监禁的制度，并从当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今年10月9日，白恩培成为新规颁布后的“终身监禁第一人”，之后不久，魏鹏远和于铁义也受到了法律同样的惩罚。

三名官员先后被判“终身监禁”，余生都将在狱中度过，而贪污受贿如何定罪量刑、“终身监禁”的规定如何理解等问题都成为社会和大众关注的焦点。为此，我们采访了刑法学专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对新规进行分析解读。

三联生活周刊：白恩培、魏鹏远和于铁义被判“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他们适用终身监禁的依据包括哪些？是否因为他们的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比如这三人受贿的金额都超过两亿。

阮齐林：刑法规定的贪污罪、受贿罪的死刑适用条件有两条：一是犯罪数额特别巨大；二是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而《贪污贿赂解释》第4条对贪污罪、受贿罪规定的死刑适用条件在刑法规定的上述两条之外，又增加了“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两条。因此，他们被判处终身监禁，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是原因之一，但不是唯一标准。

去年《刑法修正案（九）》完善了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将具体的数额删掉，只在原则上规定数额较大或者情节较重、数额巨大或者情节严重、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情节特别严重三种情况。而与之相对应的《贪污贿赂解释》则对数额进行了具体的规定，认为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30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应依法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至于“判处死缓，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的情况，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数额规定，只能根据现有的判例推测，理论界倾向于掌握的可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受贿数额一般至少是要上亿。

三联生活周刊：白恩培案所认定的受贿犯罪行为

“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是一味猛药，它仅仅适用于贪污受贿犯罪，是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或者说是一种平衡的策略。

发生在2000至2013年之间，魏鹏远案所认定的受贿犯罪行为发生在2000至2014年之间，于铁义案所认定的受贿犯罪行为发生在2005至2011年，而《刑法修正案（九）》是2015年8月29日通过的，2015年11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按照“法不溯及既往”和“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在时间效力上，这两个案子适用终身监禁的新规吗？

阮齐林：“法不溯及既往”实际上指的是“重法不溯及既往”，即刑事案件原则上适用行为时的法律，但行为后的新法之定罪处刑更轻、对被告人有利时则适用新法。所以，有无溯及力，关键要看新法规是否对被告有利。但这个事情是说不清楚的，如果罪行按照过去的标准应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现在判处死缓、终身监禁，这就对被告有利；如果本该判处普通死缓，结果却判了死缓、终身监禁，当然是对其不利。所以还是要区分不同的情况来对待，对依照修正前刑法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就依照修正后的刑法判处死缓、终身监禁，而对依照修正前刑法应当判处死缓的，则不应适用终身监禁的新规，这样来理解就可以了。

三联生活周刊：“终身监禁”只规定于贪污受贿犯罪法条中，依附于死缓制度并与无期徒刑相关联，而非刑法典总则的刑罚种类。为什么它只作为行刑方式存在，而不是新的刑罚种类？

阮齐林：“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这是个非常严厉的规定，如果普遍适用于各种犯罪，可能会造成几个问题：第一，刑罚的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的是改造对方、使其能够悔过自新重新回归社会，而把人终身监禁、不允许其重新回归社会，这有悖于刑罚的目的和价值；第二，这个规定如果广泛适用，监狱的人口压力和国家的司法成本都可能会大大增加。我们在电影大片里经常看到犯罪分子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会产生一些误解，其实它的适用范围很窄，是基于犯罪分子的危害性极大、不能与正常社会共存，比如连环杀人、连环性犯罪等，是出于保护社会的需要。除非这种特殊情况，否则不太

适合广泛适用。此外，我们国家还保留死刑，对于极严重的罪行如暴力命案犯罪等，一般是死刑立即执行，应付这样的情况手段已经足够，“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就没有必要普遍适用了。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白恩培和魏鹏远并非“不能与正常社会共存”的案例，为什么也会被判“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呢？

阮齐林：“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是一味猛药，它仅仅适用于贪污受贿犯罪，是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或者说是一种平衡的策略。非暴力犯罪很少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犯罪分子慢慢掌握了尺度，也知道不太可能被判处死刑，这样一来，死刑的威慑力就小了。我们一方面要严打，惩治贪污腐败、进行威慑，另一方面非暴力犯罪要控制死刑，特别是死刑立即执行或者死刑的实际执行，这就出现一个矛盾，要在矛盾中做到平衡。对贪污受贿犯罪进行这样一项专门的规定，可以有效减少对贪污受贿犯罪的死刑实际执行，维护贯彻我国的死刑政策，同时通过增加这样一个执行方式的变通，加大刑罚对贪污受贿犯罪的威慑力。

三联生活周刊：“终身监禁”是否真的意味着犯罪嫌疑人要终生在狱中服刑？如果死缓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确有重大立功表现的，是否可依法减为25年有期徒刑进而绕开终身监禁的决定呢？

阮齐林：从理论上讲，无期徒刑就是终身监禁，只不过刑法有减刑和假释制度，可以通过这个渠道，将无期徒刑减刑为有期徒刑，所以我们国家的无期徒刑只是名义上的，一般18年到20年左右就能出狱。现在刑法新规中“死缓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予以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就把减刑假释的通道关闭了，意味着这辈子都是犯人，不可能通过正常的法律渠道出狱。

至于通过立功绕开“终身监禁”的规定，我想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死缓期间确有重大立功，减为无期徒刑之后又减为有期徒刑，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减刑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不符合“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的要求，所以被判处终身监禁，即使立功也不能获得减刑和假释。中国的死缓一般有三种：一种是普通的死缓，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第二种是限制减刑假释的死缓，这是《刑法修正案（八）》增加的，对一些特殊情况判处死缓，限制减刑假释，规定限制减刑的死缓犯罪分子，减为无期的不能少于25年，减为25年的不能少于20年；现在又有了一个针对贪污受贿的不得减刑假释的死缓，所以终身监禁可以当成

一种特别的死缓制度来理解。

另外，我们也都知道能贪污受贿几亿的人基本都是高官，年纪也比较大，即使执行一般的死缓，他们也不见得就能在狱中熬完年头，更不用说终身监禁……所以这种处罚的警告宣示意义和道德谴责意义可能大于实际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在新闻报道中经常会看到一些案例，贪污受贿几百万和几千万的官员被判处的刑期却差不多，没有拉开幅度和梯次，这让普通人很困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法律的公平正义、罪罚相当的理念与此现象是否矛盾？

阮齐林：过去对贪污受贿定罪量刑标准主要以数额为主，比如1997年刑法规定，贪污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贪污数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贪污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规定了具体数额，贪污受贿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量刑更主要的是基于其数额标准。而去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完善了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原则规定数额较大或者情节较重、数额巨大或者情节严重、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情节特别严重三种情况，并设置相应的刑罚幅度，确立了“数额+情节”的定罪量刑标准，这样一来，贪污受贿犯罪的轻重，除了犯罪数额，还要考虑犯罪情节，比如贪污受贿的次数、持续的时间、贪污受贿赃款的具体用途和去向、是否屡教不改、是否退赃、是否因为贪污受贿造成其他严重损失等。打个比方，一个贫困县县长，贪污受贿几十万救济款，对贫苦人民的危害就不得了，而高官签个条、批个地，就受贿几百上千万，这两个数字虽然悬殊，但危害性是不一样的。数额是贪污受贿最直接可见的一个标准，但它不是唯一的标准，所以贪污数额不同、刑期相同这种现象是比较正常的。

三联生活周刊：1997年刑法修订时，贪污受贿犯罪的起刑点为5000元，但随着经济发展，这个数额代表的价值和意义已经与当初完全不同，刑法对贪污受贿的定罪量刑标准随着时代发生了哪些相应调整 and 变化？

阮齐林：我国法律结构对于贪污受贿、包括其他犯罪行为基本都分两层处理，轻微的给予党纪政纪治安处罚，严重的才是刑事处罚。这种结构的合理性在于，刑法是非常严厉的处罚措施，一旦启动就会耗费大量的司法资源，同时也会对被处理人产生

终生影响，所以一般会把刑法作为滞后手段，在此之前会有前置的、比较轻的处理手段，如党纪政纪处罚、治安处罚等。

既然是二元体制，对于贪污受贿数额极小的行为就不是直接定罪，而是会有一个切线，切线之上属于刑法的处罚范围，切线之下是行政法的处罚范围。而这个“切线”也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司法习惯相配套。

最开始，贪污受贿一两百元就可以定罪了，后来定罪数额涨到2000元，1997年刑法修订时国家立法机关又根据情况的变化，将原贪污贿赂犯罪法定最低刑的数额2000元以下修改为5000元以下，法定最高刑的数额5万元以上修改为10万元以上。这一标准后来持续了将近20年，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GDP已经增长了六七倍，按照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5000元的标准非常低，再加上现在官员受贿的数额越来越大，就需要做出调整。

去年的《刑法修正案（九）》就对原来的规定进行了修改，删掉了具体的数额，改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是弹性的，由司法解释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做出不断调整。目前新的司法解释一般认为3万元属于数额较大，比当年5000元的标准增长了6倍，基本跟上了目前经济发展水平。

但是，其实在刑法修订前，虽然规定的标准数额还是5000元，但在实践中追究的基本上也是将两三万元作为起点。另外，为了体现对贪污受贿犯罪的严厉惩罚，在有些特殊情况下1万元也可以定罪，司法解释里一共规定了八种情形，其中贪污有五种，比如赃款赃物用于非法活动的、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和拒不配合追缴的；受贿有三种，比如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造成损失的、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等。这种“数额+情节”的模式取代了以前单纯的数额模式，是法律的一大进步。

三联生活周刊：“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力度很大，被查处的官员贪污受贿数额巨大，收受贿赂不仅包括现金，还有房产、汽车、珠宝等，比如，10年前收受的一套房产当时价值50万元，现如今价值300万元，在定罪时，赃物的价值如何计算？

阮齐林：在定罪量刑上，适用法律一般是按照“从旧兼从轻”的原则，也就是说，贪腐官员收受的赃物估价一般是根据其行为时的价值；在法律适用上，如果事后的法律对行为人有利，就适用新的法律。所以，10年前价值50万的房产放到今天来估价时，仍然按照当年50万的价值来计算，同时适用现在的刑法。■



(苏圣亮摄/标准普华证券)



2



3

胡同里的微型城市化

主笔 / 贾冬婷

在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建筑大奖中，普遍认为普利兹克奖是关注建筑前沿的，而源于伊斯兰世界的阿卡汗奖是偏重人文关怀的。但是，谁能说人文关怀不是建筑前沿呢？——这也是对新一届阿卡汗奖得主张轲的胡同改造实践的最好注解。



(王子凌 摄/标准营造供图)



(苏圣亮 摄/标准营造供图)



(标准营造供图)



(王子凌 摄/标准营造供图)

1. “微杂院”中央是一棵几百年的老国槐，繁茂的枝叶护荫着整个院落
2. 儿童图书室有大大全景窗，可以当作座椅和书桌，也可以爬坐到窗台上看外面的院子
3. 活动室里的剪纸课
4. 曾经的正房被改造成一个舞蹈教室
5. 旧的空间肌理没有显著改变，但是每一个空间里的功能变了

茶儿胡同8号院，王大爷正在院里忙活着什么。他身上的藏蓝色卡其布上衣还齐整，头发却很长时间没打理，一绺一绺地垂在谢了顶的脑袋周边，有些实在太长了，就干脆在头顶绕一个圈，颇有些仙风道骨的意思。

“我不搬走，东西太多，麻烦。”他说着话，从屋里拿出来几个塑料袋，把里面的零碎物件一个一个拿出来，在院子平台上摊开，重新分类，再心满意足地系上口。这是他的日常生活，也在无形中宣示着对这

块地盘的所有权。他从小住在附近胡同，后来为了上班方便，和这院的一户人家换了房，搬过来已经30多年了。

王大爷是前院唯一的住户了。他的屋子朝南，占了正房三分之一的面积。院子里还有一间几十年前的加建，当作厨房和杂物间。属于他的这几间，一直顽强地保留着原貌，他不让动，因为只要墙的厚度改变一点，面积就可能差一平方米，损失就得几十万元。其余搬走的几户空出来的房子，被张轲重新改造了。



(吴清山摄)



(王子凌摄/茶室提供图)

2

1. “微胡同”主体建筑及内庭院
2. “微胡同”建筑入口处半开放前厅
3. “微杂院”保留了居民的加建，正是它们构成了微尺度的街巷空间和社交网络

有意思的是，外人很难一下子分清哪间是旧的，哪间是新的，因为院子的格局没变，外表看仍然是斑斑驳驳的灰砖，甚至大杂院里各家各户加建的厨房也都没拆。

“原来这里是座庙，所以比别的院子大，解放后住了十几户呢。”王大爷说。果然，门楣上还保留着“重修灵鹫寺”字样，咸丰年间重修的，据说原建于明朝。王大爷住的正房，原来是庙的正殿，房瓦和木架经过整修后，显出巍峨的气度。院里还放着一个圆柱形石墩，是原来观音像的底座。“‘文革’时‘破四旧’，观音像被砸了，就剩这个观音座了。”王大爷告诉我，它有镇宅作用，不能挪出这个院子。

占据院子中央的是一棵老国槐，高度早已超越了屋顶，枝叶繁茂，四向伸展，护荫着整个院落。这棵树是小院历史最长久的见证者。老人们说，庙还没建

的时候，树就在了，如今是大栅栏地区五棵一级古木之一。即便在人口急剧增长的年代，十几户人家在院中间加建厨房，这棵树的地位也没有丝毫动摇。改造前，粗壮的树干被几家人的厨房包围着，它们在不同高度的枝丫下方，高高低低地错落排布。

2012年张轲受西城区政府邀请，在大栅栏区域选一个院子进行改造的时候，也是因为这棵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里。“我进去的时候，一多半的人都搬走了，院子里污水横流。但是那棵老槐树太漂亮了，我觉得简直就是中国传统家庭的一个象征。”在张轲眼里，这棵树为院子增添了不少灵气，而且还带来一种文化隐喻——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不约而同地将“槐树”与知识、学习联系在一起。建筑大师路易斯·康曾说“第一所学校始于一棵大树下”，孔子更是在槐树下授课讲道。原来绕树而建的几间小厨房，错落堆

积地像是几级台阶，张轲索性就改建成一个锯齿状的不规则空间，外墙也是台阶，可以上到一个平台，高度在屋顶之上，树冠之下，周围是起伏的灰色屋顶。平台上用粉笔涂满了五颜六色的格子，显然已经被胡同里的孩子们占领。

就像“微杂院”这个名字所传达的，张轲介入改造的方式很微妙。他认为，之前的改造，不管是保护还是开发，第一件事都是把加建部分先删除，而“微杂院”是先把它们保留，然后有一些修复，有一些改建。在他看来，它们正是同院居民互相博弈和妥协的产物，最终的结果是在不大的边界范围内，构成了微尺度的街巷空间和丰富的社交网络。材料上也尽量不着痕迹，选用了北京本地回收的旧砖和一种“墨汁混凝土”。这种混凝土是张轲发明的，顾名思义就是在混凝土里加入墨汁，让颜色更灰暗，再采用和砖同样宽度的模具，在视觉上就和灰砖非常接近，带来一种新旧融合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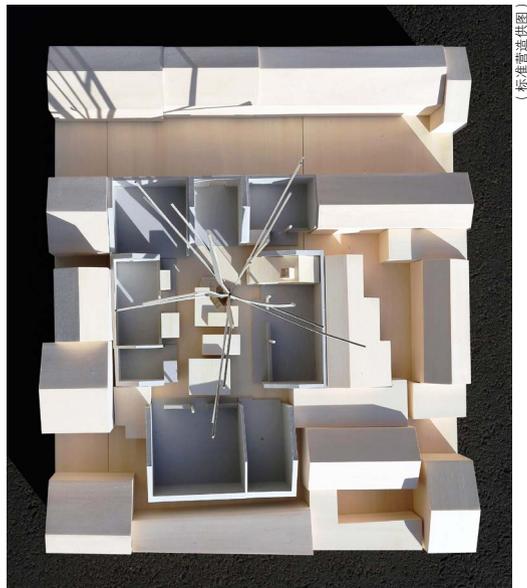
因为不远处就有一所炭儿胡同小学，张轲将改造后的“微杂院”定位为一个儿童活动空间。旧的空间和肌理没有显著改变，但是每一个空间里的功能变了：绕树的几个加建厨房被改造成了一个小型艺术展厅；南房剩余空间被设计为一个舞蹈教室；东厢房的坡屋顶下安插了一个儿童图书室，开了全景窗，加宽的窗台模仿了台阶的形式，可以当作阅读时的座椅和书桌，也可以爬坐到窗台上看外面的院子。

住在斜对面茶儿胡同9号院的海大爷拿着一串钥匙走进来，他是“微杂院”的兼职管理员。他更关心胡同里的生活需求，听说张轲之后还想搬进院子一个集成卫生间、厨房、洗衣机等的功能模块，有些不同意见。“关键是厨房弄利落了，卫生间倒是无所谓。现在住胡同里，用不了两分钟就能走到公共厕所，挺好。要在院里搞，一个院子总有好几户，厕所不可能一户弄一个。只有一个的话，将来卫生谁搞？就会制造矛盾。”当然茶儿胡同改造已经带来不少变化。“胡同里过去都没人扫，把垃圾‘噗’地往门口一扔，就不管了。现在打扫干净了，有了垃圾桶，他即便要扔，也得琢磨琢磨，不可能满大街扔。是这个道理吧？”他悄悄跟我说，王大爷之前那件衣服都穿得像油毡一样了，院子里来的孩子和游客越来越多，他不也换了件干净的？

在张轲看来，留在胡同里的居民大致有三种：一种是王大爷这样的，没有能力搬走。他单身，只有这一处十几平方米的房子，能拿到的补偿也就200多万

元，这些钱他能买到什么？能在市中心生活方便的地方买一套房子吗？还有一种是像海大爷这样的，他是回民，在9号院有三间房，已经在这里居住了四代，离不开了。他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和老两口住，儿子在顺义上班，从这边坐公交和地铁更方便，而5岁的孙子在牛街上幼儿园，在骑车半小时以内的距离。如果搬走，给两个儿子一人一套房，就得搬到五环外，比住在这差远了，不方便，还贵。还有第三种人，租住在胡同里，做点小买卖，他的孩子可能也在这附近上学。张轲说，他在“微杂院”中试图实现的目标就是共生，不仅是空间上的共生——城市过去和现在的共生；原有主体建筑和居民自发加建的共生；院落中新功能和原有居住功能的共生，更是不同人群之间的共生——院内居民和周边居民、社区居民和外来参观者的共生。

为了居民之间的“共生”，张轲找到居委会帮忙，还争取到社区内一个建于明朝的清真寺的支持，海大爷就是清真寺的阿訇推荐来做管理员的。海大爷告诉我：“附近有琉璃厂，那是过去为盖皇宫烧琉璃瓦的。我以前工作的饭馆就在西琉璃厂，挖防空洞时挖到一米多深，发现都是碎琉璃瓦。这条胡同原来叫‘柴胡同’，就是为烧琉璃瓦存柴火的地方，民国时才叫成‘茶儿胡同’了。”他说，前门大街东侧一整片全拆了。西侧大栅栏地区启动晚，不让拆了，才保留了。“再拆，



（标准雷冠供图）

北京城就没了。”

海大爷告诉我，这些大杂院里的加建，也有40多年了。“最早的四合院里，厨房卧室带茅房全在一间屋里。夏天就在窗台上支个锅，冬天在屋里做饭。这种单独的厨房从什么时候兴起的呢？是因为唐山大地震，开始搭地震棚，后来变成厨房。家家都盖厨房，你也弄一间，我也弄一间，就这么起来的。”在张轲眼里，这些加建也已经变成了当代城市历史的一部分。“胡同最吸引人的是每户居民都进行了更改，以适应他的生活方式。如果要把它直接恢复到100年前，那也是假的。你能想象在罗马去拆毁一座美丽的建筑，只因为它在几百年前未被授权吗？它存在了，就有它的价值，不应该是简单地抹掉以后再美化。”

关于微杂院日后的使用，张轲曾在社区里做过调查，很多人都说想让孩子学英语。他觉得，那太简单了，很多志愿者就可以教。但真正运营起来却没那么简单。比如费用，有人建议在利用场地进行教学的时候，对参加者收取很低的费用，把老师的课时费抵消掉，可是张轲比较理想化，不想对居民和场地收取一分钱。不过海大爷5岁的小孙子已经在这里玩得不亦乐乎了，他自称“队长”，会跟小朋友们说，进这边要脱鞋，进那边要关门，书看完要放回去。胡同里的孩子们也都下意识地在这里当成自己的地方了。

茶几胡同8号的“微杂院”是张轲在胡同里的第二次实践。在此之前，他还在杨梅竹斜街上做了“微胡同”项目，是把两个大的杂院分成七个窄条的院子，分别进行整理。在其中的一个院子里，他将40平方米的老房子改造成一个被五个房间交错围绕的庭院，试图从内部生长出异质的新空间，给新来的人使用。相比较而言，微杂院是更微妙的，是对一些原来居民创造的东西进行细微的改造，跟居民共生。之后又在白塔寺区域的宫门口四条36号改造了一个院子，在内部加入一个极小化的卫生间、淋浴、厨房等的集成模块，解决的是每一个细胞的问题。

“‘微杂院’入选，是因为它体现了传统北京胡同院落里的现代生活。”本届阿卡汗建筑奖(Aga Khan Award for Architecture)组委会指出。这一奖项由阿卡汗四世于1977年设立，每三年评选一次，旨在“肯定并鼓励那些成功诠释穆斯林社会的需求与期许的建筑概念”，尤其在这个西方文明以现代化的名义席卷全世界的年代，期望建筑师从解决实质问题出发，协调继承和创新之间的平衡，实现对本地区建成环境的保护和创造。对“微杂院”的评语中也可以看出这一标准：“微杂院为老建筑的重新利用提供了一条参考道路，甚至可以为容纳创意内容、提供公共或私人交替使用功能的微型城市化，创建一种新型模式。”

《读书》2016年第十一期目录

商伟 言文分离与现代民族国

家：“白话文”的历史
误会及其意义（上）

陈彩虹 在无知中迎来第四次工业
革命

佐佐木力 “没有卫生间的高级公寓”

王炎 海内存知己

短长书

“富布赖特”往事（顾钧）·怀念老

友刘叔新（李行健）·苏兴先生琐记
（郭杰）

汪晖 承认什么，何种政治？

张承志 轻轻地触碰（二）

李玫 文献纂集 嘉惠学林

苗怀明 既欲求真 宁复计辛苦

品书录

以“体用”阐释文气（左东岭）·物
质技术如何改变中国文学生活（杨
早）·理想的学术普及还有多远？
（孙焘）

张宗子 鲁迅的样子

张飞岸 罗伯特·达尔的红与黑

田飞龙 立法者林肯的神话尺度

叶隽 从“文化学”的建构谈起

马子木 邓之诚及其清史研究

刘晓峰 “俘虏第一号”

金捷·弗罗斯特 德拉菲尔德及其
时代

河西 沙和尚与炼丹术

汪民安 杜尚、劳森伯格和“八五
新潮”美术运动



生活需要读书，
《读书》丰富生活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010)84050425、84050451
读者服务部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邮购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读书》邮购部
邮政编码：100125 国内代号：2-275



跳出“温水煮青蛙”的状态

——对话标准营造建筑事务所创始人张轲

我是在北京二环路和三环路之间的标准营造事务所见到张轲的。这个位置处在旧城和新城的交界地带，离他所做的几个胡同项目也都不远，他常常沿着二环路坐上地铁，再走几步路，就到了胡同。他的这间事务所也像是在胡同文化里长出来的——灰砖包裹的三面长条形建筑围合成一个庭院，站在会议室长达12米的大玻璃窗前，可以看见整个庭院。院子里种了30多棵树，都是张轲自己选的，他说：“现在还是树叶基本都绿的时候。你看那棵白蜡昨天开始变黄了，可能再过一周，所有的白蜡都会变成黄的，再过两周，所有的枫树就全变红了。之后会持续一周，灰砖地面上这边一地红叶，那边一地银杏叶。这种季节变化的存在感，是可以通过植物的形态和气味变化强化出来的，这也可以部分地说明胡同在今天存在的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微杂院”不太像是一个传统的建筑项目，而更像是以胡同为切入点，探讨北京旧城改造的新的可能性。你对这方面的兴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张轲：最早是在清华大学时的硕士论文，我写了印度建筑师查尔斯·柯里亚（Charles Correa），他的研究是从城市设计角度，怎么为穷人做设计。他用一种草根的视角去看城市，其中有一项对孟买的研究，我现在还记得挺清楚，就是孟买有些人有工作，但是没有房子住怎么办，这在贫富差距严重的印度是很真实的问题。查尔斯·柯里亚在人行道边上做了一个台子，让没有房子的白领晚上睡在这里，第二天早上又可以穿上西服、打上领带去上班。一定程度上，他唤起了我作为一个建筑师对社会的清醒看法，开始对城市发展模式感兴趣。我在论文里提到一个“温水煮青蛙”的隐喻，就是我们的城市可能就像温水里的青蛙似的，会有一种慢慢加热，慢慢毁灭的过程。它不像战争时期被炸弹炸毁了那种强烈的感受，而是在你觉得越来越轻快、越来越舒服的同时，文化被毁掉了。当意识到想要跳出来的时候，已经被煮得瘫软，跳不出来了。



标准营造建筑事务所创始人张轲

当然这是一个挺悲观的故事。等我2001年赢了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的国际竞赛，决定从美国回到中国之后，想法就有些变了。我觉得，这个状况可能很糟糕，但它不可能更糟糕了，只可能变得更好，所以建筑师是可以做点事的。

三联生活周刊：“温水煮青蛙”的隐喻是什么时候开始变成现实的？

张轲：我写那篇论文是在90年代中期，其实当时没想到旧城的破坏会那么严重，胡同里的大拆大建是在2000年以后。当时有一个历史文化区域保护方

案，划出了被保护的“二十五片”，但只占旧城区域的17%，剩下的区域里面其实胡同也还是完整的，为什么不被保护呢？在实际操作层面，就等于为“非保护区”的开发开了绿灯。现在看，北京旧城拆迁的损失，其实比拆城墙要严重得多。当年城墙被拆了，旧城还在，是在最近十几年才拆的。我在一张卫星地图上看到，北京目前仅存的胡同区域已经极度支离破碎了，仅仅比17%的“保护区”范围大一点点，就像昨天刚刚被人扔了炸弹。

过去30年北京旧城改造的模式，大多是整片区域、整条街巷的改造，其规模尺度的“大”是一个共同点。政府主导的项目是没有“足够资源”去关注小尺度项目的，他们更喜欢说：“我们能在老城区做一个两公顷的开发项目吗？”于是在操作层面就形成了两个极端相互僵持的局面：一个极端是，如果想要开发历史地段并在经济上切实可行，就摆脱不了“拆一建三”的模式，必须建造比现有地段大三倍的建筑面积。于是，每拆除一个四合院，就要建造一栋更高的建筑或一栋没有院子的建筑，这对旧城的肌理和尺度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破坏。另一个极端是一种“媚俗改造”，在大栅栏附近区域也可以看到，即建造一些仿古建筑以吸引客流，然后把租金提高三倍。包括我们一些大学的研究也是碰见胡同就在下面挖三层，再把上面拆掉，盖一个很像的。但它仍然是假的，而且胡同原住民的生活品质没有得到本质提升，逐渐主动或被动地迁离了祖居的“大杂院”。

三联生活周刊：胡同只剩这么一点了，还有多少保留价值？还有救吗？

张轲：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从清华骑车进城要穿胡同。那会儿北京的自行车道都是3米多宽，而且是连续的，没有汽车乱闯，骑车可以一直骑到前门，穿过胡同。那种印象一直在我脑子里，尤其是冬天，胡同里树叶掉了，树干特别黑，下了雪，骑车过去，会闻到烧煤的味道。还会突然有几个小孩从身边“啪”

从建筑上，胡同更是中国居住单元的典型，是内向的。为什么外地游客到北京，要逛完故宫逛胡同，没有说非要逛金融街和CBD的？所以胡同在文化上是有长远价值的。

地跑过去，消失了。那种空间和嗅觉，挺有舞台感的。从建筑上，胡同更是中国居住单元的典型，是内向的。为什么外地游客到北京，要逛完故宫逛胡同，没有说非要逛金融街和CBD的？所以胡同在文化上是有长远价值的。

现在的北京城也不能说完全没救了，就像说“温水煮青蛙”，新的城市仍然要活下去。我觉得旧城现在的状态是一种片段式的，当你走到大栅栏、白塔寺、后海，走到游客不去的地方，一段一段地，还有那股劲儿。但是这种片段化怎么融合到一起、怎么创造出让人在里面行走的连续性，而不是开车或者坐地铁的连续性，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三联生活周刊：以一个胡同院落为切入点，可以触发整个城市更新系统的变革吗？

张轲：微尺度同时也是巨尺度。城市应该被视作一个有机体，每一个院落、每一个居住单元都是它的细胞。而有机体更新的最好方式，就是让它的每个细胞重新恢复活力，这个细胞里很重要的载体是原住民。比如你在“微杂院”前院碰见老王了，后院还有两户居民，他们或者不愿意走，或者没有能力走。当你把他们保留下来，有耐心一点点去做的时候，就从微尺度上开始改变了，实际上可以影响整个大环境。

这学期我在哈佛大学教的课程就叫“胡同的新陈代谢”，我觉得“新陈代谢”这个词说得特别好。就像养金鱼要给金鱼换水，不能不换水，不换水金鱼会缺氧死掉。但是如果把原来的水全倒掉，直接换成自来水，鱼也会死。你得每次换30%的水，留70%，过两天再换，鱼才会活得很好。胡同也一样，需要一个逐渐更新的过程。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没有那么多土地可以开发了，是不是反而有了“新陈代谢”式更新的机会？

张轲：对。未来对于旧城来说将是一个真正的提升过程，会有更多向内的精细活出现。过去20年是一个爆炸式的发展，快是中国经济的特点，但是文化上的快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一个城市就这么大的地方，如果每人切一块，把它像开发荒地似的卖一次，再贴一个假的，就把城市给毁了，其实是很可惜的。你能想象把故宫挪到外面再盖一个，把原来的地开发了没？故宫赚钱可以收门票，不能靠拆房子盖房子，这是一个很低级的赚钱法儿。旧城也要慢慢来，修修补补地做。

旧城改造最终还是要从模式上改变。认清什么是

不可能的，用开发商的方式来解决旧城问题是不可能的，简单用政府贴钱的方式也是不可能的，需要有一种可持续的社会参与机制，让产权人、使用者、建筑师都参与进去。未来最大的问题是现有的这些胡同要怎么改，是希望更多居民搬走，还是希望他们留下来。从建筑师的角度是都搬走了，还要胡同干吗？

三联生活周刊：你改造胡同的出发点是什么？

张轲：我觉得胡同最本质的问题就是小、挤、不方便，没有厨房，没有卫生间，没地方洗澡，所以大杂院加建的都是厨房。以前的胡同改造，都是在大尺度上研究胡同肌理之类的问题，谁真正去研究了这些基本的生活问题呢？都说大杂院挺好，应该保留，但是换了我们会去住吗？如果我们自己不去住，凭什么让别人去住？我希望能够提出一个解决方案，或者一种策略，怎么把胡同环境变好了，怎么能在30年之后，还能在这里找到童年记忆。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三个胡同项目，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旧城改造策略？

张轲：对。“微胡同”是最前卫的一个方案，就是想在一个40平方米的极小空间里，创造出传统院落里不存在的形态，让大家觉得它虽然小，但把一个家庭需要的甚至一个别墅需要的所有功能都解决了，有卫生间、有厨房、有淋浴、有院子，还很酷，可以是一个更吸引人的选择。周围老百姓一看，真的特别好，还可以上厕所啊，就像飞机机舱里的厕所一样。

“微杂院”是更微妙的。大杂院的形态有意思，是因为它的空间特别丰富，像一个小城市。每个杂院里都有很多加建，各家都心知肚明地你占一点，我占一点，但还是有很多妥协，得留出过道，最终形成一个很丰富的形态。这不是个案，几乎每一个胡同院落都是杂院，不是都要保留，但要有选择地保留，因为这是北京城二环内这几十年的一个真实状态。“微杂院”对北京旧城改造的启发，是不需要做一个看上去很炫的东西，对原来居民的创造也不是一味抹掉，只要把剩下的部分做一些细微梳理，仍然有既保护又发展的可能性。

白塔寺的那个院子就更低调了。从院子外面看不出什么，是在内部植入功能模块，解决生活舒适度，这些功能也是胡同里最缺少的东西。这三种策略基本覆盖了旧城问题的类型，但要更深入地往下实现，还要验证它的可复制性。

三联生活周刊：旧城里的环境越来越好，会不会加速原住民的外迁？

张轲：这的确是全球都在面对的一个问题——士绅化。你在附近开个酒店、咖啡馆、画廊，租金会越来越高，本地居民就越来越没有能力在这里生活，会被清空，这里就被新来的有钱的阶层占据了。这么一来，随着原住民的消失，旧城会逐渐失去原来的文化载体，只剩下躯壳，躯壳变得越来越高档。这是一种可能的趋势，但是我作为建筑师和研究者，仍然不认为这种事是必然的。理想还是得有的，万一实现了呢，万一没那么糟呢。比如老王，只要你真正解决了他的生活，他就会留下来；比如海大爷，他有儿子孙子，他如果觉得在这里生活更有优势，也不会搬走。同时也得允许有一部分人迁入，就像鲁迅当年住在白塔寺一样，他是外来人，但在这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也就变成本地人了。这就是新陈代谢的原理，只要把胡同看成有机体，永远保留一定比例的本地居民，新来的人逐渐进入，逐渐开始适应当地的习俗，文化就不会断掉。

三联生活周刊：你怎么看这个时代建筑师的角色？

张轲：建筑师在中国可干的事太多了，所以要选择什么不干。当然可以把公司做成一两千人的公司，一年挣多少钱，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每件事要问意义何在。建筑师如果只是作为一个被房地产商或政府雇来实现某个显摆工程的工具，那就太可悲了，最终还是要问问能对城市和生活在里面的人做些什么。

从另一个角度看，建筑师其实也可以是非常有创新性的。米开朗琪罗建圣彼得大教堂的时候，他要解决怎么实现一个100米高的空间，放在几百年前，相当于现在的卫星科技，要面对很多结构上的挑战。目前中国城市也有很多前沿问题，比如城市的发展模式，很多专业人士的研究都局限在自己的领域，没有把各种可能技术整合起来提出一个方向，比如怎样往竖向发展、如何让城市节约用地、如何让地铁和轻轨解决大量的交通问题，这些是创新性的，问题是用什么机制可以让城市研究的基金投入到创新里。现在的建筑师都急功近利，都在想我今天干点什么事，明天就可以发财出名，没有看见每一个小的成果都可能是冰山一角，之后需要几十年的研究，比如胡同。■

（实习记者郑亚博、项文虎对本文亦有贡献）



央视广告之变：从《大国崛起》到“国家品牌计划”

文 / 程清

去年平安夜上映的一部冯小刚主演的电影《老炮儿》，竟然隐含了中央电视台的一份企图：央视用广告参与电影的宣发工作，但广告费的收取是滞后的。双方协议当票房达到约定的数字后进行分账。该项合作最后为央视带来了2000万元的收入。他们甚至在探讨以广告换取股权的方式扶持中小型创业企业。总之，央视在变。

2017年黄金资源广告预售工作，中央电视台提出了一项“国家品牌计划”。表面上看似似乎是一种新的销售策略，实际上这份酝酿已久的计划，包含了央视在全球媒体新形势下的自省，对未来参与商业竞争

的核心能力做出新的研判。央视甚至对自己“中国唯一的国家电视台”这个身份，做了一次全新的梳理。

尽管存在了20多年的广告招标形式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但经营上的转型已经开始，这也是履新央视广告经营管理中心主任一整年的任学安带来的新变化。

“看，央视也开始做广告了”

去年10月，正是全国采购和销售经理们最为繁忙的季节。在北京、上海、广州、青岛、哈尔滨、成都、三亚等全国20余个重要城市的机场，一则“懂中国，



左图：2017 央视黄金资源发布会

右图：“国家品牌计划”启动仪式

看央视”广告在值机区大屏、候机区高清屏等各种广告牌上同步出现，如此强大的阵容吸引了许多机场乘客们的注目。不少人拿出手机拍照后发到朋友圈里，并配上一段文字，大意多为：看，央视也开始做广告了！

实际上，“懂中国，看央视”广告不仅在机场进行了投放，还出现在“北上广”三地核心商业区大型LED屏上，此外还精选了《光明日报》《环球时报》的整版广告，以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北京交通广播等多个广播媒体播出。这一强势宣传，为11月即将到来的2016年央视黄金资源广告招标造足了声势。

央视广告招标历来是中国经济领域、企业与传媒界极为瞩目的焦点，那央视为何还要如此重金宣传呢？当时刚刚接任央视广告中心主任的任学安表示：“经过多年的内外变革，央视已经完成了一个质的飞

跃和升级，现在希望通过一轮大力、新颖的传播，将央视的新形象传递给所有受众与企业。”

这次广告投放，还折射出这一国家电视台媒体经营思路出现了变化。“面对经济下行压力，面对日新月异的媒体竞争环境，坦率地讲，我们当时也有忧虑，甚至开始不自信。”任学安回忆道。大规模的广告投放，目的就在于给市场注入一针强心剂，也是给央视自己打气。

最终，央视2016年广告招标额实现了增长，全台上下都松了一口气。

“大国”思维渗入广告经营

作为国家电视台，央视在政治和市场方面，都需要起到导向作用。

进入2016年，央视经营的改革之旅，也再次升



央视广告经营管理中心主任任学安

华到作为国家电视台的定位和责任上，寻求从理论到行动上进行破冰。

最直接的变化在于，即将于11月举办的央视新一轮黄金资源招标季上，央视推出的“国家品牌计划”将与入选企业签约，这也将成为本次招标预售季的重头戏。任学安在近期的一次专访中，对“国家品牌计划”进行了这样的阐述：央视希望通过独一无二的国家平台，发现和培育一批能够代表中国各行业顶尖水平的国家品牌集群，参与到下一个30年的全球经济竞争中去。

在“国家品牌计划”中，公益部分被放在了商业部分的前面。央视提出，将支持重型装备制造业进行品牌传播，通过定制化传播方案塑造、传播大国重器的品牌形象，以品牌建设驱动产业升级。与此同时，为了以行动实践“广告精准扶贫”的战略，央视将通过优惠的广告价格政策，助力贫困地区名优农产品和有潜力的中小企业登陆央视，以品牌传播撬动地方产业发展，以产业发展推动地区脱贫。

“我们希望以自己的方式，来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转变。”这实际上，也是他所擅长的“大国”思维在媒体经营领域的延续。

2003年11月26日那天早上，任学安从一条新闻中获得了灵感：中央政治局在一次学习时，请来两位教授，就“15世纪以来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进行了一场讲解。内容主要针对9个大国的发展历程和兴衰经

验。灵光乍现一般，任学安迅速来到办公室，他停下所有事情，奋笔疾书，写下了纪录片《大国崛起》的创作提纲。

最终，任学安也因此成名，之后他又以类似的思路创作了《复兴之路》《公司的力量》。每一个作品都有着强烈的时代背景，也体现了当代传媒人的责任，“它调动了你真实的情绪，也触动了你多年的积累”。

这一次的“国家品牌计划”也是这样，据说灵感最早来源于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发起的一场“中国制造高峰论坛”，任学安作为受邀演讲嘉宾，在场下与中国工程院院士柳百成谈起中国制造的未来时，柳院士对中国制造羸弱的品牌影响力表达了深深的忧虑，这激起了任学安“要为中国的制造业品牌做点什么”的决心。

整个央视广告圈子都受到了“国家品牌计划”的鼓舞，在该计划推出的当天，一位央视代理公司的员工在社交媒体上这样留言：当你看到自己的工作，对个人、对公司甚至是对国家和整个时代产生了积极作用时，我才不觉得自己只是个二道贩子。

国台的努力

9月1日，一则贵州山区的猕猴桃广告登上了央视，在中央电视台1、2、4、7、13等多个频道播出，每天16次，为期一个月。让你想不到的是，这么大的宣传阵仗，央视分文未收。

这次以广告形式进行“精准扶贫”的尝试，最终，通过让贵州猕猴桃销量同比增长1000%多，线上线下销售额达3亿余元，使得5600余农户——其中贫困户834户——实现了增收。

对于央视来说，这不仅是一场媒体社会效益的实践，更是一次用实际行动证明自身价值的经典之战。这则猕猴桃广告全部安排在非黄金时间，比如早晨7点以前，上午9点到12点，晚上22点以后。这是央视资源表中，最为常见、门槛最低的、价格最便宜的部分，也是客户群最为集中的部分。最终“猕猴桃”倍增的销量也证明了“上央视”的价值。

“究竟是时段资源更有效，还是软广、植入性、互动性的广告资源更能够给企业带来销售的增长？”任学安认为，用一个小小的猕猴桃，就足以击穿在广告圈的“精准营销”的伪术。

这一年来，任学安马不停蹄地奔赴中国各个地区，去拜访中国最有潜力的广告主们。在沟通中，各种想

法和需求都被认真记录下来，并最终成为今年黄金资源招标季上新产品的设计参考。同时，广告中心负责销售的队伍，从两个扩充到7个。围绕在央视周边的700家代理公司，也都进行了整顿规范，加入信用管理和评级制度，用数据和广告内容说话。

央视的这些变化，正好赶上了一拨媒体传播的小思潮，市场开始反思在投放上的“去旧迎新”是不是过猛了一些。今年，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以及福克斯等美国六大电视频道的广告业务，都呈现出令人振奋的增长。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第二季度每股盈利上升近40%；Discovery的营收上升了7%，净利润提高了43%。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Facebook公开承认自己程序化购买广告的平台上有75%以上的流量是假的。

而从走访的结果看，很多国内的广告主也开始反思，新媒体投放是否带来了相应的销售增长。这一反思后随之而来的是，未来在优质传统媒体投放上的重新增长。

著名的宝洁就开始承认，在中国市场上的下滑源于营销策略的失误。2008年以前，这家跨国日化公司在央视投放广告每年都有几个亿，市场占有率也逐年增加。2008年宝洁开始逐年减少在央视的投放，加上日化业的竞争加剧，宝洁的占有率降到了今天不到3%。

上述这些典型的成败案例，已被央视总结到销售手册之中，方便销售人员随时随地去说服客户加大投放。

变化本身是否成功，仍然需要市场的成果反馈。央视正在调动全台之力，以求做好即将到来的“11·8黄金资源招标季活动”，这不光关系到国家电视台未来一年的主要收入，这场被喻为“中国经济的晴雨表”的中国最大的媒体采买活动，还富有一定的政治和经济色彩。

一个体制内的职业经理人

问：是不是因为国家电视台的身份，广告经营也要讲政治？

任学安：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舆论传播阵地，国家赋予了我们广告经营的权利和义务，但这又不是一般的商业机构，不是完全以赚钱为目标。近一年来，我们对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工作的定位不断进行梳理，作为我们的首要工作。国家电视台就是要为国家干点

事情。

问：对于传统媒体的一片唱衰声，你怎么看？

任学安：今天有很多大品牌试图通过网红来进行自己的品牌塑造，这也是非常奇葩的中国市场现象。我们进入了一个碎片化传播的时代，但我认为不管市场如何变化，传播依然有自身规律，有其常识：价值传播才最有价值。到目前为止最大的视频生产和播出机构还是中央电视台。有一段时间，渠道稀缺的时候或者是渠道出现裂变的时候，大家都说渠道为王，但是这个东西达到一个均值的时候又回到内容为王，它是阶段性的，但不管哪个渠道，还是需要有价值的东西，也只有有价值的地方才能创造价值。

问：“国家品牌计划”会让央视广告经营发生多大改变？

任学安：未来，央视的销售方式将发生根本性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国民经济中各行各业的优质企业将会聚CCTV1，我们用最黄金的时间、最黄金的资源服务于最优质的客户。比如紧随《新闻联播》后短短两三分钟的广告时间，除了亿万观众关注之外，还被称作是“品牌向领袖的汇报时间”。这些企业，将独占顶级的《新闻联播》《焦点访谈》这两档中国最王牌的新闻节目的资源。这些核心资源要采取全年打通、长单销售的原则，取消临时性和散单购买，以保护参与“国家品牌计划”企业的权益。而广告经营管理中心定位更加清晰，由单一的广告销售升级为全方位的品牌传播，新的营销时代将会开启。

问：会不会觉得广告比节目更难干？过去的经历对今天有帮助吗？

任学安：这确实比我原来从事的工作内容要复杂得多，需要角色的调整，需要体力，也需要更多耐心。这一年，我按职业经理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自己的定位是，做一个合格的体制内的职业经理人。的确，我在多个频道多个岗位都做过，对节目部门的熟悉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不管是与节目部门的沟通上，还是广告产品的设计上。《大国崛起》这些节目也给我带来了一些所谓的“光环”，会增加我与人打交道的优势，作品比名片好用。更重要的，在价值理念上，《大国崛起》《公司的力量》这些纪录片，与我们现在提出的“国家品牌计划”其实是一脉相承的，这能更容易得到市场的认可。过去，我用影像语言去探讨公司发展和个人财富梦想、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今天，我直接参与其中，以国家电视台的资源去铸造熨平这种关系的桥梁。■



毗邻盛唐木塔寺遗址而建的紫薇·公园时光，呈现“园中园、园中院、园中亭”

空间的厚度：紫薇地产的城市理想

城市学者乔尔·科特金认为，世界城市的共性在于“神圣”“安全”和“繁荣”，如果将此镶嵌在文化名城西安，则可理解为辉煌文化的传承、生活环境的构建以及参与区域竞争的运营。纵观中国“十三五”开局，“一带一路”的实施，没有一座城市像西安这样，背负稀缺度极高的文化底蕴站在了新的“全球化”前沿。如果说西安近20年发展源于土地资源的利用，那么“空间的生产”就成为这座城市最大的产出。

新城新家

作为西安城改实施以来规模最大的安置小区，将容纳3万人口、160万平方米的兴隆社区在2016年春迎来了交付。这项工程的建设者，西安最大的本土地产品牌紫薇地产又一次实现了城市空间的“地方感”营造：小区内半开敞的大戏台、大礼堂型制的村民活动中心，还有公共区域呈现出的照壁、文化墙、砖雕和小品，关中村落特有的吉祥图案依次呈现，亲切感、归属感平添了回迁村民的喜悦。这一项目的设计师、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专业总建筑师屈培青认为，这个项目契合了西安提升城市文化力、实现居民归属感、传承文化纽带的空间属性。“这也是紫薇一贯的主张，在居住功能基础上，最大提升空间存

在价值。”屈培青说道。作为与紫薇合作多年的资深专业人士，屈培青见证了紫薇的发展。“每一处小区，都追求最大的复合价值，不论是超大社区、高端住宅，还是政府委托的经适房工程，每一处作品都有不同的人文属性。”

紫薇作为目前最大的西安本土开发商，20年历程浓缩了西安房地产行业的历次进步，而空间的创新则成为其最显著的开发范式。笔者穿行在西部最大建成小区紫薇田园都市内，十大组团、开放交通的规模令人叹服，这座2000余亩的社区已住满5万余人，规模比肩广州的祈福新邨、北京的望京乃至燕郊，考虑到西安不可能具有首都那样的吸附力、集聚力，这座小区不能不说令人赞叹。“紫薇田园都市契合了城市的发展，就是在发展最快的高新区核心地带的南部兴建起功能完整的居住综合体，加速了城市‘增长极’的建设，有效导入人口，也实现了产业园区发展的带动。”紫薇地产董事长李维东告诉笔者，而由此项目带来的城市骨架拉大、外来开发商纷至的行业效应则是这一空间作品的“副产品”。如今，田园都市区位优势日渐凸显，不同组团多元居住的模式又使它具有极高的社区活力，是当地媒体赞誉的“最美社区”。其实在这一项目开发的前后，紫薇也一直力行着城市空间的创新。“复合空间”的取向贯穿于各处作品，从紫薇花园塑造电子工业园的城市环境，

企业壹号公园提升长安科技园的整体形象，紫薇·臻品“现代中国”的规划设计实现本土文化底蕴的“复刻”，“每一处作品、每一处城市人文盛景”的理念也成为紫薇提出的“五优好宅”体系的首要尺度，深刻体现在毗邻盛唐木塔寺遗址而建的紫薇·公园时光、对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的紫薇·东进项目之中。“园中园、园中院、园中亭”的即视空间，老旧厂区建筑遗存传承的记忆空间都成为紫薇“空间生产”的典范之作。

城市新空间

作为世界级课题，规避“城市蔓延”一直是规划师乃至管理者挥之不去的“痛点”，无论是反磁力中心设计，还是建设城市“绿带”用以间隔，都不能阻止快速城市化下的“粗暴”扩张，由于蔓延的持续，甚至有人认为，城市对耕地的占用将使世界在20多年后不能供给全部人口的粮食，而城市的无序“极化”更加剧了这一境况。像西安这样缺乏根植性产业资源的城市，不具长三角城市临近性的区位优势，依托土地红利发挥政府“引致力”成为必然的选择，土地财政、房地产业发挥着积极的支柱作用。西安美城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汪巍认为，西安近年的城市建设，很大程度上是被开发商所形塑，“特别是外来品牌，资本驱动下以快速复制的产品加速周转，西安籍的外地置业顾问回来上岗无压力，因为都是一样的小区和户型”。西安交大房产所所长杨东朗教授认为，西安背负着深厚的文化积淀，空间开发实则不易驾驭，“需要对本土有深厚情怀以及极为用心，否则不能做出优质、可传承的空间作品”。他还认为，紫薇在之前的多个项目中，实现了空间开发与城市提升的有序“嫁接”，应进一步传承和发扬。“由于资本对空间的侵入，造成了不只是人文传承等的诸多城市问题，生活资源的紧张、居住空间的分异、城市边缘带的发展停滞等都与此有关，都在影响‘国际化大都市’目标的实现”。陕西省社科院研究员、区域经济学家张宝通认为，西安目前迎来了“一带一路”的巨大机遇，但这一战略同时也激活了西南、东南乃至中原的大片区域，“西安正处于新一轮‘核心—边缘’大极化的区域竞争中，能否成为中心城市文化属性首当其冲，城市综合价值特别是营造产业增长极则会带来长期影响”。张宝通进而指出，西安面临包括成都、郑州等城市的竞争，“谁以城市‘空间的厚度’站在（国际化）前沿，谁就能最大顺应机遇快速发展”。在他眼中，“空间的厚度”无疑就是城市综合价值的塑造，是城市最具活力的产业板块，需要政府、开发企业共同发力，过往案例表明像紫薇这样的本土企业能够最大化综合空间价值，以空间开发创新赋能于产业板块的发展、配套建设以及人文传承。而对“空间的厚度”同样有着深刻认识的紫薇地产董事长李维东也认为，在西安这样首位度过高的区域中心开展建设更需兼顾诸多方面。“缘于国企责任的担当，按上级单位——西安高科集团的要求，紫薇致力于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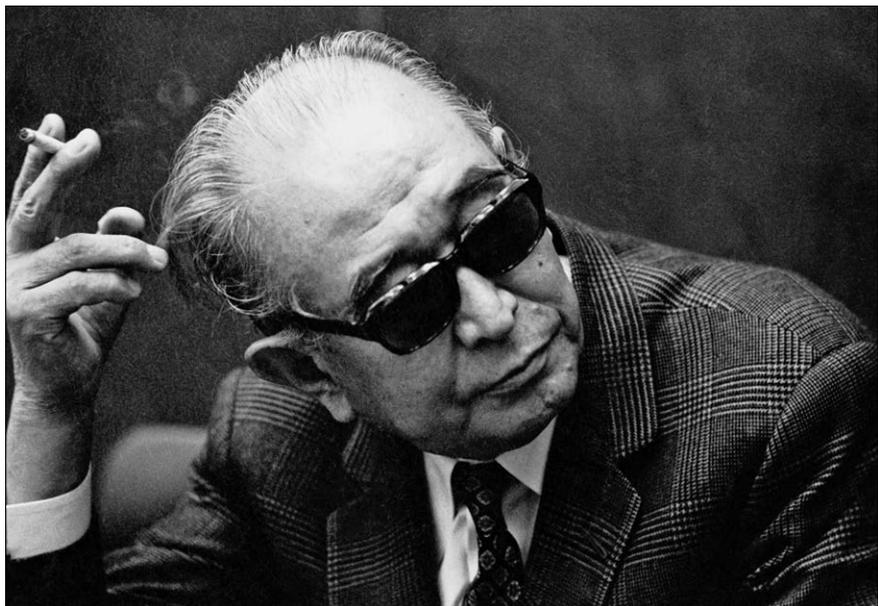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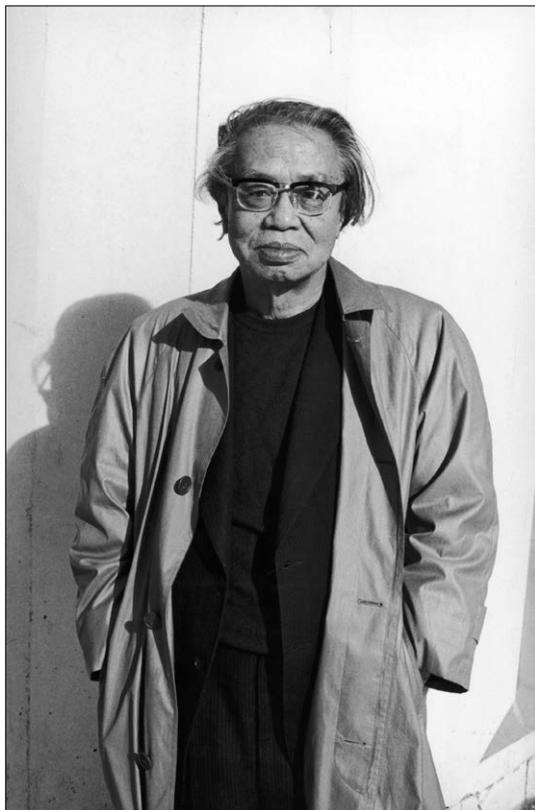
高新区、为城市提供配套的建设中，为城市塑造最大空间价值是紫薇发展的前提。”他认为，紫薇20年，就是按照“消费地产”“动力型地产”以及目前规划的“新动力地产”的路径在有序演进。“就消费地产来说，这是最易实现的空间开发，实质是住宅的建设，但也要兼顾到多元需求、对城市生境的维护，以及适应未来时代的变化。”而“动力型地产”就是对城市经济的配套和参与，如商业、写字楼等创造利税产值的物业。“‘新动力地产’则是在新的发展条件下，如网络科技带动下的城市要素流、‘全球化’提速下的区域发展挑战，特别是适应当前全新产业业态所要做的空间创新。”这一理念对于处于经济增速阶段的西安具有新意，李维东因此受邀参加今年7月在常州举办的“中美房产高峰论坛”，发表了“新动力地产”的主题演讲，得到了中房协等专家的认同。他这样阐述：“‘新动力地产’就是以集约、节约土地为目标，以‘第四代产业园’即创新型城市新区为主场，以多元化复合新创空间为载体，努力促进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的‘三位一体’，整合各方社会力量，盘活各类社会资源，通过集聚、支撑、作用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激发产业能量，辐射、带动、赋能于周边利益相关者，打造新经济产业引擎，引领区域经济发展，助推产城融合。”

紫薇地产“新动力地产”的实践是今年启动位于“泛高新圈层”的三大项目，共计百万平方米的体量在空间创新、物业管理方面将做出新的突破，以“紫薇·睿纳时代”来讲，作为西安首座“城市动力综合体”，将依托城市九宫布局、一城多心的总规划，在高新区、大学城和航天基地三个国家级开发区交汇处建起新的综合城市空间，将以城市生态公园、多元化的商业服务配套以及生产服务型设施搭建建成环境优美的现代科教、文旅、金融商贸、文化娱乐的新兴之地，让居住者真正体验公园式的职住合一，享受城市进步。

可以预见，这是一场激动人心而又充满挑战的实践之路。（文/门纪）



紫薇地产承建的兴隆社区实现了关中乡村人文的复建。图为戏楼



日本推理，通往世情与人性的幽径

文 / 蒲实

与其说日本推理小说是中产阶级的阅读品味，不如说它的气质是城市的。它混杂着城市中所有阶级、所有生灵的气息和味道，并且浮现着日本的文化潜意识。

并不舒适的日式推理

第一次接触日本推理，就感到它与英式推理小说的迥异。

20世纪90年代，柯南·道尔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已在少儿读物里流行，我非常着迷。尽管这些英国推理小说的主题是谋杀，读起来却很舒适，像是冬夜壁炉边的闲话与游戏。那是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里，闲适生活下暗流涌动的世界：英国乡村的庄园别墅、伦敦大都会的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是这些谋杀的背景；福尔摩斯戴着圆顶硬礼帽或猎鹿帽，马普尔小姐打理着花园打着毛线，将破案的严密推理和逻辑与充满真实感的世情描写抽离开来，让它们都带有一种现实的冷漠感。想起来，除了几位名侦探，很难有哪个角色因其丰满的人物性格、思想感情或命运轨迹而给人留下隽永的印象。

日本推理则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将我击中。日本电影《人证》和《砂之器》有段时间在我所在的西南省城非常流行，深入人心。当时还是黑白电视机。至今，我年过六旬的母亲都还能随口哼唱起《人证》主题曲《草帽歌》的旋律，依旧为之感动不已。这两部影视作品都是根据日本推理小说改编的，饱含着一个时间断裂和高速变迁社会中的情感——散失的亲情、社会地位的剧变、过往的贫穷乡愁与崭新的城市身份，这其中人性的阴暗、扭曲、悔悟与悲情，与我们的生活现实高度重构和共鸣。这两部影片里的主角应该都不算警探，而是涉案的人。

《人证》是根据日本社会派推理作家森村诚一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思念母亲的美国黑人青年乔尼千里迢迢来日本寻母，却被杀害，留下一顶草帽和一本诗集。刑警根据这些线索艰苦侦察，发现杀害乔尼的正是他的亲生母亲八杉恭子。已经进入上流社会而且很有名气的八杉恭子为了掩盖早年和一个美国黑人占领军人同居的经历，保住家庭的名誉，刺死了自己的混血儿子，又谋害知情人灭口。她与现任丈夫所生的儿子也走上了犯罪道路，八杉恭子悔悟自杀。《人证》是森村诚一“证明”三部曲中的一部，另外两部是《青春的证明》与《野性的证明》。它们是森村诚一推理作品在20世纪70年代的巅峰之作——那正是日本经济腾飞、社会迅速变迁的时代，也是一个日本推理小说繁荣的时代。《人证》完成后，在日本10个月内就再版30多次，半年里畅销300万册，成为日本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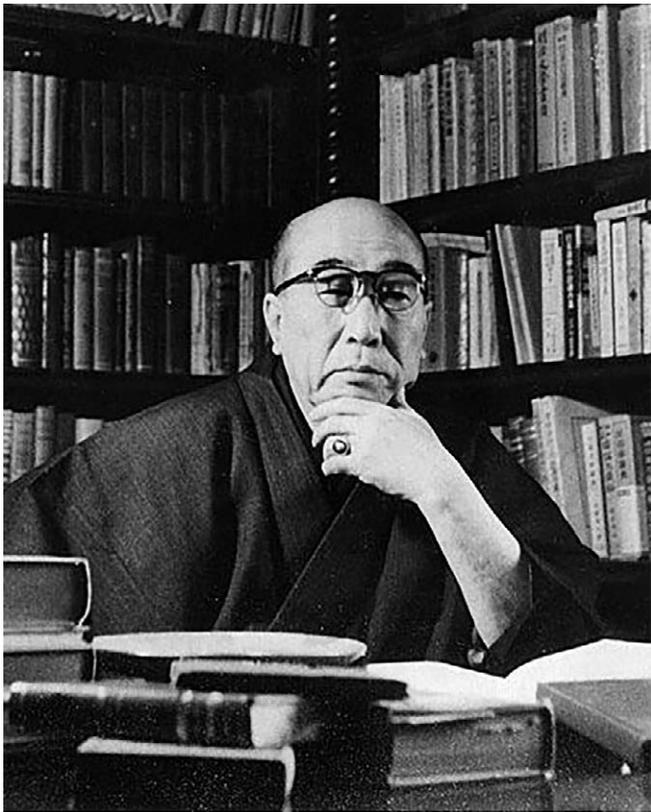
坛的一个奇迹。

《砂之器》则是推理小说家松本清张20世纪60年代的作品。它的结构与《人证》有某种神似：同样是一位想要掩饰贫穷出身的上流社会人物，杀死了知道他过往底层身份的亲人；同样是为了掩饰真相，铲除了其他的知情者。不同的是，《砂之器》里是儿子杀害恩人与养父——这位声誉渐隆的作曲家，当年与得了麻风病的父亲从山村里逃难出来行乞，夜宿祠庙，饥寒交迫，被一位慷慨仁慈、受人爱戴的警员收留，后来这个年轻人趁着战争伪造了户籍，改名换姓。

与英国推理小说不同，日式推理的理性秩序与社会的流动和失序形成了一种令人叹息的张力，有时后者的力量甚至可能更为强大。在英式推理里，命案几乎总是发生在固定的中产阶级与上流社会圈里，杀人动机似乎是预设的——遗产、婚外恋情、掩饰罪行（掩饰身份则通常发生在“二战”后人口高度流动的乡村和城市，以及美国）等，总之，为利益而杀人。杀人就像棋盘上的一步，不过是一个理性游戏里的必须动作，违背的只是法律，扣动的扳机或插入的匕首并不会让人悲恸。但在日本推理小说里，杀人动机背后却有很多情感与人性的牵绊：人物在社会剧烈变迁背景下的扭曲和挣扎，被杀的人与杀人者有千丝万缕的情感联系——这些联系属于日本“贫穷乡愁”的过往世界，当这些道义、情感和血缘关系因利益而遭到背叛，则让人悲恸和愤怒。无论是《人证》里渴望母爱的黑人青年乔尼之死，还是《砂之器》里仁爱善良的三木谦一之死，都哀婉或悲情得催人泪下。

年轻一代的推理小说大师岛田庄司（“二战”后出生），其20世纪80年代的成名作《占星术杀人魔法》，则以一种诡谲骇人的方式，让我边读边如坐针毡、芒刺在背。日本人有一种营造阴郁的心理恐怖氛围的天赋，大概是那些充满东方神秘主义的元素，比如神鬼妖怪传说、占星术或人偶，将我们内心深藏的恐惧引诱出来。1936年被人谋杀的画家梅泽吉平，日记本里有一段对“阿索德”这一他想象中的完美女人的描述，是贯穿小说的线索：人的身体可以分为头部、胸部、腹部、腰部、大腿和小腿，而这些部位分别对应着12星座和太阳系的行星与恒星，他因此想要用符合这些星座的六位少女（恰好是他家中两任妻子的几个女儿）的相应身体部位，来完成一个完美无瑕的木雕艺术作品，将其置于日本国土的中心位置，以拯救大日本帝国（1936年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开始扩张的一年），而

1. 日本推理小说作家松本清张
2. 由松本清张小说改编的电影《砂之器》剧照
3. 由黑泽明导演的悬疑片《地狱与天堂》剧照
4. 日本电影导演黑泽明



被誉为“日本推理小说之父”的江户川乱步

六名少女残留的躯体则应根据土地的星座属性被埋在日本帝国的不同矿区。画家写下日记后不久即被谋杀，之后，画家家中的几位少女相继被杀，并按照日记本里的描述被分尸和抛尸。这桩令人毛骨悚然的残忍谋杀，一直无法破案，直到40多年后，才被占星师和侦探御手洗洁破解。

虽然岛田庄司被视为“本格派”推理小说家，也就是严格遵守小说推理规则，而不以关涉社会现实为己任的推理派，但他的小说仍然是浸淫在日本文化潜意识里的。天神与恶魔合体的美的化身，暴力与审美的恐怖结合，对神秘感与难解之谜的孜孜以求，画家对人偶的变态迷恋，肉体与精神的美学，与占卜、炼金术、神话、怪谈和迷信混杂在一起，使它与所有其他国家的推理小说区别开来。它绝不是令人舒适的；相反，贯穿小说的、画家梦寐以求的完美艺术品“阿索德”，令我一想到就备感阴翳和恐惧。

然而，“阿索德”又恰是日本独特的、古意盎然

的人偶文化的精髓。日本文化里充溢着人偶符号，比如用来祭祀“替代”的市松娃娃、江户送茶人偶、女儿节上的“雏人形”，能乐、歌舞伎和人形净琉璃，这些人偶是日本“幽玄”之美的表征，就像难以猜测的日本艺伎和武士的内心，他们的脸上都缺少表情，却又代表着普遍的、超越于人的存在。除了《占星术杀人魔法》，在许多推理小说里，人偶都被用作真人的替代，有时人偶“被杀”，比如缺了胳膊少了腿，也就有一个真人被以同样的方式杀害。这有点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童谣杀人案》，都有一种童心与罪恶交织的诡异气质。但日本人对人偶的迷恋却是集体潜意识的。熟悉能乐的文化研究者体会到，戴着面具的能乐表演者，身姿不断变换着与音乐、灯光的搭配，面具的表情则不断微妙变化，竟能表现出欢乐与哀伤，“人偶复活了，它仿佛才是更高级别的真实”。只是在这层假象比真实更接近真实的幻象笼罩下，岛田庄司最终用理性的逻辑推理，将人偶的想象瓦解于现代的侦破，归结于一个女人因复仇而萌生的杀机，而“阿索德”不过是从不曾存在的虚构之物。

若论日式推理给我留下的总体印象，也许黑泽明的电影《地狱与天堂》最具代表性。在这部充满社会批判性和伦理思考的电影作品里，以鞋业大亨的小儿子被绑票为由头，警方开始了丝丝入扣的调查和推理。侦探的足迹穿过妓院街区的鬼魅人群，穿过游手好闲者与毒品贩子出没的歌舞厅，穿过新干线轰隆隆驶过的城市郊野，穿过焚烧垃圾的废品回收站；黑泽明的镜头聚焦于鞋业大亨宽敞的山顶豪宅，也聚焦于他在办公室里与其他无良股东展开的质量与利润的争论与控股斗争；豪宅里的上层阶级企业家并非总是不正直的，但他却总是与住在山脚贫民窟里的下层人构成一对不可避免的张力。日本推理始终没有英式推理的那种为游戏而游戏的轻盈与超脱，而是多了一些沉重，也多了一些关怀。

日式推理是中产阶级的阅读品味？

在什么样的社会和时代，推理小说会兴盛起来，人们会热爱阅读推理小说？

很多人认为，推理小说是属于中产阶级的阅读趣味，因为它对读者提出了较高的智识要求，需要他们有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科学素养，而且也要求他们有足够良好的经济条件，这样他们才能有闲暇

去阅读。在推理小说的历史上，它所肇始的 19 世纪末的大英帝国和它所登峰造极的 20 世纪初至“二战”后的英美“黄金时代”，的确都有这种特点。近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庞大的中产阶级，培养出追求趣味消遣的阅读品味，这在“黄金时代”的英国尤其明显。1914 年前，古典侦探小说的秩序和外部世界相当一致，直至两次世界大战后，侦探小说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才开始变化，小说里的秩序也随外部世界逐渐瓦解，直至出现以瑞士作家迪伦马特为代表的反侦探小说。在欧美推理小说里，无论是侦探还是凶杀案发生的背景，基本都是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涉案人物非富即贵。侦探推理小说的作家群体里，相当多的人也是中产阶级，比如埃勒里·奎因、G. K. 切斯特顿神父，贵族多萝西·L. 塞耶斯、艺术鉴赏家范·达因、中产阶级出身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和政府官员约翰·狄克森·卡尔。但这个结论，大概并不适合用在日本推理小说上。

在日本推理小说兴起的 20 世纪 20 年代和繁荣的 20 世纪 70 至 90 年代，日本的确也都处在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时期，并且居于世界经济的前列，但日本推理作家群体并非打上了中产阶级烙印的群体。被誉为“日本推理小说之父”的江户川乱步，就并不属于中产阶级。因为家里贫穷，他少年时一直半工半读。他在印刷厂当过徒工，在图书馆当过管理员，帮人补习过英文，替刊物撰过稿，都是为了补贴生活。正是因为打工时间太多，他甚至没能拿到大学学位。大学毕业后，他曾想去美国留学，生活的重担迫使他放弃了这个梦想，而是在大阪一家银行当了小职员。当他开始恋爱时，又因一贫如洗，差点吹掉婚事。在他几次放弃工作专职写作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家境都十分困难，幸而得到日本作家前辈的帮助和提携（比如专门登载欧美推理小说的《新青年》杂志主编森下雨森的发掘），才不懈地写作下去，直至在文坛崭露头角。正因他是在贫困中追求写作理想，有时也在写作中并不尽职，写作水平时好时坏，文风较为粗糙，精细而不精致。但这并不影响他在日本推理小说史的开创者地位。

日本推理界的一代宗师松本清张，也出身卑微。他来自福冈县的一个贫困家庭，贫困到两个姐姐都因此而夭折的地步。他是 1910 年出生的。20 世纪初的日本，虽“脱亚入欧”，已进行了明治维新，铺平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并向周边国家扩张侵略，但还

完全不是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松本清张的童年与青少年时期，日本的城市化进程正酣畅进行。在东京这样急速造就的近代城市生活空间里，相互交织着不断生长的钢筋水泥建筑和城市生活，以及对逝去的乡村田园过往的惋叹凭吊。城市最初也并非都是文明体面的，相反，倒时常是嗜血与野蛮的。在那时的日本城市里，街边公开砍头、枭首戮尸的场景还没有从它的空间里消退，关东大地震带来的无助与惶恐还没有被遗忘。与此同时，人口无休止地从乡间迁徙聚集于城市，被卷入大规模生产与消费的生活方式中：银座开张了第一家百货商店“松坂屋”；东京正式开始无线电广播；汽车出现了，并日益普遍化。就像所有近代城市一样，衣食住行开始成为有身份标识的生活方式，“职业阶层”或叫“中产阶级”开始形成，欲望不断被刺激着膨胀起来，贫富不断分化，最好的时代与最坏的时代冲撞着，奔向各自的天堂与地狱。在



2008 年西谷弘执导电影《嫌疑人 X 的献身》(上) 和 1999 年泷田洋二郎执导电影《秘密》(下)，均根据东野圭吾的小说改编

日本推理小说常常隐含着理想国的理想，小说里描写的人性和动机，有时像《嫌疑人X的献身》里的石神哲哉那样不可能，但读者乐于接受它，为之感动，并乐在其中。

不再相互熟识的陌生人高密度聚集的冷漠社会里，滋养着罪恶——就像推理小说兴起的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的伦敦一样，近代城市里，犯罪与文明如影随形，无机质的空间处处让人疑心生暗鬼。复杂的城市，也造就了20世纪初期日本推理小说的气质。正如江户川乱步小说里不断渗出来的暗黑、暴力、恐怖与狰狞，与爱伦·坡的荒诞交相呼应。日本推理小说，与其说是中产阶级的，不如说是现代城市的。到了“二战”后，随着东京大都市格局的形成和新老城市肌理病态的不断出现——贫穷、偷窃、欺诈等犯罪，或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官商勾结等乱象，推理小说再次以幽暗中的百合之势发展了起来。

贫穷是日本推理小说里暗自浮动的阴影和挥之不去的乡愁。松本清张为了一家人糊口，曾经干过很多活：扫大街、卖烧饼、在印刷厂打杂做苦工等。他是由本格派作家木木高太郎发掘出来的。在日本文坛与出版界，前辈总是不遗余力地提携有才华的后人，这是日本杰出的推理小说家能够不断涌现的重要原因。当松本在45岁获得日本纯文学芥川奖，逐渐为更多人所知时，人们才知道，这位大器晚成的作家是在简陋的宿舍里一边赶着蚊子，一边写作的。在松本清张的小说里，他不仅将矛头指向日本政界、财界、军界和法律界的黑幕，也将同情和怜悯施予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在底层挣扎的庶民。在日本小说家的笔下，东京都内环行的地铁线发生过凶案；东京与大阪是日本推理小说的策源地，冷酷行为发生在街头，本格推理则在密室内进行。但在松本清张的小说里，日本全境的领土，南至九州，北至北海道，被探员乘坐列车的侦察旅行串联在了一起，从而为推理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故事空间——这种特点，日后在像东野圭吾这些现在炙手可热的中年推理作家作品里，被发展得天衣无缝。

在东野引起极大轰动的小说《白夜行》里，时间和空间的跨度都达到了新的高度，沿着桐原亮司和高

宫雪穗14年的成长和在日迁徙的轨迹，从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时代的“烂尾楼”到信息技术时代的电脑城，从母亲将亲生女儿卖给男人以牟利的罪恶到奢侈品店和有人身着圣诞老人盛装表演的豪华商城，都是熟悉的都市场景。在这部与我们生活空间高度相似的小说里，却又是日本人极度的缜密、冷静的残酷和凄绝的爱情，调制出独有的日本味道。两个悲惨的童年恋人的命运，在两条平行线上同行，始终没有交集，但又相互依存，直至最后的诀别。像幽灵一样寄居在雪穗生活阴影里并暗中守护着她的亮司说过一席话：“人生也一样，有白天和黑夜，只是不会像太阳那样，有定时的日出和日落。有些人一辈子都活在太阳的照耀下，也有些人不得不一直活在漆黑的深夜里。……我已经厌倦继续走在这分不清白昼和夜晚的世界，我想走在白昼的街上。我的人生，就像是活在白夜里。结束吧，所有这一切。”这段令人压抑和绝望的宣言，却又触动了多少人灵魂的幽微之处，大概只有日本小说，才会在追求极致——有时到了极端地步的美学里，将现代都市的精神分裂特质如此精确地呈现出来。城市不仅是现实的，也是想象中的。伊坂幸太郎的《奥杜邦的祈祷》，就将故事设定在虚拟的城市中，以此来重新构建社会结构、社会规范，试图搭建一个想象的乌托邦社会。日本推理小说常常隐含着理想国的理想，小说里描写的人性和动机，有时像《嫌疑人X的献身》里的石神哲哉那样不可能，天才的数学理性与前现代式的奋不顾身的爱情统一于他身上，但日本与中国的读者乐于接受它，为之感动，并乐在其中。

推理小说的气质，不是中产阶级的，而是城市的，它混杂着城市中所有阶级、所有生灵的气息和味道。可以说，推理小说本就发源于作家想象中的城市。福尔摩斯与伦敦，菲利普·马洛与洛杉矶，爱伦·坡的巴黎，江户川乱步和松本清张的东京，伊坂幸太郎的仙台……不仅如此，试图现实主义地表现城市的小说，很多都会自然带上推理小说的色彩。英国推理小说家切斯特顿曾说：“推理小说的第一本质性价值在于，它是表现城市所具有的某种诗一般感觉的最初而唯一的大众文学。”横沟正史荒废的东京周边地区，松本清张的列车时刻表，高村薰的街道工，宫部美雪的老街风光，东野圭吾不经意描写的无缘人……当城市的文明式微，推理小说也就衰落下去，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法西斯独裁政权扼杀了所有推理小说的空间，因为它鼓励猜疑、追问与理性。■



《三联生活周刊十年》 《三联生活周刊廿年》
《有关品质》
《生命八卦》

限时 **8.5折**

典藏特惠

慢享20年的文字与时光

扫码直接购买



微信



淘宝

淘宝店铺搜索“三联生活周刊 lifewee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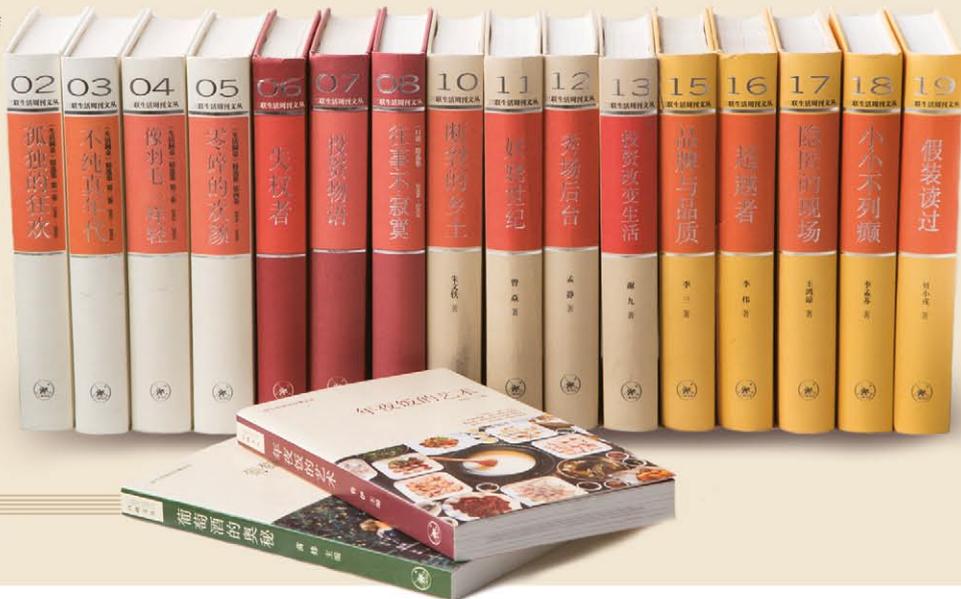
微信关注“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号，进入微店

1995-2015年，
三联生活周刊20年的成长历程，
我们先后四辑出版这套精选文从，
包括经典栏目作品集及主创个人作品集。

《三联生活周刊》精选文从
与《葡萄酒的奥秘》、
《年夜饭的艺术》

单本 **6.5折**

2本及以上 **4.5折**



十年	孤独的狂欢	不纯真年代	像羽毛一样轻	零碎的欢颜	失权者	投资物语	往事不寂寞	有关品质	断裂的乡土	妖娆世纪	秀场后台	投资改变生活	生命八卦	品牌与品质	超越者	隐匿的现场	小小不列颠	假装读过	廿年「精装版」	廿年「精装版」	葡萄酒的奥秘	年夜饭的艺术
10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78元	88元	48元	49元

如需购买整套文从产品，欢迎致电读者服务中心：010-84050451/84050425，或登录官网商城：<http://shop.lifeweek.com.cn/>

岛田庄司式迷恋

文 / 张月寒

精湛的解谜、严密的诡计之后，还让你看到一些推理之外的东西。



(为所供图)

日本本格推理派代表作家岛田庄司

北海道的原始森林以及盔甲武士的传说、紧邻鄂霍次克海的奇怪房屋、从日本转换到印尼的场景设置……这一切，让我们得以跌入一个个岛田庄司特有的迷醉，跟随这个出生在上世纪40年代的“日本推理之神”，走入他那个花费半生营造起来的推理迷宫。

岛田应邀参加方所青岛店开幕，并于当晚和隔天下午在无尽纵深感店堂发表演讲。这使我有机会面对面采访他。

一部推理小说所包裹的内核当然不只是诡计、谜题以及凶手究竟是谁。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爱看推理小说，除了提出谜题——解谜——分析凶手动机这一模式外，很多读者最感兴趣的往往是最后分析动机那个环节，即那个人为什么要杀人。而这一环节，如果没有前两个环节的铺垫——解谜过程不够精彩、诡计不够聪明或过早让读者猜到凶手，则这部推理小说，很容易被认为是一部并不出色的作品。

受爱伦·坡影响——岛田本人在采访中也多次提到爱伦·坡——岛田的前期作品中有很多会出现幽灵、神秘现象、流传已久的传说等作为开场或重要道具，并且在描述手法上，也有非常强的哥特风格印迹。小说前半部的叙述方式、营造的气氛，是恐怖瘆人的。《北方夕鹤2/3杀人事件》中，开头夜鸣石的传说、夜里倒着走的盔甲武士的传说，《斜屋犯罪》中假面木偶的传说，都成了“构成谜题”中一个很好的道具。

“形成画面感”，是很多作家之所以成为推理大师的一个极重要原因。阿加莎·克里斯蒂就是一个很显著的例子。读她的作品，除了能享受那种解谜的推理过程，还在于她的作品其实就是一幅英伦全景图。岛田庄司的推理作品同样也有不少这种“画面感”。《北方夕鹤2/3杀人事件》，东京警探吉敷竹史收到前妻的电话后，整个过程充满悬疑。又穿插了北海道的民间传说、湖区景色。文中除了让人屏息凝神的缜密推理外，让人感动的还有吉敷竹史的担当。也有很多读者觉得那根本是一部爱情小说。

岛田笔下塑造了两个比较让人难忘的侦探形象，一是御手洗洁，另一个就是这名东京警察吉敷竹史。

在采访过程中，我个人一直比较好奇的一点是，

为什么在日本，推理这个类型比其他小说类型更发达呢？在对岛田庄司的采访中，他有提到推理是一种非常依赖逻辑的运动。而近现代日本人由于在这方面受到了比较好的训练，所以无论是推理作家还是推理读者，都对这种文学形式有着更高的创作质素和接受度。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很多采访中都提到要坚持本格推理。在你的理解中，本格推理究竟是指什么？是严格遵守诺克斯公平性守则吗？

岛田庄司：关于本格推理，之前有范·达因的“二十条”原则还有诺克斯的公平性守则。他们为什么会制定这些原则？就是在推理的逻辑方面不掺杂任何其他东西，让“推理”变得更纯粹。所以基于这样一个目的，这些原则被制定。比如说，有撒谎的人在小说中出现，或者是有意爱的角色在小说中出现，或者是傻瓜一样的人物，他们作为小说角色出现的话，这样推理本身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容易被喧宾夺主。从文学流派这一角度来讲，欺骗的、撒谎的小说和恋爱的小说，以及具有傻瓜角色的这种小说，貌似可读性强，但是，它们和推理小说是不同流派，所以在推理小说中不应该掺杂这些要素在里面。所谓的本格推理就是说逻辑推理达到一定高度才能被称为本格推理小说。所以在本格推理小说的后半部分会有接近于逻辑论文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出现。而作为一篇科学的论文，就要把科学的真实性原理表达出来。本格推理也是有这样的目的，即把最新的科学成果引入到小说中。随着科技的发展，未来能够跟科学成果结合的最可期待的小说，我觉得就是本格推理小说。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一部成功的推理小说是不是读者越迟猜到凶手才越高明？

岛田庄司：您说得也对，但是有的很优秀的推理小说也有一开始犯人就己经很明确的。作为我的小说，把侦探调查、推理的过程完整展示给读者，是我的创作手法。作为杰出作品，它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怎样在推理的过程中让读者有一个意外，给读者一个冲击性的感受。

三联生活周刊：推理小说中，故事或情节的设计和真实、科学的数据以及常识，你觉得两者间哪一个更重要？严格来讲，一部优秀的推理小说是否要做到科学常识接近于全部准确？

岛田庄司：因为推理小说本身就是设秘、解谜的小说，所以它最重要的就是不能撒谎。推理小说起源于1841年埃德加·爱伦·坡写的《莫格街谋杀案》。以它为起点，最终在全世界得以推广开来的是柯南·道

尔的福尔摩斯系列。其实那时推理小说就是伴随着最新的科学知识、科学成果一起诞生的。柯南·道尔在写小说之前本身就是一个科学家，对科学实验非常感兴趣。他把福尔摩斯的住址定为贝克街221号，因为那里也是他的实验室。他在小说里曝出的细节，包括伦敦的香烟灰、伦敦土地的颜色，都有很强的科学性。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作为科学常识在小说当中出现必须是真实可信的，容不得半点虚假。为了振兴本格推理小说，我认为还是应该回到爱伦·坡的创作原点：在小说中引入最新的科学成果，通过科技成果的发展来重新振兴本格推理小说。

三联生活周刊：一个本格推理小说家是不是需要具有很强的数学思维？

岛田庄司：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不能回避的因素。作为一个本格推理小说家，必须能够逻辑清晰地去思考问题，而不被感情左右。用一种极端的说法来说，你有了数学思维能力，你就可以写推理小说了，你的文笔再烂可能都会有人看。

三联生活周刊：那是否可以理解为你认为写推理小说文笔不重要？

岛田庄司：刚才其实只是一个极端的说法，就是“有数学思维能力就可以写小说”。但是作为一个成功、优秀的推理小说，它是必须要有各种因素全面综合地考虑才可以的，这中间当然包括“文笔”。此外，对人的描写、对社会现象的揭露……所有方面如果都能做得很好，才能构成一部真正成功的推理小说。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否认为，世界上出色的推理小说作家都会创造出几个名侦探形象？是不是在作品中创作一个名侦探更利于作品的成名和系统化、影视化？

岛田庄司：设计一个名侦探角色可能是一——不管作为小说也好还是电影也好，会给人一种有“威信”的感觉，让读者和观众留下更深的印象。像福尔摩斯，他的性格本身就很奇怪、独特，此人物一出，会给读者的印象非常深刻。但我却认为，本格推理小说并不

为了振兴本格推理小说，我认为还是应该回到爱伦·坡的创作原点：在小说中引入最新的科学成果，通过科技成果的发展来重新振兴本格推理小说。

是一定要有名侦探才会让小说成功。在我的很多非常受欢迎的作品中，完全没有名侦探形象的出现。而御手洗洁其实有我本人的影子在其中，此外也结合了部分福尔摩斯特色。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有一部作品中提到，御手洗洁有厌恶女性这个特质，为什么要这样设置？

岛田庄司：其实，并不能简单地说御手洗洁“讨厌”女性，因为在他成长过程中，很深刻地感受到了女性的狡猾和聪明、不择手段，所以一段时间内可以说他是“讨厌”女性的。但是，后来随着他人生经历的丰富，你会发现在不同作品中他对女性的态度也开始转变了。男性对于女性的态度，可能有的人只是专注于一定要压过女性或者不服输，但御手洗洁并不是这样一个角色，他在和女性打交道的过程中，包括当女性遇到困难时，他都会义无反顾地帮助。

三联生活周刊：御手洗洁曾在作品中离开日本去瑞士，现实生活中你本人也离开日本去了美国，这个情节上是不是有投射自己的影子？你当时离开日本，是不是因为日本社会发生了一些让你不能忍受的现象？

岛田庄司：御手洗洁身上应该投射了我成长的一些过程，但我跟他是性格完全不一样的人。而我一直认为，人应该有必要到世界各地去走一走看一看。

我离开日本有一些不得已的原因。但是作为一个本格推理小说家来讲，欧美国家才是真正的推理小说的发源地，我只有身处其中，才能跟大家更好地去交流，才能创造出更真实、更接近本格推理的小说。基于这些我才去了美国。我离开日本去美国的时候，正好也是日本经济高度发展的阶段，类似于现在的中国。所以当时虽然经济在高速发展，但是它带来的很多社会问题也让人民很苦恼或者心理负担很沉重。当时的我也有这样一些感受，感觉到压力，所以决定要暂时离开这个国家。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作品中有很多对日本社会现象的折射，这是不是你有意为之？

岛田庄司：我作品中对于社会现象的揭露，有一

我离开日本去美国的时候，正好也是日本经济高度发展的阶段。当时虽然经济在高速发展，但是它带来的很多社会问题也让人民很苦恼或者心理负担很沉重。

部分是自然流露，也有特意对某个社会现象发出看法。我最近创作了一本新的小说，可能现在还没有翻译成汉语，这部小说里就有我对社会现象思考的一种自然流露，叫《屋顶上的小丑》。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很多作品具有诡异、神秘主义的色彩，你本人是不是也对这方面的知识很感兴趣？

岛田庄司：幽灵现象我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感兴趣，所以学习了。本格推理小说中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通过刚开始出场的幽灵现象做合理的逻辑解释，最后探明幽灵事件背后的真相，这也是创作的一种手法和手段。在19世纪科学革命出现以前，世界上的人们对幽灵现象怀着一种单纯的回避和恐惧，并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面对它们。于是当时的侦探小说中，幽灵或鬼魂的描述也非常流行。

三联生活周刊：你作品改编的电影即将上映。你认为推理小说从文字转换成影视，会丧失本格推理本身的魅力吗？你认为影视画面应如何把小说中环环相扣的推理表现出来？

岛田庄司：很多人都说我自己作品的改编要求很高，这可能是一种误解。我其实只是对御手洗洁系列的要求比较高。因为御手洗洁本身性格比较古怪，作为一个名侦探，他可能在日本是一个很难被理解的人物，所以如何传神地把他搬上荧幕，是一个比较难的课题。但这并不代表我对自己所有作品的影视改编都是要求这样高的。在我的作品里还有爱情小说，还有另外一个侦探叫做吉敷竹史。这样的一些作品很多也都被改编成了电视剧。因为现在很多人已经不读书了，只是看电视看电影，所以通过演员的表演，让我文本中的这些角色被更多人所知道，我认为是很好的事。

三联生活周刊：如何评价自己作品的影视化程度？你本人满意与否？

岛田庄司：《星笼之海》，御手洗洁系列之一，正在全日本上映，这是以我的故乡为拍摄地的作品。另外，吉敷竹史系列的一部作品现在日本的金泽进行紧张的拍摄。我之前跟中国有个电影制作公司的安总交流过，她也是电影公司的制作人。我们都不约而同感觉未来在中国可能迎来一个把日本推理作品大量搬上荧幕的时代，因为在日本有很多非常优秀的推理小说，如果把它们搬上荧幕的话，相信会受到中国读者和观众的欢迎。☑

（实习记者王琪对本文亦有贡献）

有一种温暖，叫伊坂幸太郎

文 / 张月寒

在那个夏有暴雨、冬有大雪的国度，推理小说以一种幽暗中潮湿百合的幽香绵长之势独特绽放了出来，至今，成为我们迷恋的、独特的日式推理文化。

在今年8月份上海书展，伊坂幸太郎来到中国大陆。一直以来，伊坂幸太郎的作品温暖、开脑洞、治愈系，在作品中传达出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和荒诞式想象力。在国内普遍拥有的读者群较年轻，且辨识度极强。

这位“70后”日本作家，其作品如果定义为纯粹的推理小说，则显然难以完全概括。新星出版社此次为他举办的一个活动的主题就是：“我不是推理作家。”与严格坚守本格推理的岛田庄司不同，伊坂的作品似乎更自然、随意、天马行空一些。他的作品，似可称为一种“真正属于自身的作品”，内里包含了她很多对于生活的思考以及独特的脑洞。

在日本权威杂志《达文西》评选的日本最受欢迎男作家中，在2007、2009、2011、2012年，伊坂都是排名前三的男作家。其中2007年更打败了村上春树、东野圭吾成为第一。

那么，这款很独特的推理作家，他的作品究竟该如何形容呢？

“人们的命运互相交错”，是伊坂作品的一大亮点。无论是《献给折颈男的协奏曲》，还是《余生皆假期》；《蚱蜢》也是三个杀手次第登场，《阳光劫匪》是四个人抢银行……于是，我们在这种不经意间每个人命运的穿行、交叠中，看到了伊坂幸太郎多线叙述的功力。

伊坂幸太郎与传统意义上推理小说作家的另一点不同是，他没有着力刻画一个“名侦探”形象。他的很多小说谜底都是通过讲述自然揭开，而并没有一个神一样的人物跳出来层层剖析。

虽然说很难定义为真正的推理作家，但伊坂作品中还是不乏悬念。在中国读者中广受好评的《金色梦乡》，除了首相遇袭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悬念，一个如此平凡的人物——快递员青柳在事件发生前所遭遇



伊坂幸太郎出席今年8月份的上海书展

（新星出版社供图）

的种种怪事，又会让读者不忍释手地继续阅读下去。

强调个人的力量，也是伊坂作品的一大特色。很多人会觉得伊坂的作品幼稚，因为，世界怎么可能最终还是那么美好。这一点我们在采访中也和他本人多次探讨。得出的结论是，也许，从一个作家的角度考虑，他的那种“总有光明面”的写法是能够看出一个人本性的善良的。纵使他是在叙述一件极荒诞的事，诸如《金色梦乡》里一个快递员发现自己莫名成了刺杀首相的疑凶，可是，细读下去，一种“荒诞中的真实”又会让你觉得他的天马行空貌似没有那么遥远。

在《另类日本文化史》中，作者总结日本人会有一种“贫寒的乡愁与童心”。曾经做过白领程序员的

伊坂幸太郎在每日的朝九晚五中没被淹没的正是这种“童心”，于是终于辞职当了个作家。在那个夏有暴雨、冬有大雪的国度，推理小说伴随着现代城市的兴起以及战前的猎奇心态，于一种独特的文化氛围中成长。战后，又随着东京大都市格局的产生以及城市肌理病态的不断出现，并切合日本人一贯重视逻辑的文化传统，使得推理小说，在那个纬度较好的列岛以一种幽暗中的百合之势独特发展了起来。

三联生活周刊：如何定义你自己？你认为自己是一个纯粹的推理小说作家还是一个更广义的作家？

伊坂幸太郎：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推理小说家，我也觉得我写的是推理小说。但可惜的是，别人似乎一直都不这样认为，有点不让我进入这个圈子的感觉。于是我也尝试写一些跟传统意义上推理小说有点区别的作品。但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推理小说家，也希望大家这样看我。

三联生活周刊：似乎你的作品和其他推理之作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在看似阴冷残酷的事实后，给读者一个光明温暖的结尾。比如《重力小丑》，一开始会叙述强奸、青少年犯罪、纵火等，结尾处兄弟情、父子情的升华却是众多读者最喜欢的一个点。这种前段阴暗、结尾光明，或阴暗中包含光明内核的风格，是你刻意把小说设置成如此，还是你本身性格的总基调就是比较温暖和乐观的？很多读者喜欢你的原因是都觉得你特别正能量、治愈感强，你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吗？

伊坂幸太郎：如果一直持续一种作品的阴沉感，是我不愿意让我的读者拥有这种心情的，所以我会我在结尾的地方稍微有种上扬的倾向，让整个故事变得温暖。但是如果这种转折太陡峭，就会显得太造作、太假了，也是我所不愿意的。然而，我至少希望读者在读完我的作品后能有一点点向上的心态。

我在写作的时候，也有一种给自己做心理咨询的感觉，窥视自己的内心。这不是我故意为之的，但是这种感觉多少会渗透到我的作品里。我本身的性格就是不愿意伤害别人，也不愿意别人互相伤害。既然都要一起活在这个世界上，还不如大家都开心一点比较好。这就是我的性格。或许也是作品呈现出这种风格的原因吧。

三联生活周刊：也有一些中国读者认为你的作品是比较幼稚，充满“中二病”气息的。你自己也会觉得你的作品比较幼稚吗？

伊坂幸太郎：在日本也经常有很多人这样评价。但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喜欢看漫画以及那种傻傻的故事的人。之前因为性格上的原因，我会觉得自己也很想写那种很不可思议的故事、神奇的故事，这一点有可能就会让别人觉得很幼稚吧。我觉得自己的性格也确实是这样子。

三联生活周刊：在《献给折颈男的协奏曲》，有一部分你通过主人公的口表达了对战争的看法，即反对战争。请问这也是你本人的看法吗？

伊坂幸太郎：是，我个人是反对战争的，因为战争一旦发生的话，所有人都会失去冷静，那种很平静平稳的生活状态就会崩塌。全体人都会像陷入集体癡症那样，全部发疯。我很害怕这种情况的发生。所以我是反战的。

三联生活周刊：如何构思出“折颈”这个灵感？书名中的“协奏曲”有何特殊含义？

伊坂幸太郎：日本和中国一样是不可以持枪的，如果在小说中要构思出一种职业杀手的行为，或者是用刀，或者是勒死，但“折颈”显然更有画面感。而且，我在《杀手界》（《蚱蜢》）里已经用过刀了，于是也不想重复。起名“协奏曲”是因为，这个作品集里有各种各样的故事，把他们放在一起就相当于成了协奏曲一样的东西。至于为什么和“折颈男”放在一起，是因为我就是喜欢这种矛盾、不搭调的感觉。

三联生活周刊：你现在对于当初宣布永久放弃直木奖提名会不会有些后悔？

伊坂幸太郎：我一开始拒绝直木奖，是因为直木奖在日本知名度很高，经常需要上电视什么的，而我对上电视有点恐惧心理。但是觉得直接拒绝掉的话又会显得自己很大牌，所以我一开始是想偷偷摸摸拒绝掉的。但一不小心被哪家报纸给登出，结果事情就闹大了。但是现在想的话，我还是觉得没什么，不要就不要了，我还是不想因直木奖这个事情被曝光，我觉得目前这种状态挺好。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很多作品会采用多角色描写、转换视角和多线并进的方式，你为什么偏爱这种方式？

伊坂幸太郎：我没怎么写过单一视角、单一角色那种讲述的故事，因为我想让自己的作品看起来好玩一点。这样的话会让读者看到一些东西，但同时又隐藏一些其他的线索。我会不由自主地选择这种方式。还有一个原因，我喜欢制造一种情景，角色不知道某些事实而读者却知道，因为读者是从复述的多个视角

来看待一件事。这是我可以制造的情形，我觉得整部小说看起来会非常有意思。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推理作家都会倾向于集中塑造一个或几个著名的侦探形象，比如西方的福尔摩斯、波罗或日本的御手洗洁、柯南。请问你的创作也会有这方面的考量吗？

伊坂幸太郎：其实我对塑造一个鲜明的侦探角色这种东西并不是太感兴趣。如果硬要追溯的话，我作品中的黑泽算是一个比较长寿的带有侦破性质的人物角色了。但我也没有刻意把他塑造成一种名侦探角色。我只是很喜欢黑泽这样一种人物形象，他就像一个演员，我特别喜欢让这个演员比较多的登场，然而，却并没有想“创造一个系列”这样的欲望。

三联生活周刊：黑泽身上哪些特质是你比较喜欢的？

伊坂幸太郎：我本人的性格，是会经常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的一种类型，总体来说就是一个“爱担心”的人，所以，我觉得像黑泽这种不动如山、坐怀不乱的人让我很有安全感。于是，就算我在其他作品中创造一个新的角色，也许有可能还是和黑泽这个角色很相似，所以，在很多作品里我都会让黑泽重复登场。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作品里超现实和荒诞的情节比较多，怎么构思出这些天马行空的情节？

伊坂幸太郎：我觉得自己创作的既然是虚构故事，那么只写一些普通生活或情节的话挺没意思的，我想加入一些自己独创的元素进去。所以我会创造一些超现实、特别不可思议的故事。但是如果那个不可思议、超现实超得太夸张的话，又显得会比较造作，所以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感觉，是那种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不可思议的感觉。

三联生活周刊：平时如何寻找创作的灵感？

伊坂幸太郎：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能找到一个可以聊天的对象。有的时候是跟编辑，有的时候是跟夫人。灵感一般是我自己想到的、出现在我的心里面，但是我必须有一个这样的人和我对话，有一个交流的过程。说着说着，思路就清晰了。

三联生活周刊：什么契机让你决定开始创作推理小说？

伊坂幸太郎：在少年时一次我读到岛田庄司的作品，从那时开始想成为一个推理小说作家。岛田老师在自己的书里面有写出一套理论，本格推理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我的创作动机一开始是想证明这套理论，虽然最后写出来的画风完全不一样。岛田先生的作品

我觉得自己创作的既然是虚构故事，那么只写一些普通生活或情节的话挺没意思的，我想加入一些自己独创的元素进去。所以我会创造一些超现实、特别不可思议的故事。

有一种只有他才能写得出来的那种感觉。我认为岛田先生就算不写推理，他的作品也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受到欢迎，但是岛田先生本人非常执着于“本格推理”。

成为作家前我是一名系统工程师，为企业设计各种系统及程序。原本打算是兼职写作的，不过为了有足够时间进行《重力小丑》的创作，就辞了工作，成为专职作家。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作品中经常拿仙台作为背景，为什么不用别的城市作为小说的场景？

伊坂幸太郎：我本人住在仙台，住得很舒服，我也很喜欢仙台这座城市，所以经常会在小说里面提到仙台这个地方。上回东野圭吾先生作品中写了从仙台来的人，我当时听到以后有一种自己地盘被抢了的感觉。另一个原因是我对仙台非常熟悉。如果我把舞台放在中国，随便乱写的话，肯定有人会说中国不是这个样子。但如果我把舞台放在仙台，因为本人对仙台足够了解，所以看到的人就会说其实我是懂仙台这个地方的。就是“这个作者明明知道是这样，但是他故意给它乱写一气”。读者也许会比较容易理解这一点吧。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仙台写了那么多罪案的发生，实际上仙台真是这样一个地方吗？这样写出来不怕其他仙台人无法接受？

伊坂幸太郎：我的确有朋友跟我说过，仙台不是这样的，你这样写真的好吗？其实仙台本身是一个非常平静的城市。所以随着我小说的越来越多出版，当有时仙台真发生了什么事时，我都会想：“这不是因为我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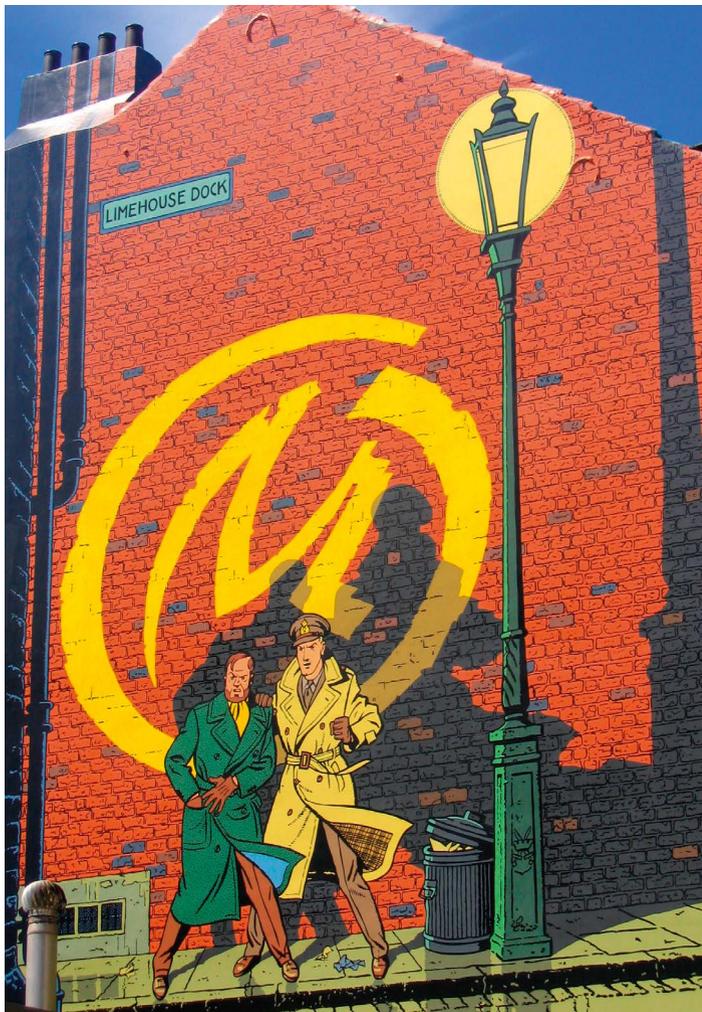
三联生活周刊：在一次采访中，你曾说自己的梦想是开一家书店？为什么？

伊坂幸太郎：我其实不是很记得自己说过这句话了，难道是在小学作文里写过？那么，如果我真的要开一家书店的话，我一定会把自己的书摆在比东野圭吾的书醒目得多的位置。■

（实习生王琪对本文亦有贡献）



1



2

布鲁塞尔的街头漫画墙

文 / 贾森

布鲁塞尔每年有漫画节，那几天，整座城市都浸泡在展览、游行和各种经典漫画书的角色扮演当中。2009年的时候，市政府甚至在大广场（Grand Place）为丁丁迷们呈现了全世界最庞巨的一幅《丁丁历险记》图画，32米长、21米宽，总共672平方米，将这个在欧洲也数得上的古老广场覆盖了一多半面积。

巨画是临时的，但布鲁塞尔城的街巷里，还有44幅被永久绘制在老建筑外墙面上的漫画，算是为这座城市坐定了“欧洲漫画之都”的名头。

其实西方很多城市都有墙画秀，最后无一例外，也都成了旅游的好噱头和当代艺术的兴奋剂。像纽约下城的街头涂鸦，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为当代艺术圈催生过像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这种明星人物，他成名以后，将涂鸦从墙上挪到画布上，连画过的门板也被人拆下来收藏，一件作品在画廊和拍卖行里可以卖到几百万、上千万美元。里约热内卢有



3



4

布鲁塞尔老城里的漫画墙从1991年开始绘画，每年都在增加，目前已经有44个，成为一条经典的“漫画之路”。自左而右图为：

1. 埃尔热的《丁丁》，法漫画永远的热爱
2. 埃德加·雅各布的《布莱克和莫蒂默》，一个关于英国科学家和军情五处要员的冒险故事
3. 弗兰克·佩的《拉热波尔》
4. 安德烈·法兰甘在1951年创造的长尾豹马苏比拉米

个“Rocinha”，号称南美最大的贫民窟之一，那里也长出了一个街头涂鸦艺术家内维斯（Marcos Rodrigo Neves），因他留下的那些涂鸦以及后来其他画家赶去凑热闹的涂鸦作品，贫民窟现在也是观光胜地，尤其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让这两种世界的反差成了巨大的吸引。

但布鲁塞尔这些墙画有点不太一样。严格地说，它们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街头原生艺术，因为画在什么地方、谁来画、画什么，从1991年伊始就出自布鲁塞尔市政府的策划，提议者米歇尔·凡·罗伊（Michel Van Roye）是布鲁塞尔城市发展与环境委员会委员。与反社会的、象征自由的墙上涂鸦不同，布鲁塞尔将墙画主题限定为“连环漫画”，画面内容要求全部选自比利时本土著名漫画家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场景，画幅宽窄虽说要随四周环境取舍，但高度上通常都安排为二到三层楼高，等于给定了相对统一的规制。

漫画墙的数字每年都在发生变化，因为市府会不断挑选他们觉得适合绘画的建筑和外墙，每年增加一两处，然后选择邀请漫画家，将从前某部经典或者他们自己作品里的场景绘画留存。市政府和比利时漫画艺术中心为此专门设计了一条全长6公里的游览路线，叫“漫画之路”（The Comic Strip Road），并绘制了地图，供爱好者按图索骥。这就好比一个寻宝游戏，一路看图说话的乐趣有很大一部分就在猜谜当中。比利时漫画的人物成百上千，在全世界都被人熟悉和喜爱的，就有丁丁（Tintin）、斯皮鲁（Spirou）、蓝精灵（the Smurfs）、幸运的鲁克（Lucky Luke）、布莱克与莫蒂默（Blake and Mortimer），还有长尾豹马苏比拉米（Marsupilami），等等。要从单幅画面看出人物身份、出自哪部漫画经典、作者是谁，不是漫画迷还真有难度。

《丁丁》无悬念地成了漫画墙旅行中的第一站，

我们作为参观者也没有能够破此惯例。对于比利时人，“丁丁”以及创造了他的埃尔热，自1929年此书诞生以来就一直无限地享用着国民热爱。从大广场步行前往撒尿的小于连雕像，要经过一条狭长老街的三个路口。就在第二和第三个路口之间，蓝毛衣、灯笼裤的丁丁出现在右侧一幢楼房的夹角处。绘画者为了利用前后两面外墙的错视感，选取了《丁丁历险记之卡尔库鲁斯案件》的一个街头追逐情节：丁丁和小狗白雪跟在哈德克船长身后，正从宾馆外墙的防火楼梯飞奔下来，试图逃脱警察的追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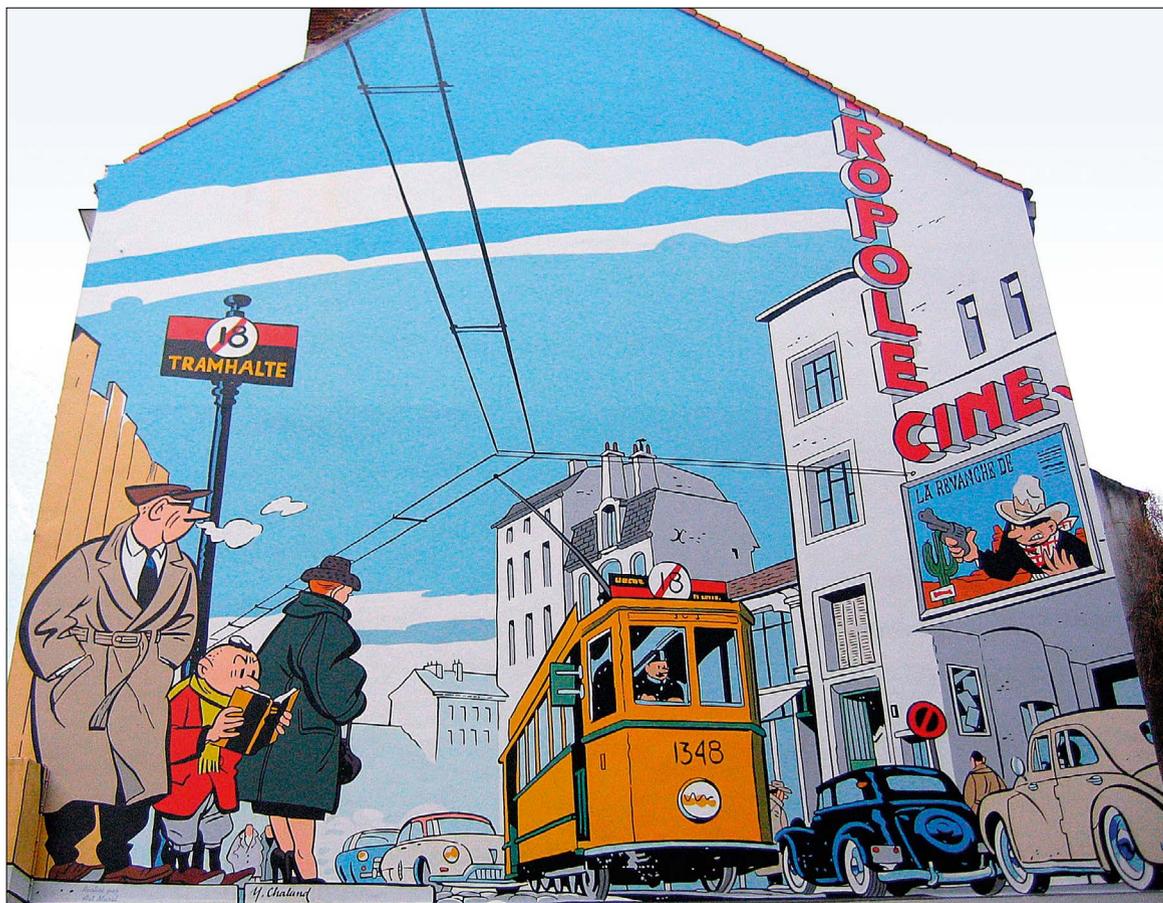
继续步行不到一分钟，转过小于连那个街角，我们就在Chêne巷9号的墙上找到了第二幅——《奥利维埃·拉莫》(Olivier Lamo)。场景类似卡通风格，是男主奥利维埃偶入“玫瑰园世界”的那一刻，漫天烟花中女主现身，正要和他携手开始浪漫冒险。如果不是资深欧洲漫画粉，对这个漫画书和作者达尼(Dany)恐怕所知有限。

但《通道》(Le passage)就不一样了。这幅墙画被安排在警局对面，地段和漫画本身的黑色侦探风倒是相宜。它的作者弗朗索瓦·史奇顿(François Schuiten)属于比利时当代漫画家里面的大名家，今年60岁，出生在布鲁塞尔一个建筑世家，他自己也是一位名头很响的景观设计师，经常被政府请去主持类似世博会国家馆这种面子工程。另外，熟悉巴黎地铁的人可能会记得，巴黎3号线有个颇具未来感的地铁站——Arts et Metiers，其内景设计就出自这个布鲁塞尔人。史奇顿的专业背景，让他的漫画作品在很多时候都显出不同于其他同行的理性和冷静。他的成名作《黑暗城市》(也译为《消失的边界》)系列，以一个与世隔绝的国家地理绘图中心的年轻绘图员为主角，讲述时空演变的故事，最初发表于上世纪80年代初，他和法国同学、文字搭档伯努瓦·佩特斯(Benoit Peeters)共同创作。一套漫画系列一般都在五六年里结束，《黑暗城市》上下两册，却从1983年一直画到2004年才让读者等到大结局，其间在2002年得了安古雷漫画大奖。有人评价史奇顿的漫画书是20世纪早期侦探小说和儒勒·凡尔纳式科幻的合体，偏爱以地标建筑、摩天高楼、城市历险等元素来建构情节，画面看起来有点像20世纪早期新艺术建筑的设计效果图，线条和色彩严谨有序，但整体上却被制造出一种异境感，将读者从熟悉的城市场景中一步步导向边界，踏入另一个时空。其实他继承

的也是“法漫”传统，长于使用明晰的线条和复杂逼真的景物描绘，在情节和人物之外，漫画家对周遭事物的观察和描摹，往往具备了像建筑师、植物学家或古物学家一样的关注和专业。《通道》这幅墙画的好处还在于，据称是画家自己亲手所绘，而非他人代笔。

站在Plattestein街口，可以同时看到两个早期漫画墙，都画于这个街头漫画运动刚刚开始期的1991~1992年。离十字路口稍远的Marche de Chapon街上，是弗朗西斯·卡兰(Francis Carin)的《维克托·萨克维耶》(Victor Sackeville)，画的是名著《歌剧院的死亡》中一幕场景：私人侦探维克托“一战”期间来到布鲁塞尔，为国王执行秘密任务，他身边女伴的衣着是20世纪初欧洲最时髦的装扮。与其他几处漫画墙一样，卡兰尽量在画中放进了当地的地标建筑，让虚构人物和现实世界发生时空连接，比如这幅里面就出现了布鲁塞尔人很熟悉的拯救圣母教堂。另一侧，紧靠Plattestein街，是弗兰克·佩(Frank Pé)醒目的《拉热波尔》(Ragebol，人物取自他的成名作《Brousaille》)。此地本来是酒吧扎堆的时髦街区，还有店铺挂出了代表同性恋文化的彩虹旗，漫画墙《拉热波尔》因此被布鲁塞尔人解读为这一街区的隐晦标识：拉热波尔和他几乎看不出性别的“女朋友”一手插兜，正开心地搭着肩膀穿过马路，从画面里那些建筑的细节来辨别，他们身后的街景，正是我们伫立张望的地方。

在欧洲追溯最早的连环漫画，有考据者认为是15世纪在尼德兰地区(包括现在荷兰、法国、比利时、德国的部分领地)流行过的家族祈祷书或家谱书的插图，这些书由职业画师手工绘画，往往以多幅生动的人物、情节来讲述《圣经》故事或家族历史，由于材料昂贵，手工精美，一般只有少数贵族家庭才有能力制作和收藏，并留传给后代。虽然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漫画迟至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才出现并流行起来，但在18世纪末，启蒙运动带来的文化普及实际上已经引导了以共享和传播为特征的大众文化的出现，区别于过去的学者精英、王室贵族和教会文化。人们对图像滋生出极大热情，创造了不同于绘画的“图画”的概念，并广泛传播。有一个数据，在1780年，60%的巴黎人拥有图画——包括装饰图画、正规画作和商业图片——而只有30%的巴黎人拥有书籍。到大革命初期，以彩色雕版印刷在普通活页纸上的漫画开始和报刊、招贴画一样



占据了整幢房屋一大面墙的《丁丁历险记》中的场景

蓬勃起来，公众喜欢这种讽刺性的活动图画并从中获得信息。有一幅收藏于巴黎装饰艺术图书馆的18世纪末彩色漫画：一个卖画小贩披挂了满满一身的图画印刷品，既有政治讽刺漫画，也有教育画，正站在地头叫卖。这种“装订成册的图画”（La Bande Dessinée，缩写为BD），后来就被用来专门指称“法漫”，不过它并非只是法国漫画而是所有法语世界的，真正的“法漫”王国在比利时。

比利时现在有700个职业漫画作者，这是布鲁塞尔漫画博物馆（Comic Art Museum）公布的官方数字，以每平方公里计算，其生存密度在全世界最高。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是，全世界的每三个漫画家里就有一个比利时人，虽然夸张，也见这行在比利时风行。比如前面提到的弗兰克·佩和史奇顿，他们就是同时代人，两人都出生在1956年，70年代

考上的也是布鲁塞尔同一所造型艺术学校——圣·吕克（le Saint Luc），只不过弗兰克·佩在当年因为急于加入一家卡通动画工作室而中途退学，没有毕业。他们入行的七八十年代，直至90年代，是长篇连环漫画的黄金时期，布鲁塞尔漫画艺术博物馆就创办于1989年，当时从市政府拿到的场地是布鲁塞尔乃至老欧洲20世纪初最重要的新艺术风格（Art Nouveau）建筑遗产之一，由新艺术大师维克多·霍塔（Victor Horta）设计建造于1906年，曾是布鲁塞尔最大的布料交易中心。现在的漫画博物馆，兼而收藏展示欧洲著名漫画和新艺术风格的图稿，各个年代的欧洲经典漫画封面，平均每年20万参观者。而布鲁塞尔街头的漫画之路，以25年时间，把这些博物馆里的纸上收藏，正在变成街巷里的视觉收藏和城市的文化遗产。■



1962年12月，达里奥·福和他的夫人拉梅在位于米兰的公寓合影

诺贝尔文学奖史上最响的“屁”

记者 奚牧凉

10月13日，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揭晓前5个小时，意大利戏剧家达里奥·福辞世。他是199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在中国，这一时刻，乌镇戏剧节正准备开幕。今年4月刚刚将达里奥·福的《他有两把左轮手枪和黑白相间的眼睛》搬上舞台的孟京辉，这位最近还在准备给达里奥·福做画展的导演，在记者会上得闻这则噩耗，扑棱一下，就从椅子上惊了起来。虽然有据可查的达里奥·福造访中国的经历，只有1975年的一次私人访问，但在这一猝不及防的消息传来的那一刻，中国的戏剧人，同样陷入了挥之不去的离愁。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达里奥·福享年90岁离世，早有预兆：他已饱受肺病困扰多年，去世前12天就已住进米兰的医院，终于当地时间上午8点呼吸衰竭，撒手人寰。之后，意大利总理马泰奥·伦齐发表悼词：“意大利从此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戏剧、文化和市民生活领域的英雄，他的讽刺喜剧，他的导演艺术、舞台设计，他在多个文化艺术领域的成就将成为意大利人对世界文化的伟大遗产。”10月15日，上千名哀悼者冒雨赶到米兰市中心的米兰大教堂广场，以吟唱政治歌谣的方式，送别达里奥·福最后一程。

“戏剧家”达里奥·福

很多国人结识达里奥·福，还是源自1997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那年的这一颁奖结果，所带来的反响更多是“惊讶”，甚至是“分歧”，场面与今年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十分仿佛。达里奥·福虽然在意大利民众中广受拥戴，却在正统的文学史中罕有一席之地。意大利文坛前辈卡洛·博（Carlo Bo）的质疑就很有代表性：“我一定是太老了，搞不懂了。这算什么？一切都变了，包括文学。”而右翼知识分子马尔塞洛·韦内齐亚尼（Marcello Veneziani）则觉得，给达里奥·福诺贝尔奖，不啻一则“达里奥·福式”的段子。达里奥·福的同胞、

1986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丽塔·列维-蒙塔奇尼则迷惑：“达里奥·福是意大利人吗？”而哲学家安伯托·艾柯的评价，虽然温和，却似乎言明了分歧的本质，他认为诺贝尔文学奖能授予一位“并不属于传统学术世界”的作家，是件好事。

实际上，达里奥·福对于自己获奖的感受，也是“惊讶”。当时正在高速路上驾驶的他，看到旁边一辆车追上来与他并驾齐驱，车窗上贴有巨幅标语牌：“达里奥，你获得诺贝尔奖了！”他才得知喜讯。他后来对媒体说：“选中我这样的人得奖，评委们表现出了勇气。”而他的妻子拉梅则调侃：“我相信，今天有很多的评论家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会心脏病发作。”

荣获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戏剧家虽也不胜枚举，但达里奥·福的戏剧与人生经历，和诺奖前辈奥尼尔、贝克特等人相比，仍然堪称别样。首先需要注意的即是，达里奥·福远不只是一名“剧作家”，“戏剧家”甚至“艺术家”才能真正包罗他的各种成绩。他具有绘画天赋，一度就读于米兰布莱拉美术学院和工学院建筑系，因此他会亲手设计自己演出的服装、布景、海报。他的戏剧生涯除了起步于舞台和娱乐场所，还始于对广播剧、电影的编剧、表演，甚至歌词创作。1962年，达里奥·福还编导了一部名为Canzonissima的电视综艺节目，其火爆程度据拉梅形容，在节目播出时街上的出租车都拉不到乘客（这一节目后因揭露了建筑工人所面对的高危险而遭停播，随之而来的抗议声不仅遍布报纸头条，甚至传入了议会）。

而更为重要的，正如诺贝尔文学奖对达里奥·福的称谓，他还是一名演员。很多戏剧研究者会在论著中指出，达里奥·福继承了中世纪游吟诗人和意大利即兴喜剧的传统。达里奥·福对这些民间表演形式的热爱，来源于他的童年经验。他出生于意大利与瑞士交界的一座贫穷小镇，自言“跟玻璃商、渔夫、走私者的儿子毗邻而居”。当地人唯一的娱乐，就是观看流浪艺人的即兴表演。而达里奥·福的祖父，又正好是一位著名的说故事者；他的父亲，也是一名业余演员，兼社会主义者。1958年，达里奥·福又与流动演员世家出身的名演员布兰塔·拉梅喜结连理，这位贤

妻家中保存有不少古老的台本提纲，日后他们就共同创作、夫唱妇随。所有这些都让达里奥·福从接触戏剧起，就未将自己困于书斋，而是编剧、演员、导演“一赶三”，即便出版了的剧本也绝不“案头”，字里行间已为其被搬上舞台做足了准备。甚至直到今年上半年，这位老人的演员生涯还未终止，他仍在自己的剧场登台演出。

在达里奥·福1969年的代表作《滑稽神秘剧》中，达里奥·福是唯一的演员，他没有舞美依托，只有一只麦克风，而且还要用中世纪的方言演出《圣经》故事借古讽今。但因为一人分饰十余个角色的达里奥·福表演太过出神入化，而且在每场演出中达里奥·福还会融入当下性的内容，根据现场情况灵活增减，因而1983年这部作品在伦敦演出仍然引发热烈轰动，有评论甚至认为现场打出的剧本翻译是在对达里奥·福的表演画蛇添足。

“政治活动家”达里奥·福

在达里奥·福很多著名照片中，他的脸上总是挂着灿烂的甚至小丑般的笑容，他那智慧的幽默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在他20多岁还在做广播剧时，他就“恶搞”过《哈姆雷特》——这位丹麦王子反倒杀了父亲、睡了母亲，而奥菲利亚则是哈姆雷特叔叔的异装癖情妇。这样的离经叛道自然会令当局不悦，果不其然，这部广播剧后被禁播。而当时的当局可能不会想到，40多年后，他们仍然要为达里奥·福的政治讽刺头疼不已——达里奥·福自称，一些政客威胁他不能演出自己2003年的新作《双头畸形》，因为其中写到了时任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接受电击治疗、普京在贝卢斯科尼的别墅被车臣叛军枪杀，以及随后人们将普京的脑子移植入贝卢斯科尼头中等情节。当然，他们更不会想到的是：后来，诺贝尔文学奖对达里奥·福表达了盛赞。

中国观众最熟悉的达里奥·福作品，大概便是《一

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1998年孟京辉导演版译名，赖声川1995年导演版译为《意外死亡（非常意外！）》）和《绝不付账》（1998年赖声川导演版）了。通过这两部代表作，即可领略达里奥·福政治讽刺剧的尖锐机锋。前者取材自1969年于米兰火车站发生的真实爆炸案，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因此被捕，谁料不久后他便在拘留所“坠楼身亡”，警方随即宣称他“畏罪自杀”。达里奥·福的故事由此讲起：一名机智的调查员伪装为“疯子”，自称法官，声称来帮助警察澄清案情，但在“疯子”的装疯卖傻、插科打诨、旁敲侧击下，警察落入了圈套，说出了真相——无政府主义者果然是被警察严刑拷打而死。这部作品虽然首演于1970年，但达里奥·福在获得诺贝尔奖后仍对其心心念念，希望用奖金为冤死的无政府主义者翻案。

对达里奥·福敬仰万分的孟京辉，虽然在他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中对原作做了不少改动，但嬉皮笑脸、挥斥方遒的精神，仍被认为尽得达里奥·福真传，譬如身着囚服的“疯子”饰演者陈建斌，与警察戏仿北京人艺版的话剧经典《茶馆》，当年看来离经叛道，如今则已为观众津津乐道。孟京辉的舞台上，即挂出了巨幅的达里奥·福肖像画；开场前，孟京辉又在黑板上写下“人民万岁，打倒强权”的字样，并一边说着“警察局长，坏蛋”，一边在警察局长的卡通画上画下大大的叉号……

达里奥·福1974年的作品《绝不付账》，又将枪口对准了资本主义，将家庭妇女描写成了“被剥削的无产者”。剧中，因为不满物价不断上涨，辛苦买来的房子质量问题频发，女主角采取了在商场拿光东西而“绝不付账”的方式，反抗奸商图利。这部作品，正是真实写照了现实中，达里奥·福于当时意大利严重的经济危机下所发起的不费钱运动。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与当权者斗争这件事上，达里奥·福的戏剧与他的人生，已经完全融合：他为了深入民众，主动走出剧场，走入工厂、郊区进行演出。他常常在重大时事发生后快速创作剧本，以表达政治看法，如20世纪80年代马岛海战事发后24小时，演员便收到了他新就的手稿；而他这些一蹴而就的剧本，往往情节松散、留有很大的即兴空间，如《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在最初写成后，每天的演出都会根据真实事件的进展而修改，甚至没有结局，最后一幕就是与观众讨论。和他的剧中人一样，达里奥·福自己也屡遭当权者的毒手。1973年11月，他在剧场被警察违法逮捕，激起了全国性的愤慨。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与当权者斗争这件事上，达里奥·福的戏剧与他的人生，已经完全融合：他为了深入民众，主动走出剧场，走入工厂、郊区进行演出。



孟京辉话剧《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舞台剧照

达里奥·福，放了一个屁

所以说来，要想真正了解达里奥·福，这位曾经研究过马列著作，自称为“非官方左派”，甚至在2005年竞选过米兰市长（最终落败）的传奇人物，就不能仅仅研读达里奥·福的文本，而要将他看作一位完整的戏剧家、政治活动家。艾柯所言极是：意大利人已经很难将达里奥·福作为演员的力量，和他作为编剧的力量分置看待。诺贝尔奖肯定达里奥·福的，不仅仅是他纸面上的剧本，更包括他舞台上的戏剧，以及他的戏剧在全社会中所产生的影响。

不少论者，如孟京辉版《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的改编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黄纪苏就曾在采访中指出，达里奥·福作为以批判资本主义为毕生使命的“战士”，却获得了资本主义世界文学的最高奖项，这二者之间的张力尤值得思考。其实早在1975年，达里奥·福就曾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虽然落败，但他仍然认为被提名是件荒诞事：“他们费了大劲让我闭嘴、给我戴上手铐，结果瑞典人玩了这么一出……拿诺奖简直就像我戏里的情节。”

所以，与近年那些大众越来越不熟悉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不同，达里奥·福作为“人民的游吟诗人”，他的作品首先就不应该是文学界独自享用品玩的“经典”，而应该继续留在剧场中，让观众开怀大笑、拍手称快。

那么，就请抛掉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对“文学大师”的哀悼吧！或许还是孟京辉版《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中，那首为达里奥·福而编的“歪诗”《达里奥·福的戏只不过是臭不可闻的屁！》，如今最适合表达我们对达里奥·福的追念：

达里奥·福，放了一个屁，崩到了莫斯科，来到了意大利。

意大利的国王正在看戏，闻到了这个屁，很不满意，找来科学家，研究分析。

这个屁是一股气，在人的肚子里蹿来蹿去，一不小心打开后门，溜了出去。

放屁的人，欢天喜地。闻屁的人，垂头丧气。

有屁不放，憋坏心脏。没屁硬挤，锻炼身体。

屁放得响，能当校长。屁放得臭，能当教授。不响不臭，思想落后！

于佩尔和《她》：一半是共谋，一半是受害者

文 / 驳静

“羞耻心并不足以阻止我们犯罪。”于佩尔在片中这样告诉她的好友，后者刚向她吐露完发现丈夫出轨的秘密。好友不知道的是，出轨对象正是其最要好的朋友。

如果你是妮可·基德曼，接到以《本能》闻名的荷兰导演保罗·范霍文（Paul Verhoeven）的电话，说有这样一个剧本，女主角是一个事业成功的女人，她在家中被蒙面黑衣人强暴后并不报警，发现其真面目又不揭穿，而是居然同施害者继续上演病态的你来我往。在故事结束前，她死了父亲、母亲，还成功地不报警不靠别人，杀掉那个男人并全身而退。希望你来演这个女人，你会怎么回复范霍文？

反正范霍文在美国，一共打出去五六个这样的电话，对方都是妮可·基德曼这个级别的一线资深女演员，得到的答复都是“不，我不能演这个”。与此同时，范霍文的制片人本（Said Ben）为电影找投资之路也遭遇了阻碍，几乎没人愿意投这样一个项目。

美国人大概对这个题材有点怵，担心它会引起众怒，遇到一些不可收拾的麻烦。

时间再回到大概一年前。本给范霍文带去一本法国作家菲利普·狄江（Philippe Djian）的小说《Oh...》，问他想不想拍。范霍文马上就被这个故事吸引，觉得自己从来没拍过这样的片子。正好，他之后在柏林电影节遇到于佩尔，就跟她提了句这部小说的电影改编。《Oh...》出版于2012年，还获得了当年的行际盟友奖（Prix Interallié），狄江本来也是在法国颇为知名的作家。于佩尔当时对这个角色表现出来的热情，让后来遭遇冷淡反馈的范霍文觉得，最开始就应该相信自己的直觉。

但当时，无论是本，还是与范霍文合作多年的编剧，都想把这个法国内核的故事套上美国外衣，毕竟这样更加商业化，而且在美国操作项目也更顺手。

范霍文意识到此路不通后，才想到，不如再到法国去试一试。结果，不只于佩尔一口答应，法国人的语境里，没有人觉得这种所谓的禁忌有什么大不了的。兜了一大圈，却原来最初的直觉最正确。所以到最后，

这部法语小说还是回到法国演员法国投资人手里。这件事既丧气，又有点鼓舞士气，快80岁的范霍文，为了能在不太爱讲英文的法国团队里顺利指导，不得不又学了点法语。

2016年，这部以《她》为名的影片获得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影片提名，还将代表法国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虽然在2015年阿根廷导演加斯帕·诺（Gaspar Noé）那部著名的3D情色片《爱恋》，以及其中全裸出镜的导演兼演员面前，《她》的尺度小到几乎无法成为可以证明法国电影人“百无禁忌”的例子。但同它在美国的遭遇一比，《她》中的某些片段又被划了重点，再加上“禁忌总会吸引更多观众”，这部电影自范霍文和于佩尔两人名字以下，又收获了一个人们爱听的幕后传奇故事，其中有固有的成见，有冲突束缚，有后来的成功，使得《她》不可避免地全球风行开来。即便是没能在院线上映的中国，讨论的声音也此起彼伏。

并不是“强奸喜剧”

《她》一开场，就是一幕黄色和暴力的性侵犯，像志怪小说，套路十足地用这两样元素吸引你。挣扎后的身体，略微暴露在观众面前，一部分人完全没想起来于佩尔已经63岁，另一部分人则暗暗心惊，“60多岁的佩姨还敢露出胸部，而且还这么好看”。

无论怎样，第一场戏给我的感觉是“惊悚”，这也是大部分人的第一感受。但很快，第一印象就被颠覆。这位性侵受害者打扫了现场，清理了自己后，好整以暇地开始点寿司外卖，并在随后到来的儿子面前只字不提。

在戛纳首映时，电影院里的笑声从点寿司开始，几乎每隔10分钟就会响起一次。所以戛纳后的影评中，就已经出现不少“强奸喜剧”（rape comedy）的字眼，企图将其归类。

对范霍文的电影进行归类不免有点愚蠢，无论是将《她》归类为喜剧抑或是惊悚，还是将他10年前的《黑皮书》归类为战争片，都有异曲同工之无知。所以大部分人后来又开始不认可这种说法。但他们并不是出



电影《她》剧照



荷兰导演保罗·范霍文

于对“喜剧”一词的抵触，毕竟还是有许多黑色幽默的戏叫人会心大笑，而是因为对第一个词不认同。

范霍文当然懂得如何吸引观众，但正如他所说，这或许是一部有强奸元素的电影，但更是一部关于生活本身的电影。而这些吸引注意力的元素，桑塔格早就说过，这仅仅是为了取乐。让观众取乐。

所以电影的成功简直不在话下，不过随之而来就是一些质疑，或者伪装成关心的质疑，“接受一个强奸犯”这样的设定，大约原本就是剧本最初在美国受阻的原因。可以想象，这类政治不正确，会冒犯到许多人，除了许多此类案件的受害者，其中还有一大类，是女性主义者。

至少在中国观众眼里，片中的迈克尔是一个十足的“女权主义者”，在叫好声中，有诸多“女权主义胜利”的评论。但单是“女权”二字，在许多真正先进的女性主义者眼里，就可以把使用这个字眼的人贴上狭隘的标签，或者说，他们对“feminism”的理解，还停

留在最懵懂的阶段。

女性主义者抵触《她》的原因，莫过于迈克尔不只没有报警，甚至主动勾引对方，接受他，意味着对暴力的妥协。更进一步，是女性对男性的妥协，这是女性主义者最不愿意看到的。片中的迈克尔最开始的确是一个受害者，但她拒绝这个角色，她与施暴者的共处，内在的原因，正是最值得人探讨的情节。是出于身体或精神的需求，还是因为“反正你也跑不了”的绝对自信，好比猫儿抓到老鼠后，先玩弄它一阵，这一点实在让人好奇。

但无论这称不称得上是妥协的一种，女性主义都无法成为你去批评另一个女人不同立场的武器。在这一点上，也许正如波伏娃所说，迈克尔跟所有人一样，一半是共谋，一半是受害者。这在迈克尔与邻居于地下室发生的一幕里，体现得特别明显。

片中，迈克尔周围是这样一些男人，杀人犯父亲、天真懦弱的前夫、幼稚的儿子、公司里对她不服气的男下属，当然，还有那个面目从模糊到真切的施暴者。女强男弱是事实，每个男人的弱点在迈克尔背后幽幽发光。

迈克尔自己，则强大到叫人害怕。其中一幕，讲她终于决定去监狱探望30年没见的父亲，到后却被告知他自杀了。她去看尸体，只见她俯身凑近，让人以为这是要给她父亲最后一个道别之吻时，她说了整部电影最荡气回肠的一句话：我到来的消息就杀死了你（Je t'ai tué en venant）。

这句话的法语，统共才5个单词，于佩尔平淡地吐出，却凭空让人嗅到一丝“闻风丧胆”的气息，以至于我无法找到在气势上与之匹敌的翻译。她说得很少，却表现得很多。于佩尔的表演令人痴迷之处，就是这种平淡之下的暗流涌动。

许多导演都会夸赞自己新片里的主演演技如何精湛，但范霍文夸于佩尔的方式不太一样。他说他和于佩尔说戏的时间，统共才半个小时，可能还再加上些零碎的化妆间闲谈。“我说得越少，从她那里得到的越多。”想象一个自行入戏的女主角，几乎不需要干涉，即便是她对台词有改动的时候，范霍文说，“我对她的信心甚至超过我对自己的导演信心。”

她几乎出现在该片的每一场戏中。即便是范霍文，也承认这是他拍的电影当中，最主角导向的一部。所以，不论从什么角度，于佩尔都成就了这部电影。

所以有人说，如果不是于佩尔镇场，这部电影讲的故事其实有点狗血，特别是在男女关系这个层面。有趣的是，这种无稽的假设在于佩尔出演的电影中常

常成立，哈内克（Michael Haneke）曾一再强调，如果没有于佩尔，他的《钢琴教师》（*La pianiste*）连拍都不会去拍。

她认出了风暴

一面是好莱坞电影人的瞻前顾后，一面是于佩尔的干脆利落，至少，在选择剧本这件事上，即便是年轻缺乏经验时候的于佩尔，也总给人二话不说的果决印象。

若干年前，夏布洛尔为他的新片联系于佩尔，告诉她说他正在拍一部新片，里头有一个令人害怕的人物，“我需要有人来扮演这个变态的角色，你有兴趣吗？”于佩尔在电话那头一口答应。

这部片子就是1978年的《维奥莱特·诺齐埃尔》（*Violette Nozière*），讲这位与电影同名的少女如何毒死父亲的故事。于佩尔那一年才25岁，并凭借这位新浪潮大师之手，拿到了她的第一个戛纳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夏布洛尔是希区柯克风格的践行者，惊悚之外，还有一层黏稠的阴暗。在随后的岁月里，于佩尔与他合作的电影多达7部，大部分都是扭曲、反传统的角色。

但于佩尔的成名还要更早，在1974年贝利叶（Bertrand Blier）的《远行他方》（*Les Valseuses*）中，她出演了一个年轻的姑娘，这部在法国受到欢迎的电影，也让于佩尔成为一个有名的女演员，然而媒体倒很少用“一举成为大众情人”这类陈词滥调去描述彼时的盛况。无形中，于佩尔的角色选择，总是偏离某些正常的美人轨道。

诺齐埃尔这个角色之后，这类“阴暗扭曲”的角色越来越多，诸如《业余爱好者》（*Amateur*）中的性瘾修女，《亡情朱古力》（*Merci pour le chocolat*）中缓慢杀死丈夫的妻子，于佩尔似乎掉入一个风暴之眼，里面席卷了许多相似的堕落灵魂。

“Isabelle”在法国是一个很常见的名字，用法语念起来抑扬顿挫，暗含一股妩媚。而且词尾的“belle”又是美丽的意思，所以一直以来都很受新生父母的欢迎。由于都叫这个名字，又是同时代的女演员，于佩尔和比她小三岁的阿佳妮被各类媒体无数次比较过，从20多岁作为年轻女演员开始，几十年不曾消停。甚至2012年，两人都在戏剧舞台上出现，于佩尔的《美狄亚》（*Médée*）、阿佳妮的《茶花女》，法国媒体又开始倒腾这二位几十年的同台历史，至少，在法国这个

电影创作力丰盛的舞台上，可比之处实在太多。

男人们自然偏爱阿佳妮，他们总是乐滋滋地写她如何“像瓷器般脆弱”，恨不得裹在自己的风衣里保护好，又毫无抵抗力地失陷于她身上那种“稍纵即逝的光晕”里，看到了不免无意识地伸手去抓，一如盖茨比站在那盏朦胧的绿灯前。而于佩尔个子娇小，顶多是一个还算可爱的邻家妹妹，而且可能都不是最讨人喜欢的那一个。

她1955年出生在巴黎16区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她有一个从商的父亲、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以及一个几乎没有透露给外界任何信息的母亲。如果她在巴黎乘地铁，走进任何一节车厢，都能看到长得比她出众的姑娘，更别说阿佳妮还有诸如玛戈王后这样美艳得叫人不知所措的角色。所以两位伊莎贝尔，一个大概能被评为最漂亮的法国女明星，另一位，大概可以封上“雀斑最多”。

不过很明显的是，于佩尔的舞台要更国际化。更何况，40年来出演的电影已经超过100部，即便50岁后的十几年来，依然保持平均每年两部的频率。她自己说：“与一个面包师的烘焙一样，我演戏，也是出于一种无法抵制的欲望。”仅从创作力上，阿佳妮鼎盛期过去后，拍电影的数量骤减。

缺乏那种张扬的美，脸色平淡却情绪十足的表演，让于佩尔成为许多男导演的最爱。他们在拍于佩尔的时候，就很喜欢让镜头长时间地停留在她波澜不惊的脸上，因为他们相信，这样一来，她的情绪就能感染到观众，一场戏就成了。

哈内克在《钢琴教师》中就发现了这个“便利”，其中有一幕令人印象深刻。男学生在面试时弹奏着一曲舒伯特，于佩尔扮演的艾瑞卡似乎听出了其中的勾引成分，镜头就长时间地凝固在她脸上，一动不动地听着舒伯特。感知到这种诱惑后，感动和愤怒两种情绪前后脚出现在她脸上，这种内在层次的转换看得人心惊胆战，让人以为这不是一场钢琴学校的面试，而是一个生死战场。

另一场，发生在浴室。艾瑞卡坐在浴缸边沿上，撩起裙子，开始割入大腿。这是非常不忍心看下去的一幕，而于佩尔一面忍受，一面享受。完后又若无其事地下楼与她母亲晚餐去了。

所以《她》中的米歇尔算不上于佩尔演过的让常人无法理解的角色，稍看几部她的电影，就很容易认可小说原作者狄江说的，“那么多伟大的美国女演员拒绝出演这一角色，真是件奇怪的事”。☑

那个叫柯川的爵士萨克斯手

文 / 黑麦

柯川诞生于90年前。没有人想到在北卡罗来纳出生的这个黑人男孩会组建一支伟大的爵士乐队，更不会有人想到他对世界音乐将会带来怎样的改变。

当你听到一首名叫“My One and Only Love”的曲子的时候，你会意识到自己已经走进了一家咖啡馆。这首轻柔的曲子诞生于1952年，曾经被众多爵士和流行艺术家演绎，其中最著名的一版便是由次中音萨克斯演奏家约翰·柯川（John Coltrane）和具有撩人声线的强尼·哈特曼（Johnny Hartman）共同录制的。如果你所认识的柯川只是一位咖啡馆爵士乐手，那你确实失掉了关于爵士的最好谈资。

他是仅次于迈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的最富有的爵士乐手，然而在40岁时因劳累而死于肝癌。他的死终结了一种演奏风格，或者说，他在后期尝试的那种拆解曲子结构，似乎是在探索某种声音的本质，他研读宗教、宇宙观与神秘主义，使音乐变得如同一场神圣的仪式崇拜。

90年前的，柯川出生在美国北卡罗来纳，父亲在去世前曾经教过他几样简单的乐器。1943年，柯川和母亲来到费城，并得到了一只萨克斯管，自此，柯川开始在社区与乐队演奏大号和黑管。两年后，他的“鸡尾酒三重奏”迎来了一场演出。柯川在“二战”后期入伍，入伍那天，美国刚在日本投下了一颗原子弹，之后他随着部队来到珍珠港，在夏威夷的军事基地内，军官们发现了他的音乐特长，不久他便开始与小号手威廉·梅西（William Massey）等士兵一道演奏传统和比波普爵士（Bebop）。

60年代的《DownBeat》爵士杂志曾透露，柯川在1945年时看过一场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的现场表演，于是被他的演奏所触动，由此帕克成为柯川最早的音乐偶像，二人曾在数年后同台表演。1946年，柯川回到费城，与金·科拉科斯（King Kolax）和吉米·希斯（Jimmy Heath）辗转于美国巡演，在恶补了两年乐理后，开始转向演奏次中音萨克斯，此时的柯川已经成为著名的吉莱斯皮（Dizzy Gillespie）大乐队成员，那是吉莱斯皮成立联合国

爵士乐队前最鼎盛的一段时间，在柯川的参与下，他完成了《咸花生》《肖，不用多说了》《最佳状态》和《温室》等专辑和巡演。几乎在同一时期，柯川还出现在了罗威尔·福尔森（Lowell Fulson）的节奏蓝调乐团演出名单中，乐团当时的钢琴手是后来著名的灵歌先锋雷·查尔斯（Ray Charles），然而此时的柯川已经不满足于表演那些所谓的“现代派”，直到斯坦利·图伦丁（Stanley Turrentine）接替了自己的位置。

几乎所有人都是在1955年开始了解柯川的，在新港爵士音乐节（New Port Jazz Festival）上令人惊喜的“戴维斯五重奏”用全新的音乐表演征服了观众和当时的音乐记者，柯川、瑞德·葛兰（Red Garland）、保罗·钱伯斯（Paul Chambers）、菲利·乔伊·琼斯（Philly Joe Jones）这些人都在日后成为美国爵士乐坛必不可少的角色。小号手迈尔斯·戴维斯是（Miles Davis）“黑暗王子”，他在50年代开创了酷派（Cool School）冷调，又是60年代末期融合（Fusion）流派的先锋人物，他也曾受到波普（Bop）大师查理·帕克的恩惠和指点，由此从纽约52街的酒吧表演跨入大乐团之流。

在与戴维斯合作时期，柯川已经在录音室中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表演风格，他的萨克斯音色粗犷、尖锐、厚重，与戴维斯的小号时而形成鲜明的对比，时而遥相呼应。许多萨克斯手演奏时在高音区会音色变得淡薄，低音区时又会不清晰和不够敏捷。而柯川的音色在任何音区都始终散发着爆满的声音与穿透力，人们认为他的演奏充满严肃和紧迫，缺乏温情与幽默的一面，他或许是最具一贯性和演奏激烈的孤独表演者。或许是时代的变化与音乐的修行使柯川发现，他自己正在试图用萨克斯与人嗓音最为相近的声音接触上帝。

专辑《午夜》（*Round About Midnight*）以及《迈尔斯与柯川》（*Miles&Coltrane*）都被认为是那一时期的经典之作，然而在1958年发行《迈尔斯与柯川》之后，二人音乐理念似乎开始出现了某种摩擦与不适，特别是在阿德雷（Cannonball Adderley）替代了葛兰之后，新的六重奏制造出一种新的不平衡感。尽管如此，这支横扫一切的乐队编制还是在1959年时创造出爵士史上最伟大的一张唱片《Kind of Blue》，



次中音萨克斯演奏家约翰·柯川

在最具代表性曲目《So What》里，听者发现次中音萨克斯与小号精彩绝伦的即兴演奏。在戴维斯的乐队中，比尔·埃文斯（Bill Evans）同样在50年代后期的纽约爵士乐界造成巨大的影响，这位白人钢琴手自省而精致的独奏与当时风行的“硬波普”风格大相径庭。事实上，他与柯川和阿德雷等人共同合作完成了戴维斯音乐向调式即兴的转变（Modal Jazz），从调式即兴的观念出现后，和弦与个人技巧已经不再是乐队中的核心，而乐手间合作的默契、整个曲子气氛的营造和乐手彼此激发出的即兴演奏火花，逐渐成为音乐重点。

柯川逐渐成为主角，当他逐渐成为爵士乐教父的时候，戴维斯开始沉寂。他不可能和柯川一样以自由爵士的旗号改变自己的形象，他要自己创造一种流行，或许有和摇滚巨星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交往的关系，或许是因为电声乐器的盛行，都为迈尔斯·戴维斯改变乐风提供了一种依据。事实上，60年代的爵士乐早已被摇滚乐赶出了中心舞台。

英国爵士音乐人艾伦·霍尔兹沃思（Allan Holdsworth）出生于40年代，在提到柯川对自己的影响时，他说道：“我喜爱阿德雷，我听他时我可以知道他的音乐出处，但当我听柯川时，我听不出和其他事物任何的联系。柯川的演奏像是一个重要的启示，他仿佛在同样的材料上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即兴和演奏。这一点绝对性地改变了我，我找到了新的在和弦序列中即兴的方法，不再是任何的比波普或是已知来源的任何东西，这成了我的一种始终的探索 and 追求。”

50年代中期后，柯川与索尼·罗林斯（Sonny Rollins）成为纽约最抢手的硬波普风格次中音萨克斯演奏家。1957年他出现在21张重要的唱片录音中，与蒙克（Thelonious Monk）一起进行了短暂而富有成果的合作。同年他回到费城，戒掉了海洛因毒瘾，开始拓展其个人风格并组建其经典的四重奏演奏形式。在为Prestige公司录制了几张专辑以后，柯川转签亚特兰大唱片公司，录下了《大脚印》（Giant



电影《爵士风情》剧照。演员丹泽尔·华盛顿（左）与韦斯利·史奈普斯分别扮演了柯川与戴维斯

Step) 专辑。这张专辑似乎提出了一个问题：硬波普该如何发展？或许柯川知道答案在哪儿。在完成与戴维斯等人的第二轮合作以后，他开始用自己全新的四重奏为这种爵士音乐找答案。

1965年，已迁居至洛杉矶的乔治·布莱许（George Braith）应弗雷迪·哈伯德（Freddie Hubbard）之邀前往旧金山在一家俱乐部演出，在当地他遇到了柯川，两位年龄相差十几岁的音乐家开始了一段惺惺相惜却鲜为人知的音乐故事。两人经常一起演奏，谈论管乐如何重奏的书籍，然而这一切都在柯川的最后一张专辑问世后草草收场。柯川的遗孀爱丽丝曾经告诉布莱许，柯川托梦给她，说自己会在每个星期二的下午15点拜访布莱许，自此，这个时间便成为布莱许从不更改的音乐时间，以表达对柯川的怀念。直到多年后罗林斯找到他，进行长期的音乐合作。

柯川曾提到过，《最高之爱》（*A Love Supreme*）就是一张关于精神觉醒的专辑，这张唱片的灵感源自宗教、冥思和寂静，这也是他第一次将自己的主张完全注入到音乐之中。唱片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为第一部分“认知”（Acknowledgement），气氛暗淡孤寂，钢琴声四处游走，合着重复着单调音节的柯川的吹奏加上不规则的鼓点，给人以恍如隔世的异样感受。曲中还插入了人声，这里的人声并非歌声，而是单纯的念白声。第二部分“决意”（Resolution）与第三部分“追求，赞美”（Pursuance/Psalm），前后呼应，力图烘托一个宗教主题。在这里，人们可以欣赏到每

个乐手精彩的独奏。于是，《最高之爱》也成为这支经典四重奏乐队留给我们的最后一张专辑。

1967年柯川的去世使得先锋爵士失去了一位精神领袖。70年代融合爵士商业性的成功使得他的光芒有些黯淡，80年代传统爵士的复兴又使得柯川硬波普时期的作品大受关注。尽管柯川一再强调年轻的萨克斯手们不要学他，但是他死后其风格反而成了一种主流。从麦克·布雷克（Michael Brecker）的伯克利学校音乐风格到欧洲的杨葛柏瑞克（Jan Garbarek），甚至像安迪·谢波德（Andy Sheppard）这样的新秀要建立自己的观众群都找不到其他更好的演奏方式。

直至今日，仍旧有很多电影在怀念柯川。肯·伯恩斯的《爵士百年》便记录下了柯川曾试图用音乐拯救扭曲的世界的多个瞬间，在斯派克·李的《爵士风情》（*Mo' Better Blues*）中，演员丹泽尔·华盛顿（Denzel Washington）与韦斯利·史奈普斯（Wesley Snipes）分别扮演了柯川与戴维斯，以传记野史的方式刻画了当年爵士音乐的感性与丰富。

柯川死后，一个名为金（Franzo Wayne King）的乐迷在旧金山建造了一个以柯川的名字命名的教堂，可见后人对他及他的音乐如神一般的敬拜。这个著名的教堂出现在1968年，最初是个爵士乐俱乐部，名叫“鸟亭”（Yardbird Temple），名字来源于查理一帕克的昵称。柯川死后，爱丽丝在洛杉矶组建了新吠檀多教义中心（Vedanta Center），宣扬古印度教一个分支混意西方近代哲学后的教派，并不时将古伊斯兰教与佛教的审思引入其中，其修炼过程多数通过音乐传达。由于人们对其行为的误解，以为她为柯川建立了教堂。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这里都作为美国黑人孤立时期最重要的聚会地点，而这家教堂也用一种人文之声抵抗着压迫，并且明示着某种自觉。2016年2月，该教堂接到命令要清空场地，此后，柯川的乐迷与朝圣者纷纷来到先锋村（Village Vanguard）、蓝色音符（Blue Note）等音乐现场，找寻柯川曾经的足迹。人们总会回忆起《OM》这张专辑，它是对一个或多个时代的闪回式描写，情绪对立、多元，充满矛盾色彩，或许是描写了内心的某种挣扎。在录音室中，柯川极力模拟人声的腔调，悲喜，或不悲不喜，富有张力的编曲、和声，更是一种乐理的尝试，这样的演奏如卢·里德（Lou Reed）的《柏林》前奏，也如同崔健在《红旗下的蛋》结尾的自由即兴。☑

（参考文章：Allan Holdsworth: One Man of Trane. 中文翻译 Bassman；《滚石：500张历代最强专辑》；《爵士乐简史》。实习生糊糊对本文亦有贡献）



一万个生活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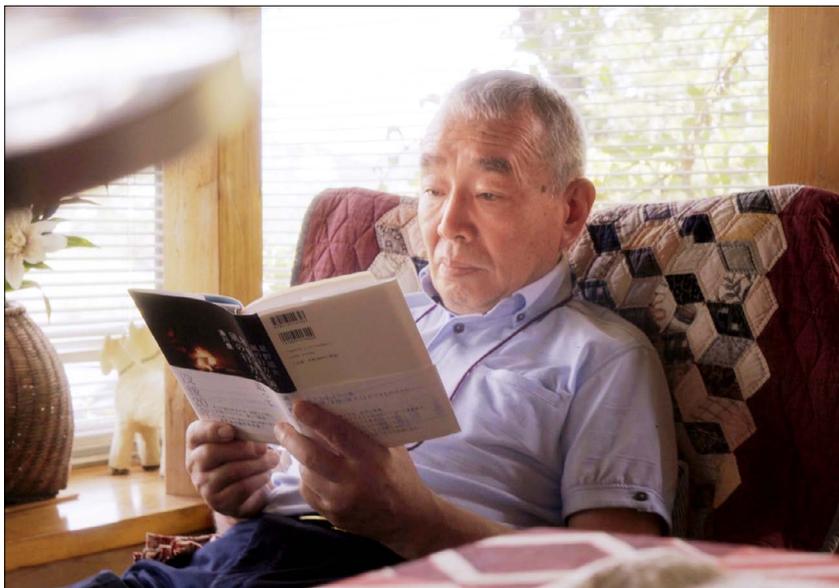
有营养，有态度





(Yuna 攝)

三浦勇是桦细工（樱树皮）里极少数擅长山水花鸟和几何雕刻的工匠之一，生于秋田县角馆市，一辈子在此地工作



(赵夫志 摄)

盐野米松用《留住手艺》的版税，在家乡河畔盖了一座朴素的小木屋

跟随盐野米松寻访日本手艺

文 / 葛维樱

“曾经主张工业立国的日本，在今天仍保存着许多手艺。”我以前怀疑这种乡愁式的描写有情感上的渲染。一路火车上看到的景色群山环抱，田野郁郁，不见高楼大厦，只有乡间木质的简朴住宅。写作“手艺”成名，盐野米松为自己和妻子在老家修建了一栋木质的乡间屋。

从东京到角馆的新干线下车，他已经在火车站口等待我。一起前往镇中心地带，沿主城区坡路一路往上走，两边茂盛的高大绿荫不是樱花就是枫树，可以想见春秋街景的“小京都”。和我们一起从东京前来的，大多是夏季旅行的老年人。在桧木内川河边，盐野指着对岸说，老家早已拆除。盐野在获得一笔版税后回到了故乡。“小时候就是沿着河骑自行车去上学”，说这话时四个孩子踩着自行车大笑着飞驰而过。门口橙色信箱上写着“盐野”，进门就看到一张写作的大书桌，窗下种植着紫色的鸢尾、粉色天竺葵，窗外仿佛一幅能动的风景画，我们来时正赶上香鱼的季节，蔚蓝天空下群山在望，渔夫站在溪流中央，甩出了长长的抛物线。

传统与现代的“两级公式”

手艺是一个中文词，日文里是“手业”。“日语里还有一个同音词，是‘手伎’，指的是一项工作。我选择‘业’，实际上说的是手艺背后还要养活家人，是一种人生观。



一条清澈的河流将角馆分为两个部分，河东是古建筑群落，河西是现代百姓民宅

用手来实现的 Lifestyle。”从上世纪 70 年代至今，盐野米松写作出版了关于日本手工艺的一系列书籍。他的小说、童话，多次入围芥川奖、直木奖，但影响力却不能与这本小册子一样的《留住手工艺》抗衡。自从柳宗悦提出民艺概念以来，盐野米松是第一个把许多手艺人集中起来长期进行几代人跟踪采访的实际操作者。

我们曾经做过《传家宝》一期杂志，去全国探访那些尚存于世的手工艺大师，然而遗憾的是，那些古老的技法造价高昂，已经不是普通人可以企及和使用的。还有一些没有进入上层通道的只能苟延残喘，眼看就要被商品大潮淹没。如果用“一件物品能不能使

人温暖”的手工艺标准，感觉离我们的现实很遥远。社会进步势必使新旧交替，然而那样以“手工艺”珍重待人的“真诚”，却是我们最不希望失去的。日本的手工艺呢？在日本现代化过程中，手工业起到了特殊的作用，成为“传统与现代”两面性命题的一个最好的现实注解。

今年春天，盐野米松为了接受采访坐了 4 个小时火车来东京，和我在一个地下吃茶室畅谈许久。我萌生了去他的老家角馆的想法。“那是一个 400 年没有变过的地方。”我一直好奇什么样的山水，会让这位作家生长出如此牢固的对手艺的信仰。在自己的著



作里，盐野米松这样描述自己的家乡：“不用看日历，便可以从匠工手里的活计感受到季节和时代的变迁。”

“你闻闻这棵树的身上还留着水的味道，很清新。”三浦抽出一把烧红的烙铁搁在一边，等一会儿突然就按在了山樱树皮上，白烟过后一阵清香，树皮呈现出颜色变化，开始由黑棕色往红色变，树皮一年里只有很短的季节能够剥取。“水分越多说明皮越好，这棵树可能是那一片长势最好的一棵。”桦细工的剥树皮只取少量，让树在冬天修养，春天就又长出光滑的新皮。我问他，烙铁多高温度，三浦想也没想，就把烙铁极快地贴在自己脸上：“你要是非问我，现在有

79摄氏度多，哈哈哈。”盐野笑我是“数字思维”。三浦同时往烙铁上洒上一滴水，看看水滴的大小和蒸发程度，就能判断怎么用了。“工匠是不用温度计的，所有的标准就靠嘴巴、手、眼睛就够了。看看今天的气候，看看今天的树皮，揉几次啊、温度多高啊，这身体马上就判断出来了。所谓修业，就是培养这样的一个身体。”

“我从小在自家窗户里往外看，有时候要块端木，有时痴迷风箱。”这就是盐野米松的童年生活。他厌烦所有对于乡村和手工艺的盛赞。在他的文字里，没有贵族式文明对野蛮再发现的大惊小怪，也没有高屋建瓴的冷冰冰的研究。他选择的视角是什么呢？现在，“各种工具声音没有了，他们的作坊没有了，隔窗观望他们的孩子也没有了”。盐野在采访中一直跟我强调，他想找到自己人生的原点，我后来想，应该就是那个怀着一颗憧憬和向往的心灵，观望匠工们做活的孩子吧。

对于手工艺，盐野选择了一个记录者的角色。无论历史沿革的追溯，还是某一技艺的传承，他所记录的都是“这一个现场”。盐野和我聊过很多日本社会在近50年里的思潮变化，但唯独对于手工艺，他是要亲自带我去“现场”的。读者喜欢他的记录，是因为那里面有社会学“田野”的客观性，仿佛一段拷贝一样，从家长里短到人物性格无所不包。

“我遇到的很多工匠都有一张漂亮温柔的脸，但年轻时一定不是这样慈祥的人。精神和固执，骨子里的输不起，懊恼、野心和坚韧，甚至连数字也写在脸上。恶魔和夜叉经过了岁月洗礼发生了转变。”对于自己采访过的手艺人，盐野米松从来都不做美化和渲染。明治维新以后，个人主义、世界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潮逐渐在日本民间流传。夏目漱石曾说，卖豆腐的人边走边卖，想的并不是国家，而是为了自己的一日三餐。这正是盐野米松所要表达的手艺，与其他作者不同之处。

作为近邻和东亚文化中有影响的国家，日本的传统手工艺有其特殊性。尤其战后日本工业振兴的岁月里，民艺曾经起到重要的作用。柳宗悦也对现代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民艺和人，成为一个质量关系，美的物品必然造就美的生活培养美的情操，这也是日本经济崛起中著名的传统与现代的两级公式。在此基础上，盐野米松打开的是新的视野。在堪称保留文化遗存最好的日本，手工业和经济循环仍然在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逐渐失去市场和传承的情况，并不只是中国独

有的，日本的手工艺很多来源于中国，很多相通的东西也存在至今。

“大概我是最近才明白它的好。看了很多东西以后，我突然再打开抽屉，才感到这里面包含了很多人生意义。我在这些东西里，看到的也不是手艺人的人生意义，而是我自己的人生意义。”盐野太太给我们泡上了香浓的伯爵奶茶。桌子后面的墙上，钉着盐野刚刚捡到的黑底白点的羽毛，塑料袋上写着时间地点。屋里上供的地方插着自己家的鲜花，窗户底下是他喝茶的一小套茶具，布上分别放了三个不同型号的细巧的小钳子、小凿子。桌后的边柜里全是他收集来的小玩意，动物牙齿、大小贝壳、日本造的嗅盐瓶子、漂亮的羽毛、植物标本，非要说华丽的，就是一个苏联制造的金属放大镜和一个西德制造的望远镜。“工业化生产把素材进行一样的加工，手艺人却要让物品看上去有性格。”有性格往往被处理掉，盐野觉得这观念已经用在了人身上。

循环：使用者与制造者

角馆最主要的这一条大路，自古以来以上下为分。古城呈狭长形，傍水而上，一直到山顶就是城主的城堡。早上起了个大早上城，从上往下看，可见左手黑褐色桧木皮的町屋，是贵族和武士们的家宅。元和六年（1620），角馆在芦名家手下开始发展，到佐竹家进入时，这位天皇的近亲公家，尽管因为拥护丰臣秀吉遭到了打压，关原之战后，佐竹家被赶到了偏僻的这个东北小城，然而佐竹家世代公卿，是天皇家的分支，从京都带来了许多极高造诣的艺术家，衣文道、歌道、诗道的家元们跟着贵族迁往这个得天独厚的小城，并在此精益求精的发展了数百年，一时成为手工艺贸易中心。

偏远的东北地区，从这时起才有了京都贵族华丽300年以上年龄，在整个东北地区堪称独一无二。武士们带来了京都繁华生活的经济基础，周围大量手艺人也开始应武士们提高的生活标准应运而生。“制作人和使用人生活在一个环境下，没有丝毫的虚伪。”这是角馆手工业能够保留下来的关键。

武家屋敷是一条以贵族和武士家建筑相邻而居的大道。今天仍在使用，很多人家接受了现代化的改造，可以舒适地居住了，更多被指定为史迹和物质文化遗产。

上面越接近古城山，也就是城主佐竹家所在地的

坡道上，是武士的世界。下半部分则是手艺人和小商铺所在地，繁华热闹，是庶民的世界。至今这街道仍是如此。盐野记得小时候街上有从事各种职业的人，有炼铁匠、染衣匠、伐木和烧炭师。这些跟随武士而来，为武家服务的手艺人世家，使角馆在近百年里一直是日本东北手工业的集散地。武家的生活方式被事无巨细地保存下来，尤其以文献书籍居多。我们并不能随便走入一家。“武士家的正门一直关着，只有来了重要客人才能打开。”盐野说，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一样，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发展以后，古迹的保存也越来越难。实际上现在武士的屋子大部分还有人居住。江户时代武士阶层没落，庶民阶层壮大。明治维新后，一些下层武士开始向手艺人行列里移动，东京和京都的世家们还在固守身份和面子，而天高皇帝远的角馆，却开始新一轮的知识分子进入手工艺行业的大潮。

在“桦细工”这样的日本传统工艺里，把树皮用鲨鱼皮、树叶等其他天然的“砂纸”，磨成金灿灿的效果，在看似斑驳实际光滑的表面上，创作自己的图案，是贵族生活习惯的延续，也是武士审美对手工艺影响的证据。以山樱树皮为主要材料的桦细工，是由佐竹家武士发明而来，200多年里这种手艺只用于武士阶层，奖励给武士打胜仗的奖品，阶层之间相互馈赠的礼品，比如烟草盒、药盒、放画轴的卷筒、茶盒，几百年前的技艺已经成熟。早年间没有工作的武士进入山林，把磨树皮的技艺变成了文人雅士的工艺装饰。几百年里角馆文风盛行，出了不少文人、教育家，直到现在，角馆知事仍然是贵族家的后人担任。今天盐野带我们寻找桦细工三浦的时候，300年前的老物件，和今天新做的东西放在一起，并不专门以年代区分。“匠人的用心，在最好的作品底部才会刻上名字。”日本传统工艺大展依然每年继续，目前这样竞争和展示的平台依然活跃。像三浦这样的师傅已经连续获奖，下一步可能就是人间国宝。桦细工里现在存世的人间国宝是盐野米松的高中同学，100多年前天皇大婚的用具就由他家生产，直到现在依然是皇家专用。

武士道和商人之道，在日本精神里本来分道扬镳。但角馆的氛围更加轻松，商业和手工业因为独有的特点在这里形成了贸易中心，下层武士没有拘于面子成为浪人，而是流向了手艺人的阶层。“武士们把‘桦细工’作为副业，增加收入，导致手工业的作品带入知识分子式的审美，不断精益求精。”

留意到手艺本身的力量，在柳宗悦那一代民艺运动的倡导者看来是一种文化上的指标。柳宗悦的理

论阵地《民艺》杂志的创刊号就是“桦细工”，这是只属于角馆的手艺。贵族、文人、宗教题材的艺术是正史所关心的，而盐野米松关心的除了桦细工，绝大多数是传统自然经济、农耕社会的产物。操之过急是违反自然的。尽管令日本自豪的工业化现代化仅用二三十年就达到了西方一两百年达到的高度，然而从公家、武家身上传达的风流文雅，却开始在知识分子身上发生作用。早在百年以前三宅雪岭就开始抨击以“鹿鸣馆”为首的欧化政策，担心日本因为善于极致的模仿，而举国成为欧美的劣等翻版。

在角馆，从武士的世界，到商人的世界，尽管居所是完全分开，生活方式却由这些手工艺物件紧密联系起来。“生活是由制造者和使用者来共同完成。”角馆的武士房顶，尽管是用了300年以上的建筑，实际上大部分是周围就近取材。贵族是用杉木板的屋顶。必须是天然杉木，因为种出来的树不够结实，下层武士用草来做房顶。这样修理和保持都为了方便，房顶表面处理好比较防水。角馆周围的天然森林一直被常年保护，正是为了便于取材。每20年屋顶和木结构就要大修，至今仍有专职维修武士房屋的组织，从树木到工艺都受到保护。

“什么是日本人的特质？”是盐野米松在旅行中给自己提出的命题。不仅仅是手艺。“尊武贱商”在明治时期大行其道，急速推动的开化，想以不到一半的时间迎头赶上欧美，夏日漱石把这归结为表面的开化，只会让日本人变得更神经衰弱。不过这样的浪潮，在角馆却能看到意外的缓和景象。因为远离权力核心，在漫长岁月里，生活艰难的角馆的武士能够放下包袱，主动向手艺人靠拢，也保证了其生活方式没有太大改变和衰退。武士家的房子里我们没有见到一寸水泥、钢筋，除了电灯设备，取水还是在井里打，地下管网完全没有进入。“劣等翻版”在角馆完全失去了土壤，难怪这里的人保持着一种对传统的自豪。

无形的筛子

在武士松本家，用槭树条编织篮筐的菅原女士，和她的徒弟相对促膝而坐，彼此并不闲谈或查看，现场的摆放并不因为游客来餐馆而有什么布置。身后是一扇可以直接照到手的窗户。炎热和蝉鸣不会使她分一点点神。也没有可以乘凉的风扇。“秋田是个冬季雪很多的地方，不适合竹子的生长。这里的人们就用柔软的木槭树和野漆树来编簸箕、笼筐以及各种农

具。”除了筐篮，还有一些编的“马”“狐狸”，在秋天当地都是孩子常见的玩具。藤编竹编是日本手工艺的一个大项。即使是日本最有名的一种柳条箱，来自“最后的清流”四十万川的土佐柳，价格越来越昂贵，却并不因为与奢侈品的合作就变成“作品”。“过去火车站行李处堆积如山的東西”，但日本人“惜物”的心情并不是因东西的贵贱。“使用者和制造者都不会随便抛弃和损坏，这就是手工艺品联系的一种人的认识。”廉价工业生产代替物却少灵魂，就得不到这样的“关照”。没有手工业以后的制品出来以后，人们才发现手工制作出来的东西那么适合自己的身体。“它们都有体温，这体温让使用者觉得温暖。”

不是作品，而是日常生活用品。盐野这样对我强调。“与自然为伴劳动的人，都有一本自然日历。材料来自大自然，所以必须遵循季节，只有那个特定时期才能生产，因为大自然只在那时提供材料。所有的手艺都不是青春饭，上年纪能做的，年轻人能做的都不同。”这些他开始采访的手艺人，大多出生于40年代，正好在自己的青春岁月里，从贫困与萧条的日本，向经济腾飞过渡。因此受到社会发展的冲击是必然。

盐野说，现在能坚持手艺人，还是要靠这个来吃饭的。“日本的传统工艺也并不像你们想象的保存那么好。”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法律、观念都在保护，但手工艺的不断流失是每一个时代的反省。“手艺怎么诞生的？大家都种地，他的农具做得好，大家都来买，他是因为手艺能出卖才能生存。”现代社会，失去了农业文明的基础，手艺的消失是必然，在此基础上盐野非常理性。他采访手艺人时，彼此都抱着尊重的态度，不是农民接受专家采访。“互相尊重而不欺骗，我没有发现过手艺人有什么特别需要隐藏的东西。他们的困苦或者尴尬是我本来就知道的。”盐野说。

日本的使用者的地位是很高的。“不是为了像艺术品一样欣赏你的东西，而是为了用，不好用就卖不掉。手艺人就活不下去。”做的人不随便做，基于大家的共识，用的人也了解。“日本的手艺人之所以还能存活，是使用者培养起来的。”“神话手艺”是一个盐野米松也听说过的趋势。他前不久闻名去福岛一个以手艺为名的小镇考察，师傅啊、匠人啊，不绝于耳，他却发现东西做得很差，卖得很贵，居然还卖得不错。“如果你人和你的东西不配，那就是有问题。无数失败以后，工艺品才能达到一个高度，从一个好东西里，你是看得到无数的失败的。”盐野米松有自己的判断



(高维摄)

号称 400 年没怎么变过的角馆。因为“手艺”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受到瞩目和保护，小镇的武士住宅从维修到养护依然沿用本地的树木和工艺。工匠们的数量在减少，但还是有工作可做

方式。“日本社会优胜劣汰，把所有东西放在一个无形的筛子上。被认可的人最后能达到‘匠’，东西做得不好很容易看得出来。”自己的努力、师傅的传授，此外，一个好匠人需要的是好的使用者。“如果你们惯着他，很快就不行了。”他想想那个不怎么样的名家，有点嘲弄地说，“这种破手艺就应该说再见。下回我去就要刁难他们一下！这是日本社会很少见的。”

“我在云然的作坊差不多就是这么大，还没有这么好的光线。风吹动会影响材料的弹性，对于久坐的人也不好。”篮子越编越快，手里是一点没有停。木槭工艺是指把木槭树或野漆树的树枝劈成细细的条片，菅原坐在垫上进行打编的。眼前安放着一个直径为 30 厘米大的圆形厚木板，需要使用柴刀或其他刃器的时候都在那上面来做，那是一个小小的工作台。编的时候，需要先把木槭的树料劈成八瓣，挖空每一小瓣上的芯，然后再把它们都按同一宽度削薄。劈成条的时候，她会伸出一只脚，用脚趾压住树条的一端，再用两只手来劈着把它们弄薄。要劈得均匀需要心细再心细。脚是裸着的，身体也

始终都是一个坐姿。这劈条的工序是材料加工过程中最难的。有意思的是这种小篓子，是过去角馆乃至整个东北山里人进山的时候挂在腰间用来装蘑菇和野菜的，插秧和撒豆也用。“我去钓鱼或去野外的时候还会把那种笼筐带在身边。笼筐那轻柔的肌体，耐水的性格，是在用于户外的道具中再合适不过的了。”盐野是户外专家，何况这种笼筐，可以在长达一个月的插秧季节一直保持浸湿而不发霉，并且能达到一个用一辈子的结实程度。

用途的消失不代表东西失去了价值。盐野举了个例子，在江水边生长的野生藤蔓，经过煮和继续在江水里浸泡洗涤。抽丝要用手指头一根一根往下拉，如果做衣服料子，要用十几根针先在藤蔓上划出痕迹，再用手拉丝。50 公斤的藤蔓才能出一斤丝线。这些拉丝线的老婆婆一个夏天很轻松就可以有超过 100 万日元的收入。

有时候菅原会特别借助太阳的光线调整木片弯度和形状。要做出那种一望而去有如阴阳棋盘一样的编织“光”，没有一个斜射自然光是做不出来的。师傅

就坐在这个位置，徒弟则要反复加工和修改一些小的部位。“如果出了问题，请一定告知我们”的纸条放在小篮子里，我想现在哪里还有顾客会去修理一个小篮子，无非是日本式的敬客之道。这样以一个专注的姿态认真编织篮筐，和日本人使用敬语的场景很相似，不仅仅是为了尊重对方，也是为了传达自己细心高雅的态度。

“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姿态。有人说这太老旧太落后了，也有人觉得这样不错。”

“生活工艺运动”是日本70年代盛行的乡村口号。这几十年里对于手工艺的推崇，日本有不少地方开始自称手工艺之乡，但手工艺变成产业并不容易。这也是盐野记录的客观情况。镇上的工艺馆里展出的都是当地人制作的木制品、圆木筒、舀子和用蔓条编的编制品，仔细看看材料，来自通草、葛草、攀缘茎草、木天蓼草、紫藤等日本最常见的植物。山人们做事并不追求艺术，而只是因为竞争激烈，希望做得更好，有很多顾客。日本民俗研究家三角宽曾经提到过“山窝”这样的人群，生活在深山，居无定所也不事农耕，四处漂泊却心灵手巧善于创作。盐野采访过的一些手编师傅的祖辈就是从“山窝”里学的艺。

无形的筛子，让工匠们反而轻松了。枯燥、厌烦和痛苦很少出现在手艺人的脸上，也很少有点头哈腰的请人购买。相反，他们神经特别集中特别紧张，导致很多手艺人头发早早全白，脾气一点也不好，甚至有点固执。“我采访的人未必是我喜欢的。但无一例外我尊重他们，虽然他们一开始也会以‘一个城里来的作家’的眼光看我，把我赶出门去。”

手工艺之艺，不仅仅吻合传统日本艺术的“轻巧、清爽、曼妙”这样的特质，也让日本以手为职业的人性的优点，在职业中有所保留。我特别喜欢盐野对于一位“名手”竹编婆婆“山里野兔子”这样的比喻，一条道跑到黑，从不看两边，一定要做到底才善罢甘休。

手工业者都不能贪心，“欲望一大就容易失败，但靠一点点积累吃饱饭应该没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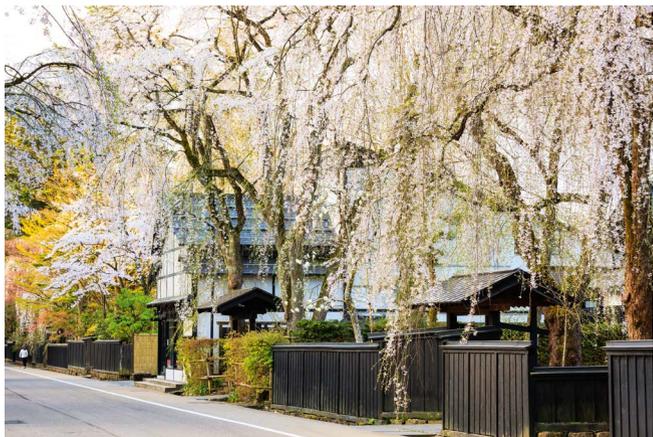
生存之美

现在到日本，多数人越来越喜欢去乡下。从那里看得到日本今天的社会从何处而来，也更直观。盐野米松给我们看他小时候穿的一种特有的雪地靴，由特别厚的毛毡制成，高到大腿根部，秋天山里冬天，积雪能达到1.5米深。就是要靠这样的大靴子才能出门。

“那时的日本人穿的衣服和中国看不出太大区别。”编织木皮篮子可以在四季工作，而大部分作坊都很狭小，大材的加工就需要空间，而冬天的角馆积雪会达到4个月不融化，完全无法户外作业。这样的自然条件造就的物品，比如“饭造”盛饭的木盆，现在因为有了电饭煲，木盆已经失传。“那需要一棵很硬的大栎树，竖着劈开，穷尽材料也只能做两三个盆。粮食短缺的时代，一个木盆可以换回满满一盆大米。作为没有现金收入、不产大米的地方，制作木盆就是一个人必须赖以生的手艺。不过冬天倒可以做木勺，在大雪纷飞的山上，自己一个人在暖融融的小木屋里，没有白天黑夜地一天做上百个。这就是零花钱，平时在山下商店里赊账，上山十几天以后把木勺都背下来抵账。”这个动人的故事讲述的对象平野不久前离世了。

“绝不是圣人君子，更不是人间国宝。”盐野米松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角度去采访多年历尽了波折，他说，“他们就是每天拼命为了养活家人而勤奋劳作的最普通的人。”

盐野本人最早收到邀请，在三越、高岛屋举办传统手工艺的脱口秀，他请自己的采访写作对象到现场来一边展示手法一边聊天，在当年居然掀起了社会风潮，以至于直到今天。日本的百货店从最高级的三越、高岛屋到一般的商店，都会进行“传统展”。几乎有几层都是这样纯日本制造，尤其是手工制造的楼层。我留心看了一下，很多名声显赫的家族品牌，价格大多并不昂贵，是普通品牌的两倍已经算得上高价了。尤其是游人较多的地点，传统工艺的销售额一直都在拉动百货经济。



武士家族为解乡愁，把樱花从京都千里迢迢带来角馆。这些樱花树龄古老，品种名贵，一到春天这里就是东北部第一胜景

“感谢二宫金次郎先生，至少在我们那里，人们觉得劳动不是件痛苦的事。”

一个好的手艺人，应该是一个“不器用”的人。“笨拙，而不是八面玲珑。”手艺人不需要“器用”，越笨的人，只要有“一心”，就能成为匠人。这样的不痛苦，和不卖高价有直接的关系。这些手艺还能在经济发展和 社会变化中保留下来，有很大的偶然和客观因素，并非三言两语坚守内心、忍受清贫的原因。因为吸水 和比较不容易沾面，“饭造”木盆在城市人开始回归“手 擀荞麦面”之后，被用作和面最棒的利器，木盆所在 的小镇也因为国家公园的建立开始发展旅游，但经济 因素还不是最关键的。木盆需要一种特殊的手磨磨， 必去找新潟一位打铁师傅来做，而那个师傅因为打铁 吃不饱饭，早就改行卖电器了。

小孩子会让他们做一个缠在陀螺身上的铁丝；在 河里扎鱼的人会让他们磨一磨扎枪的头；农家人会拿 来镰刀、锄头让他们修理。工具都是用了修，修了再 用的。用惯了的东西，时间越长越是舍不得扔掉。

“修理”这个习惯的消失，使很多作坊不复存在。 日本电视里经常把日本刀推崇为匠人精神的至美作品 代表，其实农具的制作和刀非常相似。日本最贵的“源 次锄”，所谓贵也就是普通锄头的两倍。作坊可以自己 炼钢，1600 摄氏度之下，做锄头像做点心一样轻轻地 按着。“看你烧出的火的颜色，就知道你有没有资格 出徒了。”手艺并非几百年不经历变化，新一代会 用半自动化机器来增加效率。“记得在我还是小孩子 的时候，我们周围的每一个镇上都至少会有一家打铁 的作坊。我还记得作坊里的那些风箱和炉子，还有用 锤子凿打的声音。那时候，家里的日用品需要修理了， 或者想再做个新的，都是很自然又很随便地跟那作坊 的工匠打声招呼，然后过几天去取就可以了。于是， 就有了修理来又修理去的习惯。那些作坊也因此而成 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没有得心应手的工具的那一小部分人，可以感 受那种为难和悲哀。”使用者和工具之间的关系，制 作者和工具之间的关系，这些是经过反反复复实验才

完成的优美又实用的工具。使用的人会跟自己的身高 体重，提出农具的角度要求。50 年代日本农民为开荒 制造了大量的农具，牢固、省钱、耐用，这些品质随 着时代的更新换代也渐渐消失了。

盐野米松对手艺人的命运，多年里保持观察、追 问，被认为是手艺方面的专家。他成了手艺的代言人， 他长达几年的时间进行与手艺人对话的直播和演讲， 在高级商场里为传统艺人增添空间。还得到日本农林 省和文部省拨款支持，训练高中生去采访手艺人，了 解另一种生活。“但是，谁也不能总结另一个人的人 生。”

已经去世的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会把所有盐 野书后面的调查感受写好寄给盐野。在日本，盐野米 松的文章被选入中小学教材，各种考试也常常以他所 采写的励志故事作为命题。“盐野是我们角馆的宝贝。 他的书日本人大部分读过，尤其是我作为教育部门的人， 我看到孩子读手艺人故事，就觉得这更重要。”熊谷 是角馆当地的教育次长，“本地中学里的课程里， 有盐野教孩子们采写手艺人，已经长达 10 年时间。 这些是能够对一个人的人生发生影响的。”角馆手工业 重振的 1976 年，是盐野在日本掀起手艺风的起点。

“日本人是怎样活下来的？”盐野米松说，挑选 的很多手艺人都在三代人以上。盐野更喜欢用“生存” 来取代更柔和的“生活方式”这个说法。“我不想给 日本人做个总结，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特性。我想看 的是这些。”他写作的一切题材只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回望，日本去哪里

“采访手艺人，对于我自己的人生有巨大的影响。” 盐野曾有一个小镇青年的壮志，他考取东京理工大学， 学习应用化工专业。他说“化学仿佛是给我发明的学 科”，开发最先进的药或技术。“父亲为了躲避战火而 来到了偏僻的角馆。我儿时的邻居就是做桦细工的匠 人。”经过努力考上大学回到东京的盐野却很失望。“但 我一到东京，发现天跟现在北京一样。”当时东京的“公 害”很厉害，污染严重。高效率的发展造就现代化景 象的东京不是没有吸引力的。盐野米松大学毕业的时 代，正是日本掀起旅行热的起点。日本人从自己的想 象中一下子真正地走向了世界，在大家都成为上班族的 “一亿总中流”的豪情中，盐野却是怀疑主义的那 一小部分人。“我想再审视一下自己的人生，重新考

“人在手艺里，慢慢做一个物件的愉悦， 渐渐的没了。其实每个时代人们都在往回看， 现代和过去，一直都是表里的轮回。”

虑一下自己的活法。”

毕业十几年后，盐野米松已经是日本的生活方式明星。他留着极短的头发，戴着大眼镜，以“米松大叔”为笔名，出现在电视和杂志上。他是日本人里最早在电视上周游世界的人。走遍了五大洲，“纪实不允许一点创作，这让我有点厌倦”。1987年，他身穿和松尾芭蕉同样的袈裟，用一年时间，一边吟咏俳句，一边重走江户时期的俳句大家松尾芭蕉的《奥之细道》（奥州小道）的乡间小路。

60年代，因为日韩协定和日美协定，学生运动非常厉害。盐野这一代大学生希望改变协定，可以改变日本政治和体制上的问题。“全世界的反美热潮里，我也是当时的一分子。”“化学家也好，画家也好，作家也好，都需要很强的观察能力。”1970年毕业后他进入手冢治虫创办的“虫production”制作公司出版部，负责出版“COM”杂志。“因为小时候喜欢漫画，我也爱画画，科学家和画家是可以组合得很浪漫的。后来我发现比我画得好的人太多了。”同时也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盐野是日本最早的户外派。日本最有名的户外杂志《be-pal》创刊，从小知道哪个季节山里的果子可吃，知道猎人怎么抓熊，知道手艺人干吗，盐野写了很多最接近“人”的生活状态。“很幸运的是，熟悉的生活成了可以养活我的工作。”

“日本人在城市顶层住宅的落地窗前吹着空调看着窗外，也很舒服，但内心里还是问‘这是真正的幸福吗？’”盐野说，“现在是平成，过去是昭和。每一个年代向前走了一点，那一点都是效率和经济的部分，所谓现代，科技和医疗都是为了让人活得更好。经济和科学结合得已经很好了，这里面有一种合理性的要求。这个合理把人的部分牺牲掉。人在手艺里，慢慢做一个物件的愉悦，渐渐的没了。其实每个时代人们都在往回看，现代和过去，一直都是表里的轮回。”盐野米松不觉得美国式的生活是一种理想，他说：“美国是一个300年的国家，但也有自己的烦恼。虽然不断往前在走，但也有回望的意识。”

厌倦城市生活，回农村有一个小房子有一小块地，过特别轻松的生活。这样的“回望”是不分国界的。“英国人里的绅士不是在城里戴帽打伞的，而是在乡下戴着草帽干活的。美国人要开着房车去乡间，西部片也一直很经典。”

“日本人心底里也有很多回望的情结。”可是向何处回望呢？“回望，不是一种鼓励失败者的哲学。而是你面对自己的失败，反复地总结。”盐野米松为创

作小说找到了伊豆群岛的八丈岛的民间印染“黄八丈”，用植物来染织曾经是贡绢，盐野说手工艺人的工作里本身包含着智慧，但没有机会对别人讲述。可是那些语言都那么活生生的，那么有说服力，如果是以文章形式完全不足以表现他们的真谛。盐野把自己当成园艺师，从70年代开始，倾听，再修剪、整理。

“手艺诞生于没有丝毫的虚和伪的年代。社会的变迁势必要使一些东西消失，又使一些东西出现，这是历史发展的惯性。但是作为我们，更应该保持的恰恰就是从前那个时代里人们曾经所珍重的真挚的相互信任的感情。”不断寻访工匠，成了盐野米松一生最宝贵的经历。事实都是一样的，匠工之手做出的东西已经越来越少，没有继承人的手艺，到他采访时已经是最后一位。“自古以来”日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正在慢慢消逝。

1984年，37岁的盐野米松开始了对日本宫大工西岗常一长达10年的采访。这篇文章开始在杂志连载后得到了日本全社会的回响，入选日本中小学教科书，成为励志经典作品。盐野用了近10年时间确立了自己写作的风格，打开了手艺这扇日本工匠们长久封闭的大门。此后30年，盐野走访和采写了近80部作品，有写渔民的，有写宇治茶的历史，也有清酒等等。这些书是日本手艺类出版物的开山之作，此后引发了至今仍仍在狂热的“手艺”风潮。这也是盐野最令人羡慕之处，他写作的对象往往具有一种感染力，因为真实的生存，让人产生不可思议的感动。“在我们对人生道路产生迷茫的时候，可以去认识认识他们。那也许才是人本来应该有的活法儿。”

盐野告诉我，“日本目前的文化回归到了江户时代，那时是‘町民文化’，士农工商虽然把商放在最后，但当时最主要的文化是商人文化。推崇安定和谐地过日子”。江户时代的武士，有一种“公司职员”的稳定感。作为维基百科上角馆的第一名人，盐野走到哪里，都有人上来打招呼。他也并不是很擅长应对别人的赞美，只想快点带我去田泽湖边走走。我总以为他热爱故乡，连毛孔都会散发出和本地人的亲近。没想到他说，他只有一个经常喝酒的好朋友，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人到田泽湖边去捡石头。河边有一种黑石头，这曾经是忍者的武器，没事他就来这扔石头玩，有时候还能找到玛瑙。“全世界的地方我只要想去的地方都去过了，现在在这里，即便我默默地死去了，也不会有什么后悔了。”

（感谢英珂女士，赤羽先生对采访的协助）



以有机设计著称的威尔士工业设计师罗斯·拉夫格罗夫



罗斯·拉夫格罗夫设计作品

1. 意大利品牌 Moroso 的“超自然椅”，椅背洞孔的存在是出于解放材料的目的
2. “波纹”矿泉水瓶为水添加了一层灵动的皮肤
3. 3D 打印的黄金戒指系列“叶片”
4. 以数字铣削技术制作的 Cetacea 黄铜椅



不含脂肪的有机设计

文 / 钟和晏 图片提供 / Ross Lovegrove

拉夫格罗夫的典型工作方法是通过学习 and 模仿自然的生物学及其演变原理，设计出超越时代的产品形式，其中包含了明显的社会和环境意识。

威尔士工业设计师罗斯·拉夫格罗夫 (Ross Lovegrove) 说他平生只认识 9 个和他同姓的人，其中两个是他的父母亲。他们是第一代近亲堂兄妹，这就不难解释他的身上有怪异反常的一面，他一直为此挣扎不已。

这种怪异和反常多少可以从他位于伦敦诺丁山的办公室表现出来，一个被他称为“自然历史博物馆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太空实验室的混合”的地方。里面堆满各种设计原型和物件，杂七杂八的物品包括从牛津大学购买的大象头骨、鲸的骨骼片段和人的骨头，还有人的前臂扫描图片，被放大到显



拉夫格罗夫在伦敦诺丁山的办公室中设置的 DNA 楼梯

示出它的细胞结构。

占据着办公室视觉中心位置的是一道动态的、强有力的 DNA 楼梯，复合材料制作的碳纤维楼梯结构接近生物的脊椎，花瓣形状的椎骨次第展开成为向上攀岩的台阶，恰似美国分子生物学家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所发现的 DNA 双螺旋结构。

拉夫格罗夫花费 25 万美元，用了两年时间，以立体光固快速成型的方法制作出极其复杂的 DNA 楼梯。单一元素在旋转过程中变成一个整体，碳纤维的楼梯扶手只有上下两个支撑点。

也许，正是与生俱来的怪异赋予他超乎常人的视像和直觉创造力，他可以从一张加热板上的水滴照片，看出未来汽车的形象。他的疑问是为什么汽车要用几万个零件，而不是几百个就制造出来。早在 2008 年，在“2020 年的生活将会如何”的命题下，他构想了一辆“棍棒上的汽车”，一个绿色城市交通的超现实建议。

这是一辆透明圆形气泡形状的汽车，它没有引擎，底盘是真空成型的碳尼龙材料，动力来自顶篷的太阳

能电池板。车内可以承载 4 名乘客，通过语音命令和卫星导航系统自动驾驶。球形汽车的前部有一个洞孔，到了晚上，汽车停在伸缩杆上，顶着洞孔被高高地支起，既节省了地面的停车空间，还可以充当路灯。

远在“有机”成为时髦标签的十几年前，拉夫格罗夫就已经被称为“有机队长”了，这个称号既有哲学意味又包含了审美立场。他的典型工作方法是嫁接自然世界与科技世界，学习大自然对结构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通过模仿自然的生物学及其演变原理，他设计出超越时代的产品形式，其中包含了明显的社会和环境意识。

自然界的事物通常经过了上亿年的演化，不受限制的生长模式、相互连接的美丽形态，都可以成为产品设计的灵感来源。比如观察自然的形态，采用分形技术的概念，拿一层动物身体的薄膜（membrane），像自然那样不断地缩小它，就有可能变成椅子的椅面或者运动鞋的鞋底，也可能是与座椅融为一体的汽车。

另一方面，有机的设计也是“无脂肪”的设计——



这意味着去除多余的、不必要的形式，尽量减少体块和材料，并利于分解和回收。因此，拉夫格罗夫的设计更多地依赖技术、材料研究和有机形状的结合，他相信材料研究和科技发展可以推动审美的变化，而不是反过来。

结合生物思维和工程美感，他为美国 Bernhardt 公司设计了世界上第一把镁金属材料制造的椅子 Go。椅子的整体曲线和多个切口表现出类似骨骼的结构，从某个角度看，椅腿近乎消失了。这是绝对无脂肪的有机设计，Bernhardt 公司为此花费了 170 万美元的开发费用。

如果采用高分子聚合物材料，椅子的形态可以变得更具弹性和流动性。为意大利品牌 Moroso 设计的“超自然椅”，使用两层玻璃纤维增强聚丙烯，以注射成型的技术制造，在内在结构和外在美感之间获得和谐的平衡。椅子形态和后背孔洞经过精简，如同放射虫简化到极致的双原子结构。

椅子背部的镂空有助于透气，光线穿透它，在地面投下丰富的阴影效果。不过，就像自然的物体通过钻孔解放形态一样，椅背孔洞的存在主要是出于解放材料的目的。这种可堆叠的彩色椅由电脑数据生成，比起设计过程，可以说它的结构更多是自然进化的结果。

电路板和骨骼结构

Circuit Board & Bone Structure, Parador

出于对生物形态和技术的偏爱，拉夫格罗夫 2011 年为 Parador 设计了两种层压地板，一款命名为“电路板”，图像外观模仿过去的电脑电路板，表现出复杂的精确性和潜在的技术美感。另一款“骨骼结构”是以电脑生成 3D 骨骼结构形式，细胞生长的照片被放大，体现了自然和人工的混合。





云空间

Space Cloud, Artemide

“云空间”是为 Artemide 设计的模块化照明系统，六边形矩阵的阳极氧化铝面板可以水平或垂直安排，在天花板上形成丰富的光影效果。面板由 100% 阳极氧化铝制成，色彩和表面处理成为它固有物理特性的一部分。“云空间”的想法来自 NASA 从外层空间拍摄的地球照片，地球本身的色彩以及受太阳光的热量，散发出美妙的光晕。

液体凳

Liquid Bench

“液体凳”研究单一表面结构如何延伸和流动，手工抛光的铣削镜面铝大概 2.9 米长，半流体形状似乎是瞬间被冻结的结果。凳子在英国考文垂一家为宾利等汽车公司制作零件的工厂生产，材料与形式的关系是这一设计的根源。





宇宙天使

Cosmic Angel, Artemide

“宇宙天使”吊灯具有轻盈的、雕塑化的表皮和自然流动的节奏，有机形状的反射器用镀成金属色的热塑性材料制作，两米长的数字化表面以轻盈的形式，捕捉和分配来自上下的光源。这一设计源自拉夫格罗夫对液体形式持续的研究、电脑程序的运算法则以及3D数字处理加工过程。吊灯如同天外来物，似乎无重力地漂浮着，模仿了星球难以解释的悬浮在太空中的景象。

“通过观察存在于自然界的東西，把自然的过程带入日常设计过程中，这就是我所做的，这也是有机设计的力量，它极大地促进了我们与物品的关系以及身体的感受。”他说。

拉夫格罗夫一直相信生物聚合物（Biopolymers）将是具有未来潜力的新型材料，他的最新合作对象——旧金山Emotiv公司的明星产品Emotiv Insight无线EEG脑电图耳机就是采用了专利的生物聚合物传感器，这一新型亲水性高分子生物材料传感器可以省去凝胶、生理盐水等导电材料和大量的准备。耳机扫描记录你的脑电波，提供关于大脑活动的详尽信息，然后转换成能够被理解的数据，是目前市场上先进可靠的消费类脑电图设备。

近些年，得益于数字技术领域的进步，他的产品形式趋向纯粹，演变也越来越复杂。最近，他为路易莎·吉尼斯画廊设计了“叶片”，一系列3D打印的18K金戒指。“叶片”一词来自植物界，树叶和叶脉高度进化的形状是为了捕捉阳光和雨水。

这些黄金戒指表面带着各自细微的脉纹，如树叶一般从手指间展开，手指和叶片之间存在着相互关系。使用3D打印而不是传统的模具，拉夫格罗夫想要挑战当前的制作流程，实现细节在0.05毫米到0.1毫米之间的高分辨率。他尝试了直接金属激光烧结、3D

打印蜡模等几种原型制作方法，以优化的方式在机器上定位，最终获得了精确的表面细节。

拉夫格罗夫1958年出生于加迪夫的一个小村庄，在威尔士海岸边度过孤独的童年，经常独自在海边散步，捡鹅卵石和有数百万年历史的化石。今年为荷兰家居品牌Moooi设计的“海藻地毯”就与这一深刻的童年记忆有关。他说：“海藻生长在一个粗糙的、朴实无华的地方，潮水漫涨上来，不知不觉中已经搁浅。”

事实上，这张威尔士海边的海藻照片是用他的iPhone拍摄的，得益于Moooi先进的print-on-demand打印技术，生成逼真的高清晰度图像。Moooi位于德国的印刷厂以328米长的印花机、总共648种色彩的范围，让墨水深入地毯的绒线中，可以打印出比过去更高清晰度和更大尺寸的图像。Moooi的定制地毯系列为此提供了一系列图片模板，让客户选择不同的色彩、图案和尺寸，或者在地毯上打印自己的照片。

在寂静的海边漫步时，拉夫格罗夫曾经思考过，为什么任何一块鹅卵石都适合人们的掌心？他找到的答案是——“不是鹅卵石适合我，而是我的手掌适合它。”当他后来有机会为南威尔士的天然矿泉水品牌Ty Nant设计PET瓶时，他终于设计出“适合所有人的手掌的形状”。

名为“波纹”的矿泉水瓶表面是难以描述的微妙曲线和洞孔，传递出水的纯度和流动性。这是用数字方法获得的形式，先用数字绘画软件画下对水的印象，然后像刻花玻璃一样，用机器把亚克力块进行铣削。

第一次拿到最后成品的时候，他以为自己失败了，空瓶看起来平淡无奇、毫无感觉。一旦装满了水之后，每个瓶子因为水位不同产生不同的形状，表面变得波动起伏。他意识到自己为水添加了一层灵动的皮肤，凹凸的水瓶成为水自身的象征。

缺乏制造业的伦敦，就像没有厨房的餐馆大厨。最近，拉夫格罗夫正在出售和搬离工作、生活了几十年的诺丁山工作室。他计划推出一个关于可持续性的新公司，用良好的价值观改变世界。

他的下一个工作据点可能是洛杉矶，目前正在进行中的各种具有21世纪特征的项目都是与科技有关。他刚刚成为Petrox Resources Corp的创意总监，这家公司致力于大量减少燃料中的污染颗粒，他也正在和伊隆·马斯克的Space X公司就Hyperloop商讨合作事宜，这一超高速运输系统未来可能成为加州铁路系统的绿色替代品。☑

从皮肤细胞到健康婴儿

文 / 袁越

大部分不孕夫妇之所以生不出孩子，主要原因就是精子或者卵子出了问题。人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携带着一个人全部的 DNA，从理论上讲完全具备了变成精子或者卵子的可能性，问题在于同一个 DNA 分子可以有不同的修饰方式，导致携带着同一套遗传信息的细胞可以具有完全不同的功能，如果能找到不同细胞 DNA 的修饰方式，理论上就可以变来变去了。

具体来说，要想把一个体细胞（比如皮肤细胞）变成精子或者卵子，需要经过以下几个步骤。第一步，必须将这个已经完全分化了的体细胞转变成全能干细胞，这个目标在 2006 年被日本科学家山中伸弥实现了。他找到了一种很简单的办法把体细胞转变成“诱导型多功能干细胞”（iPS），并因此获得了 2012 年度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

第二步，需要把这个 iPS 转变成“原始生殖细胞”（PGCs），也就是精子和卵子共同的前体。这一步早在 2012 年便由日本京都大学的斋藤通纪和林克彦完成了，他们采用了和山中伸弥类似的方法，即在细胞培养液中加入一些特殊的细胞因子，诱导 iPS 细胞改变其 DNA 修饰方式，最终在体外培养出了健康的人工诱导型 PGCs 细胞。

第三步便是促使 PGCs 细胞发育成卵子或者精子，自然情况下这一步骤是在卵巢或者睾丸内完成的，这两种性腺组织为 PGCs 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微环境，诱导 PGCs 细胞分别向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分化。科学家们尚不清楚这个微环境当中到底是哪些因子在起作用，所以只能把 PGCs 细胞注入活的动物卵巢或者辜

丸内，借助生命的力量完成这一关键步骤。

外行可能会觉得这没什么，但对于内行来说，凡是需要借助活体动物才能完成的细胞诱导实验难度都太大了，因为目前细胞诱导的成功率不高，需要进行大量的后期筛选才能选出诱导成功的精子或者卵子，所以科学家们一直希望能够在试管里完成这一步骤，那样的话就可以不受动物实验的限制，无论是时间还是成本都会大大下降。

经过 4 年的艰苦摸索，现为日本九州大学教授的林克彦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目标。2016 年 10 月 17 日出版的《自然》（*Nature*）杂志发表了林克彦团队撰写的论文，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一消息。不但如此，研究人员还通过体外受精的方式将这批在试管中制造出来的卵子培养成胚胎，然后将其植入母鼠子宫内，最终生出了一批健康的小鼠。这些小鼠后来也顺利地产下了健康的后代，说明整套方法已经和自然繁殖没有差别了。

虽然林克彦博士在论文中一再声明这项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哺乳动物生殖系统的发育过程，但明眼人一看即知这个结果对于治疗人类不孕不育的努力会有极大的帮助。想象一下，未来如果一名妇女因为各种原因错过了受孕的最佳年纪，她只需要把自己的皮肤细胞提交给医院，医院便会将其培养成健康的卵子，整个过程全部在实验室完成，不需要其他人的帮助。之后，医院只需取得丈夫的精子进行体外受精就可以了，所用的方法和试管婴儿是一样的，整套程序已经相当成熟了。

同理，如果一名男性因为各种原因无法生产出健康的精子，医院可以如法炮制，在不借助其他人的情况下通过皮肤细胞生产出大量健康的精子。

另一个有趣的应用就是同性恋夫妇也可以通过这个办法生出属于两个人的孩子，因为从理论上讲，男性的皮肤细胞可以变成卵子，女性的皮肤细胞也可以变成精子。

当然了，小鼠试验成功不一定保证人类能成功，林克彦的下一步计划就是先拿灵长类动物做实验，看看能不能行。不过，从动物过渡到人类需要解决伦理问题，因为从皮肤细胞制造出来的卵子有可能存在基因不良突变的问题，必须首先解决这个问题才能推广。据科学家们估计，这项技术至少还需要等待 10 年才有可能用在人类身上。☑



Wir müssen wissen. Wir werden wissen.

新知
WISSEN

与那些充斥于日常生活中的闲言碎语相比，它不关心每天都在变化的事情，它关心一些恒久的事情——理性进步，智识生活的乐趣，美。

全年6期
96元

零售20元，
全年订阅8折

双月刊，
单月中旬出版

你到底是小熊还是扬基？

文 / 张斌



1998年10月3日，头戴芝加哥小熊队棒球帽的希拉里与克林顿在白宫南草坪

终极辩论过后，只等投票。决战双方各有预案，抓住每一细节拉票，拉票，还是拉票。但是，每一个动作和声音都要经得住对手的撕咬，希拉里一不小心就惹上了忠诚度的麻烦。

希拉里近来奔波劳碌，周日晚竞选包机上，新闻秘书尼克·梅里尔抢拍了一张照片，异常生动。照片里，希拉里举着手机，嘴张得老大，欣喜之情充盈满屏，她是被家乡球队芝加哥小熊队挺进职棒大联盟世界系列赛也就是总决赛的消息深深击中。新闻秘书的职责就是传播，梅里尔快速在Twitter上将照片发出，用词中好像还有与我们极为相近的“弹冠相庆”。

社交媒体迅速发酵，单条点赞过万，转发轻轻松松也有五千。但问题很快就来了，有人平静地质询道，生在芝加哥的希拉里女士曾经在2000年纽约参议员选举中大肆炫耀自己是扬基球迷，难道她的内心中自己始终是个小熊死忠吗？小熊还是扬基？这可是个原则性立场问题，关乎血脉，涉及信仰的。

邮件门以及健康状况始终未离希拉里身边，还算攻防有序，没有让特朗普占到太大便宜，老太太比那位老爷爷的笑容始终更阳光，更有感染力一些。大选之年，无所不用其极，这是不二法则，为了选票，也只有无尽讨好选民，此番希拉里笑得太狂放了，她的新闻秘书显然忘记了2000年时总统夫人的扬基面具，

留下把柄让对手可以鼓噪一时。百密一疏，只有认了。

无论是专家还是“砖家”，总有专注特长的，居然有人一直在意希拉里的运动归属和信仰，恰逢需要炮弹的时候，专家旋即登场，洋洋洒洒来篇专栏，撕破政客虚伪。1947年，希拉里出生在芝加哥，在她来到人世前两年，小熊队最后一次打进世界系列赛，去争夺美国人视野中的世界冠军。希拉里自小与家人住在芝加哥郊区，家里条件不错，兄弟姐妹们在漫长的夏日里，可以聚在电视机前，守候着小熊队的比赛。父辈便是小熊队的死忠，全家人不可救药地变成了“小熊家族”。1996年，希拉里曾经在一篇专栏文章里专门就这份融入血脉的体育归属做过深情描述：“棒球检验了我的耐心和忠诚，我毫无保留地把一切给予小熊队，不惜暴露我的弱点。”

这片赤诚以及近乎一生的等待，当生命中还能经历小熊再进世界系列赛时，希拉里怎么可能压抑内心情感奔流，那一刻管它此前有过怎样的表达呢，对不住纽约，对不住扬基了。1999年，希拉里决意投身政坛，在纽约竞选参议员，发布消息后几日，作为第一夫人随着总统丈夫参加了扬基队到访白宫的欢迎仪式。扬基主教练热情地向第一夫人送上了NY标志的棒球帽，摄影师不失时机地记录下了头戴棒球帽尽情欢笑的场景，谁能想到这可成了十几年后的话柄。倒希拉里一派自然会说，为了选票，宁愿背叛自己的家乡与体育信仰，这样的“政治家”可信吗？即便有人客气地送上其他球队棒球帽，一位有尊严与骨气的政治家最好的方式该是接过再转递给助手了事，不可轻易向自己身上贴标签。那次白宫接见后，希拉里还曾去过扬基球场作秀。2007年党内选举时，这一举动就被揪出来在政论节目中渲染过一次，政论家们洁癖地指出：“这就是政治欺诈。”所有未来有所图的政客们，牢记啊，立场可要在一而终，漂移不得。

过往十年，希拉里总要为自己的体育忠贞辩解一番，甚至在其自传中都有涉及，逼得她要回忆说，自己7岁时便在小熊之外追随着扬基，10岁过万圣节的一张照片中也能看到“假小子”般的她身着扬基民宿头像的外套。好了，这都不过是竞选时才被折腾出来的调味剂，无论你死忠于谁，你注定会有对头，兼得是万万不可能的。■

南海局势与中国的“新长征”

文 / 宋晓军

10月22日，当国内主流媒体大篇幅报道“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内容时，国内媒体上出现的另一则新闻——“美舰闯入我西沙领海遭我海军二舰警告驱离”，也引起了一些关注军事的朋友们的关注。其间有朋友问我此事，我说昨天国家最高领导人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说了一句经典的话：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因此，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先回顾一下“来路”。

1936年10月22日红军的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同年10月25日出版的《申报》每周增刊并未报道此事。但在周刊“时事一周”栏目中，有一则题为《正在展开的太平洋设防问题》的消息。消息的大意是，美、日正在就于1937年即将到期的《华盛顿海军条约》第19条是否继续展开博弈。第19条规定英、美、日三国不得在太平洋若干岛屿上设防。当时传英国向美、日提议就第19条在1937年到期后继续有效进行谈判，但美国反对而日本则同意有条件谈判。美国反对的理由是，《华盛顿海军条约》中的“九国公约”对中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已被日本打破，因此美国自然要反对限制其在太平洋相关岛屿设防的约束。而日本同意谈判的前提条件是，修改条约中“不公平”的原则，即应对远离西太平洋沿

岸的英、美两国在相关岛屿设防上加以更多的约束。对此《申报》每周增刊在“消息”的最后写道：太平洋上的风云恐怕将跟着无条约时代的到来而严重起来吧！

看了上文就可以得知，80年前美、日两国就为争夺西太平洋主导权在为相关岛屿是否设防上展开博弈了。按照《华盛顿海军条约》中第19条的规定，当时美国在关岛、菲律宾、阿留申群岛等岛及日本在千岛群岛、小笠原群岛、琉球、中国台湾、奄美大岛等岛上不得建设军事防御工程。而80年后，可以发现除了大量购买美国武器装备的中国台湾地区外，1922年签署的《华盛顿海军条约》第19条中所涉及的绝大部分岛屿，都已经被美国或日本建满了现代化的军事工程。与此同时，美、日两国不仅在不断炒作属于中国领土的西沙和南沙群岛上新刚刚开始建设功能有限的军事工程，而且美国还要不定期地派军舰在西沙及南沙附近海域实施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10月21日美海军“迪凯特号”驱逐舰擅自进入中国的西沙领海，就是一年内美海军进行的第四次所谓“航行自由”行动。而前往警告、驱离美舰的两艘中国军舰，就是源自80年前刚刚完成了长征的那支人数仅为3万人的红军队伍。

说到这儿，我的朋友问：面对南海局势中国现在该怎么办呢？我回答说：按照最高领导人今天说的，中国只能开启“新长征”。其实，1935年6月指挥员平均年龄25岁的中央红军在第一次翻越雪山时，时任《新中华》杂志主编、25岁的卢文迪所编著的“初中学生文库”中的《现代中国》也在上海面世了，书中的最后一段也算是80年前对这个问题给出的一个答案：帝国主义因为侵害中国，乃轰开中国的门户，发展中国的交通，而自然的结果，中国人民为求自己的保存计，也跟着发展产业，采用他们的制度和文化的，但帝国主义者却千方百计地阻止中国走上繁荣的道路，而设法使之永沦为他们的“俎上之肉”。所以未来中国的发展，将走怎样的道路，完全要看我们能不能排除帝国主义的侵略，至于是否能排除帝国主义的侵略，则要以国人的努力与决心而定，而这个责任也是我们所应当担当起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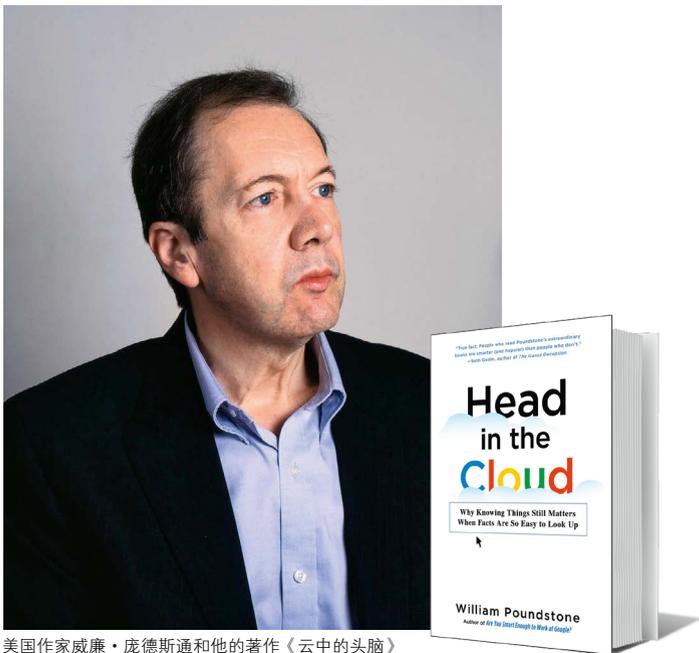
（资料图/新华社供图）

7月8日，中国海军在海南岛至西沙附近海域组织实兵实弹对抗演练。图为护卫舰发射导弹

元无知的危险

主笔 / 薛巍

“互联网的问题不在于它使我们知道得更少或获得错误信息，而在于它让我们变得元无知——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美国作家威廉·庞德斯通和他的著作《云中的头脑》

何谓元无知

如今在遇到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时，我们随时可以拿出手机在网上搜索，所以很多人认为获取知识已经不重要了。美国作家威廉·庞德斯通说，现在美国人已经不在乎事实了。他在《云中的头脑》一书中举了一位导演为例：2001年有部动画电影叫《兰戈》，其主角是一只变色龙，它老想做英雄，结果有一天他到了西部一个小镇，成了那里的警长。导演戈尔·维宾斯基在介绍他的创作灵感时说：“我们在碰撞各种想法，比如，让一个沙漠生物跑到西部去？它是经典意义上的外来者，如果来自沙漠，它是一只水生生物会

怎样？如果是水生动物，它是变色龙会怎样？”但变色龙并不是水生的，它们是生活在非洲的雨林、草地和沙漠中的蜥蜴。维宾斯基是《加勒比海盗》系列的导演，他显然不知道蜥蜴并不是水生的，而且在头脑风暴的过程中也没人告诉他。

不了解蜥蜴只是有些丢脸，此外好像没什么别的害处。有些东西确实不需要知道，只要知道去哪里查就行了，比如法规。美国的国会每年会增加大约2000万字的新法规，要10个月才能读完。再加上几百年的旧法规，读完这些法规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律师们只能知道这些法律基本的轮廓，但他们需要成为查找相关案例的专家。

我们现在把知识和记忆“外包”给了云存储，就好像我们的头都在云端。庞德斯通说：“互联网的问题不在于它使我们知道得更少或获得错误信息，而在于它让我们变得元无知——不知道自己不知道。”1995年4月，一个劫匪在光天化日之下洗劫了匹兹堡两家银行。摄像头清楚地拍到了他的面部，因为他没有戴面罩。警察在晚间新闻里播出了监控画面，很快就有人提供了线索，嫌疑人麦克阿瑟·惠勒午夜时分在家中被抓获。看到警察时他觉得不可思议，他说他在脸上涂了柠檬汁了，他认为在脸上涂了柠檬汁摄像头就拍不到了。他知道柠檬汁可以用来制作隐形墨水，由此推断，柠檬汁应该能让他的脸隐形。他在行动前做过实验，在脸上涂上柠檬汁，然后用宝丽来相机自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果然没有脸！警察也没弄清这是怎么回事，很可能是因为他的拍照技术跟他抢银行的技术一样烂。

惠勒被捕入狱，还进入了世界上最笨的罪犯的行列。1996年，康乃尔大学心理学教授大卫·邓宁注意到了这个故事，他从中总结出了一条普遍的规律：越是缺乏知识和技巧的人越是意识不到他们缺乏知识和技巧，不知道自己的无知，这叫元无知。这一观察结果后来被称为邓宁-克鲁格效应。

邓宁和他的研究生贾斯汀·克鲁格做了一系列实验来测试他们的假说。他们给心理学本科生做语法、逻辑和笑话方面的测验，然后让他们给自己估分。得

分最低的学生会夸大他们的成绩，得分较高的人对他们自己的能力认识得更加准确。要知道你的语法测验成绩，你就得懂语法，那些不懂语法的人也就无法判定他们的语法水平。他们对自己的无知一无所知。

邓宁和他的研究生做笑话测试时用到这样两个笑话：一个是，问：什么跟一个人一样大但没有重量？答案是影子。第二个笑话：如果有一个小孩问雨是从哪里来的，一个很聪明的回答是，告诉他那是上帝在哭泣。如果他问上帝为什么哭，你可以告诉他，也许是因为你做的什么事情把他惹哭了。测试目的是让学生辨别哪个笑话更有趣。他们找了职业喜剧演员给笑话打分，他们的结论被视为正确答案。喜剧演员们判定，第一个笑话一点也不有趣，第二个被评为非常有趣。学生们在辨别这两个笑话的有趣程度时很费劲，却对他们的辨别能力非常自信。

庞德斯通指出，邓宁·克鲁格效应需要对某个领域有着最低限度的知识和经验。司机都会受制于这一效应，开车技术很差的司机通常都以为他们是水平很高的司机，但那些不会开车的不会有这种想法。

知识与技能的关系

教育上一个永恒的两难困境是，到底教学生知识还是教他们技能。一个极端是让学生背诵乘法表、年代和经典。另一个极端是强调批判性思维和技能，像如何在网上查找知识。大部分都倾向于教技能，即“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2009年，金斯敦大学新闻学教授布莱恩·卡斯卡特问英国全国校长协会的官员大卫·范恩，要不要告诉学生哥伦比亚的首都在哪里。范恩回答说不用教，学生不需要知道各国首都的名字。法国的首都在哪儿要知道，但哥伦比亚的首都用不着。学生更应该学会使用地图这一技能。

范恩的这种观点有着悠久的历史。1854年，狄更斯在《艰难时世》中讽刺了维多利亚时期的填鸭式教学，教育家托马斯·葛雷梗说：“我要的是事实。只要教这些男孩和女孩事实。”但他后来意识到，每一条事实都只是教育这面墙上的一块砖。拿掉一块砖，

墙仍屹立不倒。拿走许多块砖，墙仍能屹立不倒。但不能拿走大部分砖块，那样的话砖悬在空中，墙就会倒塌。学习者必须掌握一定数量的事实，对他的知识及其不足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样他才能避免不知道自己的无知，只有这样他才能用谷歌来填补他的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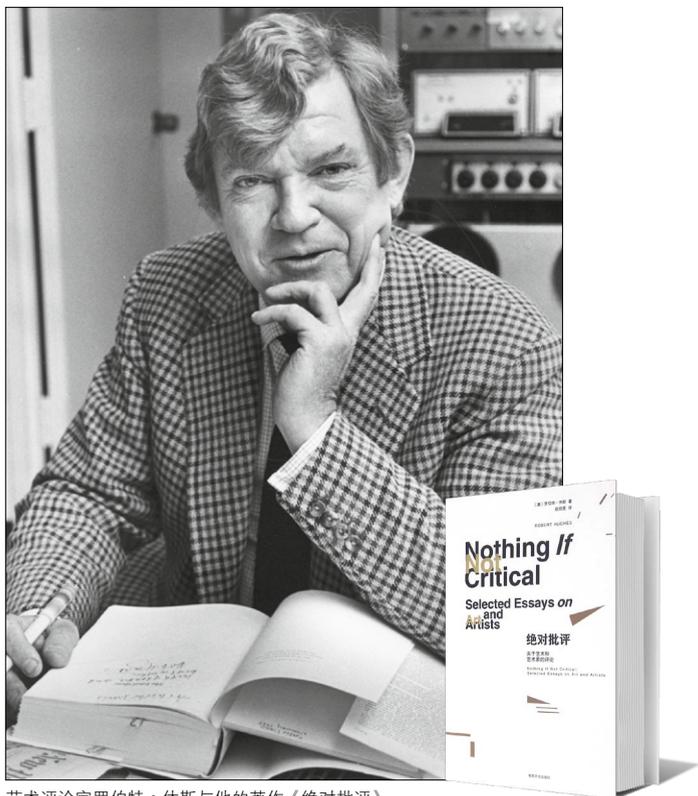
弗吉尼亚大学英语系教授埃里克·唐纳德·赫希认为反事实的运动走过头了，他谴责强调技能和批判性思维的教育制度，跟他的合作者一起编了大约5000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应该知道的人物、事件和观念。这个清单包括伽马射线、洛可可、绝对零度等词条。赫希说，这些词条是“每个有阅读能力的人都有的信息网络，是背景信息，储存在他们的头脑中，使他们能拿起一张报纸，以足够的理解水平加以阅读，能看懂，并且把他们读到的内容放入没有明确说明的背景之中，正是这种背景赋予他们所读的东西以意义。”1987年，赫希在这个清单的基础上出版了一本书，题为《文化基础：每个美国人都要知道的东西》，书出版后很畅销。

庞德斯通说，我们要多获取知识还有一个很俗的理由：知识越多收入越高。他做过一项测试，在测试中一题也没做对的人年收入大概是4万美元，全做对的人年收入平均是9.4959万美元，几乎相差5.5万美元，后者是前者的2.35倍。知识之所以能够带来更高的收入，可能是因为知识多会让雇主觉得这个人很聪明，从而起薪高、升迁快。更宽的知识面还有一些更加实质性的好处，主管需要知道他的领域之外的东西才能跟同事交流，营销人员需要了解流行文化。

知识多能促进创新，存储的知识使他们能够看到别人错过的类似之处。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但知识能够增强想象力。想象力通常要把两件事关联起来，知识和想象力密切相关。“毕加索是最早研究非洲雕塑的欧洲艺术家。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会遇到各种问题。不相干的知识可以成为类比、灵感和解决方法的源头。”另外，天生记忆力好的人能获得更多信息，而记忆力在工作中非常有用。■

锐利之眼，发情之眼

文 / 顾文豪



艺术评论家罗伯特·休斯与他的著作《绝对批评》

18岁时，在一家特价书店，我第一次读到澳大利亚著名艺术评论家、艺术史学者罗伯特·休斯的《新的冲击》。瞬间击中，形同“点射”。尽管它所包含的广博的艺术史知识，当时还无法完全理解，但一种眼花缭乱愉悦占据了头脑。

在评论集《绝对批评》中，休斯对形形色色的艺术家提出了绝不妥协的观点——从年湮代远的霍尔拜因、卡拉瓦乔到正当其时的大卫·霍克尼、埃里克·费舍尔，从教科书里的凡·高、马奈、毕加索，到当代先锋基塔伊、弗朗西斯·培根、莱昂·科索夫——近百篇评论共同唤起并提出了一连串关于艺术家的世界、作品的根本性追问：艺术是什么？艺术家是什么？如何识破那些哗众取宠的小丑戏法？如何穿越收藏家、拍卖行、艺术媒体合谋煽动的数字迷雾？

提问很难，回答也非易事。在回忆录《我不知道的那些事情》里，休斯谈到了乔治·奥威尔。虽然后者几乎没有写过什么艺术评论，但休斯仍将奥威尔视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批评家。在休斯初涉艺评的那个年代，大行其道的评论话语是“对法国后解构主义行话的一种抽象而殖民的拙劣模仿”，废话连篇，不知所云，外加“浓浓地掺和了腐朽的马克思主义引文”。这时，叼着烟卷、在打字机上敲出明朗文章的奥威尔就成了一股“清流”，适相对照。奥威尔语言明晰、表达有力、不滥用文字的写作风格，从此成了休斯的评论信条。

因此，就视觉艺术的讨论而言，休斯或许是少数几个不愿意玩弄廉价套路、私密语言的评论家之一，三言两语，切中核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具备艺术性、欠缺诗意。事实上，休斯始终带着两副眼光去审视艺术家：一副是锐利之眼，一副是发情之眼。

他赞赏卡拉瓦乔是“一个精细的身体语言观察者”，人们如何坐起、耸肩，如何颓然倒下，如何在痛苦中扭曲，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休斯将其视为“艺术史上的一个枢纽”：“他之前有艺术，之后也有艺术，但这些艺术不是同样的艺术。”戈雅的画藏着“要认识真理、讲述真理的欲望”，华托则是一个“人的背影”的发明家，在他手中，一个年轻女性的背影“变得就像人脸一样富于表情”。而马奈最佳的作品中总存留着他不探寻的痕迹，“每一寸都记录着他想看到，随后又想找到把视像合理地‘翻译’成色斑的做法的积极欲望”。莫兰迪的画则似乎“谦逊地、执拗地试图让眼睛慢下去，要求眼睛放弃不集中注意力和喜欢一扫而过的习惯”，学习将全副重量押在小小的物体上，告诉人们如何好好看东西。

同样，他也嘲讽安迪·沃霍尔就像是一条“专心致志、无比贪婪”的掠食的鲑鱼，势利算计，靠着对现代传媒与名声机制的谙熟精通，沉迷于为特权利益服务，沃霍尔的意义不在于他的明星效应，仅仅标志着“一个供方美学时代的到来”。而27岁就因吸毒早早死去的黑人巴斯奎特，休斯直斥这就是一个艺术圈如何制造、营销不曾接受过正规训练的小天才的荒唐故事，暴露出我们这个时代对“一举成名天下知的

迷狂”。甚至连以批判现代消费社会知名的鲍德里亚，休斯都毫不客气地评价他是一个“专为画商说话的知识分子”，认为鲍德里亚将所有的文化意义都瓦解成纯粹的所谓“拟像”的努力，最终使人们误认艺术除了推销其自身之外，别无其他可言。

“他是一位智识勇士，观点充满攻击性，咄咄逼人，对艺术却永远热泪盈眶。”前《纽约时报》艺术评论员本杰明·吉诺齐奥这样评价罗伯特·休斯。作为《时代》周刊的首席艺术评论员，拥有长达30年艺评经历的休斯，向来快人快语，对糟糕的作品从不宽贷，对杰出的艺术家也从不吝吝赞美。但重要的不是这些，而是休斯的评论提醒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该如何理解文化。

“构成文化的事物是通过内心敏感性来理解、记忆和欣赏的。”美国文化史学者雅克·巴尔赞面对每况愈下的人文景观曾如是说。在他看来，“文化”是智性和精神产生的传统事物，是思维所形成的兴趣和能力，更是一种自我修养的努力。恰成反证，我们正身处一个文化活动越来越多，文化本身却日趋衰落的时代：学者越来越多，学问越来越少；艺术家越来越多，艺术越来越少。

与此相应，各种头衔的专家以细菌繁殖的速度大量出现，艺术和人文学科的重要性被迫转移到各种具体的场所，职业的、销售的以及虚荣的。这时，文化就不再是分享者用来完善自己精神的财富了，更严重的是，我们随之失去了帕斯卡所说的“敏感精神”，无法从整体上来观照文化和艺术，我们就像动物园里的狗熊，看似大嚼大咽，一刻不停，实则满嘴残渣，所得无几。

因此，重要的不是休斯对形形色色的艺术家究竟提出了何种褒奖与批评，而是经由他的评论，我们是否能重拾对艺术的敏感性，是否能从各种专家的残唾余沫中逃脱出来，重新拥有对事物进行总体评判的能力，以免沦为尼采口中那种可怕的“长着1000根触角的动物”，虽然这种动物满腹经纶，学问淹通。

让我们回到休斯激赏的奥威尔。在《我为什么写作》一文中，奥威尔袒露了自己的写作动机，分别是纯粹的利己主义、审美热情、历史感以及政治目的。

他接着强调，刚成年的时候，前三个动机的影响远大于第四个，但越往后，政治目的越是强烈地主导了他的写作。但这种政治目的并非任何实际的权力斗争，而是一种“想让世界朝着某个方向发展，想要改变其他人对自己正为之奋斗的那个社会的看法”，是一种与巨大的时代习见、偏见乃至愚见做持久斗争的写作。

同样的，我认为深受奥威尔影响的休斯，也并未将他的“绝对批评”仅仅局限在艺术家身上，而是敏锐地注意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困境。困境之一，就是“被幻灯片喂饱的一代”。

也许无法想象，但事实上，作为一个澳大利亚评论家，一个“被流放的国度”的居民，休斯始终都有一种身份焦虑：文化自卑。因为文明是有限的、有中心的、不平等的，尤其是经历过殖民地统治，“无论你做什么，对其价值心中都无底，直到你自己社会以外的人对之做出判断之后才有数”。也就是说，你自己不掌握对自己的评判权，你需要一个主子的认同。

不单如此。休斯认为更严重的伤害在于没有原作可看：有学校教人如何画塞尚那样的画，但博物馆里却没有塞尚的原作。这是一种“暴政”，而“没有一种暴政，能比得上看不见杰作的暴政”，因为只有亲眼见过杰作，人们才有可能走向解放。“被幻灯片喂饱的一代”，就像是只能电话性爱的一代，从未体验过真实的快乐。而对从事艺术的人来说，在一个严重缺乏原作，仅仅依赖复制品的环境中成长，丧失的不仅是对笔触、颜色、真实比例的感知，更是文化的话语权——没见过原作的人，就是艺术王国里的二等公民，唯有苦等文化传教士的到来。

艺术本应为最广大民众所共享，体验艺术就是体验一部分的历史。因此，垄断艺术实质也就是垄断历史，垄断民众观看的权利。这时，休斯的“绝对批评”就可以视为是对另一位杰出的艺术批评家约翰·伯格的响应：“一个被割断历史的民族或阶级，它自由选择和行动的权利，远不如一个始终得以把自己置于历史之中的民族或阶级。这就是为什么——这也是唯一的理由——所有的古代艺术，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王安忆：我们以谁的名义（7）

文 / 朱伟



作家王安忆（摄于上世纪90年代）

《长恨歌》是王安忆的第六部长篇。她30岁时写完《69届初中生》，10年里勤勤恳恳，写了6部长篇。写《长恨歌》时，已经从容不迫、炉火纯青了。

《长恨歌》写一个沪上淑媛错位的40年，故事其实简单。王琦瑶，琦是美玉，宵朗之琦，能耀亮暗夜。瑶，“瑶华不琢，则耀夜之景不发”，也是美玉。冰雪态也称“瑶华”的。王安忆写这个王琦瑶非个体，她代表

上海弄堂里曾经的小女儿情态，“这情态的名字就叫王琦瑶”。王安忆一开始就归结：上海弄堂因为有了她，才有了情味；因为有了这情味，便有了痛楚；这情味一点点积累下来，在烟火气里，就有了弄堂感动。她通过这个群体写她所体会的上海，所以，第一章最后一节，在鸽子见证着飞过之后，才写到弄堂里，有点寒酸的闺阁中，在流言里生长起来的王琦瑶。这个王琦瑶的命运，从一开始就确定了的——“本是如花蕊一样纯洁娇嫩的闺阁，却做在这等嘈杂混淆的地方，能有什么样的遭际呢？”

王琦瑶其实是自尊的，矜持的，聪慧又善解人意的。这样一位小家碧玉的女子，王安忆给她红颜，却非简单是薄命。她虽一生都“妻不妻，妾不妾”，却不缺恩爱。她所爱之人终不能成眷属，如康明逊。但与她，却也是情投意合的真爱，她生下他的孩子，也认可了他的“没办法”。她不爱程先生，却依赖了程先生一生的恩泽；耽误了程先生，却也回报了她的温存。什么是价值呢？非婚姻才有价值。由缘分说，程先生这半辈子，说是因为她王琦瑶，悲剧了一生也好；说是虽无婚姻实质，却与她王琦瑶在精神上相守了半辈子也好。如按“神界”的说法，他与王琦瑶，构成了所谓的“神界”吧？留给王琦瑶金条的李主任、鄂桥送豆腐的少年阿二、“我什么事情也没有办法”的康明逊，甚至错着年代的那个“老克腊”，都不过是凡界性爱之种种，时过境迁，留下各自的刻痕而已。

我感觉这部小说的好处，就在于写王琦瑶一错再错、事事相舛中有悲凉感，却都以顺遇的态度。她觉到所遇都是避不掉的，觉到这悲凉本是人生该有的，也就没什么怨艾，就以温婉压了感伤。前两部中，程先生对王琦瑶、蒋丽莉对程先生；王琦瑶错过了程先生，回头来为何又错过；程先生错过了蒋丽莉，回过头来为何还错过；三角错位关系中彼此的相守与体贴，王安忆每一步都写得暖暖的。真正的悲惨她都不用厚重的笔墨——蒋丽莉临终抱着王琦瑶大哭一场，蒋丽莉说：“我这辈子都是你们害的，我真是太倒霉太倒霉了。”王琦瑶就说：“你说倒霉，我就更倒霉了。”

一周后，蒋丽莉就死了。程先生是“文革”后被当作“特务”关了一个月，回到空落落的家，在月光与风的鼓励下，就跳楼了。王安忆甚至不交代王琦瑶如何应对他的死。王琦瑶自己，最终是被她女儿的女友的男友错杀，悲剧起于李主任在“爱丽丝”公寓留给她“压底”的金条；而情景，则是40年前，她在电影厂试镜时就暗示过的。王安忆以《长恨歌》为篇名，王琦瑶是上海弄堂里的“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

王安忆写这40年的一个个节点：抗战胜利，短暂平安氛围中的花样年华；1948年，在一个旧时代结束前被金屋藏娇；然后李主任突然就死了，她就到了桃花源般的鄂桥，再回到上海，已经是50年代。50年代，王安忆将四人一桌的麻将、下午茶与围炉夜话都安排在1957年，浑然不觉窗外世界。那时在弄堂里，关起门，这样的隔世场景很多，马路上还都是活在旧时代中人。三年自然灾害，写的是“人人谈吃”、西餐店门前的排队、奶油蛋糕的香味，虽然配给的是有霉味的山芋干。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典型记忆。“文革”，程先生的死轻巧就带过去了，然后，很快从薇薇的1976跳到王琦瑶身临舞场，恍惚当年重演的80年代。王安忆是有意对政治背景这么处理，来凸显王琦瑶的缘遇。第一部写她走出弄堂成了“三小姐”，第二部冷落回弄堂，第三部时光倒流，又错位为热闹的派对中心。我理解，程先生、蒋丽莉死后，康明逊、严师母翻过，第三部是为了要在灯火阑珊中，给这罗曼蒂克一个令人唏嘘的尾声。王安忆让自以为活在40年前的“老克腊”与王琦瑶还有一段忘年交，在夕照中让王琦瑶体会时光倒错，多少有点残酷。但若由着顺遇，本着“不扫人兴，不碍人事”的态度，王琦瑶完全可以有一种在悲凉中，守着她的“自知之明”，感人地谢幕。她说：“做女人太不由己了，女人有自己的自知之明，自己的可怜。”“自知之明”本是她之前所有生活的应对态度啊。不知为何王安忆却终要

让她破掉几十年之守，要她抱出为“底”的那个雕花木盒，说“什么都给他，怎么就不能给她几年的时间”，硬要破掉她的自尊，让人看“这40年的罗曼蒂克竟是这么一个可怜的结局”。

王安忆写这40年，鄂桥一章里，王琦瑶的外婆有一种很重要的认识——“长得好其实是骗人的，又骗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长得好，自己要不知道还好，几年一过，便蒙混过去了。可偏偏是在上海那地方，都是争着抢着告诉你，唯恐你不知道。所以，不仅是自己骗自己，还是齐打伙地骗你，让你以为花好月圆，长聚不散，帮你一起做梦，人事皆非了，梦还做不醒。”顺这个认识，王琦瑶的错，便是被骗与自骗的结果。但我宁愿顺着暖暖的阅读感受，顺着她的缘与遇，去体会这40年扭曲中，她所凸显出的求与守，这求与守凸显出来，便是一个女人这40年的光荣。当然，反过来也可读作一场漫长春梦中自欺欺人的可怜，读作一种“拘泥不开的美”如何在凡界绽放中，被染上各种各样的颜色。一部好小说，提供一个开放的结构，从不同的门进去，本都是可以走通所有房间的。不同道路的交叉，才构成丰富的回味与感叹。

我特别喜欢王安忆在这部小说中的叙述。那样细致地写她对各种事情的认识，从容不迫与炉火纯青，就指她的叙述。她从弄堂、闺阁写到晚会、公寓、鄂桥的桥与砧杵声，写得最有诗意是鄂桥与送豆腐的少年。平安里的下午茶与围炉夜话，很有《红楼梦》那种淡淡日常中充满了韵味的写法。程先生与王琦瑶再相会，那种微妙的知会，则是最感人的。这一段就令人感觉到，人与人之间，其实是一种修行，所谓“修百年才能同舟，修千年方可共枕”。这是王琦瑶对“老克腊”说的话。

王安忆连载这部长篇小说的时候，我已经准备接手《三联生活周刊》了。对我而言，空闲期也就从此结束了。■（完）



《长恨歌》，作家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

大家都有病



朱德庸



张大君买房记

文 / 姚霞 (苏州) 图 / 陈曦



一年前，张大君要买房，没买成。他想不通，手里揣着40万元的现金，他也就只想买个小两居。张大君贷不到款。他并没上银行的黑名单，这辈子他都没向银行借过钱，也没问任何人借过钱。

张大君闷闷不乐，无论晚上的生意好不好，没生意的时候，他蹲在地上，闷着。40万元的现金，60平方米的房，首付能付八成，差个十来万，他就还得要在车库住上两年。想起这，无比沮丧。

张大君以前在广州、在南京也做这大排档的生意，身边也积了些钱，但从没想着要买房。6年前，他来到苏州，一下子喜欢上这里，暗下决心要在这里长住，老婆也这样想。两人在一个地段还不错的小区租了个车库，500块钱一个月，也没觉得心疼。第二年，老婆又生了儿子，张大君舍不得将儿子放到老家，打算租个两居室，把女儿老娘一起接过来。老婆想儿子在身边，但不同意租房子，怎么着也得2000块吧，于是在这地段又租了一间车库，连在一起，过道也能占用，一家五口过起了日子。

张大君两口子晚上做大排档，凌晨回家睡觉，下午准备材料，日子过得很满意。女儿托人也上了小区的幼儿园。老娘每天抱着儿子就在小区的小公园里玩，车库边上就是小公园，十分方便，这些年也没觉得有什么不便。就是老娘念叨：家里的四底四楼空着，在这儿住车库。说这话也只是可惜家里十几万元做的楼房空着，倒不抱怨住车库，毕竟一家人在一起。这比什么都好。

张大君做大排档做了20年，夫妻俩觉得无论如何要在苏州住上正经屋子，有厨房有卫生间，有写字台让女儿做作业。每年过年，夫妻俩都要算一算攒了多少钱，还好，没病没灾，存款年年往上蹿几万，妻子说差不多了，买吧，贷一点一个月还上3000元不怕的。女儿上小学了，好面子，不愿跟人说住车库，大夏天的，大姑娘了，车库洗个澡都不方便的。

张大君说恐怕贷不成。在苏州他没单位没有保险，果然一问，没门。妻子说找她兄弟借，张大君不答应，他不愿意。

一年后，张大君的40万变成了45万，在老婆的天天催促下，张大君终于同意借钱。老婆立即开口跟她

的兄弟借，兄弟在常州做生意，虽没存什么钱，手上的活钱还是有的，看妹子一家住车库，早不忍，立马拿出15万，催妹子快点买，这房价势头太猛，指不定要涨到什么样呢。

张大君老婆拿着15万块钱的卡，火车上一路哭着回来的，激动开心还是感恩，说不出。全家都兴奋得不得了，仿佛马上要住新房了，儿子要买个上下床，姐姐睡下面，他睡上面，他怕鼻涕虫。车库的房子夏天老有这种东西。

小区还是以前的小区，房子还是以前的房子，房价却不再是以前的房价了。张大君手上的60万再也买不到两居室。他们频频跑中介，再差的房子价格都每平方米1.3万元。张大君这回真急了，加上没时间睡，两眼血红，老婆也是，走路两条腿都打晃。这一年，他们白天睡晚上干活，没想到外头变化那么大，原指望再干两年就能买个房，可这架势，再怎么干都赶不上房价，并且被甩得越来越远。

张大君急，老婆更急。老婆有天晚上出摊累倒了。张大君扶起老婆，才发现老婆瘦了许多。两口子抱头坐在路灯的角落里哭。白天里仍是看房，张大君要老婆歇几天，老婆不干，夏天里生意好，歇不起。

房子再贵，这回也要搞定。他们决定买一室半，买一楼的，院子里也能利用起来，中介搞来好多房源，还有个两室的，便宜点，只是听说有老人死在屋子里，张大君踌躇不定，上百万的买卖啊。这个时候，张大君也摸清了借款的路子，还花钱搞了几张信用卡。从来没有赊过账的张大君也知道不用分期付款、不花点利息是不可能买到房子的。

可是越急越不行，房价都1.5万、1.7万，张大君彻底晕了。他想不通，这么旧的小区，都20多年了，如何两间屋子，100万元砸出去都买不到呢。老婆有一天又去了常州，哭着去的，她还了兄弟15万块钱。

买房的事一家人都不提了，但张大君退了车库，他租了两居室，住在那个老太死在家中的屋子里。☑